



王建华 主编



陶成章传

TAO CHENG ZHANG ZHUAN

谢一彪 陶 侃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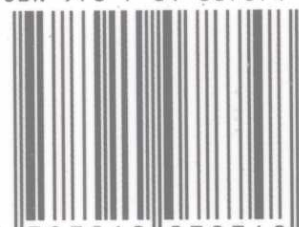
人民教育出版社



陶成章传

TAO CHENG ZHANG ZHUAN

ISBN 978-7-01-007874-8



9 787010 078748 >

定价：32.00 元



王建华 主编

絨文化
研究文庫

陶成章传

TAO CHENG ZHANG ZHUAN

谢一彪 陶 侃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姚劲华 车金凤

装帧设计:佳艺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成章传/谢一彪 陶侃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ISBN 978-7-01-007874-8

I. 陶… II. ①谢…②陶… III. 陶成章(1878~1912)-传记
IV. K8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7513 号

陶成章传

TAO CHENG ZHANG ZHUAN

谢一彪 陶侃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5.375

字数:35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7874-8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邵平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会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

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

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

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前 言

学术界对光复会领导人，如蔡元培、章太炎、秋瑾、徐锡麟等研究较多，而对陶成章的研究却很不够。长期以来，陶成章作为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并未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很不公正的。1912年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因此，在蒋介石统治时期，陶成章成了研究的禁区。陶成章曾与孙中山有分歧，发起过“倒孙风潮”，在南洋重组光复会，积极倡导与孙中山在沿海起义不同的“中央革命”，被认为是“分裂”革命组织，削弱革命力量，干了“亲痛仇快”的事，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家也未给予陶成章公允的评价。

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实际领导人。光复会刚成立时，考虑到需要一个有名望的人出任会长，因此，推选了蔡元培担任早期光复会的会长，但蔡元培是一介书生，早期光复会的活动大都由陶成章负责，蔡元培不过是名义上的负责人而已。光复会联络会党，组织革命力量，创办大通学堂，培养军事人才，筹划武装起义，都是陶成章在四处奔走。光复会后期推举章太炎担任会长，也是考虑到章太炎的名气大而已，章太炎重视革命的宣传工作，而后期光复会在南洋筹款，光复东南，克复南京，也都是陶成章在积极筹划。陶成章是光复会的核心领导人，

1912年陶成章遇刺后，光复会也随之瓦解。

如何看待陶成章与章太炎等人发起的“倒孙风潮”，一直是学术界一个备受争议的焦点问题。陶成章与孙中山产生过激烈争论，其性质属于革命党人内部不同的政见分歧，双方属于政友而不是政敌。自从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与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等人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双方也有过一些偏激的攻击性言论，这不过是革命同盟军内部不同意见的碰撞而已，很多是关于革命策略的不同看法，双方并不存在根本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孙中山和陶成章反对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目标还是一致的，同盟会和光复会在光复东南的一系列斗争中，也互相配合，共同战斗。革命的征途充满艰辛和坎坷，革命同志之间对革命的策略产生不同的看法，内部有一些意见分歧在所难免，应体谅革命家处于险恶环境下，为早日争取革命胜利而产生的一些急躁情绪，不必过于苛责前人。任何一个革命家都不可能是个完人，更不能因为革命家有些瑕疵，而以偏概全，否定其革命的一生。陶成章离开我们已经90多年了，今天我们应该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当年的那场争论。更何况历史证明，陶成章主张实行与孙中山在沿海起义不同的“中央革命”；辛亥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陶成章又反对偏安南京，要求乘胜追击，直捣黄龙，攻克北京，消灭封建残余势力，今天仍不失为真知灼见。

皖浙起义失利后，陶成章在南洋重组光复会，也是学术界分歧较大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分裂革命势力，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华兴会和兴中会均合并到同盟会，作为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不复存在，但光复会作为同盟会的加盟团体之一，并未合并到同盟会，光复会会员以个人

身份加入同盟会，光复会仍以自己的名义在日本和南洋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光复会自成立伊始到陶成章遇刺后解散，从未停止发展自己的组织和单独开展武装斗争。光复会领导人在同盟会的领导机构中也没有发言权。皖浙起义后，大批光复会员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流亡日本和南洋地区。而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离开东京策划华南武装起义后，东京的同盟会总部无所作为，未能起到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指挥中枢的作用。陶成章在南洋筹款受阻，回东京提出改组名存实亡的同盟会本部，改由黄兴出任总理，以便领导日趋高涨的长江中下游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陶成章等人的意见遭到拒绝后，重组了光复会，在东京设立了光复会总部，在南洋设立行总部，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高潮。重组后的光复会组织成分变化不大，仍以早期光复会成员为主体，除极个别不良分子外，绝大多数都是坚贞不屈的革命党人。光复会会员遍及国内的苏、浙、皖、闽、湘、粤以及海外的南洋和日本等地，有的虽然加入了重组后的光复会，但并未声明脱离原有的同盟会会籍，而是兼有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双重身份。重组后的光复会仍致力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不能说是搞分裂。

陶成章遇刺身亡，同盟会的领导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孙中山是否介入，一直是史学界的一个谜案。1912年2月14日凌晨2时左右，2个黑影翻过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低矮的围墙，径直来到二楼西面的6号病房，朝熟睡的陶成章开枪，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辛亥革命的元勋，光复会的巨擘陶成章遇刺殉难，年仅35岁。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也敲响了辛亥革命失败的丧钟。中华民国成立不到1个月，就在离民国首都南京近在咫尺的上海发生暗杀创立民国元勋的惊天大案。

凶手就是后来任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和光复会的叛徒王竹卿，而操纵者就是沪军都督陈其美。民国初年发生过许多暗杀革命党人的惊天大案，如1913年暗杀宋教仁的“宋案”，1916年暗杀陈其美的“陈案”，但均已破获。唯有民国建立伊始发生的“陶案”，不了了之。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以及光复会骨干魏兰指控孙中山是幕后指使人，李敖也认为是孙中山在幕后策划。也有学者认为，即使孙中山事先没有参与“谋杀”陶成章，事后也应该知道“陶案”真相。但孙中山却不予以追究，甚至信任刺杀陶成章的凶手蒋介石以及策划人陈其美。也有人认为，孙中山与刺陶事件没有任何关系。这仍是学术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求知若渴	(1)
第一节 江南才乡	(1)
第二节 家道中落	(7)
第三节 苦难童年	(10)
第四节 义塾塾师	(14)
第五节 任教通艺	(17)
第六节 勤奋好学	(20)
第七节 钟爱宗羲	(23)
第二章 东瀛拒俄	(27)
第一节 北上受挫	(27)
第二节 东渡扶桑	(31)
第三节 改入成城	(37)
第四节 参加拒俄	(42)
第五节 致力革命	(44)

第三章 联络会党	(50)
第一节 秘密集会	(50)
第二节 会党简史	(53)
第三节 会党概况	(58)
第四节 结识振声	(63)
第五节 创办先志	(66)
第六节 联络双龙	(70)
第七节 结交张恭	(73)
第八节 策划起义	(77)
第九节 起义受挫	(81)
第十节 创建会馆	(88)
第四章 组建光复	(94)
第一节 成立光复	(94)
第二节 确立宗旨	(100)
第三节 发展组织	(107)
第四节 加入同盟	(112)
第五章 创办大通	(119)
第一节 筹措经费	(119)
第二节 招收学员	(123)
第三节 特殊教育	(127)
第四节 捐官计划	(131)
第五节 任教芜湖	(139)
第六节 秋瑾出山	(144)

第六章 筹划起义	(149)
第一节 鸿雁传情	(149)
第二节 京城周旋	(158)
第三节 分发安徽	(162)
第四节 锡麟莅皖	(168)
第五节 撰写徐传	(176)
第六节 流亡海外	(181)
第七节 撰写秋传	(187)
第七章 风波乍起	(192)
第一节 经费风波	(192)
第二节 明码事件	(198)
第三节 孙陶分歧	(203)
第四节 主编民报	(208)
第八章 南洋筹款	(212)
第一节 筹集款项	(212)
第二节 连载浙案	(215)
第三节 缅甸筹款	(218)
第四节 槟榔受挫	(221)
第五节 泗水再挫	(223)
第六节 商议重组	(226)
第九章 兄弟阅墙	(229)
第一节 猪仔事件	(230)

第二节	残害事件		(234)
第三节	蒙蔽罪状		(236)
第四节	敛财事件		(241)
第五节	善后九条		(245)
第六节	中山自述		(252)
第七节	中山反击		(259)
第八节	孙陶之错		(264)
第十章 重组光复			(274)
第一节	酝酿重组		(274)
第二节	再组光复		(281)
第三节	发展组织		(285)
第四节	拟办报刊		(289)
第五节	经商计划		(294)
第六节	储备人才		(300)
第七节	捐弃前嫌		(305)
第十一章 光复东南			(311)
第一节	建立学社		(311)
第二节	上海起义		(315)
第三节	光复杭州		(319)
第四节	推选浙督		(323)
第五节	倡议援宁		(328)
第六节	攻克南京		(332)

第十二章 箕豆相煎	(339)
第一节 同室操戈	(339)
第二节 其美其行	(345)
第三节 陈陶之争	(352)
第四节 卧榻之师	(360)
第十三章 血色疑案	(368)
第一节 增韞事件	(368)
第二节 反黄事件	(374)
第三节 力辞浙督	(380)
第四节 血溅黄浦	(387)
第五节 真凶志清	(396)
第六节 陶案迷雾	(406)
第十四章 气壮河山	(419)
第一节 魂归西湖	(419)
第二节 会稽同悲	(428)
第三节 光复瓦解	(437)
第四节 中山祭陶	(441)
第五节 万古流芳	(452)
参考文献	(457)
后 记	(471)

第一章 求知若渴

绍兴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位于浙江东部，背靠会稽山，东临杭州湾。绍兴又是著名的名士之乡，人才辈出，相传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重建越国，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留下了传诵千古的诗篇，抗倭民族英雄姚长子和抗英爱国将领葛云飞的事迹在越地广为传诵。近代又诞生了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光复会的杰出领导人陶成章。

第一节 江南才乡

陶成章的故乡位于绍兴城东 16 公里的陶家堰，简称陶堰，东接宁波港，北临杭州湾，杭甬铁路和萧温公路及萧曹运河穿镇而过，是往来杭宁的要道，水陆相映，人俊物阜。陶堰位于鉴湖中洲地，东汉永和年间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建了江南地区最早的鉴湖蓄水工程，改造了山会平原的沼泽之地，曹娥江以西几千顷土地获得灌溉之利，免除了旱涝灾害，成为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马臻筑塘蓄水，防首尾二江，纵横 130 里，筑 25 道堰，后来陶姓居于堰下，故名陶堰。陶堰地势平坦，青山绿水，风光秀丽。南面的大流湾四面环水，小桥纵横，曲折

逶迤，置身其间犹如蓬莱仙境，扑朔迷离。

陶氏属陶唐氏后裔，相传会稽陶氏迁自江西浔阳，属于晋朝大将军陶侃之孙靖节先生陶渊明长子俨的后裔。唐朝末年，连遭战乱，其先祖由江西浔阳迁往南昌新建。元顺帝时，兵乱再起，陶氏先祖离开江西，辗转来到浙江。靖节先生 27 代孙邦本，字国宁，子一圭，字聘之，号信八，先往台州依族人而居，其第 5 子幸五，讳岳，字宗扬，迁居绍兴陶堰，为会稽陶堰始祖。陶岳（1306—1385 年）为陶唐氏 93 世，靖节先生第 29 代孙。陶岳曾从堪舆家宋朝遗臣敏师的弟子杨宗敏游学，尽得其传授之术。

陶岳来到绍兴，准备择吉地定居，先至萧山冠山下，徘徊良久，赞叹说：“此地颇佳，但暂时搁置再说。”

陶岳继续泛舟往东，入绍兴城，出五云门，至东湖箬箕山，登高望气，只见洲渚忽断忽续，不可胜计，心中大异，又沿洲行 30 余里，抵达陶堰，见堰南亘为五洲，纵四横一，枕广野，负贺池，北连巨海，南接越岭诸山，若列宸然，欣喜异常，连声称赞：“找到了！找到了！”

于是，陶岳斩茅除草，开辟路径，居于白塔洋口。

据《会稽陶氏族谱》记载：“盖曩者菱苻所都，帆樯所驰，至宋中叶，防坏湖落，而后洲单出焉，稍耕为汙莱，室为瓜牛，荡谿葑蓂，千有余岁，而后复为人居。”陶岳于元末至正年间来到堰南，距今已有 650 多年。陶堰茅葑遍野，地荒人稀。

从江西浔阳迁居陶堰的陶氏一世至二世逝世后，均安葬在绍兴县富盛镇瓜麟蟠龙坳。

相传陶岳逝世后，其子曾请著名的风水先生选择墓地。风

水先生找了许多地方，均不满意，最后才选择富盛镇瓜麟蟠龙坳。

风水先生满意地说：“此地颇佳，后背有山，前面有池，坐北朝南，将来子子孙孙都有出息。除皇帝外，其他官职都能升任，还能代代相传。”

关于陶岳的安葬，还有另一个版本的传说。相传风水先生选好墓地后，曾询问陶岳的儿子：“愿后代子孙做皇帝呢？还是代代有官做？”

陶岳儿子不假思索地回答：“还是代代有官做吧！”^①

于是，风水先生在陶岳下葬时，用麻绳捆绑他的棺木，但稍微偏离了一点方向。

陶氏地脉，出自箬箕山。秦始皇东巡会稽时，曾驻蹕饮马。相传明代中叶，族中长老梦见陶氏列祖训示：“山顶龙池庵中有池，池中有石，那是陶堰阳基发源地，住持嫌其碍眼，准备将其除掉，这对陶氏族人很不利，必须立即予以制止。”

陶氏其他族人也得到列祖的梦告，梦的内容大致相同。

于是，陶氏族人立即上山向住持询问，住持心中诧异：“我正有挖掉池中石的意思，你们怎么会知道呢？”

陶氏族人将祖先托梦一事告之，还捐献款项，并与之相约：“世世无相妨也，犯斯禁者，必举族共击之。”^②

陶氏自陶岳迁绍以来，支庶繁硕，聚族万丁，人文蔚起。

陶氏家族也是绍兴的望族之一，与孙端的孙氏、霞川的沈氏、水澄巷的刘氏、峡山的何氏、道墟的章氏、白洋的朱氏、

① 访问陶永铭先生和陶侃教授，2006年4月9日。

② 《会稽陶氏族谱》，《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203页。

梅墅的祁氏、五云的王氏、州山的吴氏、后马的周氏、姚家埭的姚氏、鲁墟的陆氏、樊江的商氏、状元坊的张氏、仑塘的罗氏等都是越中世家。

明朝嘉靖年间，陶堰修建了陶氏最大的祠堂——陶大祠堂，位于白塔洋畔，靠近陶氏始祖老屋的旁边，坐北朝南，五间四进，粉墙黛瓦，屋宇轩昂，天井宽阔，中有甬道，两旁植有松柏。祠堂后进设有龛座，呈阶梯形状，按辈份依次排列陶氏列祖列宗牌位，龛座前设有栏楯，下放祭桌。祠堂中进的明堂，铺有石板，光洁平整，正中一间是拜厅，也是祭祀散胙的地方，两边有休息室，厅的上方悬有圣旨箱，庋藏历代帝王所赐的诰命和敕文，有的因功加封晋秩，有的封妻荫子，也有的赐谥号和赠官。陶大宗祠还有田产和荡产数百亩，有专职人员管理，还有较为严谨的族规。

自陶氏迁陶堰的第四世开始，分成六大支系，即西长房、西次房、东长房、东次房、南长房和南次房。陶氏后来子繁孙衍，不少人迁居外地，也有的因任职异地，便在当地落户定居。据《陶氏族谱》记载，有的迁往平水山区，有的迁往萧山，还有留居广东、湖南、江西，甚至贵州、内蒙以及东北三省。不少外地的陶氏后裔来到陶堰寻根认祖。

陶氏自明清以来，科第仕宦，连绵不绝。相传陶岳有5子，耕读传家。明成化元年（1645年），六世孙陶性中举，弘治三年（1490年）陶恽考中进士，官至刑部主事；弘治八年（1495年）七世孙陶谐中解元，次年会试又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从此，簪缨代出，俊彦迭起。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仇兆鳌在《重修陶氏族谱序》中说：“予昔往来越郡，距城四十里外，见有高峰矗立，参青云而直上者，询之则稷山也。其

下有望族，陶氏世居於此。树荣刻阀，甲第相望，出而为巨卿、名臣、词宗、学士，先后辉映者，代不胜数。”^① 明清之际，朝廷以科举取士，从举人和进士中选拔和补充官宦。从明成化元年（1465 年）至崇祯十二年（1639 年），陶堰有 33 人考上举人，其中 1 人为解元，即乡试第一名。又有 3 人获经魁衔，即乡试名列前 5 名。明万历十三年（1585 年），陶輿龄在应天参加乡试，陶望龄在浙江参加乡试，兄弟两人南北同科中举。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陶堰的 33 名举人中，有 14 人联捷成为进士，其中会元、探花、榜眼各 1 名。明嘉靖四十四年（1561 年）乙丑会试，全国共录取进士 394 名，陶堰有 2 名进士，陶大顺与陶允淳父子同登进士榜。从此，陶堰的学子开始称雄文坛。从明洪武四年（1371 年）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全国共出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 244 名，其中浙江 48 名，而陶堰自明弘治三年（1495 年）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的 126 年中，出榜眼、探花、会元各 1 名，占浙江全省名额的 1/16。至于仕宦方面，有的官至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和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校长）。^② 陶谐官兵部左侍郎赠兵部尚书，谥庄敏；陶承学官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恭惠；陶大临官礼部右侍郎赠礼部尚书，谥文僖；陶望龄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兼左春坊左谕德国子监祭酒，谥文简；陶大顺巡抚广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清代 276 年，陶堰学子继续称雄文坛，共有 79 人考取举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陶峒等 3 人同时中举。乾隆三

① 仇兆鳌：《重修陶氏族谱序》，《陶成章史料》，1987 年版，第 200 页。

② 朱顺佐、张能耿：《江南人才名镇——陶堰》，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 页。

年（1738年），陶杏秀等3人同时中举。乾隆十五年（1750年），陶士麟等2人同时中举。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陶鉴等2人同时中举。道光八年（1828年），陶绍泉等2人同时中举。咸丰二年（1852年），陶模等2人同时中举。同治元年（1862年），陶嘉猷等2人同时中举。同治六年（1867年），陶方琯等2人同时中举。光绪二年（1876年），陶濬宣等2人同时中举。光绪十五年（1889年），陶邵学等2人同时中举。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邵明之、邵力子等3人同时中举。清代陶堰2人以上同时考上举人达17次之多。清代陶堰79名举人中，又有28名荣升进士。乾隆十八年（1745年）礼部会试，全国共取进士313名，陶堰2人榜上有名。乾隆四十六年（1761年）京中会试，全国取进士170名，陶堰的陶鉴和陶廷琚叔侄同登进士榜。光绪二年（1876年），全国取进士324名，陶堰又有2人金榜题名。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会试，全国取进士292名，陶堰又有3人同登进士榜。^① 清代陶堰还有许多人虽未登科，但在学术上却卓有成就，有著名的理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画家、实业家。清代陶堰在仕宦方面依然后继有人，不胜枚举，陶恩培任湖北巡抚，陶方琦任湖南学政，陶大均官至清外务部左丞，官阶为从一品，至于出任知府和知县的陶堰人氏，更是数不胜数了。

陶氏作为越中的鼎盛大族，被誉为：“陶家堰陶氏宗谱里，就是科第方面少了一名状元，仕宦方面少了一位宰相，其他是应有的了。”^②

① 朱顺佐、张能耿：《江南人才名镇——陶堰》，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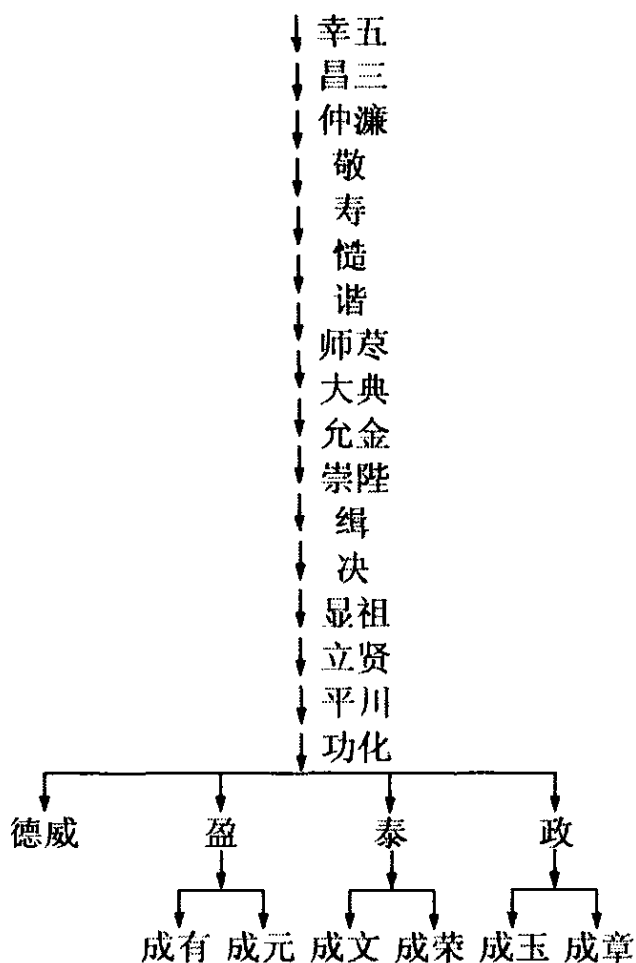
② 陈觉民：《陶焕卿轶事》，《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28页。

近现代以来，陶堰依然人才辈出，其中有革命家、文学家、史学家、书画家和学者，也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至于中高级知识分子更是难于胜数。

陶堰人杰地灵，名流荟萃，群星灿烂。近代的陶堰名人中，首屈一指的是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陶成章。

第二节 家道中落

陶成章世系（一）^①



^① 陶维堉：《陶氏史记》（上），1996年版，第141页。

陶氏在明朝曾是簪缨累叶的大族。自陶氏迁陶堰的陶成章第七世祖陶谐始兴旺发达，成为与明朝相始终的奕世簪缨。

陶成章是陶氏迁陶堰的东长房第19代孙。东长房在明代本是簪缨的官宦门第，但入清以来，陶成章这一支脉的祖先，家道中落，以读书耕牧为业，没有以华袞荣其身者。高祖名平川，字圣化，高祖母吴氏，祖父名功化，字贡华，祖母陈氏，生子陶德威，早卒，长子陶盈，字仰山，次子陶泰，字时亨；陶功化续娶章氏，生三子陶政，字品三。

同治四年（1865年），陶功化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而子女均已成家立业，于是邀请亲戚舅舅陈光荣和表亲王承珣，以及陶氏长辈陶德化、陶德一作见证，将产业分给三个儿子。

陶功化首先作了简要的说明：“缘妻陈氏所生两子，长曰盈，次曰泰。又娶一妻章氏，生一子名曰正。现今章氏已故，俱以婚娶，立业成家，意欲各炊。而吾年迈七旬，古曰树大分枝，邀亲族，所有住房、田产、园地、河荡、佃田、什物、器皿等项，一切配搭均分；一代存起，以作食用，亦百年后兄弟三股轮流，而历代祖宗，如轮着年头祭祀，以及羨余，照股均当均分，所有应完粮米，亦当照产完纳。如亲戚往来亦当次序承值，各遵议书，勤俭成家，始终如一。”^①

陶功化告诫儿子：“系兄弟者，亲亲之义，各管各业，毋得争执，为此合同分书三本，各执一本，永远存照。”

陶功化本来准备自己亲自书写《分书户管》，由于手受伤未愈，难于执笔，故由长子陶盈代笔，一式三份，兄弟仨人各执一份。

^① 《陶功化分书户管》，《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207页。

陶功化一一罗列了拥有的田户、园地、河荡和佃田：“存起公堂，腾字六百四十号田二分八厘三毛四系，又六百四十二号田四份，又六百四十四号田一亩，坐落园田，如田内尚能起造，随时随议，照老契价银派算，兄弟毋得争执。契存长房收管。又致字五百十五号田一亩五分二厘三毛，又五百十六号田一分五厘，造坟在内，与金姓各一年一转，坐落西岸头。又腾字六百卅八号田一亩八分，坐落塘路池，又后道地以及园地，并将门前致字二号河荡，又雨字号河荡，两号，共荡三十四亩五分零，又佃田一亩四分，坐落园田北首，併照。”

陶功化将产业分与三个儿子。陶盈分得的产业为：“北边上下楼房，前进平屋，连肥池一个，又连楼后直出披屋一间，又南首平屋一间，连老灶一乘。又致字一千一百五十号田四亩五分二厘，坐落坟头地，又致字一千十八号田二亩九分一厘六毛，坐落涂尖，併存。长子长孙，将腾字六百五十九号田二亩八分五厘八毛，坐落闪湊底，土名长三亩，又陶姓戩契一纸，价二十千文，抵欠款，坐落坟头地，土名水塘，併照。”陶盈分得北边上下楼房，平屋四间，披屋一间，田地十亩二分余。

陶泰分得的产业为：“中间楼上两间，中间南首楼下一间，留楼梯一步，三、次两房进出公用，中间楼下，连后披，三房公用，又有楼下廊，在三房出入，前进平屋一间，塘路池沿肥池二个。又腾字六百六十一号田三亩三分八厘六毛，坐落吊墩下，又腾字一百九十九号一亩六分三厘六系，坐落谢家埭，此系两片戩田，又腾字六百六十五号田五分五厘，坐落吊墩，又腾字一千二百七十二号田二亩九分八厘四毛，坐落旨公湊，土名窪三亩，併照。”陶泰分得楼房上下三间，平屋一间，田地八亩五分余，肥池两个。

陶品三分得的产业为：“南首楼房上下一间，又连后披二间，又前道地北侧，平屋半间。又腾字一千二百五十四号田一亩一毛，又八百三十九号田八分三厘六毛六系，又一千三百七十三号田九分三厘三毛，坐落旨公淩，土名水观，又腾字六百五十号田五亩二分八厘五毛三系，坐落闪淩，又公田河沿肥池一个，肥池分授在于公田之上，总要公商，毋得私自作主，併照。”^① 陶品三共分得楼房上下一间，平屋半间，田地约三亩许，加上公田五亩三分，以及属于公产仅可私用的肥池一个。陶品三的财产不多，尚能养家糊口。

清代陶氏族人飞黄腾达者大有人在，如湖北巡抚陶恩培、湖南学政陶方琦、江西提法使陶大均等均是达官显贵，但陶成章的父亲陶品三的境况却并不好。陶品三除农耕外，还要兼营砖灰业和漆匠，才能补足家用，经常受到有钱人家的白眼。

于是，陶品三督促陶成章苦读经书，将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光宗耀祖。

据说，陶品三“在儿子入塾的时候，品三几乎每天总是垂涕而道当日受辱情况，仿佛昔人的命人大喊：‘夫差，你忘记了勾践杀父之仇么？’的情形相同。”^②

然而，做手艺的人毕竟不入缙绅之列，自然受人歧视。

第三节 苦难童年

陶品三娶妻陈氏，曹娥人，朴实节俭，生有二子一女。

^① 《陶功化分书户管》，《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208页。

^② 陈觉民：《陶焕卿轶事》，《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30页。

长子陶成玉，字希渝，号符卿，秀才，29岁病逝。陶成玉娶妻陈氏，生一子，名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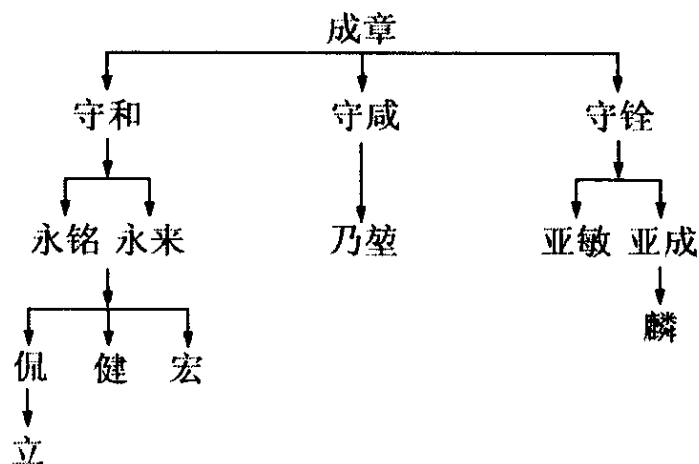
次子陶成章，字希直，号焕卿，排行第二，乳名炳生。字为父亲陶品三所取，号为祖父陶功化所取。陶成章属于陶氏“卿”字辈。

陶成章原配王氏，绍兴县富盛镇坟山村人，茶农出身，17岁嫁陶成章。王氏老实忠厚，勤俭治家，吃斋念佛，支持陶成章参加反清革命，恳求佛祖保佑丈夫革命平安成功。1937年阴历三月初一逝世，终年58岁。生二子，长子守和，字燊生，次子守咸，字受生。

陶成章继配孙晓云，生一子，名守铨，字珍，又名本生。

陶品三还有一女，名文姑，排行第三，19岁去世。

陶成章世系（二）^①



陶成章生于1878年1月24日，自称甸耳山人、会稽先生、会稽山人。陶成章笔名很多，有汉思、巽言、志革。化名有陶起东、唐继高、开泰、何志善、陶起、周守礼、济世、张

^① 陶永铭：《陶成章世系简历》（未刊稿）。

诚、东生。为了掩人耳目，便于革命行动，起了20个名号。与家人通信时，陶成章常用张诚、东生等名。邻里长辈则用陶成章的小名“阿炳”称呼他。

陶堰是绍兴水乡的一个大村落，运河流经村庄，附近的白塔洋烟波浩渺，帆船如织，盛产鱼虾蚌蛤。农家孩子为了下河摸鱼捕虾，从小就学会了游泳，陶成章也不例外，与水乡其他孩子一样，不仅有熟练的游泳技术，还练就了一手捕捉鱼虾的本领。

陶成章6岁入本村陶氏义塾读书，少有大志，自幼聪颖，勤奋好学，“过目不忘，博通经史。”^①陶成章特别喜欢史地之学，能娴熟地背诵儒家经典和《史记》等史学著作，塾师很喜欢他，称为“过目不忘的神童”。陶成章“读书过目成诵，可与章太炎先生、钱玄同先生相比。《四书》、《五经》、《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都能随口背诵；对年月日、人名、地名都准确记忆”^②。陶成章从华夷之辩中，萌发了反清复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

陶品三自己也有一点文化，能阅读《御批通鉴辑览》一类的书籍。每当陶成章从私塾放学回家，陶品三常常亲自督促陶成章课读《御批通鉴辑览》，即使是逢年过节，也从不间断。

陶品三课子甚严，常常袖文向人请教。陶成章考试完毕回家，陶品三拿出陶成章平时所作的诗文，请清孝廉族中长辈陶吉生点评。

① 《陶焕卿》，《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5页。

② 马巽伯：《追怀陶成章先生》，《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80页。

陶吉生见后，大为称赞：“此子前途远大，将来必定名列前茅。”

可是，考试成绩出来后，陶成章的成绩并不理想。原来陶成章平时无意学诗，以前是请人捉刀，虚与应付。

时正值家庙伏腊，同席的陶燕先生唯恐陶品三过于责骂陶成章，为陶成章开脱。

陶燕先生的话尚未说完，陶成章坦白地说：“不对！人应扬长避短，我的文章六百余字，诗仅六十字，不能以偏概全。”

酒至半酣，陶燕先生停杯而起，向陶品三祝贺：“公子前途无量，将来不仅能为我陶氏祖宗争光，而且还能为国家争光。”

后来，陶成章请塾师改试其他题目。

塾师责问道：“你是说试策论？你能看懂《纲鉴易知录》吗？”

陶成章笑着点了点头，并不与塾师辩论。

陶成章“肆力于古文辞，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诸大家罔弗读，不洞其窾窍，抉其精髓不止”。

陶成章又作《牵让篇》，请陶吉生点评。《牵让篇》“精义独到处，尤非赫胥氏《天演论》优胜劣败之口头禅”^①。

此时科举尚未废除，西学并未广泛传播，陶成章已有种族革命思想流露其间，见者虽然惊讶但无不叹服。

^① 章乃穀、鞠僧甫：《民国浙军参谋陶公焕卿传》，《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

陶成章自幼就好打抱不平，“在他同时代的许多少年中，他是一个领袖式的人物，大家常推他作‘盟主’。”^①陶成章平时寡言少语，偶然与村中孩子游戏，“辄树各国旗为盟主，以扶弱抑强为目的，天性然也。”^②

陶成章经常帮父亲种田，每逢有人办婚丧大事，也跟父亲一起出去做学徒。父子俩不管寒冬腊月，河水结冰，总是起早摸黑，走村串户，为一家生计奔波忙碌。然而，尽管父子俩拼命劳作，一家人仍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母亲陈氏就是因为绍兴大旱，田地荒芜，颗粒无收，贫病交困，人到中年，就不幸去世了。妹妹文姑也因悲伤过度而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陶成章从小经历了苦难生活的磨练，目睹苦苦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的悲惨遭遇，对劳动人民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在幼小的心灵中激起了对社会不平的强烈不满，埋下了从事民主革命的种子。

第四节 义塾塾师

1891年，15岁的陶成章由堂兄陶成元介绍，到陶堰竹坝头陶氏义塾任塾师，束修所得充家用。陶成章在义塾执教三年，对学生要求严格，教学认真，经常向学生宣传反礼教的新思想。陶成章“出为塾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已是一个

① 陶侃：《陶成章青少年时代》，《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39页。

② 章乃穀、鞠僧甫：《民国浙军参谋陶公焕卿传》，《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

出色的教学老师”^①。陶成章性情耿直，不屑与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周旋。

陶品三望子成龙，督促陶成章撰写课艺，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但陶成章“性鄙制艺，不屑摹仿，入手便工”^②。陶成章曾潜心学习科举的敲门砖——“制艺”，揣摩八股，写了大量艺文，18岁时就撰写了48篇，内容大都是有关《四书》和《五经》的论题，如《孝弟也者》、《使民以时。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等，大都未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堂兄陶成元在文末写了大量的批语，肯定陶成章的艺文“大致清楚，惟须再求典雅功夫，开广思路，庶可日起有功，角胜艺林，不负高堂培植一片苦心也”^③。但也有不少不守绳墨，不满现实之作。在1894年撰写的《仕则慕君》一文中，对于一些人一旦跻身仕途，就卑躬屈膝，摇尾乞怜，邀功请赏，进行了大胆的讽刺。陶成章在另一篇课艺《驱虎》中，则将清政府比喻为噬人的猛虎，驱之刻不容缓，唯有驱逐害人之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驱虎^④

虎为害人之兽，驱之不容缓矣。夫害人之兽，固不独虎也，而虎其最也，驱之岂容缓乎？且昔虎贲三千，陈商郊而夹振駟伐，非欲驱除无恶，尽涤猛虎之苛政哉？顾在朝者多猛虎

① 陶玄：《陶成章与光复会》，《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

② 章乃毅、鞠僧甫：《民国浙军参谋陶公焕卿传》，《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

③ 《蟾》，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页。

④ 《驱虎》，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页。

之政，变革固有所难宽，而在宥者聚猛虎之纵，屏逐更不宜稍缓，不必拂虎交之性，亦不必申馁虎之恩，而攘之剔之，所由难已于锄暴后也。如周公相武王以诛纣，所驱者既有飞廉矣，夫飞廉之为人助纣为虐，几等虎之猛矣。想其称干比戈之日，而大勋克捷，所驱役者，固深类桓桓之处士。抑其会朝清明之时，而殊业克正，所驱策者，固全类矫矫之虎臣。虽然，以虎韜以取胜，而凶人既驱，岂无凶兽之踪？馭虎皮以藏兵，而暴人既驱，岂无暴物之类？若是，虎固为害人之物也，而可不驱乎？虎之狂也出柙，人见之而心惊；虎之啸也从风，人闻之而心怵。虎固人所共畏者也，正惟人之所共畏也，而驱之宜先矣。非同徒手之搏，亦与攘臂之撻，歼其魁而逐其类。凡民之行于广野者，至是而何有啗人之凶。虎之视也眈眈，其钩爪之可畏；虎之欲也逐逐，其锯牙之可惧。虎固人所共惮者也，正惟人所共惮也，而驱之难缓矣。岂同袒裼之暴，直比鹰鹯之逐，绝其类而除其患。凡民之入园囿者，至是而何有伤汝之戒。驱与射异，射则加以弓矢，敢以料头而须；驱则用以楯杖，欲使趣僮而行，俟除其患而不害其生，而獐獐狝狝，使得各畅其性。驱与刺殊，刺则加戈矛，入虎穴，戕虎子，驱则用鞭撻以示威，摇虎尾，戢虎威，救患而不害其命，而僮僮俟俟，使各皆聚其类。进观豹与犀象，亦皆驱之，而天下之民有不大悦哉？

科举考试除作文外，还要赋诗。因此，陶成章也写了一些旧诗，目前保存完整的有 1894 年写的五言六韵诗一首。

赋得春草碧色^①

遥望芊绵碧，芳郊草正春。
粘天香不断，夹岸看无垠。
欲与苍波混，偏宜丽日匀。
窗纱横映砌，绝袖半遮茵。
想得寻花径，应迷拾翠人。
熙朝隆化育，四境尽醇民。

陶成章虽对科举不感兴趣，然而，父命难违，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准备考试。清代的科举考试基本上沿袭明朝，略有变化。士子未入学前称之为童生，必须参加三次考试才能入学，即入府州县学。初试由本州县考试录取后，报送省学政，最后由学政于岁科考录若干名送入儒学。初入学称附学生员，即秀才。清初的童生入学考试，即最初级的科举考试，取自四书文和孝经论，乾隆中叶以后，改试书艺和经艺各一篇，增撰五言六韵诗一首。

1894年，18岁的陶成章很不情愿地到稽山书院参加了会稽县学的入学考试，考试内容为艺文一篇，五言六韵诗一首。陶成章作了艺文《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南容》一篇，还作了《赋得道是春风及弟花》的五言六韵诗十句。

第五节 任教通艺

1895年，19岁的陶成章到陶濬宣创办的东湖通艺学堂

^① 《赋得春草碧色》，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页。

任教。

陶濬宣（1846—1912年），原名祖望，字文冲，号心云，晚号东湖居士，清代著名的书法家、园林艺术家和绍兴著名的教育家。陶濬宣毁产负债，创办了东湖书院。随后，“逐渐扩张，多立讲舍，稟请奏定为通艺中学堂”^①。1901年，又顺应时代的潮流，改为东湖通艺学堂。

东湖通艺学堂设在东湖西部，另辟大门出入。从大门到学堂，需要经过一段露天，途经北墙，设有花坛，石栏横列，刻有陶濬宣的手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墙上围列圆形青石，镂刻兰花等青石八块。

通艺学堂的教学内容采用现代教材，分为四斋，即史学斋、子学斋（经学）、算学斋（天文和数学）和译学斋（外语），相当于现在的四个系。教师有何闳仙、寿孝天、陈紫仪、陈威、谢斐麟、孙耦耕、陶成章、周作人、汤佩衡、钟懋宣、钱榭亭、吴吉庵、马欧堂。后来，陶成章曾介绍著名的革命志士魏兰到通艺学堂任教，旋因魏兰“以母病电招归去，不果行”^②。另有日本教师2人。陶濬宣自任监督，聘陈威为学监。

东湖通艺学堂学生并不多，其中有朝鲜留学生2人，曾带来朝鲜闵妃的照片。著名的通艺学堂学生有气象学家竺可桢，实业家陈彭年，诗人刘大白，爱国将领陈仪，民主革命家陶冶公等。通艺学堂的师生留学日本的也不少，1903年就有绍兴

^① 《陶七彪等稟浙江都督暨民政司及县知事请将东湖改建陶烈士专祠文》，《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39页。

^②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页。

府属的陶成章、徐朝宗以及陈威和陈仪。

东湖通艺学堂既是绍兴革命思想传播基地之一，也是辛亥革命志士集结之地。1901年陶濬宣聘请陈燮枢主持通艺学堂，杭州人孙翼中主讲，“革命思潮因之以传入绍兴。”^①孙翼中受到浙江的文字狱罪辩文案的牵连，应陶濬宣的邀请，出任东湖通艺学堂主讲席，开始在绍兴传播反满思想。

1905年徐锡麟、陈子英等人也曾在通艺学堂计划抢劫钱庄的运钞船，创办培养辛亥革命干部的大通学堂，由于遭到陶成章的反对而未付诸行动。

通艺学堂名义上属于绍兴府，实际上只有少数公款补助，为数甚微，入不敷出，不足部分，全部由陶濬宣负担。通艺学堂办学经费紧张，“虽一时大府，奏奖有加。间拨闲款，稍有辅助，为数不多。心云长于篆隶，六朝诗古文词，世之求书碑、版、屏、联以及求撰传志者，每岁笔费不下二三千金，强半以充学堂用费；甚至出旧藏书籍，新购图器以为诸生参考，十有余年，热心办学，可对国民。”^②通艺学堂虽然有时获得地方政府的一些拨款，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陶濬宣是个书法家，将大半的润笔费，充作学校的日常开支。有时甚出售家藏的书籍，来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

清末立宪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陶濬宣认为：“法律为行政之要，自治实新民之基。”^③实行立宪，人民必须有法政知识，

① 《孙翼中与罪辩文案》，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页。

② 《陶七彪等禀浙江都督暨民政司及县知事请将东湖改建陶烈士专祠文》，《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39页。

③ 朱顺佐、张能耿：《江南人才名镇——陶堰》，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尤其是绍兴学人向来喜学刑名，入官府做刑名师爷。1909年，陶濬宣将东湖通艺学堂易名为东湖法政学堂，先后开设讲习科和别科，培养通晓法政的专门人才。后来，东湖法政学堂迁往绍兴市区，改名为龙山法政学堂。

第六节 勤奋好学

陶成章酷爱读书，求知若渴，由于家境贫寒没有藏书，也买不起书，不得不到族中书香人家借阅书籍。可是，陶成章“平生读书，喜欢动笔，每读一书，或眉批，或题跋，笔墨淋漓，就在借来藏书上大书而特书”^①。陶成章的读书习惯，常为借书人家所不喜欢，因此，借过一次之后，就寻找种种借口，拒绝再借了。

陶成章的勤奋好学却为族中一些才杰突出之人所赏识。陶氏族中的陶子慎，名方琦，通经儒雅，擅长文笔。陶仲彝，名在铭，是著名的诗词名家，雄长皋社。陶心云，名浚宣，其书法碑版，声耀扶桑。陶七彪，名在宽，善制作奇器，精通数学。他们在陶氏族辈中是从兄弟，而陶成章的辈份比他们都小，属于族曾孙了。“他们对于焕卿先生髫年时的嵌奇萃落，崭露头角，都非常垂青，其中尤以七彪先生对于焕卿先生更是关怀得无微不至，经济上时加以援助，言语上时加以奖励，使焕卿先生无论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均受到了莫大的鼓舞。”^②

陶在宽（1851—1919年），字栗园，号七彪，曾任清户部

① 陈觉民：《陶焕卿轶事》，《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31页。

② 陈觉民：《陶焕卿轶事》，《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31页。

候补郎中，是著名的书法家和发明家。陶在宽对陶成章极为赏识，称赞陶成章读书得法，“有见识，有判断，非凡儿所及。”^①

陶在宽不仅将其家藏的书籍让陶成章阅读，而且还辗转向他人借书给陶成章。“七彪先生的藏书在七彪亡故以后，由绍兴旧书贾金传贤经手卖给上海的旧书店，据金传贤所说内中有很多部的书籍是有焕卿的批语题跋的。”^②令人惋惜的是这一批藏书早已无从寻找了。

陶在宽还在物质上帮助陶成章。有一年冬夜，天寒地冻，大雪初霁，景色宜人，陶在宽冒雪乘兴踏雪赏月，归来途经陶成章家门口。陶成章家的房屋不大，夜深人静之际，可以在外面很清晰地听见陶成章的读书声。

陶在宽驻足倾听，陶成章正在诵读司马迁的《史记》。

可是，陶在宽越听越觉得不对劲，陶成章平时读书声音宏亮，琅琅上口。

“今夜怎么声音虽大，却含有凄婉，与往日好像不同呢？”陶在宽百思不得其解。

陶在宽叩门而入，仔细一问，原来陶成章家已断炊两天了。

陶在宽闻之惻然，立即“命从人赶回家去，连夜载了银米送来。”^③

陶在宽对陶成章关怀备至，“焕卿先生于民元在上海被刺

① 陈觉民：《陶焕卿轶事》，《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31页。

② 陈觉民：《陶焕卿轶事》，《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32页。

③ 陈觉民：《陶焕卿轶事》，《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32页。

逝世的时候，七彪先生还是健在，悼痛得很厉害。”^① 陶成章遇刺后，陶在宽等人发起在东湖修建了陶成章专祠——陶社。

陶成章常头戴毡帽，脚穿草鞋，从陶堰步行 16 公里到城里，前往水澄桥堍的墨润堂书苑看书。清末西学东渐，绍兴有识之士倡办教育，开设书店，启发民智，绍兴图书业蒸蒸日上。原先一些专营木刻、石印线装书的书店，也改为出售外埠新书和教科书。从水澄桥至清道桥，开设了墨润堂、永思堂、奎照楼、奎元堂、聚奎堂、会文堂、明达书庄、万卷书楼、特别书局等 10 多家书店。墨润堂书苑创办于 1862 年，起初开设在西营，称为墨润堂书庄，后在府城大街水澄桥南首开设门市部，改称墨润堂书苑。店面坐东朝西单开间，店堂匾额“墨润堂书苑”为蔡元培题写。墨润堂书苑由绍兴南门外坡塘乡栖凫村徐氏创办。早期经营者为徐以孙和蔡元培，均为光绪同科举人。徐氏博学多才，治金石目录学，金石墨本收藏甚丰。墨润堂兼营新旧书，既销售木刻、石印图书，也出售外埠铅印本书籍，主要经销上海商务、中华、大东、开明、三联等书店出版的教科书和其他新书，图书门类较为齐全。墨润堂书苑也自设木刻作坊，自办编印发行，曾印行《绍兴先政遗书》、《百家姓》、《千字文》、《女儿经》、《神童诗》、《绍兴府城衢路图》等书籍，委托上海文会堂、洪宝斋等书店代为石印《越言》、《仰鹤斋丛书》等书籍。“当时墨润堂出售一批新书，如《华盛顿传》、《法国大革命》、《拿破仑传》等中外历史丛书，他对这类新书很感兴趣，起初由于只看不买，难免受人热嘲冷笑，但由于没钱购置，所以他也顾不到墨润堂店伙对他的

^① 陈觉民：《陶焕卿轶事》，《陶成章史料》，1987 年版，第 32 页。

歧视和白眼了。”陶成章经常风雨无阻，到墨润堂书苑一呆就是一整天，中午只啃一个大麦饼充饥，直到书店关门为止。陶成章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感动了墨润堂书苑的店友，他们的态度也由初时的嫌恶转为由衷的敬佩。然而，直到“辛亥革命绍兴光复后，店友们才知道这个当年头戴毡帽，脚穿草履的乡下佬，竟是大名鼎鼎的革命家陶成章”^①。陶成章对书籍的痴迷，为乡人所称赞，然而，也有人不以为然，讥为“呆子阿炳”。陶成章“喜悦新书西哲革命名著，早富革命思想。”^②陶成章喜欢阅读西方哲学名著，具有初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第七节 钟爱宗羲

陶成章通读了大量越中先贤的著作，“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喜欢读乡先辈黄梨洲（宗羲）、万季野（斯同）、邵念鲁（廷采）、全谢山（祖望）诸家的遗书。”^③陶成章尤其钟爱浙东学派黄宗羲、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的著作，萌发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

黄宗羲（1610—1695年），浙江余姚人，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清兵南下时，黄宗羲曾变卖家产，作为抗清经费，组织“世忠营”，开赴钱塘江，进行抗清斗争。黄宗羲集结浙东各路义军，在四明山安营扎寨，屡次出击上虞、新昌、奉化、余姚等地，坚持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黄宗羲重

① 陶侃：《陶成章青少年时代》，《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40页。

②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9页。

③ 陈觉民：《陶焕卿轶事》，《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30页。

操旧业，进行学术研究。黄宗羲治学注重实际，切中时弊，著述丰富，编选前人作品 1000 余卷，1000 多万字，自撰 100 多种，300 多卷，300 万字。黄宗羲的主要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南雷文集》、《明夷待访录》、《明文海》、《孟子师说》、《破邪论》等。

黄宗羲最得意的弟子是万斯同，浙江鄞县人，与兄长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选、斯大同师黄宗羲的门下。万斯同参加了《明史》的编纂工作。

与万斯同同时代的浙东学派的重要成员邵廷采，亲承黄宗羲的史学精髓，先后主讲姚江学院达 17 年之久。邵廷采继承了黄宗羲“经世致用”的史学观点，主张“文章无关世道者可以不作，有关世道者不可不作”。所著《东南纪事》和《西南纪事》，被梁启超誉为“有永久价值”。

浙东学派的第三代大师是全祖望，他在搜集、整理和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文献上作出了很大成绩，尤其是坚持春秋笔法，秉笔直书，记述抗清忠烈的事迹。

陶成章对浙东学派的著作情有独钟，曾手批“《南雷文集》、《明夷待访录》、《思复堂文集》、《东南纪事》、《西南纪事》、《鲒琦亭文集》等书，在书眉都是批得淋漓皆满，旁无隙地，而语语精辟，多可传者”^①。

陶成章最钦佩的莫过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了，“对于晚近三百年来的学人，最佩服黄梨洲先生，他们为浙东学术，源远流长，梨洲先生的学术思想，对后人影响之大，远非顾亭林、王船山两先生所及。梨洲先生的门人再传弟子和私塾

^① 陈觉民：《陶焕卿轶事》，《陶成章史料》，1987 年版，第 30 页。

的人，如万季野、邵思复、邵南江、全谢山等诸家传播师说，这真是所谓‘薪尽而火传’了，这对后来的提倡种族革命，有莫大的助力。”^①

浙东学派的开山鼻祖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陶成章的影响最大。《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作为明末清初启蒙主义思想家的代表作，也是为了等待“箕子之见访”，迎接“大壮”的太平盛世到来而准备的治国兴邦的良策。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建立，从民族情感上激起黄宗羲对封建制度的厌恶，对封建统治的怀疑。黄宗羲感到社会正面临“大壮”之交，国家制度必须改革，政治必须革新。黄宗羲以儒家颂扬三代美政的外衣，涂上了浓厚的古老东方民族的神秘主义色彩，尽管其主张带有一些空想的成分，但绝大多数立足于现实，绘就了改革封建弊政的一幅绚丽的蓝图。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尖锐地批判了阻碍历史进步的君主专制，系统地剖析了封建制度这个庞然大物，从经济基础、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和军事武备探索了新的未来制度，精密地设计了其理想王国。黄宗羲反对封建专制的大无畏的勇气，改造封建专制弊端的高屋建瓴的宏伟气魄以及救国参政的主人翁精神，使之成为浙江辛亥革命志士直接的民主思想渊源之一，从章太炎、蔡元培到陶成章、徐锡麟，“无不从中受到民主、民权思想的启蒙与教育”^②。

陶成章系统地阅读了黄宗羲的著作。绍兴有位清末著名的考证学家平步青博览群书，研治学术。平步青藏书甚丰，其中

① 陈觉民：《陶焕卿轶事》，《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35页。

② 胡国枢：《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家藏清代文人的集子最多，达千余种。平步青“曾有志于搜集《梨洲大全集》，所搜罗的黄氏作品甚多，但尚未完成，未曾杀青，焕卿先生知道了这回事，那时景荪先生已去世了，他数度上平氏门去借看《梨洲大全集》的底稿，并加以摘录，有时候甚至于连回去吃饭也忘记了，这也可以想见先生笃好学问一斑”^①。

陶成章“钻研浙中先儒黄梨洲著作，对黄氏提出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及‘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等大义微言，深以为是。”^②陶成章深受浙东学派思想的影响，“于明末亡国之恨，鞑虏仇汉之酷，时萦心目。民族革命思想，因是而生。”^③陶成章经常谈论种族革命，痛斥清政府的民族压迫，谴责封建专制统治，怒形于色。

陶成章“自其少时，已主张救世之学。痛异族之专制，悯社会之暗塞，思欲改革而扫除之，间形诸辞色，父品三先生惧祸及，屡戒之弗变。”^④其父陶品三唯恐惹是生非，予以制止，但没有任何效果。

陶品三曾责问陶成章：“你搞那什么革命？为的是啥呢？”

陶成章回答：“为的要使得人人有饭吃。”

陶品三管不了陶成章，只得无奈地自我安慰说：“我儿子要使得人人有饭吃，这个我怎么好去阻挡他呢？”^⑤

① 陈觉民：《陶焕卿轶事》，《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35页。

② 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20页。

③ 陶冶公：《陶焕卿先生小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7页。

④ 傅以潜：《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0页。

⑤ 曹聚仁：《陶成章与光复会》，曹雷编：《听涛室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第二章 东瀛拒俄

20 世纪初，中国留学生似潮水般地涌入日本列岛。一些在国内从事政治活动而受到清政府迫害的革命者，也流亡到日本。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集结了一大批优秀炎黄子孙，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话剧，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日本首都东京成了中国爱国者和革命者组织革命团体，策划反清运动的策源地之一。中国的留日学生接连发动了反对清朝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留学日本东京的陶成章也是这些重大事件的积极参与者。

第一节 北上受挫

1894 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清政府派李鸿章到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赔款白银二亿两，还割让了台湾及澎湖等岛屿。陶成章“看到清廷的腐败，外侮不断袭来，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又受内外进步思想的激荡，爱国思想‘民族主义’油然而生，甚至一发不可复遏”^①。陶成章对清政

^① 陶玄：《陶成章与光复会》，《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 6 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8 页。

府将人民的脂膏奉送外人，将国土随意割让，痛心疾首，愤恨异常，萌发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志向。陶成章自称：“愚从事军事之心，起自甲午。”^① 陶成章的救国之心，初露端倪。

陶成章向来主张“中央革命”^②。1900年，北方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陶成章决定北上，“走鲁入燕，谋歼那位氏于颐和园。”^③ 陶成章没有找到机会，刺杀未成。于是，陶成章“只身出关，游历满旗有关地区及蒙古东西盟各地，察看山川形势，了解民情风尚，以图光复河山，为革命作准备”^④。陶成章前往东北和蒙古地区，考察了其地势、人情和风俗，以便将来直捣清政府的满蒙巢穴。

陶成章回到绍兴后，对推翻清王朝充满信心。陶成章见到樊光，来不及坐下，就一再高呼：“清朝真正王气已尽，清朝真正王气已尽！”陶成章喜形于色。

陶成章向樊光详细地述说了在东北及蒙古地区的所见所闻，兴奋地说：“我们革命兄弟，摧枯拉朽，推翻满清王朝，此其时矣。”^⑤

陶成章并未因初次谋刺未成而放弃，1901年，“为策划革命，再度北上，又因不得要领而返。”^⑥ 陶成章抵京后，住在北京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北京正遭受八国联军的蹂躏，敌骑

① 《致陶汉超书》，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0页。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③ 《陶成章被刺》，《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77页。

④ 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20页。

⑤ 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21页。

⑥ 陶玄：《陶成章与光复会》，《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

横行，满目疮痍，陶成章目睹联军的暴行，义愤填膺。

陶成章走访了居京为官的族人陶大均。陶大均，字杏南，1872年留学日本，官至清外务部左丞，从一品官，是陶堰明清两代官宦中的最高官阶。陶大均热情好客，尤其重视陶成章的人品。

陶成章“日与任侠仗义者游，亲见夫清西太后窃国，光绪帝幽囚，痛陷于无政府虚君位之国家，愿效骆宾王讨武曌故事，以手刃那拉氏自誓，大庭广众，倡言不讳。”^①

陶大均唯恐陶成章的言行给自己招来祸害，挖苦说：“就凭你个人的力量，还想刺杀西太后？也太自不量力了吧！”

陶成章自知与陶大均格格不入，遂离开京城，渡孟津，出太行，到达徐州的铜山。

时任铜山县令的陶仲彝虽是陶氏族人，以前也曾帮助陶成章求学，但陶成章要做“十恶不赦”之事，唯恐因此召来满门抄斩之祸，对陶成章极为冷淡。

陶成章见话不投机，旋即辞去。

陶仲彝赠陶成章数十枚墨西哥银钱作为路费，尽管陶成章身无分文，仍婉言谢绝。

陶成章“旅费缺乏，步行7昼夜，几至饿毙”^②。

1902年，陶成章第三次北上京城，窥探时机，实行“中央革命”。陶成章目睹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耳所闻者，不过丝竹；目所见者，市之刑人而已。车如

① 章乃穀、鞠僧甫：《民国浙军参谋陶公焕卿传》，《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2页。

②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9页。

流水马如龙，引见之官也。手执国旂身佩剑，欧洲之兵也。”陶成章敏锐地察觉到清朝政府，“非境遇之奴隶，则情欲之奴隶，非崇拜古人之奴隶，则必仰承白人之奴隶耳。”^① 清王朝已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陶成章认识到仅仅谋刺西太后或一、二个清政府的王公大臣，不能根本改变中国的现状。只有实行武装革命，才能推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陶成章“素志中央革命，庚子入满洲，壬寅居北京，审察大势，知非由陆军着手不可，因之屡谋入陆军学校，以图进身之路，乃竟不获如愿”^②。

陶成章再次找到陶大均，请他介绍进入陆军学校学习军事。陶大均知道陶成章入军校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唯恐将来东窗事发，受到牵连，因此，寻找种种借口予以搪塞，致使陶成章进国内军校的愿望无法实现。

陶成章并未气馁，在《奉答友人绝句》的诗中，以越王句践卧薪尝胆的精神自勉。

天绝风云急，
神州剧可哀。
雄谈关出处，
君看越王台。

陶成章还在诗后附注：“昔人云：‘会稽为报仇雪耻之邦，

① 陶成章：《致马水臣书》，黄成礼：《关于陶成章的几个问题》（1962年10月21日），（未刊稿）。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非藏垢纳污之地，吾侪生长是乡，宁能无卧薪尝胆沼吴复越之志乎！”^① 陶成章作好了进行长期斗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准备。

第二节 东渡扶桑

陶成章不能进入国内陆军学校学习，又将注意力转向国外，决定东渡日本学习军事。

1902年7月，陶成章赴上海，到中国教育会见了绍兴同乡蔡元培。陶成章的族叔陶子缜、陶仲彝、陶浚宣等与蔡元培是乡会试同年，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蔡元培，字子民，号鹤卿，浙江绍兴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当过翰林。蔡元培思想进步，为人正直，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1902年4月27日，蔡元培、蒋智由、林獬、叶瀚、王季同、汪允宗、钟观光以及乌目山僧宗仰等人，在上海南京路泥城桥福源里，集议发起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②。中国教育会以教育团体的名义作掩护，暗中通过发行教材和出版刊物，灌输新思想，鼓吹反清革命，并很快集结了一大批爱国人士，成为辛亥革命前夕上海最早的一个革命团体。

陶成章向中国教育会的会长蔡元培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打算：“我想到日本进陆军学校，学习军事，以备将来推翻清政

^① 陈觉民：《陶焕卿轶事》，《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34页。

^② 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府之用。”

“很有远见!”蔡元培极为赞赏。

陶成章为难地说:“就是留学经费一时难于筹集。”

“我这儿还有些银钱,你先拿去做学费吧!”蔡元培慷慨解囊。

陶成章得到蔡元培的资助,得以东渡日本。

1902年9月,陶成章从上海搭上日本油轮,为了节省路费,买了最下等的船票。油船头等舱票价40元,二等舱30多元,三等舱12元。陶成章舍不得坐三等舱,买了四等舱的船票。四等舱有专门存放煤炭的贮藏室,暗无天日,像地狱一样,没有人居住。陶成章因其价钱便宜,并不计较,安之若素。

陶成章从上海起程,二天到达长崎,油轮在长崎逗留一天,再航行二天到达神户,在神户也逗留一天,最后航行二日到达横滨。陶成章“渐与司汽炉者稔。代充火头军之役,日人喜其诚慤,一路善遇之”^①。

陶成章在横滨上岸后,将简单的行李搬到海关查验,尔后,换乘火车,仅1小时就安抵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中国留日学生会馆。陶成章的整个行程历时一个星期。

1896年,清政府第一次派遣了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选拔的13人赴日留学。此后,中国留日学生逐年增加,1899年增至200名,1902年达到四五百名,1903年逾1000人,1906年达到8000多人。陶成章也赶上了这股留学浪潮。

^① 章乃穀、鞠僧甫:《民国浙军参谋陶公焕卿传》,《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2页。

陶成章首先进入预科学校——清华学校学习。清华学校的前身是东京高等大同学校。1899年，梁启超向横滨华侨商人郑席儒、曾卓轩等募捐3000元，在东京牛込区东五轩町筹设东京高等大同学校。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大同学校的经费短缺，难以为继。后由日人柏原文太郎向日本政党募捐，于1901年4月28日，在小石川传通院旁建立了新校舍并易名为东亚商业学校。

东亚商业学校续办二年后，又因无法维持，改由清朝公使蔡钧接办，改名为清华学校，即“大清统治中华之义”，由犬养毅任校长，柏原文太郎及湖北留学生总督钱恂任监督。

陶成章刚到东京，生活在异国他乡，贫病交加，但学习军事，矢志推翻清政府的决心未变，只是不再急功近利，而是作了长期的打算。1903年2月8日，陶成章在致族孙陶汉超的信中，作了详细的说明。

汉超青览：

别来甚念，去年足下在念夫子处就读，甚好。旋闻念夫子往赴铜山，未识又于何处附读？今年又读书何地？皆明以告我。

前令尊大人云：再读书两三年，不成则游幕。而不知幕之一道，将来必有变，非久长之计，为国谋固不可，为身谋亦非计之得也。故愚以为不若专心学问。中学以史为主，西学以英文、算学为主。盖英文、算学为最要紧之科学，愚以英文不通之故，吃亏不少，现拟决计不习，盖一则势难兼顾，一则志愿陆军，似可稍缓。足下不入学堂，进功终不易易。近闻上海设立爱国学校，功课甚为严整，若能设法进去，好极；不则或杭

或绍，就近处检一学堂亦好。不然，则终归自误。千切千切。盖中国校虽科学不备，较之从师，则有千百倍功，况有学校，则身有定宿，中学亦易见功。足下商之令尊大人酌量行之。吾族后起无人，不得不于足下有厚望也。

愚进东以来，五月于兹。始蹙于遇，继困于病，终累于境，自问有愧，何暇劝人？然正惟自问有愧，愈不敢不劝人。日月易逝，岁不我与，勿谓少年之足恃，勿谓见功之不易。愈年少则时愈可惜，见功愈不易，（现在东京者，多半廿岁内外之人，近卅者寥寥。）则用心愈益坚，如是则集事之不难矣。切勿轻视，蠖等以求，循序渐进，存自不后人之心足矣。

愚从事军事之心，起自甲午，以迄今日，犹不遂志，心犹未挫，志犹未灰，然志愿不改，而目的屡变焉。此中程度，有不期然而然者。近日悲悯之心愈炽，而心愈和平，未始非一病之功。盖我国病非一朝，其救之亦岂可期旦夕之功。否则瓜分之祸立见，为波兰、菲律宾，朝晚间耳。足下今日当以就学为心，俟三年后若欲游学外洋，则愚犹在东洋，或可补助少许，亦未可知。愚之所习，约非六、七、八、九年不为功，回（陶）堰恐非易易。用是聊陈片言，祈垂鉴是幸。

专此布告。即请

近安

尊大人处代候

愚成章书

正月十一日^①

^① 《致陶汉超书一》，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1页。

陶汉超幼时入陶氏义塾就读，时陶成章任义塾塾师。后来，陶成章受聘于东湖通艺学堂教习，陶汉超也转入通艺就读。陶汉超属于陶堰南大房，按辈分应属陶成章的族孙。陶汉超追随陶成章多年，师生之间的感情深厚。陶成章在日本和南洋期间，与陶汉超书信往来不断，“大致谆谆告诫治学方法及阐述革命大义。”陶汉超在陶成章的熏陶下，后来参加了光复会，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陶汉超对陶成章极为钦佩，晚年曾对儿子无限深情地说：“烈士为人守正不阿，少时即有大志，颖慧过人，读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有极强的记忆力，尤喜奖掖后进。在浙东南一带联络会党，宣传革命时，以炒米为干粮，每日徒步走数十里，不以为苦，其艰苦卓绝有如此者。”^①陶汉超毕业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生平常以不能追随陶成章左右为憾。

清华学校是由中国人办的一所预备学校，课程大都由中国的留学生讲授，只有日文和日语由日本教习讲授，陶成章考虑到学费便宜，可以补习日语，为入军事学校打下语言基础，才选择该校。1903年3月10日，陶成章在致陶汉超的信中，介绍了有关清华学校的基本情况。

二月六日接来书，敬悉一切。杏南北来，如能见面，必为足下述之。然彼此回来东京，不能久留，见面恐非易易耳。

足下勤学，已约略向书常述之，可写信来，嘱某转交，内不必提他事，问候而已。彼近与汪不甚相合，无久留意，况亦仅足自存，不过为后日计，及杏南处先容计耳。（盖杏南至最

^① 陶金门：《陶成章和他的学生陶汉超》，《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74页。

重待者，惟书常一人。)某于日本去留也未可知。盖某之目的在陆军，他非所愿，若事终不成，则当入南北洋陆军学校耳。

日本留学经费甚非易易，某用度于同辈中为至省，而每月尚须用日洋三十元左右，约中国二十六、七元左右。自前两月以来，亏负五十余元矣。故非官费，决难久留，况来人愈多，流品愈杂，留学生之前途，将来恐不堪设想。足下既在家塾读书，既未学习他事，则算学必当学习，切不可荒功。近日当静心待时，徐图转机，切不可存躁进之心。足下空时，可常通信于某，以便彼此之信息。

东京留学，衣服必须改装，辫之去留，任听自便，然终不能拖之于后，必挽在头上，然尽挽在头上，又必不能。(盖帽戴不来云。)故必剪去大半，留其少者，挽于头，以帽盖之云云。此等事，在吾村必以为怪事，一至东京，人人如此，司空见惯矣。

清华学校，犹一客寓，今日来，明日去，无一定法律，故功课亦不甚严整，教习又不时至。盖此校乃吾国人设立，为初来者不熟情形计耳。今将其章程抄于下：

甲班：物理、化学、代数、几何、英文、数学、日文。

乙班：日语、日文、英文、几何、数学。

丙班：日语、日文、英文、数学。

以上均听自择，不必拘也，教习皆以中国之留学生充之，惟日语、日文，则日人教之耳。某于此校，无久留意，不过以其费用较省耳。此校名为两年毕业，其实无毕业者，而又无可毕业者，不过预备普通或日语而已。

家内久无来信，未识平安否？足下祈代探之。义塾之教读为何人，及入学者何人？皆为详细言之。策生弟处致意不另。

阅后付火。

即请

汉超足下学安

令尊处代候

成章书

十二日^①

陶成章进清华学校不过是权宜之计，主要是过语言关。实际上，陶成章“赴日本东京，拟入成城学校学陆军，能回国柄权，实行革命”^②。陶成章到东京的目的是要进陆军学校，因此，有一定的日语基础后，就离开了清华学校。

第三节 改入成城

1903年春，陶成章转入成城学校就读。成城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校长是日本参谋总长川上操六。成城学校尽管是一所普通的中学，但其历史悠久，并有注重军训的传统。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各地的陆军幼年学校尚未建立，凡是从成城学校毕业而又有志于投考陆军的青年，几乎没有不被录取者，成城学校的学生实际上成了日本陆军补充士官候补生的一大来源。成城学校也是日本一所从事留学生教育最早而又历时最长的学校，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没有留

^① 《致陶汉超书二》，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页。

^②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9页。

学生为止。

1898年，张之洞首先选派谭兴沛、徐方濂、段兰芳、萧星垣4名秀才到东京学习陆军，进成城学校接受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教育。1899年1月，刘坤一、岑春煊和袁世凯也陆续派遣陆军留学生，进成城学校。1899年，中国在成城学校留学陆军的学生达40多人，朝鲜学生50人。成城学校学习时间为8个月，学费300元，并专门为中国留学生编著了日语和日文教科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大半通日文和日语，熟悉日式体操。1900年，从成城学校第一届毕业的中国留学生45人，全部升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许多人逐渐晋升为大将和中将。

由于中国学习陆军的学生不断增加，原有的校舍不够使用，成城学校又在牛込河町设立校外宿舍。

成城学校后来也接受志愿修读文科的学生。

成城学校纪律严明，功课要求很严，学生全部寄宿，只有星期三、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日才能外出。教员水平较高，教学认真负责。吴玉章回忆：“记得有一个数学教员，是高师的研究生，教得很好。他使我感到有经验的老师固然很宝贵，而既有热情又有学识的青年教师也同样可爱。在他的教导下，我的数学成绩很好，我做的题解，差不多和讲义一样。由于学校要求很严，日本中学五年的课程，我们以后用二年半的时间就学完了，而且还学得很实在。成城的某些有益的经验，我一直不曾忘记，我觉得他是符合教学原则的。”^① 成城学校因其教

^① 《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吴玉章文集》（下），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976页。

学质量高而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享有较高的声誉。

浙江留日学生入成城学校学习的也特别多，1899年至1903年达41人，既有官费生，也有自费生，其中自费生超过半数以上，绝少学习文科，大都学习陆军。

陶成章进入成城学校，正好符合其从事军事的夙愿。陶成章“义肝忠胆，益形言表”^①。

陶成章“东渡日本，习陆军成城学校，有殊绩，为驻日公使所忌，计削其学籍”^②。清政府派遣的留学生监督汪大燮侦知陶成章是“革命实行家，多方阻挠”^③。

这时，陶大均、那桐和载振等前来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并顺便游历东京。由于“陶成章是革命实践者，毅力惊人，对革命事业始终不渝。成章之叔陶大均，系清朝政府官吏所谓‘时务人员’。当时清朝官吏中，分‘洋务人员’，如黄遵宪、唐绍仪；‘时务人员’，如汤寿潜、张謇。陶大均被清朝政府派遣到日本‘考察’，实则阴谋瓦解革命力量。大均到日本后，与留日学生监督汪大燮勾结，认为陶成章系革命派主要人物之一，阴施釜底抽薪之计，诱陶成章往北京。”^④汪大燮与陶大均商量，设计取消陶成章的学籍。

“陶成章入成城学校，倡言革命，图谋不轨，在留学生中影响恶劣，必须予以制止。”汪大燮见到陶大均，犹如遇上救星。

① 《陶成章被刺》，《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77页。

② 傅以潜：《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1页。

③ 《陶焕卿》，《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5页。

④ 沈颀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页。

陶大均早就知道陶成章有学习陆军，推翻清政府的打算，作为陶氏的长辈，自然要想方设法阻止这位陶氏晚辈“犯上作乱”。

汪大燮与陶大均密谋诱骗陶成章离开东京，趁机取消其成城学校的学籍。

汪大燮建议：“陶成章急于进身军界，不如由你出面，劝说陶成章回北京，许其军职，然后，我再将其学籍除掉。”

陶大均与汪大燮一拍即合。

陶大均遂找到陶成章，假装关心地说：“焕卿，你家境不好，自费留学开支太大，在东京没有三年五年也无法完成学业。”

陶成章使用的还是去年蔡元培资助的费用，现在已经囊空如洗了。

陶大均诱骗说：“你不是想入军界吗？你学成后也是回国入军界，不如现在随我回去，我设法给你谋个军职。你看这样好不好？”

陶成章有些动心了，但又有些犹豫，万一回国进不了军界，而成城的学籍又被除掉，岂不是两头皆空？陶成章不无担心地说：“成城校纪严格，万一被开除怎么办？”

陶大均大包大揽地说：“这好办，我给汪监督打个招呼，就说你有事暂时请假回国。若入军界，就不回来了。万一不成，再回来上学。这不两全其美了。”

汪大燮演起了双簧：“成城那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焕卿放心回去好了。”

陶成章不知是计，觉得有陶大均推荐，直接进军界，可以少走弯路。

于是，陶成章于5月23日申请回国，汪大燮签字同意，6月12日，留学生监理委员会会长福岛安正予以批准。

可是，陶成章到北京后，左等右等，始终没有消息。陶成章自然不知道是“清廷驻日公使留学生监督汪大燮刺知成章有异志，畏其学陆军，以计调其赴北京而除其学籍。”^①

“焕卿！别急，要在军界谋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正在四处打点。”陶大均环顾左右而言他，总是找各种借口搪塞。

陶成章觉得京城不是久留之地，急忙赶回东京，准备回成城继续学习。谁知一打听，学校早就将其学籍除去。

陶成章不服，立即前往汪大燮住处。“我回国是请假，并非退学，为何将我开除？”陶成章责问汪大燮。

汪大燮推托说：“你超期未归，学校将你开除，我也没办法。”汪大燮自食其言，翻脸不认账。

陶成章怒不可遏，屡次找汪大燮理论，汪大燮均畏避不见。

陶成章至此才醒悟过来，原来这一切都是预先设计的骗局。

陶成章悔之已晚，与人谈起此事，唏嘘不已，引为憾事。

然而，陶成章并未因被成城学校撵出校门一事而气馁，“发展革命事业念益坚，进行亦益力。”^②

陶成章屡“谋入陆军学校，以鼓舞军界，均不获如愿。乃转而从事于会党运动”^③。尽管陶成章从军救国的愿望破灭

①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9页。

② 《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3页。

③ 陶冶公：《陶焕卿先生小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7页。

了，但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决心并未因此而稍挫，并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发动会党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上来。

第四节 参加拒俄

1903年，东京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渐趋高涨，陶成章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发起的拒俄运动。1900年，北方的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沙皇俄国除了派兵参加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地区以外，还出兵十万强占东北。由于中国人民的斗争，加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愿沙俄独霸东北，沙皇俄国被迫于1902年4月8日与清政府订立《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承诺在18个月内分三批将俄军撤出东北。然而，一年过去了，第二批俄军撤兵期限已过，沙俄不仅没有撤兵的迹象，反而增兵丹东，再占营口。1903年4月18日，沙俄进而向中国提出旨在独占东北的七条无理要求。消息传出，激起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上海各界在公共租界张园召开拒俄大会。

陶成章对于沙俄的背信弃义怒不可遏，与东京的留日学生一起，参加了拒俄运动。留学生会馆干事及评议员在留学生会馆商量对策。钮永建倡议组织义勇队，准备奔赴东北参加拒俄，并致电南北洋大臣，请其主战，得到大多数与会者赞成。

东京留学生又在锦辉馆召开了全体大会，有500多人到会。临时议长汤尔和提议：“今日有不怕死，肯牺牲一身为中国请命者，请立即签名，编成一队，刻日出发，前往北洋，痛陈不战之弊，愿作前驱，效命疆场，万死不辞。”

经过全体留日学生讨论，决定凡愿参加义勇队奔赴前线者，立即报名；未报名参军者，另设本部，部署军队事宜；分

别致电北洋大臣和上海各团体。另专门致函北洋大臣，愿将拒俄义勇队编其麾下；派遣特派员赴天津与袁世凯签定彼此关系；派人赴内地、南洋及欧美运动各界人士支持。

于是，拒俄义勇队定名为“学生军”，以“湖北士官学生蓝天蔚为指挥官，日在骏河台清国留学生会馆操练”^①。青年会“热心排满主义者，谋扩张其党势，均入义勇队为监事员”^②。陶成章也报名参加了义勇队，义勇队分为甲、乙、丙三个区队，每个区队又分四个分队。还制定了义勇队课程表，集中进行操练。

参加本部办事者 50 余人，设部长 1 人，运动、经理、会计、书记、参议科长各 1 人。钮永建任部长。

东京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注意。日本外务部召见中国留学生监督汪大燮，以组织义勇队有碍邦交为借口，要求予以制止。汪大燮命令停止义勇队的活动，并下令解散义勇队。东京警察署也召见义勇队负责人，认为义勇队有规则及组织，设立队长，也有军曹等名目，与军队没有差别，妨碍日本外交，要求解散。义勇队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义勇队可解散组织，不散精神，并提议召开义勇队临时全体大会，议决改名为军事讲习会。义勇队代表复函东京警察署，同意解散义勇军，但属于教育性质的体操练习以后仍照常进行。

陶成章结识了参加拒俄义勇队的魏兰，两人成了生死之交。魏兰是浙江云和人，云和旧名浮云，因此，又以浮云先生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

为号。魏兰不但是书法家，画家和诗人，还是辛亥革命的先驱人物，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魏兰在东京广泛地接触中国留学生，视野也更加开阔。由于沙俄侵占东北三省拒不撤兵，东京留日学生义愤填膺，组织了拒俄义勇队。魏兰通过平阳陈蔚的介绍，认识了陶成章。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魏兰在日本“参加拒俄义勇队，投入反抗沙俄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爱国运动，并与陶成章、龚宝铨相识为知交，常聚集一道商讨归国革命”^①。

陶成章赴日留学时，只有蔡元培资助的若干银元。陶成章后来能够在日本和南洋长期从事反清革命，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与魏兰的资助分不开。

第五节 致力革命

拒俄义勇队在留学生会馆锦辉馆召开全体队员大会，会上有人提出中国国民缺乏尚武精神，建议改军事讲习会为军国民教育会。军国民教育会组织严密，“会员有程家桢、叶澜、王家驹、张继、周宏业、陈定保、贝镛礼、翁浩、郑宪成、胡景伊、董鸿祎、翁友巩、桂少伟、陶成章、卢少歧、萨韵坡、陈天华、黄軫（克强）、刘揆一诸人。”^② 陶成章积极参加军国民教育会的爱国运动。东京“以争俄约事，游学诸生相联为军国民教育会，则黄克强、杨笃生、钮惕生、陶焕卿、汤尔和皆

^① 阙良庆：《魏兰与陶成章》，《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

^② 《秦毓蓂事略》，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5页。

在焉”^①。

军国民教育会使用黄帝纪年，参加军国民教育会的会员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充满救国救民的热情，尚无成熟的政治见解和主张。“大家一致的认识仅仅是：非打倒清朝政府不能救中国。至于打倒清政府之后，需要一个什么形式的国家，在谈论中虽然不无涉及，但都没有过深入的讨论。那时有的同志说：这时候只能讲破坏，不能讲建设；讲到建设，问题太多，不易一致，也就不易团结发展了。”^② 黄兴也应邀与军国民教育会的会员进行歃血会盟，讲了一番鼓励的话，但也未谈到将来的建国问题。

军国民教育会在东京主要开展了三方面的活动，陶成章也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加者。“首先是学习射击。会员中的一些年青人，相约每星期同到东京九段坂的体育会去学习步枪射击一次，后来因纷纷投入陆军学校，只得停止了。其次是学造火药。一部分会员凑了少数的钱，在横滨租了一处山顶上空阔僻静的房屋，由一个略懂化学的胡晴崖同志，弄到了些原料和器具，几个同志就在那里试造棉花火药。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些门径，忽然轰的一声，杨笃生和苏凤雏二人的双目都被火药气薰伤，不得不潜回东京医治。学造火药的尝试也就此停止。再次是宣传活动。会里没钱办刊物，会员们就利用当时各省留学生同乡会的刊物，如《江苏》、《浙江潮》、《新湖南》之类，来

^① 龚宝铨：《自叙革命历史》，《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② 王辅宜：《关于军国民教育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从事宣传活动。”^① 会员发表了许多文章，进行广泛的宣传，为武装起义做舆论准备。

军国民教育会曾推选特派员汤樵和钮永建回国开展拒俄运动。并起草了《特派员北行公约》7章，规定特派员北上，面见北洋大臣袁世凯，要求主战，并允许义勇军出发抗俄。如果袁世凯拒绝，则前往北京，游说清政府。特派员在争取义勇队回国抗俄的宗旨下，也有权在北京以外运动。

江苏同乡会和浙江同乡会分别开会欢送汤樵和钮永建北上。军国民教育会全体会员也齐集留学生会馆，欢送两位特派员。叶澜代表军国民教育会致辞，指出沙俄侵占东北，关系到中国的生死存亡，肯定了特派员回国的重大意义，并表示军国民教育会精诚团结，加紧训练，不忘国耻的决心。

汤樵致答谢辞，表示无论是死于锋镝，还是死于斧钺，即使肝脑涂地，也深感荣幸。

钮永建在致答谢辞时，以拒俄义勇队成立以来发扬团结力和爱国心，排议任谤，终于成为今日如此光彩的大团体，以致激发国人群起响应的曲折经历说明，中国人有爱国之心，排外之力，敢死之气，非绝无根性，断不至于沦为奴隶。中国仍有前途和希望。希望全体会员不要怕人嘲笑，怕人干涉，要有坚忍不拔的勇气，坚持斗争到底。

特派员汤樵和钮永建先到保定，找到汤樵的一位在袁世凯的幕府做事的长辈魏老先生，求见袁世凯。魏老先生出于好意，劝说他们赶快离开保定。可是，汤樵和钮永建不听告诫，

^① 王辅宜：《关于军国民教育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仍然赶到天津，找门路晋见袁世凯。

是时，沪上谣言四起，上海报刊竟误传两位特派员已被清朝官员加害。在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员闻讯后，情绪更加激昂，准备以更激烈的方式开展活动。

特派员在天津向袁世凯请愿受到冷落，给爱国学生的救国热情无异于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清政府闻而恶之，指为该学生等，名为拒俄，实则革命，有逮捕风闻，代表人遂返东京。”^① 汤檣和钮永建向军国民教育会的会员汇报了回国请愿失败的情形。

清驻日公使蔡钧得到湖北留日学生王璟芳密报，声称东京留日学生假借拒俄名义，企图实行革命。于是，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相勾结，迫使留日学生解散拒俄义勇队。清驻日公使蔡钧掌握了一张激进分子的名单，并指控为“革命党”，威胁留日学生要报告清政府，予以严办。接着，军国民教育会的特派员北上之行又失利。军国民教育会的负责人怀疑参加拒俄运动的留学生中一定有清政府的奸细，有人甚至怀疑陶成章在暗中破坏拒俄运动。

原来陶成章参加拒俄运动时，因过于激进，引起了清政府派驻东京的留学生监督汪大燮的注意，而陶氏长辈陶大均也恰好参加大阪的国际博览会来到东京，汪大燮与陶大均密谋由陶大均许诺为陶成章谋军职，让陶成章前往北京，以此除去其成城学校的学籍。陶成章不知是计，想直接进入军界，掌握军队，实现其“中央革命”的夙愿，因此，与汪大燮和陶大均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

过从甚密，以至于引起了军国民教育会负责人的误会。

于是，军国民教育会派龚宝铨与陶成章住在一起，暗中观察其一言一行。

龚宝铨，又名未生，原名国元，字薇生，别号味荪，又作味生，浙江嘉兴秀水人。“未冠，值义和团之变，即有光复志。游学日本以争俄约，与黄克强、钮锡生、杨笃生、陶焕卿、汤尔和，相集为军国民教育会，与上海言光复者相应。”^①龚宝铨是军国民教育会的激进分子。

陶成章与龚宝铨倾心交谈。龚宝铨了解了陶成章的良苦用心，疑虑全消。

魏兰回忆说：“其时在日诸志士，组织义勇队，推汤尔和、钮铁生为代表，谒袁世凯，欲以拒俄为名，假其兵力，图谋革命。事不成，疑先生从中破坏，命龚宝铨与先生同居，侦察先生之所为。及闻先生议论，始知先生之苦衷，于是陶龚称为莫逆。”^②陶成章“在东（京），恒与龚君未生偕行，每来谈，饮茶甚豪，盏有余沥，辄交互注空盏中，或倾壶中，又入沸汤，仍注饮之，殊不自觉。天雨，赤足着皮靴，饭时探袂出巾，将以试面，则引黑袜出，已破烂失其踵，复纳之，探袂底，始得巾焉。”^③由于两人朝夕相处，志同道合，竟成了莫逆之交。

回到国内的一些会员，在各地建立了军国民教育会分会，

① 章太炎：《龚未生传略》，《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页。

②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9页。

③ 《怀陶君焕卿》，《周作人文类编·八十心情》（第10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页。

联络志同道合的同志组织革命团体，运动起义。杨毓麟与吴稚等组织“北方暗杀团”，作为军国民教育会保定分会，后来实施了由吴稚用炸弹暗杀出洋五大臣的行动。黄兴、陈天华、刘揆一被派回湖南联络同志成立了“华兴会”。军国民教育会在上海也设立了支部，内设有暗杀团，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获悉后，要求入会，后来发展成为“光复会”。

第三章 联络会党

会党与新军、学界、华侨是辛亥革命并列的四大支柱之一。而浙江与两广、两湖及川贵一样，也是全国会党最为集中的四大地区之一。陶成章是较早重视会党力量的光复会领导人之一。光复会成立前后，陶成章与魏兰等人深入浙江各地，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争取会党加入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行列，使浙江的会党成了光复会的直接同盟军，对辛亥革命光复浙江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节 秘密集会

在戊戌维新思潮的影响下，浙江出现了倡办新学的热潮。杭州知府林启崇尚实学，为地方兴办实事，在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支持下，创办了三所在浙江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作用的学校，1897年，在杭州蒲场巷原普慈寺创办“兼课中西实学”的求是书院，这是浙江第一所新式高等学堂。1901年，求是书院改称求是大学堂，1902年，又改为浙江大学堂，1903年，改为浙江高等学堂。求是书院由力主改革的林启兼任书院总办（校长），学院的宗旨为“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

要义”，培养目标为“讲求实学”。^① 由地方士绅选送“举贡监生”经过考试择优录取，先收学生30人，以二年半为一期。林启聘请海内外著名学者任教，讲授外文、数学及理学课，开创了“求是”的优良学风。按新学制创建的学堂，采用西方办学方式与教学方法，讲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并订阅中外报刊，不仅成了传播新知识的园地，而且也成了传播新思想的场所。浙江许多进步青年从新学堂接受了新学的培养以及新思想的熏陶，走上了革命道路。

1900年，求是书院进步师生与杭州教育界蒋方震、敖嘉熊等成立“浙会”，遭到清政府的查禁，于是，由陈汉第改名为“浙学会”。浙学会在杭州鼓吹革命，清政府予以通缉，一部分会员惊恐万状，登报声明退会，另一部分会员没有气馁，继续坚持斗争。前往日本留学的浙学会会员，参与了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

1903年2月17日，东京浙江同乡会创办了《浙江潮》，“宣传革命的不可避免，鼓吹作革命之骁将，用革命暴力，推翻清朝统治，于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坚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② 《浙江潮》的编辑部表面上设在东京神田区留学生会馆，实际上设在东京牛込区早稻田大学附近的榎木町浙学会会员王嘉祎的寓所，也是浙学会秘密集会的场所。王嘉祎正在早稻田大学读书，兼任《浙江潮》编辑。1903年10月，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浙学会会员认为战争势必延长，这是中国进行革

^① 孙宗让：《求是书院与求是精神》，《杭州文史资料》（第17辑），1992年版，第132页。

^② 沈颀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页。

命的极好机会。东京的浙学会会员在王嘉祎的住处进行了多次秘密集会，商议对策。

1903年10月，浙学会留日会员在王嘉祎住处举行了第一次秘密集会，参加的有原求是书院学生王嘉祎、蒋尊簋、许寿裳以及求是书院教习沈颀民等十余人。浙学会会员经过商议，“决定另行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目的不仅要加强革命宣传工作，首要在于力行，要用暴力发动武装起义。”浙学会会员认为“应该先选择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实行武装占领，作为根据地，再逐渐扩大。最后认为要另组一革命团体，应邀请浙江志士参加”^①。这时“陶成章（焕卿）正在东京，军国民教育会魏兰（石山）、龚宝铨（味荪）不久将回国，周树人（豫才）在弘文书院读书，都是坚决走革命道路的人士，分别联络”^②。正在东京留学的浙江籍学生陶成章、魏兰、龚宝铨均应邀参加了浙学会。

1903年11月，东京浙学会会员在王嘉祎的住处又举行第二次秘密集会，陶成章也参加了会议。据沈颀民回忆，会议商定，“为了取得革命武装根据地，决定陶成章、魏兰分往浙江、安徽二地，龚宝铨往上海，张雄夫（开会时张在上海）和我往湖南长沙，与华兴会首领黄兴联系，因黄兴已在长沙暗策革命，武装起义，庶可首尾相应也。”^③浙学会的第二次东京秘密集会，作出回国组织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

① 沈颀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② 沈颀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③ 沈颀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决定。

东京的二次浙学会会议，成了光复会成立前的“预备会议”，实际上成了光复会的前身。“两次会议，虽以浙学会名义召开，还没有正式命名为光复会，实则光复会肇始于东京。”^①

1904年1月，陶成章、魏兰和龚宝铨受军国民教育会和浙学会的派遣，以“运动员”和“归国实行员”的名义，相继回国，来到上海，与蔡元培共商开展反清革命计划。

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必须有军队，浙江的会党成了陶成章关注的力量。

第二节 会党简史

陶成章从日本回国后，“奔走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革命。陶成章是革命实践者，毅力惊人，对革命事业始终不渝。”^② 辛亥革命起义之前，在浙江从事反清革命的人很多，而“陶成章就是其中较杰出的一个”。陶成章“为了组织反清力量，秘密运动阶层，尤其是争取青红帮的力量极为感人。陶成章为了这件事奔走浙东金衢严处各县，以至双脚起泡，不能下地，还咬紧牙关到处奔走”^③。陶成章对浙江会党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① 沈颢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② 沈颢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③ 张云雷：《辛亥革命见闻琐谈》，《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陶成章是浙江较早重视会党力量的光复会领导人。1903年秋，浙江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学生祁文豹等人建议陶成章联络浙江台州秘密会党伏虎山山主王锡彤，并介绍了联络人。1903年10月2日，王锡彤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宁海反洋教起义。王锡彤在伏虎山下齐集各路人马，声称奉清廷端王剿灭宁海天主教的密谕，并宣读了“灭洋保国”的起义文告，揭露了宁海天主教的种种罪行。起义军冲入宁海县城，焚毁了天主教堂，在城隍庙处决了宁海天主教的罪魁祸首神父朱国光。但是王锡彤缺乏长远的革命目标，取得局部胜利后旋即鸣金收兵，偃旗息鼓，入城的第二天就令民众各自回家。10月8日，清军围攻大里，王锡彤急召部众进行抵抗。由于众寡悬殊，大里被攻陷，清军肆意烧杀掳掠，20名群众被杀，19名骨干分子被捕，其中3人不久遇难。王锡彤也出逃外地，反洋教起义失败。

陶成章异常钦佩王锡彤的斗争精神。1903年秋，陶成章“由上海趋宁波入台州。会锡彤已避居嵊县，不遇而返”^①。陶成章与王文庆沿括苍山脉，到达台州府，未能遇上王锡彤。

陶成章与王文庆又到台州八仙岩上洞天，访问正在读书学剑的张任天，“纵谈天下大势，归结于革命不可，而在中国，革命非联络会帮不可。”^② 陶成章和王文庆嘱张任天注意联络会党，组织革命武装力量。

浙江会党大都从明末遗民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建立的秘密团体天地会演变而来。明末清初是浙江会党发展的早期阶段。郑成功领导的抗清斗争失败后，散居台湾和福建一带的反清志士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② 张任天：《回忆陶成章与王文庆》，《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64页。

为了积蓄力量，传播革命种子，改以秘密会党的形式，继续开展反清斗争。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明末浙江的抗清斗争也异常壮烈，人民遭受清军的屠戮也最为惨重。以张煌言为首的抗清义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慷慨就义。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抗清失败后，坚持不与清政府合作，并著书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厉行“文字狱”，其中一些重大的文字狱常与浙江人有关，但残酷的思想专制和民族压迫，并未消除浙江人民反满复汉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浙江秘密会党组织也在民间不断蔓延。张煌言抗清失败后，明末遗民一念和尚，又名张念一，以浙江大岚山为根据地，建立了秘密会党组织，联络浙西天目山及江西、江苏、山东等地的反清势力，力谋反清复明，后来遭到清政府破坏而失败。康熙年间，一念和尚“组织一秘密会，谋反清复明，以浙东之大岚山为根据地，更联结浙西之天目山，江西鄱阳湖之戈陈，江苏太湖之盐泉。其势力所及，远达于山东曹兗二府。授太仓王某为兵备副使，奉朱三太子为元帅，不幸突遭破败，赍志以歿”^①。这是浙江最早的秘密组织。一念和尚组织秘密会社的斗争坚持到清初康熙中叶，但一念和尚的部下仍坚持秘密的抗清斗争，“二百年来，日在浙省各府县组织势力，潜滋暗长，派别繁多，惟宗旨渐晦，鲜有远大之计划以企图恢复者。”^② 尽管清朝统治日趋巩固，人民抗清斗争相继失败，但会党势力仍隐蔽下来。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页。

② 冯自由：《浙江之秘密会党》，《革命逸史》（第5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页。

太平天国时期，进入浙江会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太平天国之师入浙，浙人恢复之思想复活，而会党之势乃又炽矣。”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长期蛰伏浙江各地的会党又开展活动，很快发展起来。宁波的双刀会响应福建、上海等地的小刀会起义，在浙东沿海组织武装暴动。诸暨的莲蓬党，温州、乐清的金钱党和红旗会也揭竿而起，声势浩大，成为太平军的有力后援。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被清政府各个击破。会党“皆限于一隅，坐井观天，以故一村起一村即灭，一县起一县即灭”。太平军入浙后，不少会党成员加入了太平军。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播撒在浙江大地的反清种子，清政府却无法铲除。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双重剥削下，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加速瓦解，大批失业流浪的人群集结市镇和码头，他们组织团体，会党势力因此不断扩充起来。“计自太平天国兵兴后，迄今四十余年，会党之起义者，不下数十次，盖几于无岁无之。经此数十次之摧残，会党乃益加进步，于是一村者求附于一县，一县者求附于一府，一府者又复于他府相联结，会党之势力，乃日见其强大。时势逼人，乃复有所谓革命党者，乘时奋兴，与诸会党结合，为之助其焰而扬其波。积而久之，遂酿丁未戊申间之巨案。”^①从太平天国起义至义和团运动40年间，浙江的会党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1890年至1899年之间，温州永嘉、乐清一带有哥老会活动，在楠溪江的山村里发展了上千名会员，进行反清宣传，后来被清政府镇压。这是浙江会党的蓬勃发展时期。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页。

辛亥革命时期，是浙江会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凡人受压制过甚，则其间必有起不平之鸣而图反对者。满人虐遇汉人，无人不愤，亦无人不恨。然数十年前，未遇外界风潮，刺激未甚，故其主义多隐晦不彰。及近年间，因欧美各国之侵迫，外界接触日甚，满人不思变计，虐遇汉人如故，括其脂膏以为得计。于是汉人有思想者，因新仇以记旧怨，共提倡逐满主义，不数年而革命之风潮，遂遍及于全国矣。”^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会党的斗争，更趋自觉，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1904 年前，浙江会党单独活动，主要进行反洋教斗争；1904 年后，浙江会党与革命党人联合，主要进行反满革命。浙江会党经过起义、失败、再起义、再失败的锤炼，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与发展，遍及浙江省 11 府，一些大的会党会员动辄成千上万。较有影响的会党有二十多个，与后来革命党人建立联系的有以沈荣卿、张恭、周华昌为首的龙华会，总部设在金华；以王金宝、吴应龙为首的双龙会，总部设在丽水；以竺绍康、王金发为首的平阳党，总部设在嵊县；以王锡彤为首的伏虎会，总部设在宁海；以敖嘉熊为首的祖宗教，以嘉兴为中心，活动于浙北地区。浙江全省均有会党组织，其中以金华府所属的武义、永康、东阳等县，台州府所属的仙居，绍兴府所属的嵊县，处州府所属的缙云、青田、松阳、宣平等县最多。

陶成章“在浙联络会党潜力巨子，如嘉兴敖孟姜，绍兴竺绍康、王金发，兰溪蒋禄山，金华张恭，永康吕载之，台州王文庆，云和魏兰、张伟文，丽水阙玉祺，缙云周华昌、吕东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 3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4 页。

升等皆其显著者，嗣后皆在辛亥革命役中卓立事功”。浙江会党成了光复会依靠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陶成章曾与樊光等人计划“以浙东各属万山丛杂，会党甚盛，容易资以起事，曾徒步三次潜入金、衢、严、处各属，组织起义，屡被侦缉破坏，不获成功。但先生愈失败愈不畏劳苦，草屨蒹笠，胼手胝足，了无所苦。事急时，望门投止，人皆争欢迎之，其得人心爱戴如此”^①。浙江会党无论是在1907年的皖浙起义，还是辛亥革命光复东南的战役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会党概况

终南会又名终南山，属于哥老会系统的分支，由湖南传入江西，再由江西传入浙江金华、衢州和福建建宁，势力最为庞大。1897年，左宗棠镇压太平军后，以整饬营务为名，遣散了大批军官回原籍。原籍湖南湘勇营官何步鸿和朱武因家乡没有亲人，流落金华。俩人原是洪门中人，一怒之下，开创山堂，定名为终南会，发誓与清政府作对。

终南会的组织类似哥老会，既有强烈的反清意识，同时也有浓厚的封建性质。由香长、盟证、总座（又称龙头）、正印（副龙头）组成领导机构，香长、盟证仅在开山收徒时临时推选，事毕即撤销，总座、正印实际上成为正副会长。下设内八堂，即管人事升迁的座堂，管经济的陪堂，掌印信的元堂，管内务的执堂，管礼仪的礼堂，管交际的副堂，司执法的刑堂，

^①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0页。

相传其中一堂主因犯罪被杀，该堂此后不再设堂主。另外还有外八堂负责执行内八堂交付的事情，分为山主，又称牌把大爷，管钱粮的当家，即牌把三爷，管事，即牌把五爷，巡风，即牌把六爷，负责侦察的金口，负责通报的八牌，即牌把八爷，处理日常事务的九牌，即牌把九爷，处理勤杂事务的么大，即牌把十爷。终南会设有帮规“红十条”，包括孝敬父长，手足和睦，叔嫂尊重，不得吃里爬外等。凡是违犯帮规者，按“黑十条”处罚，如“勾引敌人罪难抛，三刀六眼难恕饶。平日不听拜兄教，四十红棍皮肉焦”^①。

终南会的会员以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店员、艺人等下层群众为主，也吸收少量的地主、官僚、工商业资本家以及知识分子，但对后者的考察较为严格。终南会会员都发有会员证，即“宝”，又称“布票”。“宝”正面横额有“还我河山”四字，下面有“终南山”、“双溪水”、“明月香”、“八咏堂”四行小字。山、水、香、堂下各附七言诗一句，合起来就是一首完整的诗：“终南巍巍气如龙，双溪一贯泻长虹。明月胜迹垂千古，八咏光辉百世雄。”下方为恩（赐）承（行）保（举）引（进）四位盟兄姓名，并加盖帅印。背面则注明受宝人姓名、职位、升迁年月，并盖内八堂公章。终南会属于旧式反清会党。

终南会逐步统一了金华林立的会党组织，如金华张恭领导的千人会以及永康以沈荣卿为首的百子会，处州的双龙会、台州的伏虎会以及玉泉会和关帝会，均为终南会的分支。

^① 石夫：《辛亥革命时期的金华龙华会》，《金华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91年版，第13页。

台州的伏虎会，又名伏虎山，属于终南会的一个分支，是较早转入反满革命的会党，总部设在台州。台州民风强悍位冠浙江之首，大多为绿林豪客，少有大部的会党。台州著名的伏虎会领袖是王锡彤，台州宁海人，原是本邑附生，长期任乡村塾师。1900年，王锡彤为反对宁海官府支持天主教会欺压群众，遭到拘捕和扣押。王锡彤获释后，立会招贤，以排外作为宗旨，创建伏虎会，又称伏虎山。1903年秋，王锡彤又发动和组织了万人反洋教大起义，进占宁海县城，焚毁了宁海天主教总堂，处死了天主教神甫朱国光，惩处了为虎作伥为非作歹的天主教徒。反洋教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曾悬赏8000大洋通缉王锡彤，但一无所获。王锡彤“受革命党人之运动，遂易排外宗旨而为排满宗旨”^①。伏虎会在宁波奉化也设有分部，由王锡彤的朋友杨某负责。1904年以后，伏虎会成为龙华会的一个分部。

白布会最早创于温州。瑞安绅士孙衣言，字琴西，以治宋学著名，刊有《永嘉丛书》一部，曾任江宁布政使司。孙衣言有反清思想，遂以创办团练为名，秘密组织了白布会。后来，左宗棠攻陷杭州，孙衣言知大势已去，解散了白布会，并严禁部下继续在温州传播白布会。于是，白布会转而由客民传播到严州和处州。

双龙会是终南会的分支，本名万云会，又称万云山。“其所以称双龙者，因票布上画有二龙故。”^② 双龙会本部设在处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页。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页。

州，会主是拳师王金宝。

龙华会又称龙华山，外人讹称九华山，本部设在金华，属于终南会的分支。1901至1902年间，正会主何步鸿病逝于永康，副会长朱武也离浙江而去，终南会群龙无首。永康的沈荣卿、武义的周华昌到金华与张恭商议对策，决定另立山堂。恰好此时金华流传民谣：“若要天下真太平，除非龙华会上人。”仁人为了与民谣相应，故号称龙华会，将实现“天下真太平”的理想境界作为奋斗目标。张恭建议利用民谣，将新立的山堂取名为“龙华会”或“龙华山”。

龙华会在“金华八县咸有分部，命红旗管理其事，用五言四八句为字号次第，而以中间一字为总红旗，督理一县党军事宜。余四字分作东西南北四区，为散红旗，分头理事。如另有事故，则特派一亲信干员，以总理数县事宜，事平则去之。党徒号称五万人，实则二万数千人”。金华府属8县均设有分部，永康由沈荣卿主持，以胡鹿笙杂货店为联络点，分管永康、东阳、缙云等县会务。沈荣卿将永康事务委托吕阿荣负责，东阳和缙云则由陈占鳌和赵永景负责。武义分部由周华昌主持，分管武义、龙游、衢州等地会务，总联络点设在壶山镇县后街何茂盛酱油铺。龙华会在台州也设有分部，仙居由应师杰统领，天台由陆显元负责，各有五六百人。处州缙云也有吕嘉益统领的三千余人。绍兴的诸暨、嵊县和青田以及温州的乐清等县也设有龙华会的分部，只是势力较为弱小，不能自树一帜。龙华会的领导骨干大都是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有些人还有举人、监生等头衔，足智多谋，文武并重，社会影响较大。后来，秋瑾依靠的主要会党力量就是龙华会。

浙江腹地的嵊县和诸暨等地，山地贫瘠，民风强悍，会党

历来较为发达。平阳党原名平洋党，本部设在嵊县，党员号称万人。平阳党的党魁是竺绍康，因与本地土豪蔡老虎有杀父之仇，因此组织平阳党，进行报复。嵊县还有一支乌带党，以腰缠玄色带为号，首领王金发，字季高，也是嵊县人。王金发是竺绍康的密友，原是武生，曾毕业日本大森体育学校，归国后计划创办团练，组织革命军。

私贩党不属于洪门，其成员大都以运河漕粮为生或以贩盐为主，活动在“苏、松、常、太、宁、广、杭、嘉、湖之间，即所谓盐枭也。其一切组织法及口号暗号，咸与洪门异，号称潘门，亦曰潘家，又别称庆帮，俗讹为青帮”^①。均因其魁首潘庆得名。潘庆原为贩卖私盐的盐枭，原来也是源自洪门，因与专捕私盐的哥老会湘勇处于对抗地位，因此别树一帜。“然犹未尽忘其木本水源之意，故凡潘门兄弟遇见洪门兄弟，其开口语必曰，潘洪原是一家。”^② 潘家的主帮，大都是浙东温州和台州人；客帮大都是皖北江北人，又称巢湖帮，与温台帮相区别，江南、皖南、浙西各府的流氓光蛋均属客帮。1907年末1908年初，与清军作战的余孟庭和夏竹林等都属于私贩党。

此外，浙皖还有散居於潜、昌化、安吉、孝丰、广德、建平、宁国、芜湖、太平等地的关帝会和玉泉会，金华各地有千人会和古城会；绍兴、金华、宁波各府有红旗党、黑旗党和白旗党，温州有神拳教，金华则有白莲教和斋教。这些教会势力较小，与革命党人联系也不太多。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

② 《浙江之秘密会党》，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页。

浙江的会党势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为了将分散的会党力量纳入到统一的革命轨道上来，陶成章深入浙江各地，争取会党加入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行列。“革命志士之著手会党运动，其始于癸卯甲辰二年，而运动之主要人物，则有孙翼中、龚宝铨、陶成章、敖嘉熊、魏兰数人，成章其最著者也。”^① 陶成章联络浙江会党参加辛亥革命功勋卓著。

第四节 结识振声

1904年2月13日，陶成章与魏兰离开上海抵达杭州，寓下城头巷《杭州白话报》馆。时恰逢癸卯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陶成章自从赴日留学后，再未回过陶堰，杭州离绍兴近在咫尺，游子还乡，归心似箭。

“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杭州与绍兴仅一水相隔，焕卿为什么不回家一趟，与家人团聚，过完年我们再出发呢？”魏兰也看出了陶成章的思乡之情。

“幸好家父身体健康，家计无忧。”陶成章无限思恋地说，“我又何尝不想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过个团圆年，尽享天伦之乐呢？”

陶成章叹了一口气，“情字难却，回到故乡，一见父母妻儿，亲情难于割舍，恐怕一时就出不来了。古时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传为佳话，我虽不能与大禹相比，但也不能为儿女亲情误了革命大事。既然以身许国，怎能

^① 《浙江之秘密会党》，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页。

以家为念呢？”陶成章以革命事业为重，忍痛割舍亲情，放弃了与家人团圆的机会。

“焕卿热心国事，舍小家为大家，莫过于此。”魏兰为陶成章忧国忧民的精神所感动。

陶成章和魏兰见了原东湖通艺学堂主讲席，即后来赴日留学，回国后出任《杭州白话报》的主编孙翼中。

陶成章和魏兰向孙翼中谈了回国准备组织力量，进行反清革命的打算。

孙翼中建议：“你们现在尚缺少实力，我认识白布会首领濮振声，可介绍二位前去见见面，或许可以利用会党的力量，发动武装起义。”孙翼中与监禁在仁和狱中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交情很深。

陶成章和魏兰正为没有武装力量而发愁，会党正是他们想要联络的组织。

孙翼中为陶成章和魏兰写了介绍信。

2月14日，陶成章和魏兰持孙翼中的介绍信，前往仁和监狱，与濮振声相见。仨人相谈甚欢，一见如故。陶成章从中了解到会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悠久的革命传统，潜藏着很大的斗争力量，是一支可以依靠的队伍。

濮振声，字景潮，浙江桐庐人。濮振声是岁贡生，以训导銜候选在家，是建德、分水、桐庐、富阳、新城、临安六县的客民总董事。濮振声家资殷实，仗义疏财，素为六县民众所仰望。濮振声也精通医卜星相之术，尤其是医术高明，几经其医治之病，莫不妙手回春。

濮振声是白布会的首领。濮振声组织独立军，改订了白布会的章程。白布会的军制与洪门各会党略有差异，“以5人为

伍，有伍长；5 伍为偏，有偏师；2 偏为队，有队正；2 队为哨，有哨官，是曰百夫长；5 哨为营，有营官，号曰千夫长。”至于千夫长以下的称呼，与洪门各会党也有不同，“千夫长曰老三，百夫长曰老五，队正曰大老七，偏师曰小老七，伍长曰大老九，普通会员曰小老九。”^①实际上千百人均授有札委，濮振声自任总帅，统领白布会。由云和刘某为军师，假称为刘基的后人，白布会会员尊称为“刘师爷”。

1900 年，濮振声以保护乡里为名，利用白布会创办团练，称为“宁清团”，又称“宁清会”，表面上绥靖清王朝，实际上以此掩人耳目，进行反清活动。1902 年夏秋之际，由于天主教教民依仗外国教会势力胡作非为，横行霸道，官府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激起众怒，濮振声为此在建德、桐庐、新城三县交界处发动起义。

濮振声拟进兵严州府城，相机进攻安徽。衢州、处州以及江西玉山和福建浦城的白布会均蠢蠢欲动，警报传到杭州。

清封疆大吏闻讯惊恐不安，命令统带黄书霖率武备小队援助严州。

濮振声虽然对起义作了长期的准备，但事先并未与处州和衢州各地的白布会首领商议。而起义发动后，由于消息阻隔，处州和衢州等地白布会众未能及时响应，濮振声势孤力单，只得率余部藏匿山中，清兵四处掳掠，滥杀无辜，濮振声痛心疾首。

1903 年 1 月 6 日，濮振声出山自首，起义军最终溃散。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 3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2 页。

濮振声被押往杭州，禁于仁和县署。

濮振声是“秘密会党中之一重要人物也，因反正不成，被逮，清吏待之甚厚”^①。濮振声被囚禁在云和县署前西侧，另建房屋居住。

2月19日，即正月初四，陶成章与魏兰再次到仁和监狱与濮振声相见，畅谈反清计划。濮振声见陶成章和魏兰革命意志坚定，秘密写了数封介绍信，送上十多张名片。

濮振声拍了拍胸脯说：“凡持余名片到新城、临安、富阳、於潜、昌化、分水、桐庐等地，沿途都有兄弟照料，不至于有日暮途穷的感觉。”

濮振声的介绍信促成了陶成章等人“联络秘密会党之基础”。

1907年3月，濮振声在狱中病逝，终年64岁。

陶成章闻讯后，极为悲痛。陶成章高度评价濮振声：“秉心慈惠，与人言必尽其诚，身格短小，目光锐利，口音清朗，左足微蹙，一望之下，即可见其为精明强干之士。”^②

第五节 创办先志

陶成章化名陶起东，与魏兰一起由杭州出发，按照濮振声的引荐，前往浙西山区联络会党。

陶成章与魏兰先坐小船到达富阳。富阳是三国时东吴国君孙权的故乡，城东的鹳山下，还有汉代高士严子陵垂钓的石

^① 《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6页。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3页。

碑，谙熟中国历史的陶成章却无心游山玩水，寻访史迹。

陶成章与魏兰继续西上，抵桐庐招山埠，住魏兰的族侄魏兰存家。陶成章与魏兰栉风沐雨，探访附近一带的秘密会党。因白布会首领濮振声被囚狱中，会党的一切事务由其军师刘军师主持，陶成章和魏兰得到刘军师的帮助，与白布会各派取得联系。

魏兰由水路经兰溪至遂昌、松阳、丽水等地，返回云和。

陶成章则脚穿草鞋，腰系草绳，从陆路遍访桐庐、分水各村落，拜会白布会会员。

陶成章在分水还与潘家建立了联系。

陶成章离开分水，“由设峰岭历歌舞岭以入建德，由建德历寿昌、汤溪、龙游、遂昌、松阳以至于云和，寓于（魏）兰家。”^①陶成章和魏兰分别返回处州府云和县，已是正月底了。

陶成章以魏兰留日同学的名义，住在魏兰家中。清政府对反清志士搜捕极严，到处张贴告示：“随时抓获，就地正法”，而且，“窝藏者同罪”。魏家是云和县的名门望族，人来人往，十分复杂，一个陌生人经常出入魏家，容易引人注目，发生不测。魏兰与陶成章商议创办一所学校，作为革命的据点，以教师的身份公开活动，借此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作为革命的后备力量。清政府实行科举制度，云和县只有县学教谕衙门管理廪生和秀才，虽有一所箬溪书院，却形同虚设。另外还有私人办的私塾教育儿童，云和人尚未听过“学校”名称。创办学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校，确实困难重重，既无群众基础，更无物质基础和自然条件。陶成章和魏兰迎难而上，他俩经过反复商讨，认为偏僻小县，人民有渴求知识的愿望，设置新课程，聘请新教师，能够吸引进步青年。

魏兰借用箬溪书院校址，挂出先志学堂的牌子，贴出招生布告。魏兰不顾“不肖子孙”、“败家子”的闲言碎语，毅然变卖田产，筹措办学经费，置办课椅桌凳等教学必需设备。

先志学堂开设国文、历史、地理、数学、化学、日语、图画、体操等课程。国文教材大都是精选的古文诗词；日语采用下大三郎著的《汉译日语阶梯》日文原版教材；历史教材由陶成章亲自编写；魏兰则编写了数学、化学、地理、图画等教材，后来整理成为《数学易知》、《地舆易知》、《图画易知》等书，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由清国留学生会馆印行；体操课讲义采用可儿德编撰，在日本出版的《体操全书》，由双龙会首领之一的少林派拳师李春贤担任教师，传授少林拳术。另外，还特别聘请了东京弘文学院专修测量专科的留学生平阳人陈华到先志学堂任教。

处州府属十县尚无中学，先志学堂又是前所未有的“洋学堂”，而且又有陶成章、魏兰、陈华等留日学生任教，许多年轻人感到新鲜，纷纷报名，要求入学。然而，也有一些守旧的人物认为这些留学生虽然喝了点“洋墨水”，却未必有“黑墨水”，疑虑重重，逡巡观望。有人得知陶成章熟悉历史，也怀疑是否货真价实。“有张生者，闻先生系历史专家，取九朝纪事本末，翻阅数日，特来诘问先生，先生皆对答如流，且引他书以证其事；又有张某者，问日本系何年开国？先生则对以

周惠王十七年，由是乃大信服。”^① 陶成章的博学多才轰动了全城，偏僻的小地方难得有这样的大学问家光临讲学，那些年轻的秀才、廪生、增附生深感学识不够，谁也不肯错过良机，争相报名求学。沈村叶为榕、叶为芬，梅源叶兰雄、叶瑞如等都是兄弟双双同时入学。先志学堂一时盛誉远播。

陶成章和魏兰以先志学堂为掩护，对外以公开招生为名，暗中却联络会党，招收会众入学。魏兰回忆：“先生以掌教为名，寄居学校。（魏）兰则奔走于括瓯两郡。（魏）兰之堂侄魏毓祥，亦驰往松阳、青田、温州诸处，联结会党。”^② 陶成章和魏兰对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先志学堂成了处州会党的集结地。

陶成章赞叹：魏兰“在云和创办先志学校，处州府之有学校，自此始也。学校既立，处属各县之人咸莅至，成章为任教事职，（魏）兰则奔起于瓯括两郡，处府由是多革命党”^③。处州各地的会党领袖及进步人士如丁嵘、赵舒、许绍南、阙麟书、黄桂芬、何子华、阎逊斋等纷纷云集云和。

先志学堂尽管办学时间不长，却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05年以后处州东渡留学的许多青年学生，包括云和32人，景宁7人，大都在先志学堂学习了《汉译日语阶梯》，接受了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教育。因各种原因未能出国的先志学堂学生，如叶桐圭、王显之、王德清等也积极参加地方活动，做出

①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0页。

②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0页。

③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了重要贡献。陶成章和魏兰以后创办“丽水实业织布学堂”、“体育学堂”、缙云“半日制学堂”以及后来的“大通学堂”，都是仿照先志学堂的办学模式。先志学堂为创办革命干部学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六节 联络双龙

陶成章居留云和2个月后，前往上海，魏兰则继续留在处州和金华府属各地联系双龙会和龙华会。“所到之区，（魏）兰皆登台演说人种之分、民族之说，由是人人皆晓。”^①

双龙会是终南会的一个分支，由拳师王金宝受终南会的委托创办，总部设在松阳县城，处属各县均设有分部。双龙会会主王金宝和副会主阙麟书在丽水广肆放票，发展组织，号称二万余人。

魏兰在丽水结交了阙麟书。

阙麟书，字玉麒，小名志仁，浙江丽水碧湖镇人。1879年12月1日，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16岁负笈入丽水圭山书院，师从名儒熟读经史。时值甲午战败，阙麟书痛心疾首，常寓意于诗词歌赋之中。18岁应县试，19岁应府试，府学出《安上定下策论》，阙麟书奋笔疾书，“言外患日甚，救亡图存之理，府学夸其文，名列第一。”^②可是，阙麟书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毅然抛弃仕途，走上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② 阙良庆：《阙麟书传略》，《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了反清革命道路。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对内搜刮民脂民膏，无所不用其极。大批知识分子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反清革命。1902年，阙麟书与丽水的江湖拳师李春贤、黄桂芬等人结交，倡言革命，一起加入了松阳王金宝领导的双龙会。阙麟书被推为双龙会副会主，负责丽水分部，经常来往于处属各县，进行宣传，散发布票，扩大组织。阙麟书每年都要举行“单百会”、“双百会”入会仪式各一次，其家乡碧湖镇几乎全体加入了双龙会。

阙麟书与前来联络的魏兰协议订交，还作为中介人，陪同魏兰会见了双龙会会主王金宝。

王金宝，浙江青田人。父亲王玉明，以善拳勇而闻名，曾任松阳富户黄某的卫士。王玉明游历闽赣等省，沿途传授拳术。王金宝年仅13岁即随父亲游行四方，结交各省的秘密会党首领。1894年以后，父亲因年老体弱，侨居松阳，经营商业，获利不少。王金宝以营利所得，结交各路豪杰，并代父继任黄某卫士。王金宝尽管拳术不如父亲，但魄力过人。黄某因受人欺凌，特地出资请王金宝倡建秘密会社以图报复。王金宝已受终南会的委托，在松阳创建秘密会党“万云会”。恰好松阳县西乡双龙滩每年秋季均要举行水神会，有数千农民到会，各出钱数百文举行大会餐，并进行武术比赛。于是，王金宝借民间双龙滩例行祭祀的水神会，定名为“双龙会”。加入双龙会必须举行入会仪式，入会者先交一对红蜡烛，一只大公鸡，然后歃血为盟，聚饮盟誓。再由会主传授会中密语暗号，发给会员证。证书由白洋布制成，正面印有双龙，背面有诗一首，其中有“洋教为非当灭尽，要求乾坤扭得转”之句。双龙会

曾在西屏南门瓯江船夫经常聚集的场所“瓯青公所”设立机关，结交遂昌、松阳、云和、龙泉、丽水、青田、温州等地往来的民众。会友满百人以上称“单百会”，满两百人以上称“双百会”。“是时处州知府赵亮熙（四川人）性贪鄙，黄某执贄投为门下，于是放票者肆行无禁，年余之间，会员骤增达2万人，处属10县，咸有分部。金宝摘录成语为七绝诗一首，以编字号次第，每县或一字或二三字不等。”^①处州府属各县均设有双龙会的分部，双龙会的势力骤增。

处州民众惧怕官府，视县官如天帝。尽管清吏百般鱼肉，民众却敢怒而不敢言。

双龙会建立后，情形为之一变。时外国传教士在处州各地飞扬跋扈，欺压民众，官府不敢过问。松阳基督教牧师德国人廉和清与教民吴士根依仗官府势力，诬蔑双龙会为“土匪”和“乱民散勇”。王金宝怒不可遏，率领会众数百人捣毁了教堂房室和家具，牧师廉和清也被打伤，仓皇逃往省城杭州。

魏兰向双龙会首领指出：“洋教肆无忌惮，欺压百姓，盖由于清廷腐败无能，投靠帝国主义，纵容教士鱼肉人民。不推翻满清，就难于灭洋，不灭洋就不能有中国人民安居乐业的日子。”^②

经过魏兰的教育，王金宝认识到洋教之所以跋扈，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遂将双龙会的宗旨由“仇洋”改为“反清灭洋”，矛头直指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双龙会在处州各地散发了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页。

^② 《辛亥革命的先驱——魏兰》，《云和文史资料》（第1期），1985年版，第10页。

《告群众书》，传单中有“八月桂花香，十五十六动刀枪，先杀倪国璋，后杀镇台草色官”。倪国璋时任处州知府。双龙会的威望更加深入人心，声势也日益壮大。

第七节 结交张恭

龙华会的大本营在金华，会众遍及金华府所属八县，处州府所属的缙云等县也颇有势力，吕逢樵及其侄吕嘉益拥有会众三千人。

魏兰在处州府城会见了龙华会首领丁嵘，又在丁嵘的陪同下，前往缙云壶镇会见李造钟、吕逢樵及其族侄吕嘉益。

吕逢樵，又名东升，字耀初，乳名唐良。吕逢樵“开一小杂货店名曰吕万盛，其家本小康，以慷慨好士之故，因中落其家，然不介意也”^①。吕逢樵喜欢交结豪杰，尽管家境并不富有，但挥金如土，有时匮乏，也能运千金如反掌，仗义疏财。吕逢樵才智过人，热情好客，熟悉秘密会党情形，与魏兰一见如故。

吕逢樵的族侄吕嘉益“秉心强直，最喜抑强扶弱，结党数千，雄踞一隅”^②。魏兰得到吕氏叔侄的大力支持。

吕嘉益与龙华会永康分部的首领沈荣卿和武义分部的周华昌是莫逆之交，魏兰得到吕嘉益的介绍，与丁嵘和李造钟一起，前往永康，结识了龙华会正会长沈荣卿。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沈荣卿，名乐年，又名瑛，龙华会党人称之“荣哥”，清吏误“哥”为“古”，并以“荣古”之名予以通缉。沈荣卿原籍浙江山阴，侨居永康，从小喜习武术，备有石锁二对，铁鞋底十双，舞剑弄棒，寒暑无间，臂力过人。沈荣卿曾纳粟入监，穿过花翎，戴过红缨，但目睹朝廷腐败，洋人侵略，民不聊生，萌发了“反清仇洋”、“革命排满”的思想。沈荣卿与人合伙开设“新万顺商店”，富甲一方，性情豪爽，喜交豪杰，深得人心，起初结有百子会，后来加入了终南会，递升至新副。沈荣卿与好友张恭、周华昌另开一山号，名曰龙华会。沈荣卿交游广泛，势力日渐壮大，家道也因此而中落。永康龙华会的联络机关设在胡鹿笙杂货店。沈荣卿的心腹名叫吕阿荣。

东阳各县会党事宜，由陈魁鳌、赵永景负责；武义各县事宜，由周华昌管理。周华昌外号金海，原是缙云人，侨居武义。周华昌也“仗义疏财，深得诸党友之欢心，而能致其死力，胆力识力亦复加人一等，故其所办一切事宜，颇有成效可观”^①。周华昌出任龙华会副会长。

魏兰结识沈荣卿后，返回云和。

魏毓祥与阙石原再次赴松阳，寻访王金宝。

1904年秋，魏兰与魏毓祥离开云和，前往上海，途经处州府城时，与冯豹和陈乃新相遇。冯豹，字地造，乐清人。陈乃新，字梦熊，又名粹，也是乐清人。冯豹和陈乃新受敖嘉熊的委托，到处州考察会党情形。魏兰与魏毓祥带冯豹和陈乃新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拜访了处州的志士。魏兰将会党的部分情况告知了冯豹和陈乃新，介绍了李造钟与丁嵘的地址。

冯豹和陈乃新赴缙云访问了李造钟，得知了秘密会党的所有情况。接着，冯豹和陈乃新又到净岳，访问了丁嵘，并偕丁嵘一起到永康。

魏兰与魏毓祥也于次日抵缙云，访李造钟，再赴永康，与冯豹和陈乃新在沈荣卿家相会。

魏兰通过沈荣卿的介绍，又到金华会见龙华会另一副会长张恭。

张恭，名临，字伯谦，又字同伯，浙江金华人。金华文风颇盛，丽正书院为闾群俊秀肄业之所，聘请汤寿潜为院长，讲求实用之学。张恭入书院学习，文思敏捷，每逢月课，一面与人谈论，一面写课艺，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夙具大志，对于章名之学不屑一顾，即使书院的讲授，也不甚重视。1900年秋，张恭与终南会另一首领蒋鹿珊到杭州紫阳书院读书。这时，正是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张恭与杭州各校的一些进步师生组织了名为“浙会”的小团体，研究时事，议论时政，对“四夷交侵”的险恶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揭露了清政府卖国媚外的丑恶嘴脸，日益滋长了排满思想，并敏锐地觉察到“谋光复图共和”的民主革命时代即将来临。时唐才常的弟弟唐才中由湖南来到杭州，与张恭和蒋鹿珊相识，并授予召集同志入会的“富有票”。张恭和蒋鹿珊得到“富有票”后，拟回金华一带散发，组织会党武装，以响应唐才常起义。由于汉口唐才常的自立军未及起义即遭失败，张恭和蒋鹿珊遂停发“富有票”。

1902年，张恭中举人，乡里惊漾，张恭却不以为然。

张恭生活于内忧外患之际，“当是时，明亡二百六十年矣。奴虏柄政，四夷交侵，神明之胄方群集以谋光复，而图共和，侵淫偏乎陋隘，故君亦毅然崛起，以提倡革命为职志。”^①张恭与刘琨等人在金华城东吕成公祠创办《萃新报》，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科学知识，传播民主革命思想。《萃新报发刊词》宣称：“为我桑梓同胞作‘警晓钟’，作‘渡津筏’。”^②《萃新报》在金华、衢州、严州和处州四府各县设有35处代销点，总销处就设在金华马门内宝和银楼。《萃新报》创刊不久，即被封杀。“苏报案之风潮既传入内地，于是金华志士刘琨、盛俊、张恭等亦倡办一报，以谋开通内地之风气，名曰萃新报，盖旬报也。有严州学生某，偶携一册至严州府学校，为知府锡纶所闻，进禀浙抚，谓该报出语狂悖，请封禁以正士习。”^③恰好寓居杭州下城头巷《白话报》馆的陶成章和魏兰闻讯后，立即由魏兰函告张恭。待浙江巡抚下令查封时，《萃新报》已改易门面，易名继续出版，张恭也避往他乡，《萃新报》只出了六期就夭折了。

金华易旱多涝，自然灾害频仍，积谷赈济既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也易为官府所认可。张恭结交豪杰，创立“积谷会”，以聚集力量。张恭依照南宋朱熹倡办“社仓”，救济农民的办法，向金华知县写了禀帖，请求创办“积谷会”，青黄不接之季，缺粮户可借粮救荒，秋后免息偿还；备荒年平价粜粮；灾

① 陈去病：《金华张恭传笺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页。

② 石夫：《辛亥革命时期的金华龙华会》，《金华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91年版，第16页。

③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

年则免费定量赈济。张恭自己先捐谷 100 石，县衙觉得新科举人关心民瘼，不仅批准其建议，还捐谷 200 石作为仓本。张恭在金华城东永福寺的谷仓储谷达 2000 石，还分别在曹宅、孝顺、澧浦、横店、长山、竹马、罗店等地设有谷仓。张恭放宽了入会的条件，凡积谷一石以上，即可入会。于是，积谷会员猛增，达千人以上，因而又称“千人会”。“千人会”也采取喝鸡血酒，发愿盟誓的形式，结为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其后入终南会，因与荣卿、华昌共兴龙华会，其信用之人，则有吴琳谦、刘永昌、徐顺达等，而以顺达为最。”^① 张恭的秘密联络机关为金阿苟茶店。

第八节 策划起义

魏兰叔侄与张恭取得联系后，一起来到杭州，再赴嘉兴，会晤龚宝铨，并结识了以前陶成章就介绍过的敖嘉熊。魏兰叔侄折返上海，会见蔡元培。

陶成章正在温州活动，接魏兰的信后，立即赶回上海，商讨配合华兴会长沙起义事宜。“陶成章联络各地会党参加革命的工作，略有头绪，就到上海和黄兴、蔡元培密谋，决定十月十四日‘万寿节’实行武装革命。所谓‘万寿节’，就是那拉氏七十岁的生日。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在湖南、湖北两省同时革命，用武力占领长沙等地；陶成章、敖嘉熊领导浙、皖诸省会党，也于‘万寿节’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起义，以为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响应。”^①

蔡元培告知陶成章和魏兰，湖南的华兴会拟于11月16日（即农历十月十日），西太后七十寿辰时，发动长沙起义。华兴会一边联络会党，一边联络其他各省响应长沙起义。宋教仁、胡瑛前往武昌，设立华兴会分会，并联络湖北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约定湖南起义，湖北响应。陈天华、姚宏业等前往江西，游说江西巡防营统领廖铭缙响应湖南起义。周维桢、张荣楣则联络四川会党，与两湖会党合作。杨守仁、章士钊前往上海南京一带，发动江浙策应。

华兴会要求浙江方面予以配合，蔡元培答应响应起义。

陶成章觉得目前时机还不够成熟，还要与浙江会党进一步联系，但表示到时一定接应。为了慎重起见，陶成章与蔡元培商议，浙江会党在长沙起义三天后予以响应。

为了便于与华兴会联系，依照东京浙学会的决议，张雄夫与沈颀民前往长沙活动。沈颀民从日本回国后，立即奔赴长沙，出任长沙明德学堂教习。明德学堂由胡元倓创办，是湖南革命运动的大本营，黄兴、苏子谷、谢晓石、金封三、李连舫、秦毓璠、张继等均为该学堂教习。张雄夫随后也赶到长沙，在革命派翁浩做监督的长沙实业学堂担任美术教习。张雄夫精力充沛，热心革命。黄兴全力以赴准备长沙起义，枪弹物资也陆续运抵长沙。张雄夫与沈颀民“按日用各种方法，把黄兴动态通知陶成章和敖嘉熊；浙皖动态也随时通知黄兴，以

^① 沈颀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页。

为策应。”^① 张雄夫和沈颀民沟通了华兴会与浙皖会党的联系。

陶成章与魏兰加紧联络和发动会党工作。陶成章、魏兰和魏毓祥仁人马不停蹄地赶往嘉兴，与龚宝铨、范拱薇和敖嘉熊等接洽，商讨发动嘉属府会党响应起义事宜。然后，仁人再折返杭州，从兰溪入金华，布置起义事宜。金华是浙江会党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龙华会总部所在地。

陶成章、魏兰和魏毓祥随张恭的戏班，赴金华各地演出。爱好戏剧的士绅出资组织剧团前往城乡演出，作为娱乐，俗称“太子班”。1903年，张恭将龙华会员、名花旦李宝剑组建的李庆福戏班归他直接掌握，民众称之为“张恭大班”。李宝剑因扮相俏丽，演技超群，被誉为“宝剑花旦”，16岁就誉满金华，是浙中徽戏班中最负盛名的花旦，有“永康一把剑”之称。李宝剑曾拜金华曹宅乡绅为义父，得其资助组建了徽戏班——“李庆福班”。李宝剑加入龙华会后，张恭劝李宝剑以戏班为掩护，前往邻州外府演出，进行反清宣传，加强龙华会与各地会党之间的联系。李宝剑欣然同意，并将戏班交与张恭管理。张恭为了充实戏班阵容，提高戏班声誉，又特地聘请了徽戏名丑“砂罐茶壶小花面”冯进流、著名副净“打铁二花面”鲍济富、著名老生“梨糖先生”金李棠等名角，与宝剑花旦同台演出。群英荟萃，相得益彰。“李庆福班”名声益振，誉满浙东。金华、严州、温州、台州、处州六府所属各县竞相邀约演出，张恭则亲自随戏班奔赴各地，联络抗清志士，宣传革命思想。

^① 沈颀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页。

1904年，张恭又在金华城隍庙创办科班，招收十二三岁的儿童学习徽戏，任命擅长正吹的汪海水为班主，组成“汪永庆班”，民众称之为“张恭小班”，或称“张恭太子班”。汪海水原来是“李庆福班”正吹，为人正直不阿，有“铁面正吹”之称。徐顺达是班中头牌武旦，被张恭任命为小班司帐，与汪海水共同负责对科班小艺徒进行培训。由于两人精心培养，科班小艺徒进步很快，三个月后就在城隍庙戏台上初次登台演出。“张恭小班”后来也涌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青年艺人，如“长子花旦”王阿饭、“小花面”小丑俞兰英、老外周金洪、小生陈瑞亨、副净钱小富等，均驰誉徽戏舞台。

张恭的戏班不仅讲究精妙绝伦的演技，更注重节目内容对观众的教育意义。戏班经常上演的剧目，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有四类：“（一）反抗异族入侵，以激发观众之民族意识者，如《两狼山》、《大审潘洪》、《草地败金》、《岳母刺字》、《疯僧扫秦》等。（二）揭露封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者，如《崔子弑君》、《金殿装疯》等。（三）鼓励民众反抗压迫剥削者，如《过江杀相》、《九件衣》等。（四）歌颂人民造反者，如《狮子楼》、《大闹登州》等。”^①张恭组织的两个戏班，往来于金华和义乌之间，串镇走乡，表面演唱宋明亡国故事，实际上进行反清宣传，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驱除鞑虏，恢复汉族江山，并以此作为掩护，结交各路英雄。

陶成章、魏兰和魏毓祥以堪舆家卜吉穴的名义，跟随剧团活动，借此联络和组织金华和义乌一带的会党。演出前，先登

^① 涂旭：《张恭与金华徽戏》，《金华市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

台进行革命演讲，慷慨激昂，言词激烈，闻者莫不动容。并散发革命书刊，革命影响深入人心。

陶成章到金华联络龙华会时，带来大批《猛回头》、《革命军》和《国民报》等革命书刊赠送龙华会，革命书籍因此流传浙东各地。

陶成章和魏兰为集结浙东各地会党联合起义，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张恭革命意志坚定，目光远大，在龙华会的会主中，德高望重，足以影响整个龙华会的行动。龙华会人多地广，在浙东各会党中势力最大，而张恭的威望又最高，能够号召整个浙东会党。陶成章有鉴于此，深知要在浙东发动起义，应以龙华会为中坚，因此，亲自到金华，与张恭及其亲信徐顺达、吴琳谦等结盟。陶成章考虑到浙江并非军事要冲，即使革命军得手，亦难于震撼大局，但可出师赣皖，上援长沙，下拊南京，起重要的配合作用。陶成章将龙华会作为配合长沙双十起义的一支主力军。

第九节 起义受挫

陶成章决定长沙起义后三天，浙江会党予以响应。“先以计袭取金、衢、严三府。然后由严出皖以扼南京，由衢出赣以应长沙，而用金华之师，以堵塞杭城之来兵，且分道以扰绍兴、宁波、湖州之诸府，而震撼苏杭及探官场警信于衙役。”^①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陶成章具体安排龙华会作为起义的主力军，张恭、沈荣卿命令部下做好一切准备，计划分别袭取金华、衢州、严州三府。首先刺杀金华知府嵩连，然后兵分三路，一路由金华出发，接应杭州，取下浙江；一路取遂昌，攻衢州，出江西，与长沙相呼应；一路由严州（建德）出发至安徽，进取南京，直逼北京。

浙江会党按照陶成章的布置，枕戈待旦，一触即发。

然而，长沙起义时间已过，仍无消息传来。

陶成章心知有异，从义乌经诸暨返回杭州，“阅上海各报，始知湖南事败，马福益死焉，湖北按兵不动。”^①陶成章从报上得知长沙起义未及发动，就已夭折。

长沙起义原定于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岁寿辰举行，湖南省的文武要员将齐集一起庆祝万寿节，届时起义军准备引爆预先埋好的炸弹，然后乘机占领长沙。不料，11月3日，有会党两人不慎走漏了风声，长沙起义未及发动即遭破坏。黄兴等华兴会骨干避往上海；马福益逃亡广西。黄兴在上海继续召集同志，另设“爱国协会”，准备运动大江南北的学界军队，在鄂宁等地起义。马福益潜回湖南，图谋再举，不幸被捕遇难。华兴会经此波折，遂停止了国内的革命活动，黄兴、宋教仁和陈天华等华兴会的重要骨干均亡命日本。

陶成章急忙通知各地会党隐蔽不发，并亲自返回金华，指示龙华会停止计划中的武装起义。时金华的龙华会已组建武装队伍，并请金华以锻造鸟枪闻名的金正灿在千人安村锻造土枪，作好了响应武装起义的准备。大部分会党得到消息后，及

^① 《陶焕卿》，《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6页。

时取消了行动。唯有双龙会首领王金宝不慎泄露风声，不幸遇难。

原来龙华会主沈荣卿将响应长沙起义的计划通报双龙会会主王金宝，并要求处州一起发难，与衢州的会党联合出兵江西。

王金宝遂令部将管马德通知处州各地会党做好准备，以便如期起义。王金宝准备在松阳亲自率部起义，管马德率遂昌西乡 2000 剿纸工人，预先攻取遂昌，充任各路义军前往江西的先导。

双龙会准备起事的消息在松阳传开后，城内风声鹤唳，士绅抱头鼠窜，有的逃往乡村，也有远走他乡。知县叶昭敦闻讯，惊恐万状，急忙向省城告急。

因起义中止，沈荣卿又急告双龙会，王金宝遂下令解散部属，并亲赴永康，与沈荣卿商议善后事宜。

王金宝与沈荣卿商议后，先是避往兰溪，后又赴桐庐。

清军急赴松阳，处州知府赵亮熙四处张贴布告，悬赏 2000 余元，通缉王金宝。

王金宝的亲信程象明，浙江青田人，为清政府的赏金所动，竟丧尽天良向赵亮熙告密，领着清兵到金岸逮捕了管马德，将藏匿桐庐的王金宝，经松阳解往丽水。

双龙会曾两次计划劫狱营救王金宝，均因清军防守严密而未能成功。

王金宝在丽水斩首，其头颅被运往松阳，悬挂城内示众 3 天。王金宝遇难时，年仅 26 岁。

双龙会员骤闻王金宝噩耗，痛心疾首，对叛徒程象明莫不切齿痛恨。

王金宝不慎遇害，陶成章痛心不已：“金宝本卤莽武夫，不能谨慎其事，遂及于难。”^①

陶成章对王金宝作了高度的评价：“金宝之义侠，其感人土心者，可谓深且厚矣。”并将王金宝与濮振声一起称为一代人杰：“濮振声才大心细，王金宝志果气劲，皆人杰也。而二人之遗爱在人，久远勿替，尤为难得，成败又何足论也。”^②

王金宝遇难后，阙麟书化名吴应龙，继续领导双龙会。

尽管起义受挫，陶成章和魏兰没有因此而气馁，仍继续联络各地会党，做好善后工作。陶成章和魏兰一起从金华入永康，魏兰从桃花岭入丽水，取道返回云和。

陶成章在龙华会永康分部首领吕阿荣的护送下，从永康转赴东阳，到巍山，寓赵永景家中。再由巍山至玉山尖，转下葛庵，住大开和尚处。随后，至尚湖，寓陈魁鳌家。

大开和尚属于沙门，俗名姓潘，名根昭，法号清泉，别号大开，原籍浙江磐安县玉山区前山乡后张村。

1903年，大开和尚与一批武师在下葛庵成立了“百子会”，凡入会者均由寺院发给一双云头鞋作为标记，会员聚会时，由寺院供给膳食。参加“百子会”的人越来越多，由刚创建时的10多人，很快就发展到数百人。1904年永康“九龙党”的沈永固到玉山，得知大开和尚组织了“百子会”，正在设坛练武。沈永固便与尚湖的陈魁鳌一起造访大开，仨人一见如故。大开采纳了沈永固的建议，将“百子会”改为“九龙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页。

会”，不久，又改称“九龙党”，其宗旨为推翻清政府，复兴明王朝。“九龙党”以“仁义礼知信，忠孝节义廉，荣华富贵昌”15字作为编号，推陈立光任“总红旗”，大开为“总管事”，下设“蓝旗”和“巡风”。九龙党各首领集结一起，祭起香案，对天发誓，歃血为盟。为了便于开展活动，九龙党总部由下葛庵迁往铁店村，公开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大开又派人到各乡村向土豪劣绅借款借粮，筹集革命经费，并发动农民抗捐抗税。“加入九龙党，不交租谷不交粮”的口号传遍穷乡僻壤，闹得豪强地主惶惶不可终日。九龙党迅速发展，未及一年，就达3000多人。

大开和尚与陈魁鳌相约一起加入了龙华会，隶属于沈荣卿。

陶成章与大开和尚共同商讨了反清革命大计。“陶成章由巍山趋玉山尖，过夏家（下葛）庵访大开，大开特为出已舍以舍之。”^①1904年10月，大开和尚与陈魁鳌在玉山尖起义，建号神乐王，改元兴洪，巍山赵永景也起兵响应。杭州的清吏急遣清军赴东阳镇压，但清兵畏惧，不敢轻举妄动。东阳县令以什长职招降赵永景，赵永景禁不住诱惑，轻率入城被杀。巍山的龙华会党军队随即溃败，清军乘胜进攻玉山尖，大开和尚与陈魁鳌率部拼死抵抗，清军伤亡惨重，由于缺乏军械，寡不敌众，被迫退往天台，解散部众。

陶成章离开陈魁鳌家，前往天台，到平头潭平镇，住在陈显元家。然后，再由天台经黄门，至海门，寓大观楼。陶成章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页。

积劳成疾，卧病数日。病愈后，立即乘轮北上，在嘉兴逗留，寓敖嘉熊家。随后，返回上海。

陶成章“折回国中，潜入浙江东西各属，从联络会党组织实力，以为躬亲从事革命基础”^①。陶成章与魏兰等人进行了历时近一年的艰苦卓绝的联络会党工作，“以本省温、处、台、严诸州郡，民风强悍善战，时往运动，以为光复军预备。往往坦簦蹑屣，芒鞋破笠，日行百里。常携一布衲自随，因发已薙去，至无宿无食时，作游方僧装，乞布施以活，至今尤有‘乞丐和尚’之名，坚苦卓绝盖如是。”^②浙东各县，万山丛杂，会党林立。“数岁之间，提皮包，蹑草履，行浙东诸县，一日或八、九十里，交其豪俊，数频危难，亦有天幸得免于祸。”^③陶成章常脚穿草鞋，头戴笠帽，腰束草绳，风餐露宿，徒步翻山越岭，深入山区。

陶成章联络会党取得了很大成绩，“金、衢、严、处、温、台六府秘密党会之情形，尽为成章等所探知矣。”^④陶成章不仅探知了金华、处州、台州、严州、温州、台州等府会党的详情，而且与这些会党首领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陶成章“在浙江活动时，悉心结交会党巨子，如嘉兴敖孟姜，绍兴竺绍康、王金发，兰溪蒋禄山，金华张恭，永康吕戴之，台州王

①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0页。

② 章乃穀、鞠僧甫：《民国浙军参谋陶公焕卿传》，《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

③ 龚宝铨：《自叙革命历史》，《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④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

文庆，云和魏兰、张伟文，丽水阙玉麟，缙云周华昌、吕东升等皆为其中之佼佼者。”^① 陶成章规劝会党“不要做劫夺商人货物和人民财产的事情，和我们一起反对清朝。在陶成章苦口婆心的说服下，许多帮会中人改邪归正”^②。陶成章规劝会党改变自由散漫的习气，争取使会党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反清力量。

陶成章和魏兰总结出一套联络会党的办法，“原夫成章、魏兰等所办之概要，则先是调查也。调查之概要凡五：一曰秘密之调查，二曰兵营之调查，三曰贫富户之调查，四曰地理之调查，五曰钱粮之调查。一切皆有记录。其次则党会之联合也，又其次则开导党员也。其开导之方法，则多运革命书籍，传布内地，文言与白话并进。文言体则有《革命军》、《新湖南》、《新广东》、《浙江潮》、《江苏》等，而以《革命军》、《新湖南》为最多；白话则有《猛回头》、《黑龙江》、《新山歌》、《警世钟》、《孔夫子之心肝》等，而以《猛回头》为最多。其在多数人聚会之所，则又代为出资购送各报，而以《国民报》、《国民日日新闻》及《警钟日报》为最多，由是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③ 经过陶成章和魏兰等人奔走联络，革命思想传入浙江各地，浙江会党的思想觉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后来光复会的重要武装力量。

① 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21页。

② 张云雷：《辛亥革命见闻琐谈》，《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③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

第十节 创建会馆

1904年5月，陶成章与魏兰堂侄魏毓祥以及阙石原离开云和，经丽水、青田抵温州。

陶成章与先期到达温州寓居平阳古鳌头小学校的龚宝铨以及陈大齐会合，相约一齐赴上海。

陶成章一行五人途经嘉兴，与祖宗教首领敖嘉熊相识。

敖嘉熊，字梦姜，浙江平湖人。敖嘉熊“幼豪迈，髫稚通经义，弱冠入庠，屡试优等”^①。1902年，敖嘉熊到杭州，研究经世致用之学。敖嘉熊与王嘉榘、蒋百里相识，加入时事研究会，又称“浙会”，讨论时事，昕夕不倦。敖家已移居嘉兴南汇镇，因为经营商业，敖嘉熊曾被推为嘉兴商会董事。敖嘉熊拟创办团练，护卫乡里。为了便利交往起见，敖嘉熊又举家迁居嘉兴城北门外，开始从事革命运动。

1903年，敖嘉熊来到上海，结识了蔡元培，加入了爱国学社及中国教育会，进一步加深了对革命的认识。敖嘉熊读了湖南留日学生编的《猛回头》，深受教育和启发，于是，用白话文自编了宣传反清革命的《新山歌》，并请蔡元培审阅。蔡元培阅后，极为推崇，在上海代为印刷。沪上各县青年争相添印携归，作为宣传品，广为散发。而以乐清县的陈梦熊添印最多，后来酿成《新山歌》案。

《苏报案》发生后，爱国学社也被解散。敖嘉熊认为聚集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8页。

上海非根本办法，应效法浙江各县同志从本乡着手，开展革命活动，才有群众基础。敖嘉熊认识到必须集中各县的力量，善为联络，则势必有成。敖嘉熊回嘉兴后，计划创立团体，以联络青年，组织革命力量。于是，敖嘉熊与田月斧、褚辅成等人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竞争体育会”除了学习新式体操外，还要在街头发表演讲，宣传鸦片烟及赌博的危害。体育会设有专门的阅报室，陈列各种书报，供会员阅读。体育会名义上由田月斧、褚辅成主持，由于褚辅成任商会会长，无暇兼顾，实际上由敖嘉熊和龚宝铨主持。

清政府地方官吏认为敖嘉熊创设竞争体育会“暗藏革命宗旨，下令解散，且欲逮治”^①。敖嘉熊的亲友为其安全担忧，劝其离开嘉兴，暂时避避风头，可敖嘉熊不以为然。清吏鉴于敖嘉熊深得民心，不敢贸然逮捕治罪。

敖嘉熊前往温州，到乐清结识冯豹和陈梦熊。

敖嘉熊返回温州时，地方官员闻讯，如临大敌，派人侦探敖嘉熊的行踪。敖嘉熊谈笑风生，若无其事。敖嘉熊从温州趋台州，再由台州入宁波，遍谒士绅豪杰。

陶成章到嘉兴后，与敖嘉熊一见如故。敖嘉熊向陶成章详细介绍了创建温台处会馆的设想。

原来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太仓，浙江的湖州、嘉兴、杭州、严州以及安徽的宁国、广德、太平等地，因靠近南京，为兵家必争之地，连年战乱，户口减少，田地荒芜。浙江温州、台州和处州等各府的农民视为乐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9页。

土，争相迁入嘉兴。迁居稍久者，家资殷实，置有田产，地方官吏欺其非土著，常常于纳税以外，加额征收，或粮已缴纳而不给粮票，追课达三四次之多。而刚刚迁入的农民，类似无业游民，成群结队，白昼抢劫，地方官也无可奈何。土客矛盾因此加剧。

敖嘉熊因此提出建立温台处会馆的建议：“诸府田地，客民殆居半数，而温台之人，又素以强悍著名，欲因是以创办团练，设计握地方上兵权，统其事于温台处会馆。复可由温台处会馆出面为客民代输租税，客民畏清吏侵陵，必咸喜归赋税于会馆使为代纳，则又可因是以渐握地方上财权。一旦有事，即用所办团练以卫乡里，而以所取入赋税充兵饷，是不烦一甲，不费一文，安坐而致独立之形势也。”^①

敖嘉熊还具体谈到设立温台处会馆对革命的有利之处：“一、嘉兴人性懦体弱，好空论而不能任劳怨。欲办团练，非借重客民不可。有温台处会馆之组织，即可成立一支劲旅。二、温台处客民所苦者，为不法胥吏之苛索。由会馆出面缴纳赋税，一方面解客民之被榨取，一方面可酌收手续费以充实会馆之经济，为将来有事之用。三、嘉兴地处江浙两省交通之要道，为兵家必争之地，对于湖州、松江、苏州、常州各县之交通，尤可便利。而四府属各县，又皆有温台处各县之客民。会馆之设，可成为江南各县之联络站。四、嘉兴距上海近，交通极便，在嘉兴有据点，可便利上海之活动。”^②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0页。

^② 朱福宜：《记敖嘉熊》，《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敖嘉熊便以调和主客民矛盾为词，游说地方官吏，得到一致赞同。敖嘉熊又以安抚客民，免其流离失所为理由，游说温台处绅董，也得到赞同。敖嘉熊遂请温台处绅董出面，联名具禀清吏，要求设立温台处会馆，由敖嘉熊先垫资成立。于是，由旅居嘉兴的温台处绅董联名请求立案设立温台处会馆。

敖嘉熊筹备资金，购置了嘉兴东门外北首沿城墙空地作为会馆地址。

陶成章与敖嘉熊共同商议了“浙江独立军事，意见相同”。

陶成章指出：“浙江非可自守地，欲在浙江举义，非先注意南京不可。而安徽又居南京上游，上接两湖，下通江浙，又不可不先有以布置之。”^①

敖嘉熊也有同感。

敖嘉熊计划温台处会馆设立后，再设分会馆三处：“一建于松江，而以苏州、松江、常州、太仓之秘密党会附入焉。一建于湖州，而以宁国、广德、严州、衢州之秘密党会附入焉。一建于杭州，而以其属於潜、昌化、新城、临安之秘密党会附入焉。复拟以另策招致镇江枭党，以窥南京右翼，集广德宁国洪军，以窥南京左翼。更用衢处之秘密军队，预备出江西以上隔两湖。”^② 到时义旗一举，四省响应，南京势成瓮中之鳖。再以暗杀进行扰乱，可不战而降。

温台处会馆于5月酝酿，秋季成立。陶成章介绍魏兰及魏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9页。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0页。

毓祥到会馆工作，魏兰出任总理。魏兰和魏毓祥又介绍丁嵘、吕逢樵、吕熊祥、赵卓、魏毓蕃、魏仲麟等任执事员。敖嘉熊又亲自聘请冯豹和陈梦熊任执事员。陶成章也出任温台处会馆的执事员。

敖嘉熊建立会馆的目的就是：“谋握地方上财兵二权，以次组成独立之军，且以交通浙东西之各秘密党会。”^①于是，敖嘉熊以会馆的名义，出资派人到湖州、严州、杭州、温州、处州、台州和江苏的苏州、松江等地，联络各地会党。

温台处会馆成了浙江革命党人联络活动的重要据点之一，“名为温台处会馆，实则一纯粹之革命机关部也。”^②

敖嘉熊考虑到要团结人心，不如建立会党。于是，敖嘉熊以宗教名义组织革命，创立祖宗教，作福字祷词及各种秘密暗号。

温台处会馆的经费均由敖嘉熊一人负担，尤其是派人到各地联络，费用较大。1905年春，敖嘉熊迭遭家难，经营商业屡次亏损，财政困乏，会馆难以为继。敖嘉熊将妻子的首饰变卖充作经费，仍无济于事。会馆工作人员也相继离去，冯豹和陈梦熊返回乐清，魏兰前往爪哇，陶成章和龚宝铨偕吕熊祥入绍兴，温台处会馆无形中停止了对外工作。由于会馆曾派人赴各地联络，因此，各会党首领仍与会馆保持联系。

敖嘉熊时常与革命志士相交往，为革命事业而奔波，自然被清吏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加上性情伉直，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

^② 《浙江之秘密会党》，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9页。

也被一些小人所忌恨。可嘉兴是江浙两省的孔道，又邻近上海，清吏慑于敖嘉熊的潜在势力，苦于无法应付，于是，改用暗杀之计。敖嘉熊平时行动极为谨慎，出入都有卫士徐象黼追随左右，寸步不离。1908年春，敖嘉熊因事外出，徐象黼恰好未跟随。敖嘉熊彻夜未归，8天后敖嘉熊的遗体在嘉兴城东乌桥港被发现。敖嘉熊遇害时，年仅35岁。

陶成章对敖嘉熊的遇难极为悲痛，“嘉熊死而浙西江南一带革命之事业坠矣。嘉熊身体禀质虽弱，然状貌则壮实，动作咸有威仪可象，有口才善辩，所操论说，人不能难。其宅心兹惠，凡恤厘育孤养老赈穷等诸慈善事业，无不首为之倡。又常提倡教育，多建学校，故所造就人才极众，其影响之波及于社会人心者亦甚大。自兴立温台处会馆后，浙东士民敬仰之若神明，迄今称道不衰。”并高度评价了敖嘉熊的革命业绩，“敖嘉熊以休休有容之度，兼能善为大计，岂仅方面之才，直可含盖万有。昔孔子赞仲弓曰：‘雍也，可使南面。’余于嘉熊亦云。昊天不吊，哲人先萎，光复之绪，其果斩乎！《诗》曰：‘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何赎兮，人百其身。’可为嘉熊咏也矣。”^① 龚宝铨文弱，敖嘉熊勇武，陶成章认为嘉兴有龚宝铨和敖嘉熊两人，珠联璧合，文武双全，能够领导革命。敖嘉熊遇难，浙西的革命事业因此受到严重挫折。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2页。

第四章 组建光复

1904 年以前，中国只有孙中山组建的唯一的的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4 年以后，华兴会和科学补习所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相继建立，遍及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福建、江西、四川、陕西等省。陶成章与蔡元培等人也在上海创建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复会，并制定《光复会章程》，以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革命的奋斗目标。光复会主要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开展革命活动。1905 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陶成章等光复会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

第一节 成立光复

1903 年以前，只有兴中会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903 年以后，华兴会和光复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纷纷建立，遍及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福建、江西、四川、陕西等省，其成员大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标志着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即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全国的形成。

1904 年秋，陶成章前往嘉兴，向龚宝铨提议，将江苏、

浙江和安徽等省的志士集合起来，建立一个大的革命团体，得到龚宝铨的赞同。龚宝铨参加了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和军国民教育会，与陶成章同时受军国民教育会和东京浙学会的派遣回国，建立革命组织。龚宝铨回到上海后，秘密组织了“暗杀团”。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设有暗杀团组织，由杨笃生领导，只有何海樵和苏凤初等少数人。上海暗杀团是东京暗杀团的扩大，参加者有蔡元培、钟宪鬯、章士钊、陈由己等人。暗杀团机关就设在新闻路余庆里，上海的许多进步团体，如蔡元培领导的爱国学会、吴春阳组织的青年学社以及争存会，也设在余庆里，该地成了各地来沪的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暗杀团准备先暗杀两三个清朝大员，打乱其阵脚，由于暗杀团人数少，力量单薄，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龚宝铨只好返回家乡嘉兴。龚宝铨也想扩大暗杀团组织，与陶成章商议后，决定按照东京浙学会的原议，在暗杀团的基础上，组织一个革命团体。陶成章请龚宝铨将该意见带给正在上海的蔡元培，请蔡元培主持团体事宜。

陶成章又写信给魏兰，邀请魏兰到上海，共商建立革命团体事宜。自从响应长沙起义失利后，魏兰返回丽水，与志同道合的进步女青年何莲卿举行婚礼。婚后仅三天，魏兰就应陶成章之邀，偕魏毓祥、张伟文赴沪，与龚宝铨一起商议筹建革命团体事宜。

龚宝铨来到爱国女学校，向蔡元培提出建立革命团体的建议。

1903年夏，蔡元培因《苏报》案避走青岛，年底才返回上海，创办了日报《俄事警闻》，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改名为《警钟》。蔡元培“觉得革命止有二途：一是暴动，一是

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于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① 蔡元培再度主持爱国女校时，组织教师秘密研制毒药和炸药，准备进行暗杀活动。蔡元培嘱爱国女校对化学有兴趣的国文教师俞子夷研制毒药和炸药。蔡元培一直进行两手准备，即武装起义和实行暗杀，筹划排满革命。龚宝铨提出建立革命团体的建议，自然得到蔡元培的赞成。

蔡元培对龚宝铨说：“身在狱中的章炳麟也主张建立一个革命团体，以便进行反清斗争。”

光复会初创时，章太炎也参与其间。章太炎“虽因《苏报》案，身系上海西牢，闻光复会成立，暗中积极支持，欣然参与”^②。章太炎回忆说：“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魁，陶成章、李燮和继之，总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也。”^③ 章太炎之所以夸大自己和蔡元培在成立光复会中所起的作用，是因为“章氏身系上海狱中，不详原委也”^④。

陶成章与龚宝铨商议，考虑到“章炳麟在狱中，惟蔡元培系清朝翰林院编修，声望素高，欲推为首领，以资号召”。陶成章又“素知蔡书生气重，恐不能相容，反使工作造成不利。于是由龚宝铨先与蔡元培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组织，并

①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页。

② 章导：《章太炎与王金发》，陈平原、金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③ 章炳麟：《光复军志·序》，《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4页。

④ 沈颢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页。

由蔡元培自动提出邀陶成章参加，于是光复会遂在上海正式成立”^①。陶成章从策略上考虑，应由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出任光复会会长，而蔡元培较为合适。

光复会成立后不久，徐锡麟也加入了光复会。陶成章“组织光复会，以为机关，四海同志相率来集，尤以同乡徐锡麟交相得”^②。1903年，陶成章与前来日本参加大阪国际博览会的徐锡麟一见如故，畅谈反清革命计划。徐锡麟回国后，立即开展革命活动，在绍兴东浦创办了热诚学堂，提倡“兵式体操”，培养革命人才，并利用特别书店，秘密运销革命书籍。1905年1月，徐锡麟赴沪，前往爱国女校会见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恰好陶成章也在场。蔡元培向徐锡麟介绍了光复会的组织及革命目标，徐锡麟当即表示参加反清革命的决心。于是，徐锡麟由蔡元培介绍，加入了光复会，并自号“光汉子”。然而，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反清革命，徐锡麟还有些茫然。“当年徐锡麟和陈子英打算造清王朝的反，但还不知道怎么干的时候，陶成章主张联络浙东会党，招集四方豪杰，都动起来。”^③陶成章介绍了自己联络浙江各地会党的经过，并说明联络和运动会党对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性，并建议徐锡麟联络会党，组织革命武装力量。徐锡麟在陶成章的启发下，豁然开朗，立即与学生童济时、卢临先等人，“游行诸暨、嵊县、义乌、东阳四县，自东阳至缙云，昼行百里，夜止丛社，

① 沈颀民：《记光复会二三》，《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页。

② 《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3页。

③ 朱顺佐：《江南人物春秋——绍兴东浦》，广州出版社1993版，第147页。

几及二月，多交其地奇才力士。归语人曰：‘游历数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①。有会党作为革命的后盾，徐锡麟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徐锡麟又返回上海，购置枪械弹药，准备武装起义。徐锡麟由一个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有明确的革命斗争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士。

绍兴也有一大批志士参加了光复会。蔡元培的堂弟蔡元康“到绍兴运动商学二界，声言成章已入会，诸志士闻成章已入会，亦遂群入其会”^②。光复会“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光复华夏，大振国权’为号召，志在推翻清廷，另谋成立政府，以挽国运。其主要成员，大部是吾浙江人，特别是绍兴人为多，如蔡元培先生、陶成章先生、徐锡麟烈士、秋瑾女侠、陈伯平烈士、马宗汉烈士、陈赞卿、朱敏生诸先生等，此外如余杭章太炎先生、嵊县王金发先生、金华张恭先生等均属之”^③。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陶成章、蔡元培、徐锡麟、秋瑾等都是绍兴人，在他们的带动下，参加光复会的绍兴籍志士特别多。光复会的首任会长、副会长以及主要骨干，几乎都是绍兴人。兄弟相邀，父子联袂入会者，比比皆是，仅《绍兴市志》有名可查的光复会会员就有265人。

陶成章后来在《浙案纪略》中，对光复会的成立作了简单的介绍：“各省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亦多归居上海，军国民教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页。

② 陶冶公：《光复会的组织与发展》，《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9页。

③ 沈光熊：《沈钧业传》，《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育会组织有暗杀团，规则极其严密，为上海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所觐和，求人其会，于是改名为光复会，又曰复古会，军国民教育会之名词，亦遂销去无踪也。当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枪击王之春（原任广西巡抚）不中之时。先是陶成章尝于壬寅之夏，由北京之日本与龚味荪相识为莫逆之交，味荪为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其时会员皆严守秘密主义，成章不以问，味荪亦不以告也。癸卯之秋，成章由日本还浙江，往游台宁二府，旋返日本。未几，又至内地。至甲辰冬，复渡日本，道经上海。是时蔡元培已由人望见推为光复会会长。元培与成章为同乡，成章素重元培德行。元培之组织光复会，本为暗杀计，然亦招罗暴动者，知成章于内地各秘密党中颇有结纳，故劝之入会，成章不能却其意，遂入其会。”^① 陶成章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在《浙案纪略》中之所以“所记光复会成立事，稍有出入者，雅不愿自居首功而已”^②。

光复会成立初期，主要领导人有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光复会之起，在癸卯壬寅间，其时亦无组织，而五人者为之魁，则徐伯荪（锡麟）、陶焕卿（成章）、沈馥生（钧业）、龚薇生（宝铨）、陈子英是。”^③ 光复会刚成立时，并未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② 沈颢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页。

③ 《与陶冶公》，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选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89页。

第二节 确立宗旨

光复会之所以以“光复”为名，源自1903年章太炎为邹容《革命军》所撰的序文：“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①章太炎在《狱中答新闻报》也说：“吾之序《革命军》，以为革命、光复，名实大异。从俗言之，则曰革命；从吾辈之主观言之，则曰光复。”^②因此，陶成章等人将新成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取名为“光复会”。光复会具有明确的反满意旨，比以振兴中华名义创建的兴中会和华兴会的反满宗旨彰显得多，旗帜鲜明，斗争目标明确。

光复会又名“复古会”，陶成章后来在《龙华会章程》的会规中作了诠释，就是要“报我们兄弟家祖上的大仇，并现在种种虐待我们的新仇，赶去了满洲鞑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③。实际上就是要恢复明末清初反清志士的革命传统，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恢复明朝的汉族一统天下。

光复会还有一套通信用的暗语。例如，以“销路畅”代表工作顺利，以“生意不好”代表“情势不利”。龙华会副会主沈荣卿到上海光复会的秘密联络机关人和煤号联系工作时，

^① 《革命军·序》，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3页。

^② 《狱中答新闻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3页。

^③ 陶成章：《龙华会章程》，《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0页。

陶成章曾用暗语专门写了介绍信。“干，来书。家瑛来沪配备书籍仪器，请招待。陶起。”其中，“‘干，来书。’是光复会的暗号。所谓‘家’指光复会的同志，是自己人的意思。‘陶起’系陶成章的化名。”^① 光复会成员每人也有一个类似店号一样的代用姓名。光复会成员相见时，还有一套探询用的暗语。“例如：你认识黄先生吗（是否成员）？何时认识（参加年月）？何地认识（入会地点）？在问答同时，必须做些手势，例如问答那一题时，右手伸中指、无名指、小指并置右膝上，回答另一题时，则须头向左看看。”^② 显然，光复会的这种暗号联络方式，是模仿会党的做法。

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光复会采用一方块的方式联系，即浙江为一方块，江苏为一方块，不是一方块成员，互不联络。浙江一方块联系的光复会会员名单中，第九名就是鲁迅。鲁迅加入光复会，并未告知弟弟周作人，因此，周作人也不清楚鲁迅加入光复会的情况。“光复会严守秘密，虽父子兄弟也闭口不谈，又系用一小块的方式联系。1912年1月，陶成章被陈其美、蒋介石刺死于上海广慈医院以后，领导乏人，光复会就星散了。”^③ 光复会实行一方块方式联系，既有保密的优点，也存在联系范围狭隘的缺点。

光复会刻制了专门的证章，“外形作桃子样，上面还有两

① 沈颀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

② 俞子夷：《蔡元培与光复会的草创时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516页。

③ 沈颀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

片叶子，中间铸有‘光复中华’4个字”^①。光复会会员还有一个标记，“以金牌为徽章，中镂一‘复’字篆文，旁刻真楷”^②。也有的说是由“光”字头和“复”字脚组合而成。“1905年秋瑾拟仿照三点会暗号的办法，使每个同志，都有一枚‘光’字头，‘复’字脚的戒指作彼此识别的暗号。”吕公望提出异议，认为“这是有形迹的，容易被反动政府看破，此时的伪官方捕风捉影地找革命党人，我们不能不审慎将事，以期顾全”。秋瑾表示赞同，但又认为，光复会不能没有标记，于是，“刻了一个小木戳，作‘囿’模式，用以徵信”^③。

光复会还有自己的旗帜。陶成章“尝为‘光复会’设计旗帜的式样。”^④遗憾的是现在已无法知晓光复会旗帜的颜色、式样与标志。

光复会还制定了《光复会章程》。俞子夷回忆说：“将近寒假前，蔡师与我谈起组织问题，他提示几点纲要，嘱我起草一种章程，会名定‘光复’，以示光复我们汉族祖国之意。写成他斟酌修改后，我用氯化钴液誊在六行二十格的老式文格上；章程在行间，格内另用墨笔抄一篇古文。氯化钴写时带红色，烘干即无色，喷水会受潮又现淡红色。但这种显稳药太普遍，容易被人查出。后来假期中王小徐来，想利用奎宁发光作用，但屡试不成，而且用奎宁盐液写时虽无色，火上一烘，字

① 胡国枢：《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

② [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页。

③ 吕公望：《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④ 陈觉民：《陶焕卿轶事》，《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32页。

迹即现。”^① 光复会着重“驱逐异族”，强调光复，民族主义色彩较重。

光复会的原始文件大都已湮没无遗，据俞子夷回忆，蔡元培曾致信谈到“光复会有文件、工具、书籍一批，交我保管，又嘱日后同志往来过沪我应多与联络。寒假回沪，受委托者将这批物件点交给我，除杨笃生自置的一个庞大的集气筒由他派人取去外，其余物件从此成为我行李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文件内有店号名册、同志来信、暗语表、账簿”。唯独不见《光复会章程》。“辛亥后，我草率将文件焚化，当时想法幼稚而片面，以为工具可供实用，文件已成明日黄花，对历史文物全未注意其价值。工具书籍等则在抗日战争中散失，只有一把小钳，一个螺丝钻，我经常携带、备用，至今尚在。”^② 蔡元培曾将早期光复会的一些文件托俞子夷代为保管，辛亥革命以后光复会已解散，俞子夷认为光复会的文件已没有什么价值，故付之一炬。

光复会是以爱国知识分子为骨干的革命团体。早期“光复会为山阴蔡元培领导。他是前清翰林，为人清静不竞，思想进步，注重教育，在沪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世变日亟，故他极端主张排满革命，救亡图强，宣传革命和吸收党员的方针，都是从教育界和知识分子方面着眼，所以起初入会的陶成章、徐锡麟、秋瑾，以学界人物居多。故以后徐锡麟、陶成章、秋瑾等办绍兴大通师范学堂，一

^① 俞子夷：《蔡元培与光复会的草创时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516页。

^② 俞子夷：《蔡元培与光复会的草创时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519页。

脉相承，从教育方面发展”^①。光复会的成员，主要有两部分人，一是爱国学生，二是会党成员。光复会的骨干是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其中核心成员大都是留日学生。“光复会最初选择会友极严格，会内制度也亦极严。会友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会员入会时，须选一极秘密的地方举行入会仪式；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明革命的决心。”^② 光复会的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誓词的前两句，就是“反满复汉”，这是光复会的宗旨和政纲。“反满复汉”也是辛亥革命时期各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共同宗旨。虽说“光复汉族”主要是强调推翻满族贵族的统治，将满族视为“异族”，有失偏颇，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但是，却“代表了江南广大人民长期以来强烈的反满复汉要求。它的这种主张，不但符合广大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的民族愿望，而且也得到地主阶级中反满分子的赞成，因此它在长江下游和日本留学生中影响较大”^③。光复会强调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符合时代的潮流。光复会誓词的后两句，是会员应遵循的基本政治操守。光复会一向重视和强调政治操守和品格道德，无论是光复会英勇牺牲的烈士，还是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大都能够从政治到生活上严于律己。光复会是清末怀有救国救民的强烈爱国情绪的新型知识分子的革命集团。

① 陶冶公：《光复会的组织与发展》，《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9页。

② 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

③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31页。

光复会成立时，在上海爱国女校举行了秘密的仪式。寒假开始后，蔡元培的堂弟蔡国亲带着未婚妻来到上海，蔡国亲拟担任爱国女校国文教师，其未婚妻则准备入学读书。汤尔和也来到爱国女校，与俞子夷住在后厢房。由于女学堂中假期很多男客出入，容易引起邻居注意，于是，爱国女校便在门口张贴了举办假期音乐会的纸条作为掩护。汤尔和能演奏风琴和唱歌，音乐教师吴丹初住在爱国女校附近，经常来学校，并拿出昆曲折子教大家唱“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挑”。蔡元培原本不住校，假期仍经常到校，而且比平时开学到校的次数还多。据俞子夷回忆：“阴历过年时，两桌人吃年夜饭，喝酒猜拳，兴高采烈。蔡师善劝酒，我被灌醉，即回房大吐。他们散席后，还有些人结伴去逛马路。所谓1904年（甲辰）冬上海成立光复会，殆即指此。没有正式开成立会，议决会章，推选会长等事，时太炎师在狱中。从往来者与蔡师分别接谈的情况看，不难推知会是在极度秘密的方式中成立的。”^① 光复会没有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只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中组建。

光复会成立于1904年冬。魏兰回忆1904年冬，陶成章“与皖宁各志士，在上海组织一秘密会，名曰‘光复’，以蔡元培为会长”^②。陶成章曾自述“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不中之时”^③。万福华是安徽合肥人，清候补知县。万福华得知清广西巡抚王之春在沪发表割地联俄的谬论，义愤

① 俞子夷：《蔡元培与光复会的草创时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516页。

②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1页。

③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

填膺，遂与同乡吴春阳、高荫藻等商量，经刘光汉、林獬等设计，假借吴葆初之名，请王之春到上海四马路湖北路口金谷香西餐馆赴宴。王之春登楼后发现中计，急忙退出。万福华连忙在店门口举枪朝王之春射击，谁知慌乱中忘记打开保险，弹不出膛。王之春得以逃脱，万福华被扭送租界巡捕房，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此时，恰好是1904年农历十月十三日，即公历11月19日。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创始人，其回忆又在光复会成立后五年，因此，可以确定11月19日就是光复会成立的时间。

爱国女校成了光复会成立初期革命党人集中的大本营，门庭若市。据俞子夷回忆：“黄兴常穿响底皮鞋，赵声、徐锡麟，每来辄谈捐官、做官等事，而赵的一套武官行头（皮衣包，帽笼及一双靴）时常寄存在我所住的厢房里（男子住校者只我一人）。秋瑾的服装举止，完全像日本女学生，鞠躬礼十分到家，别的中国留日女学生在这一点上每易露马脚。”陶成章也是爱国女校的常客，俞子夷对陶成章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治学极为钦佩。陶成章“读书有惊人的高速度，能一目看一页，尽管考问，内容可对答无误”^①。陶成章与龚宝铨经常出入爱国女校，与蔡元培等光复会领导人商讨反清革命事宜。

光复会在上海新闸路仁和里人和煤号内设立了秘密联络点。人和煤号由光复会会员王廉创办，号内辟有密室3间，作为联络机关。由于人和煤号对外联系频繁，过于引人注目，暴露目标，于是，陶成章、敖嘉熊和魏兰联合给沈颀民写信，指

^① 俞子夷：《蔡元培与光复会的草创时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517页。

示另外设立学会，作为光复会的秘密联络点。沈颀民遂筹设了浙江旅沪学会，起初设于上海四马路益智楼上，后迁三马路宝安里。由沈颀民任主办，人和煤号的王廉任干部，绍兴大通学堂的总理姚定生也辞职来沪任文牒。浙江旅沪学会担负了光复会在上海的联络工作。凡是光复会往来的函件，均由浙江旅沪学会收转；光复会会员来沪联系工作，也由浙江旅沪学会的沈颀民、王廉和姚定生三人接待。

第三节 发展组织

光复会成立后，积极扩大组织。陶成章继续将注意力集中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五省的会党方面，动员会党参加光复会，以达到武装革命的目的。光复会虽有以前龚宝铨组织的暗杀团成员，毕竟力量不足，而且大部分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顾虑动摇，犹豫不决，行动迟缓。由于会长蔡元培“德行有余而方略颇短，性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①。因此，陶成章承担了联络五省会党工作的重任。

陶成章等人首先将会党的“仇洋”目标，改为“排满”。浙东会党在外国教会势力大举入侵之下，反对教会的蛮横霸道，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以反洋教作为主要斗争目标。会党大都“以‘仇洋为主义’，而不谈‘排满’。会党的宗旨是‘仇洋’，各地不是徒托空言，而是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光复会‘灭洋’之外，先以‘逐满’，这种思想开始时，会党是不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十分理解的”^①。陶成章反复向会党解释，将其排外之心，尽化为排满，使会党的奋斗目标与光复会趋于一致。经过陶成章和魏兰等人的宣传，浙江会党改变了单纯的“仇洋灭教”的宗旨。浙江会党如“处州王金宝则称双龙会，衢州刘家福则称九龙会，浦江杜亦勇则称千人会，严州濮振声则称白布会，数年以来，前后各以事刑死，其余如绍兴竺绍康之平洋党，嵊县裘文高之乌带党，金钱党、祖宗教、百子会、白旗会、红旗会、黑旗会、八旗会等，皆以仇洋为主义，以愤耶教之跋扈故也。自近时革命党入其中，说以洋教之跋扈，由于满政府之恶劣，遂一变而为倾覆满政府，仇洋之主义转以消灭”^②。会党将斗争的主要矛头由反对洋教改为反对清政府的统治，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先是，浙东屡闹教案，自此而后，遂乃绝无而仅有，清吏因得高枕安卧，而梦想乎太平，而实不知易其排外之心尽化为排满也。至丙午以后，清吏乃始警觉，于是忧排满之心比排外为更剧矣。”^③ 会党基本成员大都是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他们不满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要求改变现状，勇敢善战，富有牺牲精神，但也有许多弱点，诸如拉帮结派，各行其是，目光短浅。陶成章不愧为著名的资产阶级组织家和宣传家，将浙江会党在“革命排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会党各有“山堂”，暗号各异，“洪门”、“潘家”的家规

① 沈颢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页。

② [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③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

堂章也不同，这成了会党首领加入光复会的障碍。“会党不愿意参加光复会的主要原因，是会党各有‘山堂’，口号暗号不一，‘洪门’、‘潘家’，家规堂章各殊，骤然要会党首领一起入会，自有难色。”陶成章针对会党问题，召开了几次会议，进行了反复商讨，决定“会党成员入光复会者，所有会党口号、暗号，各家各教一切仍其旧，一切照‘洪家’、‘潘家’的旧规。”会党消除了顾虑，纷纷加入光复会。会党成员与暗杀团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参加光复会，赴汤蹈火，义无反顾。“于是，光复会大盛，浙江、安徽倡言革命，屡次起义，前仆后继，可泣可歌，都是光复会所领导的”^①。从此，会党成了浙江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反清力量，为光复会组织武装起义准备了组织基础。

光复会在上海成立后，陶成章认为应与日本东京的原发起人商议，成立海外分部。1904年底，陶成章与魏兰一起赴东京，与王嘉祎等人商量，成立了光复会东京分部，入会者有蒋尊簋、孙翼中、董鸿炜、许寿裳、周树人等。“上海与东京互相呼应，光复会声气大壮”^②。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复会、华兴会和兴中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蓬勃发展。

陶成章与鲁迅是同乡，两人同一年到东京留学，陶成章在清华学校读书，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求学，他俩在东京的浙江同乡会和绍兴同乡会这种带半官方性质的民间组织经常相聚晤

① 沈颀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页。

② 沈颀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页。

谈。陶成章等人组建光复会东京分会后，鲁迅成了首批应邀入会的成员。陶成章在日本与鲁迅来往密切，鲁迅住东京本乡区东竹町的“中越馆”公寓时，陶成章也是常客。据陶冶公回忆，“这里原来只是一户人家，由于有三个中国客人租住着，警察一定要把它算作公寓，所以就在门外挂了一块‘中越馆’的牌子。当时常去的还有‘焕强盗’——光复会首领陶成章，以及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和绍兴东浦的陈子英。我们在鲁迅的住所里，是毫无拘束的，大家很随便，总是上天下地，山南海北地谈天。谈得迟了，有时也在鲁迅那里吃饭，菜蔬是很简单的，一碗豆腐，一碗豆瓣酱汤。陶成章只热心讲长江下游会党的起义斗争，以及春秋战国时候的外交和军事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我们也听得津津有味。陶成章于饭菜尤其不讲究，那怕给他一碗臭盐菜汤，他也当作肉丝粉条汤一样喝下去”^①。由于陶成章体格强健，肤色微黑，目光炯炯有神，生活检朴，不修边幅，性格豪爽，讲义气，重信用，颇有水泊梁山的鲁智深辈的气质，而其联络的各地会党头目都是官府通缉在案的“强盗”，章太炎自称“深山大泽之夫”，称誉陶成章和王金发是养勇之士，戏呼陶成章为“焕强盗”，王金发为“发强盗”。鲁迅非常敬佩陶成章的革命精神，称之为“革命的真正实行家”^②。

陶成章还介绍留学日本的同乡秋瑾加入光复会。1904年秋，秋瑾来到东京留学，陶成章经与秋瑾有亲戚关系的陈静斋

① 周芾棠：《陶冶公忆鲁迅与“中越馆”的一段史实》，《绍兴文史资料》（第4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② 陶珍：《孙中山与陶成章》，《陶成章史料》（第6辑），1987年版，第43页。

之子陈威和陈仪介绍，结识秋瑾。秋瑾因资助长沙起义失败避往东京同志的生活，经济拮据，拟回国筹措学费，临行前曾向陶成章了解国内革命活动情况，陶成章详细地介绍了多年来在浙江各地活动的历程和组建光复会的有关情况。秋瑾听后，极受鼓舞，恳请陶成章介绍参加光复会。陶成章为秋瑾的革命热情所感动，“分别写信给主持人上海蔡元培及绍兴徐锡麟。她到上海后，先到虹口爱国女校见蔡，并回绍兴东浦热诚学堂见徐，遂加入了光复会。单太夫人典卖衣物，筹措了几百银元给她回日读书。她从绍兴到上海时，陶成章也回上海，曾偕秋瑾访问龙华会处州负责人吕熊祥等。”^① 陶成章为秋瑾介绍了国内两处革命机关，一是致函上海光复会的会长蔡元培，一是致函绍兴的徐锡麟。秋瑾回国后，首先到上海蓬莱路爱国女校找到了蔡元培，向他谈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与蔡元培相谈甚洽。回绍兴后，又立即到东浦热诚学堂见了主持校务的徐锡麟。秋瑾赴日前，从绍兴来到上海，将徐锡麟催陶成章回绍共商革命大计的信面交正在沪上开设催眠术讲习所的陶成章。陶成章介绍秋瑾首次会见了浙江会党首领丁懌和吕熊祥等人。秋瑾经陶成章等人的介绍，加入了光复会。秋瑾离沪东渡，在船中应日友人银澜使者之请，赋诗《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表达了献身革命拼死战斗的豪情壮志。

秋瑾经宋教仁介绍，在东京会见了孙中山，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方策，大为信服。不久，又加入同盟会，被推为同盟

^① 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

会浙江主盟人。从此，秋瑾踏上了资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了光复会的一员女将。

第四节 加入同盟

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日本友人内田良平家里举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张继、马君武、汪精卫、田桐、居正、李烈均、唐继尧、阎锡山、曹亚伯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及留日学生中其他团体的部分成员76人参加了会议。孙中山作为发起人被推为大会主席。孙中山首先发表演说，宣讲革命理由、革命形势以及革命方法，强调全国各地革命组织应联合起来，结成新团体，共同从事革命工作。随后，黄兴等人也相继演说。

演说完毕后，孙中山主持讨论了新团体的名称和宗旨。湖南学生张明夷提出以清政府作为革命对象，建议使用“对满同盟会”。孙中山持反对意见，认为革命不限于排满，还包括废除专制，建立共和国，应允许所有同情革命事业的人加入同盟会，主张采用“革命同盟会”。黄兴提出该团体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不拟冠于“革命”二字。黄兴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认可，于是，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建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

黄兴倡议由孙中山任总理，得到大家的赞成。孙中山起草了盟书，经黄兴、陈天华审定。各人自写盟书一份，由孙中山率众人同举右手，对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最后，大会推举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8人负责起草

同盟会章程，准备提交成立大会上讨论。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人坂本金弥寓所举行，有近百人参加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同盟会章程》，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作为同盟会宗旨，以东京作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设总理1人，由会员投票公选，任期4年，可连选连任，总理对外有代表本会之权，对内有执行事务之权。同盟会下设执行、议事、司法三部，执行部下分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等6科，议事部有议同盟会规则的权利，议员由全体会员投票公举，以30人为限，每年公选1次。同盟会在国内设立5个支部，即东部（上海）、西部（重庆）、南部（香港）、北部（烟台）、中部（汉口），在国外设立4个支部，即南洋（新加坡）、欧洲（布鲁塞尔）、美洲（旧金山）及檀香山。各分部均受本部直接领导，后来各省又相继设立分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任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

同盟会会员均有实行同盟会宗旨，介绍会员，发展组织的职责。同盟会本部成立后，立即在各省和海外华侨中发展组织，扩充会员。同盟会本部推定各省一个主盟人，一面吸收本省留日学生入会，一面回国在本省建立同盟会分会。

各省相继担任主盟者为：

直隶——张继、杜义、吕复、王观铭

山东——徐镜心、丁惟汾、于洪起、陈干

山西——王荫藩、荣福桐、荣柄、谷思慎、景定成、狄楼海、景耀月

陕西——康宝忠、赵世钰、井勿幕

安徽——吴春阳、高荫藻、权道涵、孙毓筠、孙作舟
江苏——高剑公、章梓、张鲁、陈陶遗、许屠
浙江——秋瑾、陶成章、龚宝铨
湖北——时功玖、张昉、陈镇藩、匡一、但焘、白榆桓
湖南——黄兴、仇式匡、宋教仁、刘揆一、陈嘉会
四川——淡春阳、丁厚扶、张治祥、黄复生、董修武、李肇甫、吴永珊
云南——吕天民
贵州——于德坤、平刚
河南——杜潜、朱炳麟、曾昭文、刘积学、程克
福建——林时爽、李恢、方声涛
江西——钟震川、张世膺、邓文辉、文群、汤增璧
广西——刘峬、庐汝翼、曾彦、刘尊权、严宽、蒙经
广东——何天瀚、何天炯、廖仲恺、熊樾山、何天衢
南洋——胡汉民
上海——蔡元培
天津——廖仲恺
香港——冯自由、李自重、谢华国

9月，孙中山派冯自由赴香港与陈少白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同盟会分会，此后，各省分会如雨后春笋建立起来，迄武昌起义前，全国各地建立的同盟会分会约有70多个，遍布23个省区，连西藏和台湾也有同盟会的活动足迹。同盟会在海外华侨中的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暹罗、缅甸、菲律宾、澳大利亚、檀香山、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墨西哥等地建立了同盟会分会，欧洲的比利时、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等地设立了同盟会通讯处。

同盟会将全国的革命志士集结起来，有了共同的纲领，共同的宗旨，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领袖。入会者均以个人名义申请，并履行一定的手续，入会后再遵守规定的组织纪律，整个同盟会从本部到支部再到分部，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打破了以往的地域观念和习惯，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光复会会员均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光复会的一些主要负责人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也先后加入了同盟会。陶成章回忆说：“及乙巳之岁，黄兴与蔡元培谋迎孙文为会长，先开会于东京青山黑龙会会所，与议者12人。翌日，复开会于麹町区富士见轩，广招各同志入会，名曰同盟会。同盟会成立数月后，吴樾掷出洋五大臣以炸弹，不中，死之。吴樾者，芜湖安徽公学学生，亦光复会之会员也。然是时浙江内地多不知有同盟会事，仍其旧名为光复会。”光复会会员大都是浙江人，而其主要领导人大都是绍兴人，“盖浙人素多个人性质，少团体性质。其行事也，喜独不喜群，既不问人，亦愿人之不彼问，以故癸卯甲辰以后，内部革命势力日增，而外界人迄不知之也。至于绍兴人之多入光复会者，实以蔡元培闻望素隆之故，惟秋瑾反是，喜群不喜独，且偏为张扬其事，故自秋瑾返绍兴后，而革命之风声乃大露。”^①光复会一些领导人加入了同盟会，但仍以光复会的身份开展活动，秋瑾加入同盟会后，也以光复会的名义组织光复军，发动浙皖起义。

兴中会和华兴会在同盟会成立后，实际上并入了同盟会，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不再以原来的名义进行活动，对外均使用同盟会的名义。虽然光复会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但光复会并未并入同盟会，光复会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仍然独立存在。光复会虽然也是同盟会的一个加盟团体，但在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仍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同盟会虽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所组成，但并不是所有光复会会员尽是同盟会会员。有原是光复会会员后加入同盟会的，这是多数，如蔡先生既是光复会会长，又是同盟会上海分部负责人；也有的光复会会员并未加入同盟会，如徐锡麟就是没有加入同盟会的。”^① 沈颀民对光复会并入同盟会说，持反对意见。“有人认为光复会已并入了同盟会，这样说是不符合史实的。”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在“国内仍照光复会宗旨，进行革命活动，也极少参加同盟会者”。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的革命团体，组织不严密，并非领导人参加后全体会员均要参加，何况同盟会仅是各革命团体的联合性质而已。因此，国内革命起义，仍以光复会的名义办事。”^② 同盟会作为资产革命团体，缺乏严密的组织，虽然光复会的领导人参加了同盟会，但光复会并未因此解散，仍然以自己的名义开展革命活动。而且，光复会的著名领导人徐锡麟始终没有加入同盟会。特别是地处内地东南山区参加光复会的会党，因消息闭塞，并不知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始终以光复会作为革命旗帜。

同盟会成立初期，与光复会关系融洽，没有冲突。同盟会

① 林文静：《蔡子民先生二三事》，《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② 沈颀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7页。

钦佩光复会的胆识，希望光复会加盟，壮大革命力量，而光复会对同盟会也无戒心，无不踊跃入会，自光复会员蒋尊簋第一个加入同盟会后，秋瑾、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均相继加入同盟会，他们心系两会，志同道合，情同手足。蔡元培既是光复会会长，又是同盟会上海分部的领导人，上海与东京两地的革命党与学界互通声气，相互支援，日本留学生的爱国运动与内地革命活动相互促进。秋瑾、章太炎和陶成章也受到同盟会的充分信任。光复会也竭诚拥护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的领导。光复会与同盟会有共同的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奋斗目标，双方能亲密无间地合作。“留日 17 省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中国同盟会已历数月，浙江人人会者有蒋尊簋、秋瑾数人，成章于丙午东渡，旋即加入，且见推为《民报》之发行人，元培于同盟会成立之初，已为本部指定为上海分部创办员，因是光复会员泰半入同盟会籍，独锡麟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始终没有加入同盟会。秋瑾也“于乙巳 7 月由冯自由介绍入同盟会，且被推为浙省主盟员，为浙人入盟会之第二人”。同盟会发动萍浏醴起义期间，“同盟会本部派遣归国运动湘鄂苏各省起事之刘道一、杨卓林、孙毓筠、胡瑛诸人，瑾皆与之约期同举，亦概用同盟会章制，则可知是时革命党员对于光复同盟之名义，固无畛域之见也。及萍浏革命军失败，徐秋二人遂协议决用光复军名义在浙皖二省企图大举，不及半载而有安庆绍兴之二役。”^① 同盟会和光复会在东南地区，精诚合作，共同战斗。“孙中山联合宗旨相同的会

^① 《光复会》，冯自由：《革命逸史》（第 5 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56 页。

党，组织同盟会，在日本设总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设分会。上海分会由陈其美担任，有时派黄郛等到杭联系军人及地方人士顾乃斌、韩绍荃、葛敬恩、计宗型、黄元秀、来伟良、方於笥等先后入党。其他浙人在日本或在上海参加者，有蒋尊簋、吴思豫、俞凤韶等。此后两会会员因宗旨相同，互相呼应。秋瑾自任绍兴大通学堂校务后，经常到杭，住过笕桥荣庆堂客栈，扩充联系，不断在西湖白云庵及湖心亭或在船上开会，召集同志，报告省内外工作发展情况及以后进行方针等。”^① 皖浙起义失败后，徐锡麟和秋瑾相继遇难，孙中山异常悲痛，撰写了一副挽联：“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② 孙中山对秋瑾也深寄哀思，并关注浙江光复会的处境，“秋侠虽已捐躯，火种依然存在。毋忘我浙东受难的同志。”^③ 光复会与同盟会本无芥蒂，光复会成立初期主要活动在江浙和长江下游东南各省地区，而同盟会则多在海外和两湖及华南一带，双方井水不犯河水。光复会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互相之间也没有限制和干涉。光复会和同盟会之间有过一段“蜜月时期”。

① 傅墨正：《辛亥革命杭州光复的回忆》，《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页。

② 孙中山：《挽徐锡麟烈士》，《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6年版，第113页。

③ 沈鹏年：《孙中山与王金发》，《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

第五章 创办大通

光复会创建后，急需大批军事干部，组织革命军队，发动反清起义，陶成章、徐锡麟和龚宝铨因此创办了大通学堂。大通学堂不仅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所培养武装干部的学校，还是光复会和皖浙起义的指挥中心。

第一节 筹措经费

1905年7月，暑假结束准备再次赴日的秋瑾带着徐锡麟要陶成章回绍兴共商革命大计的信来到上海，时陶成章刚从日本归国不久，在上海开设催眠术讲习所。敖嘉熊因迭遭家难，经商亏折，温台处会馆开支浩大，难以为继。敖嘉熊欲以温台处会馆起事，陶成章急忙赶往嘉兴为之筹划，因时机不成熟未付诸行动。不久，温台处会馆因经费支绌被迫解散。于是，陶成章与龚宝铨从嘉兴相约一起来到绍兴，与徐锡麟商讨培养革命骨干问题。

光复会成立后，急需军事人才开展武装斗争。特别是徐锡麟“自与弟子童济时、卢钟岳徒步循历诸暨、嵊县、东阳、

义乌、缙云诸邑，访其豪俊，得交嵊县竺绍康、缙云吕东升，欲以视竺、吕子弟，养成劲旅，乃谋设学以培植之”^①。此时，清政府废除科举，创办学堂，各省除设有提学使外，省设有高等学堂，县设有县学堂。光复会领导人计划创办一所学校，以办学名义，对浙江各地的会党骨干分子进行军事培训，为武装起义作准备。于是，光复会将培养革命骨干的基地设在绍兴。

绍兴成为革命的大本营决不是偶然的。光复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都是绍兴人，光复会所联络的会党大多是在绍兴府所属各县以及邻近的金华和处州两府；而一度成为光复会成立前后浙江革命联络中心的温台处会馆又因经费问题解散；光复会会长蔡元培虽道德文章受人敬重，而内外联络工作却非其所长，故光复会成立后上海方面的会务并无太大的进展，同盟会成立后，他又远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徐锡麟加入光复会，积极奔走于绍兴府属及邻近的其他府属各县，开展会党的联络工作。徐锡麟目光远大，热心公益，克己从人，对待会党亲如家人手足，为会党所推崇。徐锡麟时任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兼算学教员，上海与浙江各地的革命党人都到绍兴来联系工作。自从温台处会馆解散后，陶成章、龚宝铨与徐锡麟一起到绍兴创办大通学堂，“浙江革命之大本营遂由温台处会馆而移于大通师范学堂，即光复会本部之事权，亦由上海而移于绍兴。”^② 光复会的中心转移到了绍兴。

徐锡麟正设法筹集经费，购买武器，因此，托秋瑾带信促

① 沈光烈：《大通师范学堂之特殊教育》，《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4年版，第90页。

② 陶冶公：《光复会的组织和发展》，《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9页。

陶成章回绍兴共商光复会的发展大计。刚从上海回绍兴的蔡元培的从弟蔡元康向徐锡麟建议，用抢劫钱庄的办法，来筹集革命经费，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徐锡麟对抢劫钱庄的计划，尤为赞赏。“锡麟果敢人也，闻而识之心中，即向同志许仲卿借银 5000 元，至上海购买后堂九响枪 50 杆、子弹 2 万粒。声言枪 200 杆、子弹 20 万粒。其购此枪也，请于知府熊起蟠，言明系各学校体操所用，领公文而往，明目张胆，雇挑夫 10 余名直过杭城，警吏皆不过问。既渡钱塘江到西兴，雇船运送至绍兴城内，寄存于府学校。”^①徐锡麟跃跃欲试，立即向徐家表亲许仲卿借银 5000 元，以绍兴府学堂学生进行体操演习为名，请绍兴知府熊起蟠批准，从上海购得后膛九响枪 50 支，子弹 20000 发。

随后，徐锡麟又嘱咐绍康回嵊县，挑选 20 多名身强力壮的会党青年来绍兴，每人发给 20 元费用，由徐锡麟亲自督率，在东湖进行训练，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实施抢劫计划。

然而，“当他们正准备于‘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出外实行路劫时，却来了一位军师，就把他们可笑的计划全盘推翻了。”^②陶成章“竭力反对这样做，认为不能因筹款而损害全局”。陶成章劝说徐锡麟放弃抢劫钱庄的计划，因为一旦计划实施，必然引起社会上的巨大反响，不但暴露了自己，而且还会给光复会抹黑，得不偿失。

徐锡麟采纳了陶成章的意见，取消了原定的抢劫钱庄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 3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6 页。

^② 曹聚仁：《陶成章与光复会》，曹雷编：《听涛室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8 页。

计划。

陶成章后来在日本准备离开东京赴南洋筹款时，提及放弃抢劫钱庄计划很有远见。“如果照蔡元康的办法做，恐怕光复会现在难以存在了。”^① 陶成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危害性。

陶成章、徐锡麟、龚宝铨等人商议，决定在绍兴创办一所学校，利用购买的枪支弹药，训练会党骨干，秘密培养军事干部，为武装起义作准备。

学校最初选定东浦镇北大通桥旁普济寺，东南临下横江，水面宽阔，可以训练水兵；西面有乱坟杂地，可开辟为练兵场地；东浦离绍兴也近，交通便利，闹中取静。但普济寺属于徐氏家寺，主持方丈得知徐锡麟欲改寺办学的消息后，立即告知了徐锡麟的父亲徐凤鸣。徐凤鸣“不许大通寺方丈把房屋借给他的儿子”^②。徐凤鸣严厉训斥徐锡麟不守规矩，竭力反对徐锡麟改寺办学。

光复会的办学计划遭到徐锡麟父亲的阻挠，眼看就要流产。事为城内豫仓董事候补知县徐貽孙所知，他想从提倡学务中获得好评，主动找到徐锡麟，支持办学计划。

徐貽孙爽快地说：“听说你要办学，我可以将豫仓的空屋借给你。”

陶成章考虑到在东浦办学不方便，阻力较大，最好能在绍兴城内办学。

陶成章、徐锡麟、龚宝铨等到豫仓谒见徐貽孙，商借豫仓

① 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页。

② 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页。

空屋数间作为办学之用。

大通学堂的校址就设在绍兴古贡院前，以山会两邑豫仓——地方政府的粮仓作为校舍。

第二节 招收学员

陶成章和徐锡麟将原先存放在绍兴府学堂的枪支弹药全部转移到豫仓。竺绍康带来的 20 多名会党青年也来到豫仓。因放弃了原先通过抢劫钱庄筹集经费的计划，办学经费改由许仲卿负责。徐锡麟具体操办了修缮房屋、辟建操场、购置教具、聘请教习以及登报招生等工作。徐锡麟为筹建大通学堂，呕心沥血，栉风沐雨，废寝忘食。

温台处会馆解散后，陶成章介绍原会馆工作人员吕熊祥、赵卓等人到绍兴，协助筹办大通学堂事宜。会稽平水人陈伯平刚从福建回乡，获知即将创办大通学堂，也来入学。

徐锡麟建议在大通学堂举行开学典礼时，邀请绍兴城内的所有清吏参加，一网打尽，并要求陶成章通告各地会党届时响应，发动武装起义。

陶成章表示反对，指出：“浙江非冲要地，欲在浙江起事，非先上通安徽，并以暗杀扰乱南京不可。”^① 陶成章竭力劝说徐锡麟放弃了起义计划。

学校名称最初定为大通武备学堂，清政府规定，私人不得办武备学堂。陶成章建议将大通武备学堂“改为大通师范学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页。

校，设体操专修科，不论其为何府何县人，皆可入学”^①。大通师范学堂“其所以如此命名者，恐引起当时官吏之疑，而以此掩护而已”^②。大通虽然冠于师范之名，却不讲授教育学科，而以军事训练为中心。

为了取得办学的合法地位，陶成章还通过绍兴知府熊起蟠办了公文，亲自赴省城杭州，以“奉旨办学为名”，向浙江学务处递交申请，请其转达三司。陶成章声称：“东西洋各国，尽征民兵，号曰国民军，然皆系中学校及高等小学校卒业者，兵式体操习之有素，故一行号召，即能成军。照我国目前情形，不能不行征兵之制。然市民村农，妄识步伐，据生等意，以谓欲行征兵，须先倡办团练，以为基础。今特设立大通师范学校，内设体操专修科，凡有志者均可入学。6月毕业，即行各归本乡，倡办乡团，以为征兵预备。”^③陶成章以大通学堂替政府办“团练”为名，设立“体操专修科”，请予批准。清吏被陶成章冠冕堂皇的理由所迷惑，认为言之成理，批准了创办大通师范学堂的申请。

为了招集会党骨干到大通学堂培训，准备武装起义，“成章乃遍召各县会党头目入堂练习兵操，为军事进行之准备。”^④陶成章与龚宝铨、吕熊祥奔赴浙江的诸暨、永康、缙云、金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页。

② 沈光烈：《大通师范学堂之特殊教育》，《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4年版，第90页。

③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页。

④ 陶冶公：《陶焕卿先生小传》，《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华、富阳等地，通知各地会党骨干会集绍兴，入大通学堂学习兵式体操。“成章遂偕味荪、熊祥由山阴出诸暨，道东阳，欲至巍山。闻赵永景兵起，乃由安文镇改道入永康，至缙云之壶镇，寓于熊祥家。遍招各处会党头目，入绍兴大通学校练习兵操。授与名片以为纪号，给与川费以资其行。其返也，则由壶镇至永康，由永康至金华，寓于徐顺达家。于是，熊祥亦遂与顺达相识。成章欲邀顺达至大通，因正在新婚，不果。再从金华至兰溪，由七里垅水道趋富阳，循诸暨而返绍兴府城。”^①金华、处州和绍兴三府的会党络绎不绝地来到绍兴，到大通学堂接受兵式体操的训练，“吾国各省秘密会党之能受正式军事教育，盖自此始。”^②大通学堂是革命党人在国内建立的第一所训练会党骨干的学校，开创了中国秘密会党接受近代化军事教育的先河。

陶成章因急于返回绍兴捐官赴日学习陆军，因此，“不往访衢严之各党会，以故衢严各党会首领，无至大通者。其温台二府，亦未暇往招之，故其党友亦不来。所至者仅有金处二府，与绍兴之人。职是之故，丁未浙案之发，亦由金处绍三府而起，其他诸府，不过因金处绍三府党会之牵动，稍受影响而已。”^③陶成章拟捐官赴日学习陆军，只联络了金华、处州和绍兴三府的会党，无暇前往其他各府联络，致使衢州、严州、台州、温州四府的会党骨干没有到大通学堂学习。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页。

② 《浙江志士与革命运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页。

③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陶成章为大通学堂制定了若干规约，凡是大通学堂的学生，一律加入光复会；学生毕业后，仍受本校办事人员节制；而会党骨干仅习兵式体操，毕业后发给文凭，正面盖绍兴府及山阴和会稽两县官印，下盖大通师范学堂圆形公章，背面记以特别符号。为了挟制官府和绍兴的绅学界，使其以后不能随意反对大通学堂，每当开学及毕业时，均邀请绍兴城内所有清吏、著名士绅及学界人士参加，并拍照留念，送各府县署及学校悬挂，显示了陶成章等革命党人高超的斗争艺术。

1905年9月23日，大通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由徐锡麟、陶成章负责，钱葆荪任总教习，陈魏任总监。学堂设有董事会，有名誉董事、常务董事及董事，负责学校的行政和经费。大通学堂成了光复会吸收会员，发展会务的主要基地，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所培养武装干部的学校。

大通学堂大厅高悬楹联一副：

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年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

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①

楹联因语涉忌讳，仅数日即撤去。

^① 绍兴逸翁稿：《再续六六私乘》，《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页。

第三节 特殊教育

大通学堂设总理1人，由学堂董事会公举，一般由德高资深者担任，但均为挂名而已。具体学堂事务由总理提名任命的督办（襄办）负责，另设有学监、司账、庶务等管理人员。

大通学堂的学生来源有两种，一是光复会各地会党骨干，主要来自金华、处州和绍兴三府；二是向社会公开招收的18岁以上30岁以下的青年。学生毕业后发给由山阴会稽两县署和绍兴府署验收盖印，并加盖学堂印章的文凭。

大通学堂仿照日本的振武学校，除开设师范学校所必须讲授的各门学科，如国文、英文、日文、算术、测绘、舆地、历史、理化、博物、伦理、教育、琴歌、图画等科目外，其课程设置以体育为中心，特别重视军事体育，包括兵式体操、器械体操、夜行军、爬山、泅水、军号等，其中体育课程的课时，远远超过了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时数。学校还经常举行演说会，陶成章和徐锡麟亲自担任主讲。徐锡麟讲到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时，挥拳击桌，声泪俱下。学校还订有《革命军》和《浙江潮》等革命书刊，供学生阅读。

大通学堂的教师分为三部分，一为光复会会员，如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王金发等，徐锡麟“对待学生像亲生子女一样，往往在夜阑人静时，轻轻地走到学生宿舍，见有手脚外露的，为之盖好被褥；蚊子相扰，为之掩好床帐”^①。二为

^① 朱赞卿：《大通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学堂聘请的文化教员和军事教练，还有一些学生也兼任教员。

据不完全统计，大通学堂办学两年内，在校先后任职的教师有30余人，其中专任教师20余人，先后任经理的6人，任督办、襄办、学监的3人。

大通师范学堂“既乏固定资金，又鲜补助经费，左支右绌，竭蹶时虞”。教师薪俸微薄，“教职员类皆光复会同志，坚苦卓绝，共维危局。月支极少数之生活费，间或一钱莫名，略无酬报，亦数见不鲜之事。”^① 光复会会员任教者均尽义务，聘请的教员半尽义务，每月薪金以20元为限。师生同吃同住，生活异常艰苦。

大通学堂初创时，经费仍由绍兴富商许仲卿捐助。绍兴孙端的孙德卿也曾资助大通师范学堂经费。孙德卿原本家境贫寒，但过继给叔父孙学文后，继承了2000亩良田等巨额遗产，骤成巨富。孙德卿赴日时，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了同盟会，还结交了陶成章、徐锡麟和秋瑾等绍籍革命志士。孙德卿回国后，慷慨解囊，资助光复会员从事革命活动，帮助徐锡麟在孙端办竟成小学堂和秋瑾在庙埭底的余屋办大端妇女学堂，并资助陶成章和徐锡麟等人创办大通学堂，还出任大通学堂总理。

大通学堂从第2期始，经费由学堂同人筹集。由于经费有限，学校的教学设施因陋就简，除了一般教学设备外，主要是军事演习用的枪支弹药，还配有天桥、榴木、平台、铁杆、木马、秋千、铁环等体育操练器械。

^① 秋宗章：《六六私乘补遗》，《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0页。

大通学堂设特别班和普通班，特别班学生全部都是会党成员，只练操习武，不修其他学科。而普通班招收一般的青年学生，文武兼学，除学习文化基础课程外，也同样侧重体操与军事。据曾任大通学堂的数学教师沈光烈回忆：“特班尽竺（绍康）、吕（东升）子弟，管理训诲，二君负其责，军事操练以前，不教任何学科。普通班一部为竺、吕子弟，一部在本县招致，年龄较轻。所教学科，有国文、史地、数学等科，仍侧重体操与军事，数学一科，曾命（沈）光烈承乏，自编教材，凡四则、分数、小数、比例及浅近代数、三角以至测量，题材悉与军事相联系。一年教毕，其进程之速，不可想象。其余文科，任教者志不尽同，我未一一配合。但管理训育，则望以军事部勒。”^① 无论是特别班，还是普通班，对体操和军事训练均极为重视。大通学堂实际上成了“各会党荟萃之所”。^②

大通学堂学生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无论是起床和熄灯，还是上课和下课，均用号角。学风严肃认真，学生仿正式陆军编制，每天三操四讲堂，兵式体操，均在郊外大校场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操练时均排队出入，身着操衣。若遇上大雨，则在饭厅上操，或在走廊四周跑步。大通学堂的“催起号角一鸣，立即把被褥捆好。鞋子一律放在门外，不得在室穿脱。除星期日外，每天第一课起，三课兵式体操，要跑到几里路外的大校场去操练。有时朝露未干，青草没胫，教师喊五百、六百米达卧倒、预备放，学生不问马尿牛粪，毫不犹豫地卧倒下去，并假想敌人在前，眼亮手准地动作起来。遇到大雨就在饭厅上操

^① 沈光烈：《大通师范学堂之特殊教育》，《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4年版，第90页。

^② 《陶焕卿》，《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6页。

击枪柔软或在走廊四周做跑步。我们所用的枪，是从俄国买来的老毛瑟后膛枪，分量是很重的，所以操击枪柔软最累人，左手把枪托在手上，伸直作瞄准状，教师不喊放，当然不许缩转来，手臂酸得不得了。还有跑步，开步大不行，小也不行；慢不行，快也不行。教师说一分钟走多少步等于几里，要这样作战时才有用，这两项课程最吃不消。此外，还有星期一、三、五的一小时器械体操，有很高的天桥，极长的溜木和平台、铁杠、木马、秋千、铁环、跳远等种种设备，应有尽有。”教师对操练认真负责，“譬如开步走走得不好，他就用指挥刀（未开刃的）敲你的腿。夜间打行军，你爬不上山，他就把你一推；泅河，你不敢下水，他也把你一推。”^① 每项训练活动均一再进行操练，直到学会学好为止，有时还进行真枪实弹的军事演习。

1906年4月，大通学堂又开办了第2期，由竺绍康主持。每学期学员学习时间均为6个月。

大通师范学堂先后办了四期，每半年一期，第一期学生仅30人，以后各期均上百人。加上1907年办了一期“体育专修科”，招收男生八九十人，“共培养起义骨干近千人。”^②

光复会会长蔡元培赴德留学后不再过问光复会的事务，光复会会员和浙江革命志士有关革命事宜大都到大通学堂联系。大通学堂以办师范学校作为掩护，吸收各地会党志士入学，成为培养青年、联络会党、储备和扩大光复会革命力量的基地。

① 朱赞卿：《大通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② 晨朵：《绍兴大通师范学堂史略》，《绍兴文史资料》（第15辑），2001年版，第200页。

会党的骨干分子经过半年紧张而严格的训练，提高了政治觉悟，使原来山堂林立、政治倾向模糊的会党统一到反对清王朝的革命目标上，并且有效地纠正了会党自由散漫的习气，加强了组织纪律性，还掌握了一定的近代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成了光复会的重要干部，在武装起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大通学堂成了光复会在国内的重要据点和机关，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成为后来浙江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武昌起义爆发后，浙江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在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台州、温州、金华、处州、严州、衢州等府群起响应，推翻清政府的地方政权。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当年大通学堂培养出来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时，杭州、绍兴两地之光复，大部分是光复会人员之力，其中更多是大通学堂和中西学堂之师生。绍兴光复，即系大通学堂体操教习王金发先生带同大通、中西同学首先进城，光复后他出任绍兴都督。”^①大通学堂的学生在光复杭州和上海，攻克南京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四节 捐官计划

陶成章与徐锡麟、陈志军、陈魏、龚宝铨因筹办大通学堂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们都是奋发有为的革命青年，经常商量“光复汉族，还我河山”的办法。陶成章鉴于学校毕竟只是培养人才之地，不可作为革命的大本营。而且

^① 沈光熊：《沈钧业传》，《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页。

在清政府的统治下，大通学堂也不可能公开招兵买马，像正规军那样进行训练。当时各省新兵日见增多，采用新法训练，装备精良，仅凭大通学堂培养的学生所组成的武装，实力仍然有限，难于与清政府的军队相匹敌。陶成章见绍兴的光复会会员中，有些同志家境殷实，又建议：“捐官学习陆军，谋握军权，出清政府不意，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①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陶成章指出，“我们这样训练教育是不够的，必须改订计划。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捐官去日本学习军事，以便将来回国后可以做军官掌握兵权，实行革命。”陶成章提议设法捐钱买官，取得官费留学生资格，赴日学习军事，回国后到新军中任职，掌握新军力量，使之成为革命党人的武装。

徐锡麟也提出：“要革命成功，除非掌握军队，否则，革命难于成功。”

“绍兴地处偏僻，很难有所作为，不如从仕途着手。”许仲卿也表示赞成。

徐锡麟深有同感：“在野无以措手，必稍得政权而后可。”^②

陶成章的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于是，在原定的计划中，又增加了“捐官去日本学习军事”一项。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② 龚宝铨：《自叙革命历史》，《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捐官赴日学习军事的共有5人，陶成章建议以年龄长幼确定捐官的等级，“锡麟为长，成章次之，志军又次之，德毅又次之，味荪居末。”^①徐锡麟捐道台，填步兵科；陶成章捐知府，填步兵科；陈志军捐知府，填炮兵科；陈魏捐同知，填骑兵科；龚宝铨捐同知，填工兵科。由徐锡麟说服许仲卿出资捐官。“伯荪有学生许崇卿者，家赀百余万，五人谋捐赀入官，得所凭藉，然后反正。其赀则崇卿出之，伯荪得道员，焕卿以下皆得同知。”^②许仲卿为五人捐官又出资五万元。

捐官经费解决后，由徐锡麟负责通过表伯俞廉三打通有关关节。于是，徐锡麟前往湖北，会见原任湖北巡抚俞廉三。俞廉三正谋浙江铁路总理的职位，素以顽固著称，为人所唾弃，也想做出一点成绩，为自己脸上贴金。徐锡麟说服俞廉三同意代为纳粟捐官，并致函浙江将军满人寿山，为徐锡麟等人赴日学习陆军提供方便。徐锡麟带着俞廉三的信返回浙江，赴杭州求见寿山。寿山是满族权贵庆亲王奕劻的女婿，也是后来任安徽巡抚恩铭的连襟。寿山不仅愚蠢而且贪婪，徐锡麟趁其吞吞吐吐之际，送上3000元。于是，寿山立即嘱幕友批准了5人赴日学习陆军的禀文，并致函清政府驻日使臣杨枢，予以疏通。新任浙江巡抚张曾敳从湖北起程时，俞廉三又再三予以重托，声称徐锡麟是其表侄，陶成章等人均其好友。

徐锡麟为了组织更多的人到日本留学，又进行了多方动员，陈伯平、马宗汉、王金发、沈钧业、范爱农等人也表示愿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② 《与陶冶公》，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89页。

意随同前往。徐锡麟将赴日学习陆军一事告诉妻子王振汉，王振汉对革命已有一定的认识，也要求同行。

1906年1月，陶成章、徐锡麟、龚宝铨、陈志军、陈魏、陈伯平、马宗汉、王金发、沈钧业、范爱农以及徐锡麟的妻子王振汉、二弟徐仲荪、侄儿徐学舜等13人在上海会合，前往日本。陈志军先期出发，约正在东京的鲁迅赶到横滨迎接。徐锡麟为了安置王振汉，先在神户上岸，改乘火车前往东京。秋瑾在东京车站迎接徐锡麟夫妇，并热情地招待王振汉。

陶成章等人准备进振武学校学习。以前，准备入学陆军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都进成城学校，1902年，因中国9名自费留学生拟入成城学校遭清政府驻日公使拒绝作保，未能获准入校，引起纠纷。经东亚同文会居中斡旋，日本政府与清政府驻日公使达成协议，于1903年7月由日本参谋本部在东京牛込河西町另设振武学校，专门从事陆军士官学校或陆军户山学校的预科教育，成城学校的学生全部转入振武学校就读。10月，经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和留学生监督汪大燮的请求，振武学校又开设了文科生班。驻日公使杨枢曾向清政府上《奏陈兼管学务情形摺》，力陈每年派遣200或百余人赴日学习陆军的必要。清政府练兵处为此奏定《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16条，规定每年各省选定100名年龄在18岁以上22岁以下的学生进振武学校学习，经费由清政府支付。因此，志愿学习陆军的学生比成城学校时还多，但每年的数目大体固定不变。

振武学校的学制起初是1年零3个月，后来是3年。振武学校设有宿舍，过着军事化生活。《振武学校规则》中的《斋房条例》（《学生守则》）多达7章，共65条，事无巨细，均有规定。

振武学校创建初期，只有学生 170 余人，改为 3 年制以后，在校生达 300 余人。1904 年毕业生有 49 名，1905 年为 121 名，1906 年达 202 名。“20 年来中国军界之重要人物底姓名，几十之九可以从明治四十（1907）年《振武学校一览》之学生名册中查出，其影响于中国军政界可谓大矣。”^① 振武学校为中国近代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

陶成章一行到清政府驻日使馆办理入军校的手续时，遇到了障碍。原来驻日公使杨枢已经调离，继任者为汪大燮，陆军留学生监督是王克敏，寿山写给杨枢的信没有任何作用，还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因我们是学生，不是官僚。”^② 而汪大燮对陶成章早就知根知底，因此，拒绝保送五人入军事学校学习。

清政府本来就怕革命党人进军事学校，与日方达成协议，中国留日学生入日本军事学校学习，不仅必须是官费生，而且还要清政府驻日公使和驻日留学生监督保送。

徐锡麟转而向日本官方活动，通过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局长石井菊次郎的介绍，会见了日本陆军省少将福岛，要求入日本联队学习。

福岛答复：“中国留学生必须先进为中国留学生专设的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尔后才可以入日本联队。”

陶成章和徐锡麟只得再次见王克敏，要求入振武学校。

王克敏搪塞说：“根据规定，不是官费生是不能进振武学校的。你们是自费生，可以进其他学校。如要进其他学校，我

① [日]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49 页。

② 陈魏：《光复会点滴回忆》，《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 27 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32 页。

可以立即送你们入学。”^①

陶成章和徐锡麟一再声称他们是浙江省的官费生，由官府派来日本学习军事，但无济于事。

陶成章一行回到寓所后，商议由徐锡麟给俞廉三拍电报转浙江巡抚，再由浙江巡抚致电驻日公使，说明陶成章、徐锡麟、陈魏、龚宝铨、陈志军等5人均是浙江官费生，请依旧例保送到振武学校学习。

经过俞廉三的疏通，浙江巡抚张曾敳致电汪大燮，告知陶成章等五人已改成官费，请其立即保送入军事学校学习。

王克敏收到电报后，仍借故推托：“5个人不能单独开办一班，必须等奉天送来的学生到东京后，再一齐保送入学。”

陶成章等5人与从奉天来的学生前去检查身体时，振武学校告之5人身体均不合格，不能入学。

陶成章等人与振武学校的校长福岛交涉，福岛只得如实相告：“这是你们监督处的意见。”原来是汪大燮和王克敏寻找种种借口，阻止陶成章等人进入陆军学校，以防止他们将来“图谋不轨”，颠覆大清江山。

陶成章与徐锡麟商议，决定徐锡麟先回国活动，再定行止。

徐锡麟先赴湖北，向俞廉三叙述了在日本的遭遇，请求俞廉三帮助。俞廉三劝说徐锡麟采纳王克敏的意见，改进其他学校学习。

徐锡麟见俞廉三不愿再帮忙入军事学校，又提出进京引

^① 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

见，谋求官职的设想。

俞廉三对此极为支持，表示愿意向湖广总督张之洞“通关节”，请张之洞写信引见直隶总督袁世凯。

徐锡麟又到杭州，刺探寿山的意向。

寿山询问徐锡麟：“为什么就回来了？”

徐锡麟搪塞说：“他们要我剪辫子，我不愿意，所以回来了！”

寿山一听，非常高兴。

徐锡麟见时机成熟，提出：“我想进京引见，请求分发任用，大人以为如何？”

寿山也表示支持，并介绍徐锡麟见其岳父庆亲王奕劻。

徐锡麟打入官场已有眉目后，决定返回日本，与陶成章作进一步商议。

徐锡麟返日后，与陶成章等人商量继续争取入其他有关军事的学校。

于是，陶成章和徐锡麟设法入陆军经理学校，也未成。

留学陆军不成，一行人不知何去何从。

徐锡麟建议：“以警察权代，并谋陆军学校及军正司令等差使。”

陶成章持有不同意见，认为“非直接统军不可，否则行团体暗杀，以扰乱北京，亦是一计”^①。

大家意见分歧，一时难于统一。

当时，除徐锡麟没有剪发外，陶成章、龚宝铨、陈魏、陈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页。

志军均剪去辫子，给回国从事革命活动带来诸多不便。最后大家商定，分成三部分开展工作。

第一部分，由徐锡麟率领，回国从军，掌握军权。陶成章“计使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回国，渗入清政府内部进行活动。徐捐纳为清室道员，赴安徽试用，担任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①。徐锡麟拟“回国谋分省候补，待掌握了大权，再安排同人，布置一切；又以安徽虽是小省，是南京的门户，距浙江不远，在太平天国时，是一个重要的战场，乃兵家必争之地，宜谋分发安徽为上策。”^②徐锡麟积极进行回国的准备，进日本私立东京巢东斌学校，专门学习军事，研究劈刺骑射的技术，还请石井菊次郎协助留日同志学习造币技术，为将来大规模起义后，制造货币支付革命军的军饷。徐锡麟临行前，又请已入巡警学校的陈伯平和早稻田大学预科的马宗汉一同回国开展革命活动，他俩毫不犹豫地辍学随徐锡麟回国。徐锡麟回国时，有人劝其将妻子留在日本，万一因革命工作遭遇挫折，免得连累家属，斩草除根。徐锡麟毅然表示：“人皆有妻子，可悉移异域乎？以至安自处，诒人以危，吾耻之。”^③于是，徐锡麟带妻子王振汉一同回国。

第二部分则留在日本，由陶成章负责，继续学习，配合徐锡麟在国内的革命活动。“既来日本，可以改学其他重要部门，以待徐烈士函召；留在日本的，归陶成章主持一切。陈志

① 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24页。

② 陈魏：《光复会的点滴回忆》，《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③ 章太炎：《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1页。

军是改学政治，陈魏是改学警政，陶、龚拟去南洋活动筹划经费，以为徐烈士分省候补用款。”^① 陈魏后来进了日本东京警监学校警务科学习警务。

第三部分，继续办好军事学校，“即绍兴大通学堂，当时因主持人员欠当，内外都有不满，这个重要的部分，是由徐烈士选择较好的人员前去主持一切。”^② 由徐锡麟另选他人主持大通学堂的工作。后来，徐锡麟请秋瑾负责大通学堂的校务。

陶成章第二次进陆军学校学习陆军谋取军权的计划再次化为泡影。

第五节 任教芜湖

1906年夏，陶成章“潜结闽皖各同志，被任为五省大都督，分浙东、浙西、江南、江北、皖北、皖南、上闽、下闽为十军，计划在杭垣起义，作大规模行动。不幸为浙抚侦知，机关器械和一切军备全被破获，与重要同志数人仅以身免”^③。陶成章联络闽皖浙等省志士，成立光复军，分为十军，陶成章被推为“五省大都督”，计划在省城杭州起义。陶成章“与苏

① 陈魏：《光复会的点滴回忆》，《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② 陈魏：《光复会的点滴回忆》，《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③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0页。

子谷等至杭，被浙抚侦知，几被捕获”^①。

为了实现五省十军计划，陶成章又偕龚宝铨前往嘉兴，会见敖嘉熊。

随后，陶成章又偕龚宝铨、敖嘉熊赴安徽芜湖，居住在赫山，在安徽公学担任教员，继续筹商武装起义事宜。安徽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是芜湖，而芜湖的革命活动中心则在安徽公学。1903年，桐城李光炯与卢仲农在湖南长沙创办了“安徽旅湘公学”，以此掩护革命工作。由于环境恶劣，无法在湖南呆下去，便于1904年迁往芜湖，改称“安徽公学”，租赁了二街留春园米捐局巷内的民房作为校舍。

安徽公学聘请了陶成章等著名革命家和知名人士担任教员。李光炯在长沙时，就与黄兴、刘揆一、张继、周震鳞等革命党人过从甚密，黄兴和赵声也曾在公学任教。公学迁来芜湖后，李光炯更是暗中推动革命工作，不遗余力。为了办好教育，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李光炯聘请了不少学界名流来校任教或讲学，其中大都是革命党人，既有同盟会会员，也有光复会会员。“最著名的有刘申叔，陈仲甫，柏烈武，陶焕卿，张伯纯，苏曼殊，还有谢无量、周震鳞、江彤侯、俞子夷等。公学经费不足，延致名师不免有些困难，李光炯则设法保举张伯纯任官立赫山中学监督，彼此合作，如苏曼殊等即由赫山中学厚致俸金，延揽来芜；还有一个日本著名的科学家来芜教授理化，他的俸金及译员费用，也是由赫山中学负担。安徽公学请

^①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页。

他们代课，只需致送少许酬金就行了。”^① 安徽公学集中了不少各地的革命领袖人物，吸引了不少进步青年，轰动了芜湖。

安徽公学以培养革命骨干，散播革命种子作为宗旨，教师经常在课堂上讲授革命道理。“刘光汉、陈独秀、柏文蔚、张伯纯、陶成章、龚未生、段昭等，陆续到校，公开宣传革命。尤以刘光汉之种族演讲最易动人，特限于时代与环境，一般同志之成绩，惟在文字宣传而已。”^② 陶成章也在学员中宣传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特别是刘师培在校内公开地宣传反清思想，引起了清朝东南疆吏的注意。两江总督端方曾告知道台蒯光典，准备逮捕安徽公学中的革命党人。经过蒯光典的婉言解释，端方才没有下手。然而，安徽公学也因此受到影响，刘师培等革命党人在安徽呆不下去，相继离开芜湖，奔往他处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安徽公学的教师还指导学生传阅革命书刊，教师和学员纷纷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1905 年底，刘师培曾托安徽公学教员胡渭清送交 100 余名新会员名册上交上海光复会会长蔡元培手中。刘师培还与陈独秀秘密组织了“黄氏学会”，专门研究暗杀，李光炯、柏文蔚都曾刺血为盟，参加学会。同盟会刚成立时，张伯纯担任长江下游支部长，积极发展会员，取得很大的成绩，分发安徽新军任职的南京武备学堂毕业生，大多数都是在芜湖由张伯纯主盟加入同盟会，如熊成基、倪映典、薛哲等人。安徽公学迁往芜湖的数年间，也是长江中下游革命运动急剧发展的阶段，孙毓筠、权道涵在南京谋炸端方，徐锡麟、

^① 《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79页。

^②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753页。

熊成基先后在安庆发动武装起义，革命潮流形成一发不可遏止之势。

安徽公学内设有革命组织岳王会。安徽公学迁来芜湖时，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就创建了岳王会的组织，由陈独秀任会长。岳王会以岳飞精忠报国精神为宗旨；以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为目的，实际上是一个从事军事运动的机关。会员采取江湖上惯用的烧香宣誓的形式，绝对保守秘密，对外也不作宣传。参加岳王会的除安徽公学的教员外，“主要是安徽武备练军学生、新军中下级军官以及警察学堂学生。岳王会会员为了运动军队，有不少人投入新军中充当士兵或下级军官。”^①岳王会组织极为精干，“大概共有30多人。所订章则，主要内容不外为反清。”^②岳王会在南京和安庆设有分部，南京分部由柏文蔚负责，安庆分部由常恒芳主持。同盟会在安徽建立组织后，岳王会的会员同时也参加了同盟会。陶成章通过岳王会与南京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建立了联系。

8月28日，陶成章和龚宝铨在芜湖给韩静涵写信，告知安徽的通信地址。

静涵先生大鉴：

敬启者：前晋谒几右，值崔公以敝友有事相商，匆匆告别，不能纵谈，多聆教言，甚为抱歉。章等于本月七日到芜湖，现居赫山。嗣后若赐教言，请寄芜湖赫山皖江中学堂可。

^① 《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81页。

^② 常恒芳：《记安庆岳王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438页。

也。余后陈。

专此。敬请

撰安！

晚陶成章、龚国元 同上

七月九日^①

陶成章离开杭州时，足疾未愈。陶成章“偕味荪入嘉兴，与嘉熊同赴芜湖。当其至芜湖时，病尚未愈，以故遂久不游历内地”^②。延至10月陶成章才与龚宝铨、苏曼殊一起返回上海。旋又潜回杭州，下榻《白话报》馆。

陶成章频繁地往来于上海、安徽、杭州之间，筹划起义，不慎走漏风声。“时杭城忽来谣言，谓成章、味荪已召上八府义士三千，将于十二日袭取省城。藩司宝芬，满人也，以浙江党人遍地，屡欲藉事以兴大狱。既闻此事，即下密札于杭府三多（亦满人）及警察总办候补道某（忘其名）。某接此札，不敢自专，乃谒抚院请命于张曾敷，复以藩司原札示曾敷。曾敷以有前因，未便深究，见札蹙额曰：‘现今新旧交争时代，人言未可尽信。’既而曰：‘如果系革命党，乃是叛逆之徒，应当拿问。但拿到后，若无凭证，叫兄弟如何发放，岂不动人公愤乎？’言毕入内，某道逡巡而退。”^③浙江巡抚张曾敷左右为难，如确有其事，知情不究，罪责难逃；如果是道听途说，草

^① 《致韩静涵先生函》，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4页。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页。

^③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页。

率行事，查无证据，无罪释放，肯定备受舆论攻击。于是，张曾敫自以为想出一个两全其美办法，暗中派人通知陶成章等人暂时回避。

陶成章知道官府并无证据，不过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已，并不急于躲避。为了不引起怀疑，陶成章以与人有约在先为借口，2天后才离开杭州。

陶成章前脚刚走，杭州立即全城戒严，早晚紧闭城门，严密搜查出入行人，达10余日之久。

1907年初，陶成章又应南京新军的邀请从日本回国，抵达杭州，准备集合各地会党，由严州经湖州过广德，潜入南京，以便里应外合，占领南京。陶成章曾与王文庆前往金华、兰溪运动会党，曾寓居金华张恭处。陶成章回忆：“当王军入金华时，成章亦返国应南京军人之招，共谋袭取南京。于是再返杭城，欲由严州历湖州取道广德，率勇士数十人暗入南京，掩其不备，破坏军政所各机关，以便兵营之暴动。不期南京内应志士行不密，未及期而难作。”更有甚者，“黄兴复大放谣言于长江上下，致令清吏预为戒备，成章等计因不得行，王军等在衢、处亦几及于祸，于是革命之风潮，乃又加紧一度矣。”^①由于预先走漏消息，被清吏侦知，机关遭到破坏，南京起义未及发动就夭折了。陶成章被迫再次流亡日本。

第六节 秋瑾出山

陶成章和徐锡麟赴日前，徐锡麟委托曹钦熙任大通学校经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页。

理，负责学校的一切事务，陶成章将金华和处州会党的事宜托吕熊祥代为照料。陶成章原拟“约6月毕业后，体操班即行停止。届期，诸生咸如约归里，或办体育会，或开办团练局”。大通学堂也“乘时闭歇，以免日后之破露”^①。陶成章计划大通学校培养的革命骨干毕业后，立即分赴各地，以创办“体育会”或“团练局”的名义，组织革命力量，准备武装起义。

但是，徐锡麟持反对意见，主张继续培养革命骨干，竺绍康、吕熊祥和赵卓等人也主张以大通学堂为大本营，聚结会党力量。陶成章“与锡麟等意见又不洽。而绍康、熊祥、卓等咸欲藉此以广招徕，均不愿闭歇此校。于是再由绍康、熊祥、卓各自转招其徒党，来大通学校，再开体操班，一仍前日之旧”^②。

陶成章因患脚疾，入东京浅草区乐山堂医院就医，住院1个月也未见好转。陶成章与龚宝铨回国，居西湖白云庵继续休养。

白云庵位于杭州西湖南屏山雷峰塔夕照寺旁，虽托名为庵，但极少做佛事。白云庵风光秀丽，有山有水，庵内供有月下老人，南宋时称为猗园，成为内廷宫人休息之地。清朝光绪年间，有老僧带徒弟游方到此，因爱其清幽隐居下来。老僧名智亮，俗家原籍绍兴，是雍正时戮尸诗人吕留良的后人。徒弟名意周，俗家淮北李姓，相传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后裔。师徒行侠好义，曾往河南嵩山少林寺习武多年。师徒披阅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页。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页。

《大义觉迷录》，振腕浩叹，闻海内外志士倡言革命，极表同情。

陶成章和龚宝铨的到来，得到智亮和意周师徒的盛情款待。“徐烈士伯荪、秋烈士竞雄、陶焕卿等来杭开会，师徒竭诚招待。陈英士、章太炎、蔡鹤卿曾多次在庵集议。蔡松坡由桂省游杭亦在此庵与顾子才、吕戴之、黄元秀共谈数日，借商策略。”^① 白云庵成了浙江革命党人相集的秘密机关。

吕熊祥从绍兴渡江赶到杭州白云庵见陶成章。

陶成章又一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欲兴革命军，非可以学校为大本营者。学校不过为造就人才计，今人才已足用，不若归乡倡办团练。”

吕熊祥“诺之而去，然终不能践其言也”^②。

大通学堂第一届学员毕业后，均按照约定回归故里，创建体育会或者开办团练局。如处州府城以及缙云与壶镇等地，相继办起了体育会或开办了团练局以及半日学堂等多种形式的机构。

1906年春，第二批学员又如期开学了。

大通学堂刚创建时，陶成章、徐锡麟等负责料理学校一切事务，纪律严明，绅学两界交口称赞。陶成章等人赴日后，将学校事务托曹钦熙代理，曹钦熙一介书生，不识会党情形，未能妥善处理，然曹规萧随，延至第一期学生毕业，尚能相安无事，未引起大的风潮。第一期学生毕业后，竺绍康、吕熊祥、

① 黄元秀：《西湖白云庵与辛亥革命之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页。

赵卓等人又动员各府会党入学，由于竺绍康、吕熊祥和赵卓等人非本郡人士，与本地学界也不太熟悉，校内学生也渐生主客之隙。

曹钦熙辞职后，余静夫继任总理。余静夫是局外人，对会党更是一无所知，被校中会党驱逐出校。竺绍康又介绍朋友姚定生代余静夫任总理。姚定生对会党情形也不熟悉，“由是学校内大起风潮，学生分两派：一派袒定生，一派攻定生。其始，仅口舌相争，争之不已，竟至执刀械斗（即枪上之刀）。继乃持刀出校，横行街市，各自寻仇斗殴。官绅学界咸莫敢过问，寻由个中为之和解。定生辞去总理，其事始平。”^①由于大通学堂主持人乏人，内部纪律松弛，屡起风潮，学生械斗，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竟被讥为“强盗学堂”。

大通学堂因缺乏主持人而造成的混乱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光复会决定请秋瑾来主持大通学堂的工作。

秋瑾因反对日本政府颁布歧视中国留学生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毅然离日回国，“屡往来于沪杭嘉湖之间。”^②秋瑾在上海与陶成章相遇，并持陶成章的介绍信前往嘉兴，与敖嘉熊、褚辅成见面。褚辅成推荐秋瑾到吴兴南浔镇浔溪女校任教，担任日文、理科及卫生等科教员。

秋瑾在浔溪女校任教时，经龚宝铨介绍，认识了陈华。陈华邀请秋瑾去爪哇办学，秋瑾准备前往南洋，到杭州白云庵征求陶成章的意见。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页。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

陶成章劝阻说：“远涉重洋前往爪哇，不仅人生地不熟，而且作为女子更有诸多不便，还不如留在国内，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陶成章认为远离故土不如回浙江运动会党更有利于从事反清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

秋瑾接受了陶成章的劝告，没有前往南洋。

秋瑾急于开展革命活动，很快就离开南浔，来到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号召二万万女子参加反清革命。

徐锡麟赴安庆任巡警学堂会办前，推荐秋瑾到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并派嵊县平阳党首领王金发到上海邀请秋瑾，秋瑾无比兴奋地接受了邀请，决定将工作重点从文字宣传转移到组织武装起义上来。

秋瑾从上海来到杭州，与吕公望一起到西湖南屏山下的白云庵与即将出发去安徽任职的徐锡麟见面，双方约定分头行动，筹划皖浙起义，计划以安庆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金华、处州等地也同时发动，占领两省重镇之后，分路攻取南京。安徽方面由徐锡麟筹划，浙江方面由秋瑾准备。大通学堂的学生陈伯平则负责来往皖浙两地，进行通讯联络。

1907年2月，秋瑾正式出任大通学堂督办，以大通学堂作为据点，积极筹划武装起义。

第六章 筹划起义

光复会创建后，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陶成章计划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苏、浙、皖、赣、闽的五省起义，并与徐锡麟商议，由徐锡麟打入安徽官场，以安庆和绍兴为中心，组织革命武装，首先发动皖浙起义，直捣南京，实行中央革命。皖浙起义因仓促发动而失败，徐锡麟和秋瑾英勇就义，陶成章义愤填膺，奋笔疾书，撰写了《徐锡麟传》和《秋瑾传》，并整理成《浙案纪略》，在南洋革命党人的报纸上连载，弘扬革命先烈的献身精神。

第一节 鸿雁传情

陶成章“计使徐锡麟回国捐纳清室道员，在皖省恩铭处得权，办巡察学校。锡麟先是与秋瑾等在绍兴开设大通师范学校，专事收揽浙中会党头目和革命志士，人材众盛。锡麟等在皖垣刺杀皖抚恩铭，一声霹雳，清室震悼，东南半壁全体动摇。大通原约同期举事，因皖垣事有失缜密，锡麟恐全盘泄漏，大功败于垂成，乃先期举发，一击成功，惜皖垣各方接应未能得手，而锡麟等三杰遂以牺牲。清廷一面则来绍兴查抄大

通学校，秋瑾被执，党中诸人，各地逃散，仍传播革命种子，遍于浙东。秋瑾被刑就义，绝口不言，临刑只吟‘秋雨秋风愁杀人’一句，绝对不屈，闻者壮之。后人特墓于西湖，定时吊祭，并立风雨亭以纪念于不朽”^①。陶成章与徐锡麟商定陶成章留在日本继续学习，与回国潜入官场、掌握军队的徐锡麟遥相呼应。

徐锡麟夫妇与陈伯平、马宗汉一行四人由日本返回上海，准备在上海呆两天处理有关事务后就一起回绍兴。徐锡麟在上海立即给东京的陶成章等人写信，告知平安抵沪消息。

□□同命仁弟台鉴：

麟于中历闰四月初一抵上海，路上平顺，勿念。麟在上海速了事务，大约停两天即回绍矣。墨峰、子贻两君均好，拟同回绍。吾弟如有事通信，可寄府学堂□□□君转交，笔墨须谨慎为是。吾弟思想以及交际均臻完善，麟当视为长城之靠者也。在日同志团体必须坚固，且宜推己及人，忠恕之道，麟有志未逮，然欣慕之忱，时时有之。麟自思之，与吾弟相交已及四年，无一毫介意处。以后交情断断不致中变，麟堪自信，兼可信吾弟者也。所望联成热血以达目的，事成后共处一堂，欣然喜色，坐谈前事，岂不快哉！余容后告，即请侠安！

小兄徐锡麟谨上。^②

徐锡麟在信中表达了与陶成章等人共同携手，将反清革命

^①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2页。

^② 《致某（一）》，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进行到底的决心。

徐锡麟在上海逗留了一星期才返回绍兴，马宗汉因祖丧直接回到余姚，王振汉则返回东浦老家，徐锡麟和陈伯平住进大通学堂。陶成章等留日诸人托徐锡麟带回的家信，徐锡麟也派人送往陶堰等地。徐锡麟将有关情况，向陶成章作了简单的介绍。

□□同志仁棣侠鉴：

麟于阴历闰四月初八日抵绍，一路平顺，请勿念。□□□□弟及□□□兄托带诸信，统着人去送矣，请转知勿念。□□之事，麟已与□□先生接洽过矣，但匆匆晤面，未及细谈，后见面宜提及。款项寄东（京）之事，□□弟目下如支绌，吾弟祈力为设法。留东诸君，祈代为转告麟平安。余容后告，即请侠安！

小兄麟上言。^①

自从陶成章和徐锡麟离开绍兴后，大通学堂因为缺乏坚强的领导，同志之间意见分歧，内部也发生了不团结的现象，绍兴学界的一些顽固守旧分子也乘机肆意进行攻击，给大通学堂带来一定的困难。竺绍康等人要求徐锡麟留在绍兴，共同办好大通学堂，培养革命骨干。徐锡麟离日时，曾与陶成章相约，徐锡麟回国打入军界，设法掌握军权，发动武装起义，而陶成章则继续留在日本，配合国内光复会的起义。“成章计使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回国，渗入清政府内部进行活动。”^② 徐锡麟因

^① 《致某（二）》，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② 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24页。

此没有留下来，而是准备以道员身份，进京引见，谋取官职，打入官场，相机开展革命活动。徐锡麟在绍兴收到陶成章写来的信，得知在日本的同志诸事极为顺利，异常欣慰。徐锡麟也给陶成章写了一封长信，告知大通学堂的有关情况以及自己的进京计划。

□□仁弟同志侠鉴：

前奉一函，想已侠鉴矣。正思作函，忽奉手书，得悉吾弟学问与办事两端，均臻极点，钦佩！钦佩！□□先生之卓识达见，麟所师事。□□兄之勇于任事，秉公无私，麟所兄事者也。足见吾弟之卓见，看人不差，可喜！可喜！伏祈吾弟时时往来，商量大事。□□弟等诸同志均无恙，麟甚慰。□□一节，麟与□□先生接洽过，上半年二百元，麟拟二十左右动身至上海，由正金银行汇票汇至吾弟处，转交□□同志。以后□□之学费，宜与□□对分，此等事已与□□弟面说矣，勿致变卦，请勿念。尚乞吾弟等弗介意于□□弟为要。和好如初，以全交谊。来示云□□弟来东，吾弟竭力照料等语，足见吾弟顾全大局，不胜欣慕！麟如可落手，定即电告吾弟，回国共商办法。承示遇事待人格外注意。此二语，麟当书绅弗忘。马子貽君系热心好人，麟当时时注意，□□□同志弟，麟已往过伊之家中，据说在陡门学校，麟拟明日一走，探其意见如何。如不同往北京，麟当在绍为之设法，办一可着手之事。如何布置，相机而行。墨峰同志准同往北京，大约在闰四月廿外动身。外务部石井菊次郎已有来信，麟另纸录奉。□□事已成就，陆军事尚有希望，祈吾弟与石井菊次郎往来交接。学习造□□一节，麟到上海拟在商务中运动，如有头绪，即当飞报。

麟有事回国，与石井见面时代为谈及。麟如有事，拟电达吾弟，告□□回上海一次，无甚紧要，不过略通信息，兼作几端小事而已，请勿念。麟受府校□□先生之托，拟转托□□兄聘请理化教员，修金每月百元。回信可径寄往府校□□□君收，此事便与□□兄接洽，大约从暑假后订起，一切请□□兄斟酌。现绍兴学界□□□、□□□、□□□等恶劣之人，颇为专权，弄得□□先生名誉有伤。麟到绍后，切实对□□先生告语，请其远小人，近君子，如□□先生、□□先生等诸正人，同为商量学务，□□先生颇以为然，后学务或有起色也。适麟到绍时，各人意见甚重，交涉极多，现已稍稍平静矣。总之，作事有小人在内，势必破裂，此一定之理也。麟已深悟吾弟高见，谅早已烛此。余容后告，特请侠安！^①

6月中旬，徐锡麟与陈伯平、曹钦熙、许克丞离开绍兴北上，准备赴京谋取官职，同时考察全国革命形势，联络革命志士，并顺便为留日同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徐锡麟一行人途经杭州时，为了解决在日本警监学校学习的陈魏等人的学费，徐锡麟特地进见张曾敷，要求从绍兴的积谷捐内，每年拨1500元作为学费。

徐锡麟抵上海后，在上海光复会的秘密联络点周昌记客栈收到陶成章写来的两封信，并在沪上停留了三四天。徐锡麟等待陶成章按约定派人从日本送来的军用地图和为留日同志送款。但是原定从日本回国的同志去了杭州，未能如约来沪。徐锡麟分别发了电报到杭州和绍兴，嘱其速来上海相见。徐锡麟

^① 《致某（三）》，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还到《中外日报》社探听关在狱中的章太炎的情况，得知有许多人关照，才放下心来。徐锡麟见上海商界的爱国民主运动非常活跃，商界中也蕴藏巨大的民主革命力量，能够成为革命党人争取的对象，准备在商界活动。但是，徐锡麟与商界素无联系，一时很难打开局面。徐锡麟及时给日本的陶成章写了回信。

□□仁棣同志侠览：

在昌记连接两次手书，谨悉。麟到沪，□□弟适往杭，不遇为怅！大约麟在沪坐待三四天，不能再迟，一面发两信于杭州，又发一电于绍兴，催其速来沪勿缓，因其二百元之学费拟面交也。□□□弟学纸币一节，俟麟北京回来，如何样子，再作计议。在日诸事，全赖吾弟办理，且能实践而行，麟实钦佩无已。总之，吾辈作事，眼光宜放大，魄力宜雄壮，而谨慎之心尤不可少（在日同志必格外亲密为要，□□兄等祈见面道及）。规我数言，谨守不敢忘。军器、舆图，可寄□□□转交麟处。麟此次北京一走，成败如何，不可预知。而直道而行，不容退后，诸事大概已安排妥惬。麟之作事，不得于上，必欲达目的于下。□□一事，吾弟于歇夏时办之，甚善，日后必有大效也。余容后告，即询侠安！

小兄麟上言。^①

徐锡麟想将二百元学费当面转交由日回国的同志，并将不便在信中写的话也托来人转告陶成章。但徐锡麟在上海左

^① 《致某（四）》，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等右等，总不见其来沪相见，而徐锡麟一行多人又不便在上海久等，心中异常焦急。徐锡麟又从上海给陶成章发了一封信。

□□仁棣同志侠览：

顷接手书，并图一组，均收领，请勿记念。读吾弟寄□□弟书，得悉□□弟遇盗难一事，麟读之，记念万分。此事详细情形，究系若何？祈寄北京□□弟转交为要。麟此次同往北京者，□（许）君□□（克丞）、曹君醴泉、陈君墨峰，皆同志也，一切请弗锦注，麟当见机行事，顾全大局。□□弟今日尚未来沪，不胜记念。麟未到沪时，恐□□弟相左，先嘱陈墨峰弟到□□□等候，不料□□弟住在别处客栈，来找寻时与墨峰弟不遇，即回杭矣。麟到沪时发两电，一至杭州红门局□寓，一至绍兴府学堂。且发多信，麟思□□弟经费奇绌，□□之二百之款当面奉，且有许多语与吾弟接洽，托□□弟口传□□，弟仆仆数千里之遥，未得见面，焦心万分。一面有同伴多人，未克久居上海，两难之事，奈何！奈何！章（太炎）君，麟已向《中外日报》馆□君问过，颇多招待之人，麟始得安心。麟前日本动身时，向□□借日洋一百元，兹托正金银行汇奉，到时祈转交为托。吾弟具特识，多爱情，且任劳不嫌烦，麟实钦佩无已。现时作事，苦心不可言状，日后事成，当相聚一笑，乐何如之。总之，吾辈志愿必达目的而后已，否则，虽死亦不瞑目矣！凡事愈苦，其志愈坚，□□、□□等同志，可谓可与共患难者矣。前示二人，必使联络，此言甚善。绍兴学界不比以前，□君□□与□君□□有冲突，大概在学堂经费上，多年交情，一见钱财，当即变脸，可叹！可叹！余容后告，即

请侠安！

麟上言。^①

徐锡麟在信中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死不瞑目。

徐锡麟一行急于赴湖北，与俞廉三商量赴京任官事宜，没有继续等待由日本回国的同志从杭州赶来相见。徐锡麟留信周昌记客栈，嘱从日本回来的同志到指定的地点取款，并将陶成章托他带回的军用地图寄往湖北。

徐锡麟一行于7月初到达湖北汉口，住在俞廉三家中。徐锡麟与陈伯平等人商量引见后分发的问题。徐锡麟仔细地研究了湖北的革命形势和地理环境，认为在湖北发动武装起义有诸多的有利条件，计划引见后争取分发湖北。后来，徐锡麟获悉湖北暂停分发，只好打消该念头。“因安徽巡抚恩铭在山西为知府时，颇得廉三青目（廉三旧任山西巡抚），相结为师生，又系奕劻之婿，与寿山为连襟，故遂改省分发安徽引见。”^②时任安徽巡抚的恩铭，任山西知府时，深得任山西巡抚俞廉三的青睐，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而且还是浙江将军寿山的连襟，利用俞廉三和寿山这两个社会关系，争取分发安徽把握性较大。于是，决定由陈伯平和许克丞先到安徽芜湖一带活动，徐锡麟和曹钦熙则乘火车北上北京。因京汉铁路黄河大桥被洪水冲毁，要将近一星期才能修好，徐锡麟只得等铁路通车后再北上。徐锡麟将有关情况向陶成章作了通报。

^① 《致某（五）》，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页。

□□仁弟侠览：

麟于五月十三日到湖北，寓俞中丞家中。一路平顺，请勿锦注。□□弟，麟在上海待之数日未来，只得动身赴湖北，因同伴多人，未能久居一面。□□弟，二百之款，麟留书在周昌记，嘱其往□□去取。吾弟托其携回军图，嘱其寄湖北，恐劳记念，特此奉闻。麟本拟趁乘火车即赴京，现因铁路在黄河被河水冲坏，只得于廿一日始得乘车。麟此次赴京，自问于大局或有关系，成败不敢预料也。特请侠安！

麟上言。^①

然而，被冲毁的黄河大桥未能如期修复，徐锡麟在湖北耽搁了十多天后，不得不折返上海，再乘火车北上。徐锡麟返沪后，到周昌记客栈询问，从日本回来的同志仍未来上海，估计回绍兴老家了。徐锡麟仍未收到陶成章托其带回的军用地图，想托其带给陶成章的口信也无法转达。徐锡麟在上海又给陶成章写了信。

□□同志弟侠览：

麟本拟由汉乘火车进京，后因火车不通，在俞中丞家中耽搁十数天，仍回上海。拟乘新济轮于初四日赴京不误。恐劳记念，特此附闻。嘱□□弟交来之图，尚未收到，大约伊随带回绍。如仍带到日本，或由日本直寄□□□□亦可。与□□弟面晤时，可接洽也。麟前连发三电与□□弟，始终相左，不见一面。可慨！可慨！麟所以急急于□□弟者，因有许多肺腑语难

^① 《致某（六）》，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于笔述，托□□弟面详吾弟。麟大约于七月底可以卜成败，如在上不成，定当从下做。容后再告，即请侠安！

麟顿首。^①

徐锡麟在上海没有过多逗留，按计划进京。

第二节 京城周旋

7月13日，徐锡麟与曹钦熙离开上海前往北京，住在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徐锡麟刚抵京城，就给陶成章写信。

□□同志弟侠览：

麟于六月初十日到北京，寓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后有信寄此处，询及□□弟因歇夏回绍，麟日后如何办事，如何手段，缓几日再当报告。知关注念，特此奉闻，顺询侠安！

小兄麟上言。^②

徐锡麟系初次到北京，了解了北京学界、报界社会各阶层的情况，深深地感到北京在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下，思想闭塞，政治空气沉闷。徐锡麟曾一度产生在北京办报馆，传播新思想，宣传反清革命的设想。徐锡麟此次进京的目的是引见，求得分发任用，因此，经常奔走于清朝上层统治集团和满族权贵之间。徐锡麟持浙江将军寿山的介绍信，到中央练兵处求见

① 《致某（七）》，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② 《致某（八）》，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奕劻。尽管有自己女婿的介绍信，奕劻仅与徐锡麟面谈片刻便告退，以后便拒绝接见。徐锡麟持俞廉三请湖广总督张之洞写的介绍信，托袁世凯的幕僚，求见直隶总督袁世凯，尚在等候消息。探知端方刚抵京，情绪不好。也获悉铁良居住松叶胡同，“欲以计杀铁良不得。”^①徐锡麟经过多方奔走，分赴安徽有所眉目。徐锡麟到北京后，才收到由日本回国同志从绍兴寄来的陶成章的信，得知东京同志精诚团结，很是欣慰。徐锡麟及时将北京周旋的情况，向陶成章作了通报，告知陶成章等五人在日本学习的经费已向张曾敫疏通，张曾敫已同意从绍兴积谷捐中每年拨付1500元作为学费。章炳麟在沪得到各方关照，生命安全没有问题，请陶成章放心。并对陶成章提出患难与共，生死相与，义无反顾地开展反清革命表示赞赏。

□□同志弟侠览：

麟到京后，接由□□弟交来手书，均读悉，□□弟已回绍，不晤。□□兄袁（世凯）有调至北洋法律馆之信，未知伊欲就否？北京情形，下等人颇有进步，而在上者仍如故也。学界中无甚思想，报界中亦无关切议论。大抵京中经营者，多在利禄。留学回国办事者，无甚权力。保定、天津等处已去过，一切运动虽未十分得手，尚不致陨越。现时多与满人之有权力者常常往来，良某在松叶胡同，已调查明白，麟时谋进步。袁（世凯），已托□□□君（系袁之幕友）介绍，未知能得见否？端（方）于昨日到京，闻不悦于色，因伊之谋未遂也。麟此次到京，奔走终日，无片刻之暇，大约安徽兵权或可到手。吾弟等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页。

在东（京），闻知十分和洽，可敬！可爱！□□、□□两弟由□□分拨学费，如何办法，祈吾弟斟酌为是。麟前在绍时与□□弟说过，嘱其日本不必出去，余款不若改与□□、□□二人，伊即允洽，因府校有留□□意也。前在浙省城中晤到张中丞，面递一禀，内系□□（锡麟）、□□（成章）、□□（志军）、□□（陈魏）、□□（宝铨）五人学习警察，由绍兴积谷捐内每年拨洋一千五百元，作五人学费，此款由绍兴办警察之□君□□拨交，张中丞晤面时颇以为然，以后如何，尚无信息，念念！恐防绍兴腐败劣绅，因麟不在绍，有意阻挠也。墨峰弟在湖北，时与□□同往内地运动去矣。立早君（章炳麟），麟在沪得悉伊欲往芜湖，麟之心中颇为纪念，现在日本可以放心矣，断不致有意外之变。来信云：“生死患难与共”一语，麟读之十分起敬，不觉兴致勃勃。麟之辛苦亦份内事，断不灰心。麟在京身体尚好，知念附闻。顺询侠安。

小兄麟上言。^①

徐锡麟在北京进一步了解了清王朝的一些内部消息，慈禧太后在实行“新政”的幌子下，陆续办起了贵胄学堂和贵胄女学堂，西太后还装模作样地为贵胄女学堂捐赠了十万两白银，以博取提倡“新学”的虚名，实际上，全部招收满族贵族子弟，培养皇室的亲信和爪牙；铁良、良弼和端方等满族权贵，借“预备立宪”之名，集权中央，力求收取地方督抚之权；而在满族权贵的排挤下，汉族大官僚赵尔巽有辞去盛京将军之意。一些自命为“假新党”的官僚，趋炎附势，见利忘

^① 《致某（九）》，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义，竟然无耻地吹捧铁良等清朝权贵。京城的大批汉族官吏，无权无势，终日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徐锡麟将北京有关清政府的情况，向陶成章作了通报。

□□同志仁弟侠览：

□□、□□两弟想已安抵东京矣。麟两次到天津运动，事虽未十分得手，然尚有头绪。袁之幕府□君□□常常见面，然无甚宗旨，祇得从缓进步。□□□君不在天津，已向督轅内问过。袁之次子（袁克文）昨日由奉回津，赵（尔巽）有辞办东三省之意。端（方）昨日在北洋公所演影戏，几乎遇害（因电机炸裂），而同坐之客有王某、何某、姚某者均殒命，而受伤者五六人，端（方）不觉放声大哭。王、何两君系北洋当差，姚某系出洋随员，演影戏之人，系端（方）电天津海关道嘱其特请之员。贵胄学堂有观秋操之说，学堂内汉人祇二名，其余统系满人。皇族定例不准出京，现有准其出京游历之消息。皇太后现捐银十万两，开贵胄女学堂，满洲人可谓通晓时务者。汉人在京当差者，每月拿二、三十两至七、八十两，一月用用，今日或嫖，明日或吃馆子，后日或打麻雀，计算何日可以补缺。□□诵赞铁（良）军机之政声好得很，此等情形，可悲！可痛！而内地假新党往往见利忘义，狼心自负，口出大言，较之骗贼小窃犹不如，可叹！可叹！麟所交之友，真挚者十居八、九，尚堪自喜。世态红羊，人情苍狗，想吾弟高明早已见此。余容后告。即请侠安！

麟上言。^①

^① 《致某（十）》，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徐锡麟在北京的谋官计划，进展非常顺利。

第三节 分发安徽

徐锡麟向来重视进行社会调查，增长见识，加深阅历。8月下旬，徐锡麟利用在京候见的空隙，与曹钦熙一起赴东北进行考察。徐锡麟在致陶成章的信中，简单地谈到这次旅行。

麟于七月初五日由北京动身，往山海关、营口、奉天等处一走，以观风土人情。诸事尚觉顺手，不过稍缓耳。七月廿余拟回南，然尚未一定也。□□、□□两弟谅已来东（京）矣？念念！此上□□仁弟同志侠览。

兄麟上言。^①

东北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资源丰富。1904年至1905年，沙俄和日本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我国的东北，发动了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的土地上厮杀，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成千上万的人在炮火下丧生，村舍也被夷为废墟，赤地千里，荒无人烟，辽东一带尤为凄凉。徐锡麟前往东北时，恰好是日俄战争结束的第二年，战争的残迹历历在目，各地残破不堪，盗匪横行，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徐锡麟将沿途的所见所闻向陶成章作了简略的介绍。

麟于初七早到奉天，日人势力颇大，营口到奉天铁路，尚

^① 《致某（十一）》，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系日管束，颇严。麟拟各处乡村游览，以观人情，于作事或可稍有裨益，然亦不可料也。此上□□仁弟同志台览。诸同志代告无恙。

兄麟上言。^①

徐锡麟深入东北的彰武一带农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日俄战争后，东北的北部被沙皇俄国控制，南部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东北在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异常尖锐，政治局面也十分混乱。被称之为“马贼”的武装组织，星罗棋布。徐锡麟“特至满洲见马贼魁首冯麟阁”^②。徐锡麟在彰武访问了东北著名的“马贼”头目冯麟阁，两人一见如故。徐锡麟与冯麟阁相约南北呼应，共同开展反清大业。

徐锡麟在东北进行十多天的考察活动后，返回北京。徐锡麟赴京的上策是争取打入掌握清政府军权的中央练兵处，而时任中央练兵处的督办是满族权贵庆亲王奕劻，会办（副职）是袁世凯。奕劻为了独揽中央练兵处的全权，极力排斥袁世凯。而袁世凯则不以为然，与奕劻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徐锡麟一度想利用他们之间的重重矛盾，打入中央练兵处，在中央腹地开展革命。于是，徐锡麟到天津，送上张之洞的介绍信。而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却避而不见，只派幕僚虚与委蛇。虽然徐锡麟与袁世凯的幕僚多次见面，但均无果而还。徐锡麟打入中

^① 《致某（十二）》，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页。

央练兵处的计划失利。徐锡麟将东北考察的所见所闻和北京活动的情况，向陶成章作了详细的介绍。

□□仁棣同志侠览：

顷接七月三日所发来信，已悉壹是。麟于十五日由新民府乘车赴北京，到奉天彰武一带已游历一过。该处有一人，名麟角（阁），姓冯，前与俄国打仗，常常获胜，系该处统帅，前即马贼之大头目。人颇节俭，身穿布衣，单娶一妻，其人极有威名，麟宜与时时信札往来。该处风俗尚武，无迷信，少经营性质，有盗案，无窃案。所居之屋多土泥造成，无门户关闭者居多，荒地极多。内地行路颇难，时时有胡子窥伺。麟仆仆风尘，较苦于南方，然身体尚健，堪慰锦注耳。总之，我辈作事，如水银入地，有路必钻，必达到目的而后已。然麟近日之阅历所得，有数语为吾弟者，宗旨要守定不移，办事必须有阶级可寻，切勿出做不到之无因大话。古人云：“言之靡艰，行之维艰。”此二语必当切记。麟日后拟在安徽经营，吾弟于七月廿五日后来信，可交绍兴□□□□转交，然言语要谨慎，防有人拆看。麟之办事，以练兵为目的，或达到亦未可知。端（方）到两江，周（馥）到闽、浙，赵（尔巽）不久居东三省。现袁（世凯）颇与政府反对，而政府亦出其反对之力抵之，故政府以集权中央为主，处处有收取督抚之权，南北会操（恐停止未可知），练兵处欲握全权，袁（世凯）不以为然。赵（尔巽）与袁（世凯）亦不甚合意，日后之情形，再当报告。俞虞仙中丞之子号梦丹，麟嘱其在京于警部办事，已有头路。麟现思到练兵处办事，然恐未能达到，不过有此理想耳。在东（京）诸同志及诸友人，代告麟之近况。曹（钦熙）、□

两君在京，意气颇合。□君亦往安徽。特此附闻。顺请侠安！

小兄麟上言。^①

徐锡麟掌握清政府中央的兵权，进行中央革命的目的没有达到，不得不按原计划分发安徽。

□□仁棣同志侠览：

麟在京运动尚得手，抵安徽办事，预料不致十分窒碍，请勿记念。麟拟廿五、六出京，由鄂一转，再行回绍，小住数日，即赴安徽。麟现思浙江全省矿务，办理尚无其人。俞虞仙中丞即廉三，现在两湖仕学院做监督，正可担任此职。副理则□君□□，祈与□□接洽（……），庶几此事成就，亦系浙江自治地步。同乡京官及全浙绅耆，麟拟遍告。即此，顺询学安。

小兄麟上言。^②

浙江正在掀起保路运动，要求铁路收归商办。徐锡麟希望由俞廉三出任浙江铁路总理，由浙人自办铁路，以免落入外国人之手。

徐锡麟返回北京后，清政府宣布分发徐锡麟到安徽任用。徐锡麟领取了公文，安排年长体弱的曹钦熙从天津乘火车先返上海。徐锡麟则于9月14日离京南下，辗转直隶、河南和湖北等省，调查各地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结交革命志士。徐锡麟抵河南驻马店时，已囊空如洗，身无分文，一日不食者数

^① 《致某（十三）》，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② 《致某（十四）》，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次，但他仍坚持每天早上四点半起程，到夜幕七点钟才休息。徐锡麟之所以能够这样忍饥挨饿，披星戴月，不辞辛苦，长途跋涉，是因为有革命的理想和抱负，支撑他义无反顾地奋勇前进。徐锡麟在致陶成章的信中，备述了路上的艰难困苦。

□□仁棣同志侠览：

麟于廿六日出京，于直隶、河南、湖北等处一游，以观世态人情及风俗地理之关系，于阅历上或稍有进益。若学问二字，麟实有退无进，所仰望于吾弟及诸同志者也。麟大约八月初十外回绍（兴），小住数日，拟再往河南看大操，9月底必至安徽，容后再告。此请侠安！麟上言。

□□兄及醴泉先生由天津至上海矣，麟由湖北乘轮至上海相会。麟到安徽，或督练公所总办谋得到手，吾弟卒業回国时，正达到目的之日。麟此次之游，系一人独行，早上每日四点半钟启行，晚上七点宿夜。孤灯作书，以抒吾弟等之记念。^①

徐锡麟辗转来到汉口俞廉三家中，告知在北京活动的情况。因北京报界思想沉闷，徐锡麟想在北京开一报馆，进行革命宣传。徐锡麟也十分同情东北同胞的遭遇，计划筹集三十万至百万或更多的资金，在奉天创办垦务公司，开垦荒地，发展生产，既可改变东北战后贫穷落后的面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可寓兵于农，造就一支保卫国家安全和进行革命斗争的武装力量。徐锡麟对此有些把握不定，写信征求陶成章的意见。

^① 《致某（十五）》，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仁棣同志侠览：

麟于初三日到汉，在俞虞仙中丞家中住三天，商及在北京开一报馆，请□□□先生主笔，已有函寄伊处矣。又思在奉天组织一垦务公司，资本约三十万至百万，如能多集更妙，办法系寓兵于农，未识高见亦为然否？麟于八月底或九月初可到安徽，特此奉闻。顺请侠安。

小兄麟上言。^①

徐锡麟在汉口未作过多的逗留，旋即风尘仆仆返回绍兴。徐锡麟北上不久，儿子徐学文在7月就出世了。徐锡麟望着产后虚弱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心里既感到高兴又深感愧疚。

徐锡麟急于奔赴安庆，走上战斗岗位，以实现其打入官场，掌握军队，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但是，徐锡麟对大通学堂也极为关注，作为一个革命的基地，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徐锡麟准备将大通学堂领导乏力的问题解决后，再赴安庆。徐锡麟将自己的设想，非常隐晦地告知了陶成章。

□□仁棣同志侠览：

麟于十五日到绍（兴），尚平顺，本拟即赴安徽，现因绍郡学界、商界公留办警察三月，去留尚未决定。□□、□□两弟想必均好，□□已来绍城。……前奉诸函，想已收到。近来在日诸友身体安好否？念念。专此奉告。顺请侠安！麟上言。

当今之世，人心叵测，所谓人面兽心者颇多，凡交友不可

^① 《致某（十六）》，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轻信，至要！至要！麟当初之视天下人无一不可交，无一不可以诚感，于今思之，竟有出人意外之事，恩将仇报，此等人虽比之禽兽犹不若也。盖古今之成大事者，皆从道德耳。^①

大通学堂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徐锡麟想到了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秋瑾。秋瑾已是徐锡麟最信赖的革命战友，也是徐锡麟心目中最理想的大通学堂的领导人。于是，徐锡麟请在大通学堂任教习的王金发专程赴沪，邀请秋瑾到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的校务。秋瑾欣然接受徐锡麟的邀请。徐锡麟请秋瑾主持大通学堂的校务后，就放心地从杭州直奔安庆。

第四节 锡麟莅皖

自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同盟会不断派遣革命党人回国开展革命活动，长江中下游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清政府为了加强对长江中下游的控制，先后派恩铭出任安徽巡抚，端方出任两江总督，以镇压革命党人的活动。1906年4月，恩铭到任后，鉴于长江中下游的会党与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联合在一起，异常活跃，一边暗中派出侦探，四处查缉，一边加紧编练新军，设置巡警，强化地方封建统治机器。

徐锡麟抵安庆后，到抚署见了安徽巡抚恩铭，递上了俞廉三的介绍信。恩铭虽说与俞廉三有师生之谊，对徐锡麟也有好感，但毕竟不了解徐锡麟，仍怀有戒心，不肯轻易委以重任。

^① 《致某（十七）》，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徐锡麟希望能谋取安徽督练处总办的职位，以便掌握全省的军队，为发动武装起义作准备。徐锡麟将刚到安徽的设想告知了陶成章。

□□同志侠览：

麟在皖于军事有着手处，大约在参谋处当总办。该省军务中人颇觉接洽，日后必有生色，可以达到目的，此事勿为门外人道。即请侠安！

麟上言。^①

恩铭对徐锡麟考察了两个月，才委派徐锡麟出任安徽陆军小学堂会办，即副校长。安徽陆军小学堂位于安庆北门外南庄岭下，只招了一年级学生 133 人。学生年龄较小，也无枪械。但徐锡麟仍然认真对待，作为进入军界的一个阶梯。徐锡麟租赁了安庆小南门二廊巷查姓房屋，建起了“徐公馆”，雇用了五名轿夫，两名亲兵，两名家人，一名厨子，配置了整套的勤杂人员。为了取得恩铭的进一步信任，徐锡麟对学生的训练要求严格，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他都亲自上操训话。恩铭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徐锡麟大为赞赏，认为徐锡麟办事干练。徐锡麟很快获得“徐小道”之称，在安徽官场站稳了脚跟。徐锡麟接到陶成章写来的信后，又复信告知了任陆军小学堂会办的情况。

□□同志侠览：

兄于十一月初三日由抚台委札与藩台冯，会办陆军小学堂

^① 《致某（十八）》，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4 页。

(此事兄费心极多，足见办事之难与陆军部直接)。现在堂内学生一百三十三人(系第一年生)，明岁拟招二年生。兄现时往来多系在陆军上者，宜极力经营，然初入军队中，一切办事，亦当时时留意。来书云□□一节，恐防□□窥破，此实光明正大之词，兄前言不过为一时计耳，非正办之法，足见吾弟之心术，虽小节亦不苟，钦佩！钦佩！吾弟如有来信，必须谨慎。余容后告。即请学安！

兄麟上言。^①

徐锡麟虽然身在安徽，但仍念念不忘与北京保持密切联系，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想方设法为陶成章谋取陆军部的职务，以便掌握全国军队，实行中央革命。徐锡麟与陶成章信件往来不断，商量开展革命活动的计划。

□□仁棣同志侠览：

顷悉□□、□□，不胜欣幸！足征吾弟学问之有实际，办事之可靠。兄近来竭力与陆军中人联络，预备后来任事地步。陆军中有可为吾弟相当地位，即当飞电达报。……□□在京任教科也好，多一个朋友在中国任事，可少一分阻力。□□同志弟目下光景如何？兄常常记念，复思有吾弟为之运筹，可以无虑。□□兄现仍在学铁路否？念念。即询侠安！

小兄麟上言。^②

① 《致某(十九)》，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② 《致某(二十)》，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徐锡麟将近一个月未收到陶成章写来的信，非常想念在日本的各位同志。徐锡麟对陆军小学堂会办这个没有实权的差使也不满意。徐锡麟只好再次向俞廉三求助，俞廉三又给恩铭写信，称赞徐锡麟的才能，要恩铭加以重用。徐锡麟孤身一人在安徽开展革命活动，感到极为孤独和寂寞，很希望有同志跟他一起进行斗争。徐锡麟写信要马宗汉和陈伯平前来安庆，协助自己开展革命工作。徐锡麟也同样没有放松在北京的活动，以便为陶成章谋取在陆军部的职务。徐锡麟在信中，一一向陶成章作了说明。

□□同志弟侠览：

将及一月，不见手书，麟十分纪念！未知吾弟在东（京）如何情形？麟在皖无别事，不过日与军界中人联络耳。陆军学堂不过面子上事，其效缓，无甚实权。不久，麟或可到军队上作事，握全省军务，然勿对外人道也。去年底，陆军部派哈汉章、良弼二人来查军务，皖省大约正月底可到。马（宗汉）君、陈（伯平）君大约二月初由余姚动身来皖。吾弟位置，麟当斟酌，非在军队不敢告吾弟回国，况吾弟卒業不远耶！麟拟有把握时再告吾弟，然办事随时机会不同，亦不能拘执。大约麟之意见愈速愈妙，未识高见以为如何？在东（京）诸君现各如何？祈便中示及。此请旅安！

小兄麟上言。^①

^① 《致某（二十一）》，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徐锡麟因办事干练，又有俞廉三的大力推荐，很快取得恩铭的信任，出任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掌握了安徽省巡警和治安大权。安徽巡警学堂坐落在安庆城东北的百花亭，学堂总办由安徽按察使兼任。学生分为官生、兵生两班，官生100人，兵生200人，每期训练三个月。每个学生均配备九响毛瑟枪一支，有较优良的武器装备。

然而，徐锡麟在安徽飞黄腾达，而光复会的工作却未见起色，陶成章因此对徐锡麟产生了误解。“徐锡麟莅皖后，以见知于恩铭，迭获军警要差，方谓权势日重，大有可为，然转不能见谅于光复会各同志，盖陶成章、龚宝铨等以锡麟求进太速，疑为功名心重，宗旨不定，渐非议之，而成章反对尤力，锡麟不为少动，仍进行不辍。”^① 面对陶成章等人的误解，徐锡麟写信向陶成章作了解释。

□□同志弟大鉴：

接浙（江）绍（兴）所发之书，读悉。麟自去岁在横滨别后，而所抱之宗旨，千辛万苦，仆仆道途，终欲达其目的（在河南驻马店，行之半途，而钱已用完，一日不食者数次。此等苦况，麟自知之）。而前所心印之同志，刻刻在心，即间有不通信者，亦无时或忘，盖公义而兼私情也。吾弟为学问计，预备后来办事地步，麟极力赞成，盖建设之不可无人也。然麟则抱孤愤以往，终不变初志也，以“忍耐”二字与世相接。浙江军事现有竞雄回浙主持，麟可安心在皖经营矣。……麟或者于四五月间，来日本一次，亦未可知。相别一年，记念

^① 《光复会》，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1页。

甚深，渴欲一见，以抒积悃。即请学安！

小兄麟上言。^①

徐锡麟出任巡警学堂会办后，如鱼得水，准备将巡警学堂改造成安庆革命活动的基地。徐锡麟经常向学生宣传振兴民族、热爱祖国的思想，课余时间也常找学生谈话，分析国内外形势，启发学生的爱国感情和思想觉悟。徐锡麟也关心学生，经常变卖自己的衣服，接济经济困难的学生。徐锡麟的言行博得了学生的敬重和好感。

徐锡麟在安庆得到恩铭的迅速提拔和重用，又暗中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自然引起了各方的注意。而兼任安徽巡警学堂总办（校长）的臬司世善，对徐锡麟更是处处掣肘，百般刁难。世善突然得暴病身亡后，又有人怀疑是徐锡麟暗中放毒，欲加害徐锡麟。世善死后，徐锡麟想谋取臬司和巡警学堂总办的位置，终因清政府处处防备汉人，未能成功。恩铭后来提拔了原安庐滁和道毓秀出任臬司兼巡警处总办和巡警学堂总办，但是，毓秀并不到巡警学堂办公，实际上由会办徐锡麟主持工作。徐锡麟终于掌握了巡警学堂的实权，可是，对徐锡麟的诬陷和攻击并未因此而停止。他们继续散布日本学生多阴谋，恶语中伤徐锡麟。恩铭对徐锡麟也产生了怀疑，曾当面责问徐锡麟说，有人指控你是革命党人，请好自为之。徐锡麟则机智地回答，请大帅明鉴，闯过了险关。

徐锡麟进入官场后，进一步看清了官场的腐败，充斥毒心狡诈之人。徐锡麟也时时提醒自己要“谨慎敏捷”，以免遭人

^① 《致某（二十二）》，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毒手。徐锡麟高瞻远瞩，在日本没有轻易剪辮，便于回国开展工作，感到庆幸。徐锡麟还有意识地与抚署中两个负责镇压革命党人的候补道交“朋友”，从中及时掌握安徽官府镇压革命运动的动向，获知萍浏醴起义后，各地官府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徐锡麟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周旋于群魔之中，处境极为险恶。徐锡麟在官场中升迁很快，陶成章对徐锡麟的误解也越来越深。“伯荪入官颇得意，焕卿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及伯荪杀恩铭，始信之。”^①陶成章屡次来信劝说徐锡麟，“陶成章在日本亦数数相责备。”^②徐锡麟在致陶成章的长信中，再次作了解释。

□□仁弟同志侠览：

接书感触时事，百忧莫解。自问生平遇最苦之境地，值最难之际遇，而麟出以无形之运动，期曲折以达目的，其中忍耐坚苦备尝之矣，可为知己道也。麟自早至暮，无一念或忘，无一事不从此著想，纯然以诚心待人，但世途之险诈不可言状。麟一入官地，见毒心狡谋之人，不一而足，吾同志等终当以“谨慎敏捷”四字抵当之。吾弟此时未处办事之地，其中曲折，亦可随时忆度，切勿徇情作事，受人毒手。麟现时官场消息，处处灵通，见之作事，不得不谨慎一二。麟到日本不去辨发者，至今作事较易一层。凡事当观于后，未可计目前之成败

^① 《与陶冶公》，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89页。

^② 《徐锡麟墓表》，《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

可否，未知高明者以为然否？回忆在日时，与吾弟讨论办事，长予见识，今则相隔数千里，思之不觉闷闷。来书询萍乡之事，已烟消云散矣。而官场对于该党之人，尚觉紧要，无处不密查，无处不防备，而吾有好友二人系道班，当巡查该党之事，其中情形，麟知之深矣。不入官场，不谙此事。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不欺我也。□□先生现值如何境遇，祈代转知麟之无恙。□□兄不通消息已四月矣，现在何处？祈一查为托。诸同志在日好否？念念。余姚马子贻同志，祈即写信请其从速来皖，信内不必多言，到浙江会馆一问便知，然由上海动身，必须乘招商船，其余船上岸不便，信内要言明，免得临时不便。言不尽意。即复。询侠好！

麟上言。^①

然而，徐锡麟的解释，并未消除陶成章的疑虑。

徐锡麟办事深沉，行动谨慎。徐锡麟“居皖半年，对于光复会事务从未实行推广，会友之投皖相助者，亦只陈伯平、马宗汉2人，每值星期日虽常召集巡警学堂教员学生于讲堂为爱国之演说，然其意在灌输最新智识，以激荡思潮，而于种族之大义特隐隐流露于词气之间而已。校中生徒闻其纵谈时事，莫不奋发，然亦多莫明其宗旨之所在。盖锡麟办事与秋瑾不同，秋瑾性情豪迈，不畏人言，主持大通学校不过数月，而校中生徒及所联络之会党头目，皆令一律入光复会，故会务进步极速，而革命之风声大露，锡麟则条理细密，措施审慎，其初对于安庆军学界同志，以关系尚浅，既不敢与商机密，即在光

^① 《致某（二十三）》，徐乃锦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复会旧友，除在浙之秋瑾等数人外，亦鲜与联络，及改任巡警处会办及巡警学堂堂长，恩铭且为之奏请加二品衔，始渐着手于实行工作。”徐锡麟循序渐进，机不外露，“以同志陶成章等之见疑，益滋戒惧”^①。徐锡麟在安徽官场飞黄腾达，而光复会的会务却没有任何发展，陶成章等人怀疑徐锡麟留恋功名，革命意志衰退。

第五节 撰写徐传

徐锡麟刚到安徽时，举步维艰。“是时皖省尚无光复会之组织，军学界中赞成革命者，寥寥可数。独芜湖有安徽公学，始制于甲辰年冬，刘光汉、陶成章、龚宝铨、张通典、段昭、柏文蔚、陈由己诸人先后讲学其间，提倡民族主义，不遗余力，皖人之倾向革命，实以该校为最早，锡麟莅皖时，张通典方任芜湖中学监督，皖中党员咸借该校为活动机关，以故锡麟在安庆进行诸事亦大得其力，又有湘人张伯寅者，世居安庆，与锡麟为莫逆交，有大宅在城内，锡麟每次开会，常假张宅为会场，皖省同志如兵备处提调胡维栋、马营排长常恒芳、督练公所学员龚镇鹏、兵弁孙希武诸人，皆与往还。”^②徐锡麟逐渐在安徽的军界打开局面，暗中发展了一批革命力量。

徐锡麟筹备安庆起义，也是光复会五省起义的计划之一。

^① 《光复会》，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2页。

^② 《光复会》，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2页。

“徐之枪毙恩铭也，公初与其谋。”^① 陶成章在芜湖也参与了安庆起义的筹划，但他没有想到安庆起义比预期的还快。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被残暴的清吏剖腹挖心，惨杀在安徽巡抚署东辕门外。陈伯平牺牲，马宗汉遇难。

徐锡麟的壮举，使光复会声名远扬。“光复会比于同盟会，其名则隐，然安庆一击，震动全国。立懦夫之志，而启义军之心，则徐锡麟为之也。”^②

安庆起义发生时，陶成章刚离开安徽。“徐之刺恩铭，陶实与闻。事发，陶适离皖。警信传至，陶悲痛欲绝，三日不爽，初萌灰念，继忽击桌曰：‘大丈夫岂可如此耶！’”^③ 陶成章遽闻徐锡麟遇难噩耗，伤心裂肺，悲痛欲绝。然而，陶成章“不敢以此遽灭其志，且图为故人雪耻”^④。陶成章伏案挥毫，满怀深情地撰写了徐锡麟的传略，记录了徐锡麟短暂而悲壮的革命生涯。

徐锡麟传

徐锡麟，字伯荪，浙江山阴人。幼矫虔，器过手辄毁，父憎之。年十二，挺走钱塘为沙门，家人踪迹得之以归。读书慧，善算术，尤明天官，中夜常骑危视列宿，所图天象甚众，又自为浑天仪，径三尺，及所造学校地势图，然未尝从师受也。稍长习田农事，闻昆山多圯土，欲往开治，不果。庚子

① 《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3页。

②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章太炎全集》（第5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

③ 《陶成章被刺》，《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77页。

④ 《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3页。

夏，义和拳起于北方，锡麟在乡（锡麟所居村名东浦，离绍兴府城15里），谋办团练，为人所忌中止。辛丑九月，锡麟见举为绍兴府学校算学教师，知府熊起蟠敬重锡麟学问，招为门下，任之甚专，锡麟由是得发抒其才。寻转副监督，在校四年，弟子益亲如家人。

顷之，以观博览会赴日本大阪，乘便游东京，寓本乡龙冈町某旅馆。是时，正值俄约问题兴起，众学生自编义勇队，受日本政府干涉，改名军国民教育会。浙江学生因章炳麟言革命入狱事，开会于牛込区赤城元町清风亭，锡麟出资赞助其事。会所中遇陶成章、龚味荪，相谈颇洽。散会后，即携其徒张某访陶成章于驹込追分町浪花馆。成章导之于见松江钮永建（字铁生，前为义勇队代表人），相谈宇内大势，锡麟大悦。颠覆清政府之念，由此益专。遂购图书刀剑以归，归益尽力公事，与同志数人建蒙学于东浦，名曰热诚。又规建越郡公学，复设一书局，遍置各种书籍，号曰特别书局，欲以其所出书强售各学校，为人所挤，退副监督任。锡麟常置一短铳，行动与俱。俄人既逼辽东，锡麟闻之恸哭，画俄人为的，自注丸射之，一日辄试铳数十次，遭弹丸反射直径汰肩上，颜色不变，试之愈勤，其后持铳有不发，发即因指而倒。

锡麟始慕勾践、项梁，欲保聚绍兴，且以观变。甲辰冬，以事过上海，寓于五马路周昌记，因至虹口爱国女学校访蔡元培，成章亦在焉。时元培与皖、宁各志士组织一秘密会，名曰光复，邀锡麟入会，从之。成章因尽以已所经营者告之锡麟。锡麟归绍兴，始以兵法部勒其子弟矣。明年正月，与弟子数人游行诸暨、嵊县、义乌、东阳四县，自东阳至缙云，昼行百里，夜止丛社，几及二月，多交其地奇才力士。归语人曰：

“游历数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

初绍兴城中有大善寺，天主教会欲得之，因勾诸无赖胁沙门署质剂为赁于教会者。绍兴名族士大夫皆怒，弗敢言。锡麟方病瘡，裹絮被，直走登坛，宣说抵拒状，众欢踊，卒毁券，教会谋益衰。

锡麟念士气孱弱，倡体育会，月聚诸校弟子数百人，习手臂注射，遂与成章、味荪建立大通师范学校，招诸府材士以实之。设体操专修科，朝夕讲武，每训练必以身先之，素短小，习一岁，筋力自信能日行二百里。从成章计，欲以术倾清政府。富人许仲卿捐金前后五万版以与之，入资，得道员。遂以余姚马宗汉等十三人诣日本，因通商局长石井菊次郎求入联队，不许。欲入振武学校，以短视不及格，居数月归国。是时，炳麟系上海狱三岁，罚作限且尽，或言虏欲行贿狱卒毒杀之，上海大哗。锡麟为之奔走调护，设百计以谋出之，不得。复东抵日本，与成章及弟子陈伯平等图入陆军经理学校，又不成。嘱其友某学造纸币曰：“军兴餉匱，势将钞略，钞略则病民，亦自败，洪秀全事可鉴也。今计莫如散军用票，事成以次收之。然军用票易作伪，宜习其雕文织缕，令难作易辨，子勉学之。”议既成，以伯平、宗汉归。

乡人复请任巡徽事，许之。旋与曹钦熙赴宛平，出山海关，遍走辽东、吉林诸部，至辄览其山川形势，见大盗冯麟阁，与语甚悦。是岁，淮安徐海大侵，锡麟以道员赴安徽试用。锡麟初得道员时，欲藉权倾虏廷，诸达官无所不游说，自袁世凯、张之洞及浙江巡抚张曾敳、故湖南巡抚俞廉三，皆中其说，为通关节书。镇浙将军满人寿山，亦受锡麟倭刀为其用，到安徽岁暮即主陆军小学，逾年移主巡警学校。日中戎服

自督课，幕即置酒请诸军将士，又卖衣服给弹丸，诸生益尊重锡麟，虽军士亦多附者矣。安徽巡抚恩铭为锡麟能，奏请加二品衔，然闻人言，日本学生多隐谋，稍忌之。锡麟内不自安。会浙东义师将起，势将牵及大通学校，秋瑾命伯平赴安庆告锡麟，锡麟知事已露，势难复掩，急与诸练军结，欲仓卒取安徽大吏，令军心乱，乃举事。初图五月二十八日巡警生卒業，集大吏临视，尽掩杀之，恩铭欲速招其校执事，乃谕令易期，以二十六日临视。时锡麟援结未固，顾已不可奈何，乃密与伯平、宗汉为备。及期鼓吹作，诸大吏皆诣校凝立，巡抚前即位，三司诸吏以次侍，锡麟持短铳遽击恩铭，数发皆中要害。左右與之走。锡麟令门者闭门，门者仓遽不及闭，故恩铭與及三司皆得夺门走，即闭城门拒外兵，诸军至，不得入，乃发兵捕锡麟。锡麟知事败，怒门者，击杀之。因传呼巡警生百余人，率之以破军械局，据之，发铳弹丸尽，发炮机关绝，伯平死，锡麟即登屋走，追者至，被擒。

恩铭已死，三司问锡麟状曰：“受孙文教令耶？”锡麟曰：“我自为汉种，问罪满洲，孙文何等鰥生，能令我哉！”五月二十七日虜杀山阴徐锡麟于安庆市，剖其心以祭恩铭。而浙江虜官亦捕杀秋瑾。大通学校遂破坏。锡麟之死，年三十有五。

锡麟性情精悍，凡所行事，咸操极端主义，故动与人忤，然性慈爱人。居郡城时，尝步至龙山，见一老姬方自缢，遽抱持救之，问其故，曰：“负人债。”即为代偿，得不死。又常与成章赴武陵，日暮宿郭门外，闲步滩上，见一童投水，急拯之。问其故，知系某店学徒，道行遗失店主银钞，即护送至店，为代付银钞如所失，嘱店主勿加虐其徒，不告姓名而去。锡麟尝应科举，中癸卯乡试副贡。

陶成章称赞：“余与徐锡麟缔交者4年，共事者2载，遂得洞悉其性情。锡麟勇悍仁强之德，洽于项王，其行事亦颇类之，功业不遂，非战之罪，时为之也。”^①成也英雄，败也英雄，徐锡麟无愧于时代的杰出英雄人物。

皖浙起义失败后，“鹤唳风声，酿成绝大破坏，公（指陶成章——引者注）数年来之所经营，从此涣散。嗟乎！公心伤矣，忧愤成疾。至翌年夏，始愈。”^②陶成章为战友出师未捷身先死而振腕感叹，也为光复会的革命运动受到严重挫折而痛心疾首。

第六节 流亡海外

皖浙起义是光复会五省大起义的一部分，而陶成章自然在劫难逃。“釀成皖浙案之原动力者，其人有三：曰敖嘉熊，曰魏兰，曰陶成章。三人中，则又以成章为转运之机枢。”^③特别是陶成章曾与徐锡麟“相偕出洋，期入日本联队，肄力陆军，以偿素志，因考验体格不合，徐公归国，公仍留东（京）”。现在“徐公刺恩铭起义于皖”，陶成章“以曾与徐公偕同出洋，遂被株连”^④。

徐锡麟被害后，清吏搜查了徐锡麟的住处，查出数枚炸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页。

② 《陶焕卿》，《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7页。

③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④ 章乃穀、鞠僧甫：《民国浙军参谋陶公焕卿传》，《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2页。

弹，一枚革命军大元帅印以及准备起义胜利后发布的光复会军政府告示。“又从锡麟箱书检出书信数件，而以沈钧业及其弟伟函件为最多。”徐锡麟与弟弟徐伟两人关系本不融洽，可是徐伟见兄长出任道员，官运亨通，才经常与徐锡麟通信。“然信内所言，实非革命事宜，不过含语暧昧，不曾明晓，遂为清吏所疑及之耳。”^①时徐伟准备来安庆见徐锡麟，尔后前往湖北请俞廉三向端方推荐，以谋取一官半职。徐伟的船经过大通时，得知徐锡麟刺杀恩铭已遇难的消息。徐伟的船经过安庆也不敢上岸，后在九江被捕。

徐伟原来对徐锡麟就有意见，现在官未谋上，反而受其牵连被捕，“伟深以此事恨其兄，乃更迁怒其嫂，供称其嫂王氏，与秋瑾同主张革命。伟既系锡麟弟，虽未与实谋，而其兄之行状，彼亦常得察出。因又供出锡麟同事人陶成章、龚味荪、陈志军、陈德谷及秋瑾，另又供出与锡麟有交之绅学界数十人。”^②徐伟招供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革命的所有情况，还供出了陶成章等革命党人。

徐伟供^③

锡麟于癸卯年同绍兴府学堂东文教习日本人名平贺深造到日本大阪赴博览会，才认识陶焕卿、龚味荪。回国后，即放言无忌。父亲屡次教训他不听，所以把他分出。因锡麟曾出继于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

^③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6页。

已故伯父为嗣也。

乙巳年，锡麟先办体育会合绍兴学堂，每月会操一次。锡麟又办大通师范学堂，陶焕卿、龚味荪同住大通学堂。沈钧业即馥生任教科。有会稽人陈子英出资开办，陈俶南也从中襄助。生员见其时时演习兵式体操，心窃危之。锡麟常开演说会，主张民权。那年夏间，生员因科举已停，游学日本，进政法大学。锡麟与陶焕卿、陈子英、龚味荪、陈俶南、陈墨峰即陈渊到日本，初想进联队，不得进去。后想进振武，因体格不合，又未得进去。才倡革命排满等邪说。陶焕卿曾习日本催眠术，作有《中国民族消长史》，在各书坊销售。与龚味荪、陈子英、陈俶南、陈墨峰并锡麟散布邪说，尽人皆知。生员因宗旨不合，屡劝锡麟不听。锡麟自日本回国后，曾到东三省一次，至其商谋何事，至光复会情形，生员实在不知，陶焕卿、龚味荪、陈子英、陈俶南四人谅无不知。此四人与锡麟交甚密，以革命为口头禅，按照革命拿办，明正典刑，决不冤枉。现在锡麟已诛，将来拿获陶焕卿等若供有生员同谋入会事情，愿甘伏法无怨。大嫂徐王氏，到日本后改名振汉，与女学生秋瑾为友。秋瑾屡次演说，以革命排满为宗旨，振汉遂为所愚，亦主革命。上年三月间，大嫂同锡麟回国，锡麟才以道员分发安徽，屡次致书生员，皆有中国腐败，急须整顿等语。生员屡次劝他切勿卤莽疏略，实因在此。在日本时，与沈馥生即沈钧业会过，他谈起接锡麟信，言锡麟在东三省亲见满汉不平，可以运动马贼应援等事。所以生员致锡麟信内，劝其与馥生通信，尤要留意等语。总以为空发狂论，竟不料作此乱臣贼子之事，牵累父母，万死不足蔽辜。生员委实无同谋知情等事。锡麟又有信云，“安徽军界学界无可整顿，想回浙江办学堂，可

以自由。”生员信内所称“浙皖办事，兄自酌定，生员不敢操末议’数语，即指军界学界而言，实未预知谋为叛乱等事。生员于今年五月十九日到神户，坐神户神奈川丸船，二十三日到上海，与卢钟嶷会遇，说接锡麟电即来皖，他想来安省图一警察事。生员本想往武昌见表伯俞廉三，托其于毕业后谋一效力地步，带有水晶图章等物，致送表伯。因便道安庆看望锡麟，才邀卢钟嶷到周昌记栈房同住，以便结伴到皖。因卢钟嶷无钱，生员帮他同写船票。二十七日坐新丰二号官船，上船时，即见新闻报内载安抚于二十六日看操被枪击伤，生员以为学生放枪误伤。船到大通停泊，听闻抚台被人谋害，凶手系道员姓徐，并说凶手已被拿获，正法。生员知道必是锡麟闹事，恐被连累，遂不敢到安庆。问卢钟嶷可上岸否？他说既到此，只可上岸往看友人。生员知道他无钱，遂借洋50元，备作回浙盘缠。生员遂改买汉口船票上行，路过九江，经警局查拿，解到安徽的。听说生员父母因锡麟事受累，如果蒙网开一面，生员愿以父母之罪加于生员之身，虽死不辞。至现获之马子畦，在日本见过几次。他到安庆先不知道，是到案后见面才晓得的。锡麟信内提及陈墨峰要到安徽，生员因墨峰素有多学名誉，故在锡麟信内提及的。墨峰本名渊，及生员到安徽，始知改名澄字伯平。女学生秋瑾，绍兴人，前在绍兴府演说，主张民权，不愿立宪，并与陶焕卿等时相来往，是晓得的。若现在绍兴起事，实不知情。今蒙严审，生员历次亲书供单，均照此供实。不知锡麟光复会名目，并没预闻谋为叛逆及知情不发情事，家中父母们也不晓得锡麟所做事情，求恩典。再陶焕卿、龚味荪、陈子英、陈俶南、沈钧业、陈墨峰等是锡麟革命同党，生员是知道的，将来拿获，可以对质。此外同学同乡是不

是革命党？不敢妄指，所供是实。

清吏将徐伟关入监狱，以便与革命党人对质。

清政府大肆拘捕革命党人，陶成章自然成了通令缉拿的要犯。“那时焕卿因徐锡麟秋瑾之案，被两江总督端方通缉，由是他革命党之名大著。”^① 两江总督端方在致军机处的电文中声称：“徐匪同党为陶焕卿、陈子英、龚味荪、陈俶南、沈钧业五人，素倡革命排满之议。”其中“沈钧业，字馥生，浙江山阴西郭门外张墅村人，年23岁，现在日本早稻田学校，暑假患病，寓牛込町东乡方家；陶焕卿名成章，会稽陶堰人，年约30岁，面瘦削，剪辮，习日本催眠术，著中国民族消长史；陈子英名志军，山阴东浦人，年20余岁，面瘦削，剪辮；龚味荪，嘉兴人，年20余岁，矮小，剪辮，现均在日本；陈俶南名德谷，山阴赏坊舜家楼人，年20余岁，面瘦削，身稍长。”^② 连各“匪党”的年龄、相貌、籍贯及住址也查证详实。

上海各报均以头条新闻，黑体大字刊载两江总督端方“严拿徐党陶焕卿”，并声称：“徐锡麟刺杀皖抚恩铭一案，曾由升抚冯煦讯出同党陶焕卿等五名，匿居各处活动起义。当时已经江督札飭沪道，严密查拿归案究办。兹因久未拿获，日前又奉电催，即由端观察并札县廨，一体从速访拿解究。”^③

不仅通都大邑通缉陶成章，穷乡僻壤也有缉拿令，只是指

① 陶冶公：《光复会的组织和发展》，《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页。

② 《徐锡麟安庆起义清方档案》，《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9页。

③ 陶永铭、陶侃：《徐、秋起义失败后陶成章家属之遭遇》，《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91年版，第21页。

名通缉的姓名及人数略有不同而已。其中北京被点名通缉的革命党人有陶成章、蔡元培、陈盛、龚味荪、童亦韩等8人；在长江中下游各省通缉的革命党人有陶成章、徐振汉、沈钧业、方世均、陈志军、陈德谷、龚味荪等7人；浙江巡抚张曾敳电告绍兴贵福缉拿陶成章、陈志军、陈德谷、龚宝铨、沈钧业、徐振汉等人；处州府特别缉拿者有陶成章、吕逢樵、赵宏甫三人；南京特电山东省查缉者为陶成章，南京特电上海查拿者有2人，即陶成章和龚味荪，南京致电各省查拿者有4人，即陶成章、张恭、王金发和竺绍康。东北移文各省查拿者为陶成章。所有革命党人的通缉令，陶成章均名列其中。陶成章被清政府视为罪魁祸首，必欲除之而后快。

徐锡麟遇难后，陶成章被迫再次流亡海外。周作人曾回忆陶成章流亡日本的窘迫处境，“余初见焕卿，在丙午夏，相遇上海，衣和服，草履左右异式，行马路上，见者疑为乞食沙门。丁未六月，徐案发，君走东京，相见于是乡寓楼，落拓之状，固如旧也。”^① 尽管陶成章“逃到东京后，同龚味荪住在小公寓里，穷得要命，衣服全是东洋瘪三的样子，可是意气还是一样，访问友朋总谈的是某处已经或可以‘动’，即是起事。”^② 陶成章并未因光复会皖浙起义的失利而气馁，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① 《怀陶君焕卿》，《周作人文类编·八十心情》（第10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页。

^② 《焕强盗与蒋二秃子》，《周作人文类编·八十心情》（第10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

第七节 撰写秋传

7月13日下午4时，清兵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被捕。7月15日凌晨，秋瑾戴着脚镣步行到轩亭口，从容就义，年仅33岁。

秋瑾遇难后，陶成章为了继承和发扬秋瑾的革命精神，撰写了《秋瑾传》，记述了秋瑾的革命业绩，特别是其组织浙江起义和英勇献身的过程。

秋瑾传

秋瑾，字璿卿，别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会稽人，隶籍山阴。幼随其父宦于闽，旋复随父入湘。年十八，嫁湘人王廷钧，廷钧入资为部郎，需次京师，瑾与之俱，生有子女。旋与廷钧定约，分家产，瑾得万金，即以之经商，所托非人，尽耗其资。又与廷钧不睦，同乡戚属陶大均、陈静斋等为之和解，不得，乃尽以其所有首饰，托大均妾荻意为变卖，集资东渡日本留学。值宁河王照以戊戌案自首，系刑部狱。瑾闻之，出所集得留学费送入狱，以济其急，并嘱使者勿以其名告之。逮照出狱，始悉其事。瑾之天性义侠常如此。

瑾东渡之时，为甲辰三月。既到东京，即入中国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会学习日语，因与某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瑾既与陈静斋有戚谊，故到东京后即与其子相识。是时，教嘉熊、魏兰、陶成章、龚味荪等在浙东西秘密运动有年。甲辰冬，成章以事东渡，成章与陈氏子为同学，瑾因之以识成章。日语讲习会终，瑾将还里省亲，因叩成章所运动事，成章尽以其所历告之。瑾乃索为介绍。成章以

其为女子，不便，然亦难竟拒之，遂为介绍同人机关二处，一函致上海光复会长蔡元培，一函致绍兴徐锡麟。瑾既返沪，即谒元培于爱国女学校，旋往南京欲运动资本家辛某之子汉无效，乃复归沪。由沪旋绍，见锡麟于热诚小学校。锡麟即介绍瑾入光复会，是为乙巳六月间事。

瑾之归也，本为筹学费计，既抵家，求给于母。母固深爱其女，然家徒拥虚名，实不中贲，为勉强筹数百金付之。瑾既得金，又至沪，会成章亦归上海，遂偕瑾见处州办事处丁嵎、吕熊祥等，瑾出绍兴同志公函，促成章归。已复东渡，罹疾数月，愈后入青山实践女学校。会锡麟、成章等在绍兴运动有得，皆先后来日本，锡麟携其妻王氏即名振汉者同来，瑾为之照拂一切。是时，取缔风潮规则起于学界，学生咸倡归国之议，瑾亦主张之，因结敢死队，瑾又为其指挥，纷扰者匝月。湖南陈天华蹈海死，瑾亦从此逝也。

瑾之再归也，成章复为介绍于教嘉熊，得转荐浔溪女学校教员，与女学生感情不洽，辞去。屡至上海。上海有中国公学者，本系取缔规则归国学生所倡设，瑾于此校助力甚多，由是瑾之信义，著于遐迩。会稽陈伯平本为大通学校学生，尝偕锡麟游日本，因与瑾识，志愿暗杀，瑾因荐为中国公学教员，居中联络。会锡麟需次安庆，赖其姻亲俞廉三力，甚得巡抚恩铭信任，为陆军学校会办，实与伯平、瑾遥为应援。初，平阳陈华偕其兄蔚留学东京，因识味荪。乙巳之岁，董鸿祯自爪哇函请秀水王嘉榘、仁和汤调鼎前往爪哇理学务，调鼎却不往，味荪因荐华，华得与嘉榘同赴爪哇。丙午夏，嘉榘、华先后返国，瑾之识华也亦由味荪介绍之。华劝瑾赴爪哇兴女学，瑾许之，以告成章、味荪，成章、味荪力止之勿行，乃止。瑾又倡

一女报于上海，既又与伯平等租屋虹口祥庆里，制炸药，忽爆发，伯平伤目，瑾伤手，是为丙午八月间事。是岁冬，萍乡革命军起，光复会会员集议上海，欲起兵为援，瑾与议焉。瑾以浙事自任，乃还绍兴，入居大通学校。大通学校为金、处、绍三府诸会党人荟萃之所。瑾既入居大通，与诸党人约，俟湘人起事后，即出为应援。谋既定，乃亲走内地，由诸暨道义乌至金华。至金华府城之日，为十二月十九日，寓于金阿狗家。未几，归绍兴。上海同议党人杨卓林等殉义于南京，胡瑛等被系于湖北，宁调元等见拘于湖南，接应之举，顿成瓦解。瑾闻益愤，乃始谋独立举事矣。

丁未正月，大通学校因办事乏人，公举瑾为督办。开学之日，郡守及山、会两县令皆莅堂致颂词，郡守贵福并赠瑾对联一，联曰“竞争世界，雄冠地球”。瑾于是益得畅所欲为。正、二月间，瑾屡往来杭、沪，运动军学两界，其方法不外藉会党之声气，以鼓舞军学界，复以军学界之名义，歆运会党，而以大通学校为其中枢。三月间，瑾又亲历金、处诸邑二次，既归，大通乃改约束，颁号令，分光复会职员为16级，以七绝诗一首为表记。诗曰：“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凡从黄字起，迄于使字，皆有表记。例如：黄字为首领，首领5人，即以推锡麟等。祸字为协领，无定员，瑾自居协领。源字为分统，以洪门首领任之。溯字为参谋，以洪门红旗等任之。浙字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职，各职员均以金指环为记，指环中文字即以已职衔之代名词籍入之。或以ABC等英文字母代之，其势力所及，上达处州之缙云，亘金华全府，而下及于绍兴之嵊县，金华府之金华、兰溪、武义、永康、浦江5县，实为其中心。是

月之末，风潮起于缙云、武义、永康之间，大通学校职员缙云赵卓复至武义一带运动，即公举本城绅士刘耀勋督办党军。

四月初，瑾复编制各洪门部下为8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8字为8军记号，因与诸同事定议，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应之，俟杭城清兵出攻金、处，即以绍兴义军渡江以袭杭城，军学界为内应。若攻杭城不拔，则返军绍兴，入金华，道处州，出江西，以通安庆。既谋而行，定期以五月二十六日，未几易为六月初十日，金华诸处仍为二十六日之期。五月初，绍兴党人裘文高遽召台州义军由东阳至嵊县，札营西乡，树革命军旗帜。二十一日武义党案发。二十三、四日金华党案又发。当风潮急时，瑾使伯平赴安庆告锡麟，锡麟知事急，乃于五月二十六日乘机杀恩铭，清廷震惊，大索党人，于是大通学校遂陷于四面楚歌之中。郡守贵福于二十七日进省面禀巡抚张曾敳，曾敳以问巨绅汤□□（寿潜），□□（寿潜）素恶瑾，力怂恿之，曾敳之意始决，乃遣贵福先返绍兴。五月晦，瑾始知安庆事，坐泣于室。六月朔，诸学生相议早日举事，先杀贵福，占领绍城，而后再图其余。瑾必欲待六月十日，遣学生二十余人往杭城分头埋伏，以为内应。六月三日晨，杭城武备学校学生以密书至，言清兵已发，速为定谋抵制。众学生又集议于堂，卒无成议，因之散去者复有数十人。初四日午前9时，王金发自嵊县来，与瑾商酌十日举事之约。午膳毕，从容而去。未几即有党军侦探队归报瑾，言清兵已来，瑾使再探，回报往东浦，瑾信以为然。已而清兵进城，众学生又集议，劝瑾出奔，瑾不答，学生散去者又数人。清兵既至学堂前，不敢遽进。是时学生之留者尚有十余人，于是有出后门而游泳以逸者，亦有出前门持军械以拒敌者，出清兵不意为学生击死者数人，伤者数人，学

生死者2人。瑾居内室，为清兵所执，同时被执者6人，曰程毅，曰徐颂扬，曰钱应仁，曰吕植松，曰王植槐，曰蒋继云。贵福使山阴令李钟岳讯瑾，瑾无一语。翌晨殉义于绍兴轩亭口。友人收其遗骸，葬之西湖，清吏恶之，将平之，恐激民变，乃阴嘱其兄桐出名，迁柩以还绍兴。己酉冬，其子自湖南来，迁瑾柩归湖南，盖将与其夫廷均合葬也，瑾死时年31。

陶成章由衷地赞叹：“秋瑾席诸党人已成之业，发挥其手腕，改弦而更张之，未及3月，而难作，竟以身殉。记曰：‘谋人之邦国，败则死之。’秋瑾有焉。”^①

陶成章还整理出版了秋瑾的遗稿，并寄往南洋各地。陶成章曾寄给李燮和“秋女士遗稿四十册（每册二角五分，外加邮费五分）”。送李燮和一册，另请李燮和代送王若愚、何震生、王文庆各一册，“余请代为寄售”^②。陶成章还将秋瑾的遗稿寄给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嘱送往欧洲各国图书馆。蔡元培除分送德国和比利时图书馆外，还请吴稚晖和章士钊送往伦敦和苏格兰图书馆。蔡元培为此专门致信吴稚晖：“前数月，陶君成章、龚君未生以所印《秋女士（瑾）遗诗》十册寄弟，嘱分送欧洲大藏书楼，弟已送数册于德、比之书楼也。寄奉二册，请于读毕时以其一送伦敦藏书楼，其一或就近寄行严，托其送苏格兰之藏书楼为幸。”^③ 陶成章以此表达对秋瑾的怀念。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页。

^② 《复李燮和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1页。

^③ 《致吴稚晖函》，《蔡元培书信集》（上），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第七章 风波乍起

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资产阶级革命联合团体，自成立伊始，就存在较严重的内部分歧。1907年初，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礼送”孙中山出境。孙中山没有在同盟会内部进行商议，就接受了日本政府以及日本股票商人的赠款。章太炎和陶成章认为孙中山应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不应该接受日本政府的“贿赂”，犹如“丧家之犬”。由此引起了同盟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并导致了第一次“倒孙风潮”。表面上看，事情是因经济问题引起，而其根源在于中国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与原光复会领导人章太炎和陶成章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所致。

第一节 经费风波

1907年初，同盟会内部围绕经费问题，在原兴中会领导人孙中山与原光复会领导人章太炎和陶成章之间产生了矛盾，并进而引发了第一次“倒孙风潮”。

萍浏醴起义被镇压后，湖南巡抚岑春萱、两江总督端方、江西巡抚吴重熹、湖广总督张之洞均纷纷上奏朝廷，声称起义

与孙中山有关。清政府指使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本政府转达了逮捕并引渡孙中山的要求。日本政府接受了中国驻日公使的要求，同意驱逐孙中山出境。

日本政府采取了两全其美的政策，一方面，向清政府表示同意驱逐孙中山出境，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希望继续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力争不得罪革命党人。于是，日本政府通过黑龙会首脑内田良平和日本志士宫崎寅藏等人转告孙中山，清政府要逮捕孙中山，日本政府考虑不抓，但孙中山必须迅速离开日本。否则，不能保证安全，并允诺三年后可以重返日本。

孙中山临行前，日本政府委托内田良平在赤坂区三河屋设宴饯别，章太炎、宋教仁、胡汉民、汪东、刘师培、宫崎寅藏、清藤七郎、和田三郎等人参加了宴会。“这次宴会是由日本外务省次官内田康哉出名请的，其原因是清政府秘密交涉，要日本驱逐中山先生出境，日本政府也不喜欢中山在那里搞革命，但对于政治犯是不能加于驱逐的，便劝中山先生暂时避到别处去。中山先生不得已应允了。这席酒等于暗中饯行，并传说，还送了3000块钱作旅费。中山先生便带同汉民、精卫一起到南洋各处展开活动去了。同盟会一部分人对此表示不满，甚至有人说这等于受贿，损失了同盟会的威信，要提议另推黄兴为领袖。”^①正是东京赤坂区红叶馆这次不起眼的宴会，引起了一些会员的怀疑和不满。

日本政府送给孙中山5000元，日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

^① 汪东：《同盟会和民报片断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也赠送旅费 10000 元。“孙总理受之，同人未喻其意，故颇不以为然。”^① 孙中山因经济拮据，急需现款发动南方武装起义，故接受了两笔赠款。由于孙中山没有来得及在同盟会本部讨论接受赠款问题，引起了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的误解和愤怒。

章太炎和陶成章只知道孙中山接受铃木久五郎的 10000 元赠款，并不知道孙中山也接受了日本政府的 5000 元赠款。“孙先生为顾念《民报》，所以从 10000 元中分出 2000 元来放在《民报》社。这件事给章太炎晓得，以为铃木送 10000 元要全交给《民报》，而孙先生过手只交出 2000 元，自己落用了 8000 元。”^② 章太炎要求孙中山将铃木久五郎的 10000 元赠款全部留给《民报》作为出版费，但孙中山只留下 2000 元，另有一说只留下 500 元。

3 月 4 日，孙中山偕胡汉民及日本人萱野长知等人离日南下。日本政府通知清政府应中方的要求，已驱逐孙中山出境。清政府不知底细，肆意吹嘘。孙中山体谅日本政府的难处，对于日本政府的款待，认为已经仁至义尽了。

然而，章太炎和陶成章对此却有另外的看法，“以孙君英美化之超国家观视之，当其被逐时，日本政府赠予之数千金，未尝不可视为对亡命客所给予之国际怜悯，然以太炎之国粹主义之自尊心视之，则深以孙君率留学生离去而不示威为憾，且认为孙君实不应密收金钱，如丧家狗之被逐。”^③ 章太炎和陶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 4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89 页。

^② 《胡汉民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冯自由：《革命逸史》（第 5 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91 页。

^③ 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6 页。

成章认为孙中山应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而不应该像丧家犬一样，灰溜溜地离去。

孙中山离日不久，同盟会内部因经费问题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赠款的事，首先被加入同盟会的日本人平山周、北一辉、和田三郎等人探知，并与中介人宫崎寅藏等人吵了起来。接着，章太炎、陶成章、张继、谭人凤、刘师培等人也获悉，认为孙中山接受了日本政府的“贿赂”，被日本政府所“收买”，有损同盟会的威信。

谭人凤认为“东京为全国志士萃荟之区，《民报》又为同志总机关，最重要之处所。中山身为总理，橐贮多金，仅以五百金予之，以后遂听其自生自灭。异哉！且丈夫重意气，日政府既无理干涉，堂堂总理，受此万金何为？厥后日人对我党，日存鄙夷之见，何莫非因此事启其轻侮之心耶？吁！可慨也矣。”^①

“说走就走，要他钱干什么？”张继对此也不满意。

章太炎和陶成章本来就对孙中山只给《民报》社仅留2000元不满，要求将铃木久五郎赠送的10000元全部留下，对其“私受”日本政府的“贿赂”更是怒不可遏。“章太炎以《民报》为世界，就大发其书呆式的牢骚，摸不着头脑的大闹大吵。他竟胆敢把挂在《民报》社的孙先生的照片撕下来，下面批下几个字，叫做：‘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②章太炎以为孙中山还在香港，将照片连同批语也寄往香港，以此羞辱孙中山。

^① 谭人凤：《石叻牌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② 《胡汉民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1页。

恰在此时，传来潮州、惠州起义失败的消息，无异于火上加油，反对孙中山的同盟会员越来越多。章太炎“与陶成章乘着潮惠起义失败，鼓动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白逾桓等主张召集大会，罢免中山先生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克强继任”^①。章太炎、陶成章等人要求代理庶务刘揆一召开同盟会本部大会，讨论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选举黄兴继任。

刘揆一却认为“孙总理受此款时，留给《民报》社维持费2000元，余悉供潮惠党军急需，诚非得已。又深知公（即黄兴）素以实行革命为务，绝不居此空虚总理之名，且方与孙总理共谋粤东首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故力排众议。”^②刘揆一考虑到孙中山接受赠款是为了筹备武装起义，此时革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可能使起义军陷入困境，因此，拒绝召开改选总理大会。

张继破口大骂，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人之命。”张继对刘揆一极为不满，甚至在《民报》社与刘揆一揪打起来。

刘揆一考虑到东京很多同盟会会员对孙中山意见很大，连忙写信给香港的彭邦栋，请其将实情转告黄兴，给予指示；并给冯自由和胡汉民写信，“引万方有罪罪在一人之比语，请劝孙总理向东京本部引咎。”刘揆一要求孙中山主动向东京同盟会本部承担经费问题的责任。

① 仇鳌：《辛亥革命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443页。

②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9页。

孙中山回信表示：“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① 孙中山断然予以拒绝。

孙中山表示可以辞去同盟会的总理一职，但前提是同盟会本部及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也承认错误。

黄兴复信声援孙中山：“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② 黄兴来函说服东京同盟会同人消除误会，以革命事业为重，继续拥护孙中山的领导，并拒绝出任总理。

尽管经费风波“幸同人调停解释，表面尚得曲全，惟同志之精神，则由此稍形涣散矣”^③。

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希望有充足的经费办好革命党人的喉舌《民报》，并非自私自利，用心良好，无可非议。但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对经费的来源产生误会，对孙中山也缺乏足够的了解，以至引起纷争。而孙中山作为同盟会的总理，缺乏民主作风，未能在同盟会本部就接受日本政府赠款问题进行讨论，而事后也未作耐心的解释和说服工作，未能及时化解双方的矛盾，以至于愈积愈深。

吴玉章对此作了中肯的评论：“《民报》正遭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经费不继，章太炎等人几乎有断炊之虞。他派陶成章到南洋去募捐，也无结果，因南洋华侨与兴中会关系较深，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9页。

②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9页。

③ 谭人凤：《石叟牌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而与光复会素少联系。因此，章大骂孙中山先生不支持他办《民报》。其实，孙中山先生这时到处搞武装起义都失败，也很困难。章的埋怨徒然暴露了同盟会内部派系之间的裂痕。看到这种情形，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既无过错，而章太炎也可以原谅，于是便极力设法弥补。”^① 吴玉章获悉《民报》的艰难处境后，立即在四川留日学生中进行募捐，将募捐得到的钱交与章太炎去维持生活。

平心而论，同盟会领导人在分歧面前，缺乏冷静和理智，未能正确化解内部矛盾。

第二节 明码事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经费问题尚未解决，又引发了“明码电报事件”。

事情是由加入同盟会的日本人萱野长知购买武器引起的。萱野长知是日本高知县人，自从1895年与孙中山订交后，就决心投身中国革命，成了孙中山最亲密的日本朋友，也是加入同盟会的8位日本朋友之一。1907年2月，孙中山委任萱野长知为革命军顾问，协助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许雪秋发动武装起义。萱野长知受孙中山委托在日本购买了大批武器，准备援助起义军。由于选择卸运港口困难，故迟迟无法运往广东。后因黄花岗起义未成，改在钦州白龙滩上岸，接济王和顺部队。运送枪械必须与起义日期一致，由于传达军机困难，故运往白

^①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48页。

龙滩的计划也被迫取消。

1907年6月17日，萱野长知再次奉孙中山之命，从香港租船返日购买武器。6月20日，萱野长知从长崎致电香港，告知购械租船已有眉目，要求汇来款项。负责筹运饷械和传递消息的冯自由立即通过香港正金银行电汇10000日元，萱野长知收到汇款后，购买了村田式快枪2000支，每支配发子弹600发，枪头刺刀、革囊等附属品也一应俱全，另外还有日本古刀50把，将校用军刀20把，短枪30支，各配子弹百发。枪械价钱昂贵，先预付了10000元定金，余款由山下汽船会社主人三上丰夷担保清偿。

正在购械紧张进行之时，章太炎在《民报》偶然听平山周和和田三郎说：“吾党所购枪械属明治18年式，陈旧不堪作战。”^①

章太炎不听则已，一听火冒三丈。章太炎对经费问题已是满肚子火，得知“孙先生派同志到日本买军火，他老先生当然要乘机报复了。当时孙先生所购的军火是村田式，章太炎就乱嚷乱吵地说道：‘孙某所购军火是村田式，这种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地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是不讲道理，我们要破坏他。’”^②许多东京同盟会会员站在章太炎一边，认为孙中山购买过时的旧式日本武器不妥，徒令革命党人白白牺牲性命。

陶成章在购械问题上也支持章太炎，批评“孙黄二公但

^① 《记章太炎与余订交始末》，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页。

^② 《胡汉民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1页。

求其多而价廉，认为械多可张大声势。”而陶成章与章太炎“均主张宁可少购，购必精良”。

时陶成章因病住在日比谷昌口医院，有人奉劝陶成章：“大家不要争夺领袖。”

陶成章闻言怒斥：“年轻人不要胡说。”

尽管章太炎和陶成章根本无意“争夺领袖”，但是，陶成章的“言词之中却嫌孙先生武断”^①。

章太炎、陶成章、宋教仁等人用《民报》社的名义，以明码电报形式，致电香港《中国日报》，指出“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并请负责联络购买武器事宜的冯自由转告孙中山。

冯自由将来电转告后，“总理以事属军事秘密，而太炎竟以明码出之，深为不怿。”^②

孙中山亲自指挥了钦廉起义，联络了地方抗捐的民团以及在清军任职的同盟会会员赵声和郭人漳，并派黄兴和王和顺归国领导。孙中山以为只要武器一到，就能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能够收复两广，出击长江，汇合南京和武昌的新军，形成势如破竹之势，取得革命的胜利。可是，王和顺攻占防城后，武器未能及时运到。

“不期东京本部之党员忽起风潮，而武器购买运输之计划，为之破坏，至时防城已破，而武器不来。”^③ 孙中山自觉失信于起义的同志和地方民团，极为恼火。

① 许轶民：《从陶成章先生被害说起》，《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油印本。

② 《记章太炎与余订交始末》，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页。

③ 《记章太炎与余订交始末》，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页。

孙中山认为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泄露军事秘密，破坏武装起义计划。胡汉民指责章太炎和宋教仁等人毫无军事知识，坚持迂谬之见，左右同盟会本部同志，违反党魁命令，破坏革命军的大计，并奉孙中山之命，致函同盟会本部，表示要执行革命党的纪律，予以处分。随后，孙中山又派林时爽等人回东京，向章太炎和宋教仁提出严重警告，禁止他们以后再干预军事问题。

9月13日，孙中山又致函宫崎寅藏，严厉谴责平山周、北一辉、和田三郎和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并全权委托宫崎寅藏负责在日本筹备军饷，购置武器事宜。孙中山告诫：“弟以后不复信任此数人，其关于日本之运动，当托足下全权办理。宜秘密行事，不特平山、北、和田数子不可使之闻知，即本部中人及《民报》社中人亦不必与之商议。专托足下一人力任其难，如有所商酌，可直接函电弟处。”^①

由于运械计划没有成功，孙中山将责任全部归结为章太炎、陶成章、宋教仁等人的破坏。

或许章太炎、宋教仁等人使用“明码电报”不够妥当，但责备孙中山购买过时武器，徒使革命党人作无谓的牺牲，因为他们不太了解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实际。冯自由曾批评：“章某这句话完全没有根据，因为当时满清的军队所用的枪械是老毛瑟，比之村田式来不见得高明，中日之战的时候，中国是用老毛瑟打败战，日本是用村田式打胜仗的。如果说当时买村田是送同志的性命，那么我记得在民元二年的时候各省军队还是买

^① 《致宫崎寅藏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3页。

村田式的，何以时间越后了反而不是送性命呢？可见得这完全是章太炎的无稽造谣蓄心破坏的恶毒了！”^① 冯自由指责章太炎和陶成章利用购买劣质武器问题，进行“打击报复”。

而孙中山指责章太炎、宋教仁等人泄露军事秘密，破坏武装起义，并将武器购买运输计划未成的责任，全部归结到章太炎、陶成章、宋教仁等东京同盟会本部党员身上，则言过其实。对此，冯自由也有较为客观的评论：“据此事经过而言，当时吾党虽有运械至白龙港之计划，但后经孙总理、王和顺、萱野长知及余等再三研究，以钦州党人无法与日本通电，自不能依时接卸船械，而香港与钦州经由河口辗转传递消息，亦必迁延时日，贻误戎机，遂废此策不用，而改从运械至惠州汕尾卸岸之议。是即丁未八月汕尾一役，党人许雪秋等接收而未得手之武器也。故平情论事，责太炎以不谙军事，冒昧发电则可，若加以泄露秘密破坏戎机等辞，则容有未当。盖太炎生平秉性戆直，稍有感触，辄一吐为快。顾以书生而好预兵事，则无心之失，自不可免。况此役运械至钦州海岸之原定计划早已抛弃，更不能为太炎咎也。”^② 而孙中山因此专任宫崎寅藏一人，抛开东京同盟会本部，抛开《民报》社，抛开多数同盟会会员，对章太炎、陶成章、宋教仁等党员不再信任，其做法有欠妥当。

从日本运送军械到中国大陆沿海接济起义军，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即使没有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的“明码电报”，运械

^① 《胡汉民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1页。

^② 《记章太炎与余订交始末》，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页。

也难于成功。而章太炎和陶成章在军械问题上“争论时坚持尤力，因与孙黄失和”^①。

尽管第一次“倒孙风潮”因黄兴拒绝出任同盟会总理而暂时平息，但双方的对立情绪并未因此而消除。孙中山自第一次“倒孙风潮”后，从此不大过问东京同盟会本部事宜。

第三节 孙陶分歧

陶成章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与孙中山存在分歧。

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就反对满族的民族压迫而言，双方意见一致。孙中山提出要“驱逐鞑虏”，因为“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②。陶成章也提出要“报我们兄弟家祖上的大仇，并现在种种暴虐我们的新仇；赶去了满洲鞑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③。资产阶级革命派就反对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建立汉族的一统天下，没有异议。

但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双方分歧较大。孙中山长期

① 许轶民：《从陶成章先生被害说起》，《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油印本。

②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③ 陶成章：《龙华会章程》，《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0页。

在海外从事反清革命，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较多的幻想，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孙中山制定了同盟会的对外政策：“一、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二、偿款外债照旧担认，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四、保护外国居留军政府占领之域内人民财产。五、所有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各国权利及与各国所借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六、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七、外人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争用之物品者，一概搜获没收。”^① 孙中山寄希望帝国主义列强赞成中国革命不过是痴心妄想而已。

陶成章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旗帜鲜明，明确表示“我们动手革命的时候，外国人不来帮扶满洲，我们一概客礼相待。兵力所到的地方，无论他是传教的，做商人的，来中国游历的，都要好好保护；或是不愿在我们交战的地方久居，我们就送他出境。等我们平定了满洲，立格外优待的条约，无论何国，都是利益均沾。若是有人帮助满洲，不要说是外国人，越是汉人的奸细，越要杀他尽绝，外国是不用说了。但我们所杀的，是和我们打仗的外国人，比如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生命财产，即使与某国失和，也万万不肯违背公理，杀戮无辜的。所以就是革命的时节，就立定了两个主意：满洲是我仇人，各国是我朋友，万万不会误会的。”^② 凡是支援中国革命的外国人，一律以礼相

^①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1页。

^② 陶成章：《龙华会章程》，《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39页。

待；凡是站在清政府一边，助纣为虐者，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一律严惩不贷。章太炎和陶成章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较深，但在不丧失原则的情况下，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争取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革命表示同情或提供某种形式的援助，减少革命道路上的阻力，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在民权主义问题上，孙中山谴责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政体，主张通过“政治革命”，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① 孙中山认为“民主立宪政体”最适宜中国。

陶成章对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持否定态度。立宪“外面看看像是照各国的样子，实在是把权柄集在皇帝同几个大官身上，却好借着‘宪法’二字，用出种种的苛法，来压制我们。无论各国立宪，是因为离着封建时代不远，一时不能到平民执政的时代，就把这‘立宪’做上下过渡的用法。我们已是平民做了皇帝宰相千百余年，那里还要用着‘立宪’过渡呢。况且立宪实在是有弊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将来天下各国，定归还要革命。况且我们又添着一个异种的政府，来替我们立宪，哪里立得好呢？所以我们今日就是同种人来立宪，还要再起革命。虽然，成功以后，或是因为万不得已，暂时设立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虽不定，然而不能传子

^①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传孙呢。或者用市民政体，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也未可知。然而必须看那时候我国国民程度了。但无论如何，皇位是永远不能霸占的，列位有大本领的出来，替大家办事，余外百姓也便万万不至于像今日的样子，苦的苦到万分，穷的穷到万分，他们做皇帝大官的，依旧快活到一万二千万分”^①。陶成章等人虽然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选举制度弊端百出，但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相对于封建专制统治，仍然较为进步。

在民生主义问题上，核心是土地问题。孙中山鉴于欧美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的现象，建议实行核定地价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民生主义问题。因此，孙中山提出：“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② 孙中山希望通过核定地价的办法，来解决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后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

陶成章则提出：“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资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呢。”^③

在革命策略上，双方也有较大的分歧。自兴中会创建伊

① 陶成章：《龙华会章程》，《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38页。

②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③ 陶成章：《龙华会章程》，《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0页。

始，孙中山就致力于发动会党和新军进行武装起义，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因此，光复会自始至终，从领导人陶成章起，深入各地，打进基层，实行武装革命，从不稍懈。而同盟会员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领导人居国外时间多，宣传也就多于力行。光复会对这点意见较深，两者分歧点在此。”^① 确实，同盟会不仅对武装起义的宣传多于行动，而且将武装起义的地点，长期局限于华南地区。

陶成章则主张发动武装起义，进行武装斗争，但在起义的地区上，与孙中山有分歧。“尤其在辛亥革命的前夕，光复会主张不要打河口、打广州——像黄花岗起义那样，不要在边疆起兵，主张‘中央革命’——就是在中央地区来一个革命。”^② 孙中山无论是在兴中会时期，还是同盟会时期，都将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清朝统治势力薄弱的边缘地区，主要是华南地区，集中在沿海一带，从1895年广州起义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孙中山亲自组织的十次起义全部在两广、云南，而其中六次又在广东。而光复会则将起义的重心集中在中部地区。陶成章向来主张实行“中央革命”，在内地开展斗争，致力于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为中心的武装起义。陶成章认为“现在我们的人，凡21行省内，及新疆、西藏、蒙古、满洲等地方都有的。然因中国的地方太大，所以不得不分头办事，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五省为一大部，然这五省的地面亦不是小的，所以又要分开来办理的，现在我们将这个五省的

① 沈颢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② 王仲萃：《太炎先生二三事》，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地方，分为十路，每省二路。第一，江苏省：江南路，江北路；第二，安徽省：皖南路，皖北路；第三，江西省，江左路，江右路；第四，浙江省：浙东路，浙西路；第五，福建省：八闽上路，八闽下路”^①。同盟会成立前，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大都以所在的地域作为武装起义的中心，如兴中会在华南地区，华兴会在湘赣地区，光复会在江浙皖赣闽地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在湖北地区。同盟会成立以后，形成了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长江流域的革命浪潮也风起云涌，而作为同盟会的领导人孙中山应集思广益，审时度势，跳出原先地域性的小圈子，从全国革命的高度来确定军事重心。毫无疑问，所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发起的武装起义，都推动了全国性的反清形势的发展。但是，很难肯定，究竟是孙中山的“华南中心论”正确，还是陶成章的“中央革命论”正确？从辛亥革命首义不是在华南的广州，而是在长江流域中部的武昌来看，不能不说孙中山拘泥于在华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没有商榷的余地。而中华民国得以最后成立，也要得益于光复会和中部同盟会光复东南地区。

第四节 主编民报

在革命宣传问题上，孙中山着重宣传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而光复会的领导人则着重宣传民族主义。革命党人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

^① 陶成章：《龙华会章程》，〔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

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章太炎和陶成章等光复会领导人以其深厚的国学基础，弘扬华夏民族的辉煌历史，明夷夏之辨，否定清王朝的合法统治。因此，革命党人内部形成“三民主义”及“一民主义”之说。这种分歧在革命党人的机关刊物《民报》的宣传上突出地表现出来。《民报》创办初期，着重宣传三民主义，自从章太炎和陶成章接办《民报》后，则着重宣传民族主义。

陶成章抵东京后，旋即出任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主编。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于1905年11月创办了机关报《民报》，先后担任《民报》编辑兼发行人的有张继、章炳麟、陶成章等人。革命派的《民报》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就革命与改良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

《民报》主编是“当时不用隐蔽身份而自愿以真姓名向日本政府登记的人出来担任名义罢了。张继、陶成章都是如此”^①。而《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大都是一些能文之士。《民报》创办初期，由张继任主编，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宋教仁等撰写了大量阐述三民主义的文章，其中胡汉民的《民报之六大主义》，无异于《民报》宣言。朱执信关于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的论述，同样是《民报》的重要文献之一。

《民报》从20期开始，因主编张继离开日本，前往南洋群岛，改由陶成章任主编。“本报编辑人张继君以要事已离东京，自二十期起，改请陶成章君当编辑之任。”^②《民报》第

^① 汪东：《同盟会和民报片断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② 《本社特别广告》，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6页。

18期就刊登了陶成章以笔名汉思撰写的《桑瀚遗征序》：“中原板荡，索虏人居，屠戮之余，继以焚坑，公私涂炭，文献荡然。三百年来，非无爱国博雅之士，着手眼于闲冷之地，求诗书于灰烬之中者，顾流传未广，津逮无从。迩来欧化东行，求学之士，往往士苴其朔，后生小子，于故书雅记，乃至百不窥一，何怪其民族思想之销沉哉！不揣浅陋，以见闻所及，荟萃丛残，汇而录之，随得随存，不复诠次。大雅君子，庶无几欤？”^① 陶成章发出征集明季遗文的倡议。

《民报》第19期，又登了《特别广告》，预告：“本社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不入空漠。海内外志士如有谙于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务祈据实直陈，发为篇章，寄交本社。又，宋季、明季杂史遗集，下及诗歌、小说之属，亦望惠借原书，或将原书抄录，寄交本社，以资采辑，汉族幸甚。”^② 《特别广告》重申了征集明朝及宋朝遗文的告示。

陶成章接任主编后，又以汉思来函，重申征集告示：“下走芜才末学，腹笥罄如，操笔构思，难于登天。差幸寒家稍有旧藏，前拟网罗遗佚为《桑瀚遗征》之辑，卧子文章可供采取者尚有数四，余若左萝石、侯忠烈、黄陶菴、夏存古、瞿文忠、路文贞、王晓闇、徐焱斋诸集，亦当葺其精华，以次写奉。自愧袜线微长，不敢高谈撰述，聊自厕于钞胥之列而已。此外倘有一得，即当奉正。能力所及，鞠躬尽瘁，不敢

^① 《桑瀚遗征序》，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6页。

^② 《本社特别广告》，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6页。

辞也。”^①

自从陶成章发出倡议后,《民报》开始连载《桑瀚遗征》,其中第18期辑有《钱谦益致瞿文忠公蜡丸书》、《陈鉴哭卧子陈公文》以及《刘均杨娥传》;第19期辑录《陈卧子报夏文忠公书》。陶成章主编《民报》后,继续连载《桑瀚遗征》,第20期辑录《陈卧子徐文靖公殉节书卷序》、《陈卧子袁烈妇传》、《陈卧子玄丝传》;第21期辑录《陈卧子皇明殉节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虞求徐公行状》;第23期辑录《夏存古大哀赋》。

陶成章主编的《民报》,大量刊登宋明史实,宣传民族主义,倡导以武力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民报》之所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以激动感情为事者,盖自陶氏编辑时始。”^②

鲁迅也是《民报》的忠实读者之一,晚年回忆说:“我爱看这《民报》”,尤其爱读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撰写的战斗檄文,感到“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③

尽管《民报》前期和后期宣传的着重点有所不同,但《民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宗旨却从来没有改变,《民报》所起的革命鼓动作用也没有因此而降低,许多留日学生转变了对革命的看法,革命思潮还随着《民报》传入国内,在新军的中下级军官中传阅,瓦解了清政府的统治支柱。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新军响应,迅速成功,《民报》功不可没。

① 《来函》,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2页。

② 曼华:《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3页。

③ 裘士雄:《陶成章与鲁迅》,《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61页。

第八章 南洋筹款

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因经费短缺，难以为继。而皖浙起义受挫后，光复会的元气大伤，大批光复会会员被逮捕入狱。为了维持《民报》正常出版发行，营救入狱的光复会会员，建立五省革命协会，筹备新的武装起义，陶成章踏上了曲折的南洋筹款之路。陶成章在新加坡和缅甸的华侨报纸撰文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尤其是在《光华日报》连载了《浙案纪略》，弘扬光复会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并以光复会的名义，向南洋华侨筹款。由于南洋经济恐慌，华侨大都不富有，光复会在南洋的影响也有限，加上没有得到孙中山的支持，陶成章的南洋筹款举步维艰，成效不太。

第一节 筹集款项

1908年，《民报》因经费问题陷于困境，连房租和印刷费都支付不起，主编章太炎有时只能靠啃几块麦饼充饥。章太炎也曾给南洋的孙中山拍过几封电报，写过几封信，吁请接济，然而，要么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要么以南洋经济困难，无法筹钱予以“搪塞”；有时又声称到时将带五六千元到东京

来，届时又不了了之。《民报》社前前后后加起来只收到孙中山寄来的300元左右。

章太炎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派陶成章赴南洋筹款。“初时成章先生游历南洋英荷各属地运动华侨，并募捐款接济国内起义，乃为同道者所忌，多方尼之。”^①孙中山闻讯后，予以劝阻，以南洋同志甚少，而且大都不是资本家，肯定不会有什么效果，不如在东京自筹经费。但章太炎和陶成章没有采纳孙中山的意见，陶成章化名唐继高，又名开泰，毅然“赴南洋群岛，筹划经济”^②。陶成章为了维持《民报》的继续出版和为筹备中的五省革命协会募捐，带着章太炎印制的《民报》股票数百张，踏上了艰难的南洋筹款之路。

陶成章从上海前往南洋，随行的还有陶成章的堂侄陶文波。陶文波16岁时，就由叔父陶成章介绍，入大通学堂学习，并加入了光复会，从此，跟随陶成章踏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清军围攻大通学堂时，陶文波从学堂后门逾墙潜回陶堰。绍兴知府贵福又派清兵百余人到陶堰搜捕“徐匪”余党，陶成章一家不得不避居皇甫庄。陶成章派人到陶堰，动员陶文波前往南洋。陶成章指出目前国内已不能立足，不如到南洋另外开辟革命基地。陶文波征得父母的同意后，毅然决定随陶成章去南洋。

陶成章与陶文波抵新加坡后，不仅身无分文，连携带的炒米也吃完了。陶成章带陶文波找到华侨总会投宿，并打听孙中

①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1页。

②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页。

山、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的行踪。华侨总会介绍陶成章到《中兴日报》社，并与孙中山见了面。陶文波也留在《中兴日报》任校对。

陶成章住在《中兴日报》社，参加了南洋革命党人对保皇派控制的报纸《南洋总汇新报》的论战。但南洋之行的主要目的是筹款，陶成章要求孙中山给经济窘迫的《民报》拨款3000元作为印刷费，并增加股款和维持费。孙中山“四处张罗，无法筹措，乃出其手表等物，嘱往变款，以救燃眉之急”，这与陶成章的要求相距甚远，因此两人曾“争执不休”。^①

陶成章还要求孙中山为即将筹建的五省革命协会“筹款5万元，回浙办事”。孙中山“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②。陶成章的筹款要求被孙中山断然拒绝。

陶成章极为失望，“时《中兴报》执事员陈威涛不以为然，尽将孙文内容告之先生。先生知孙文难与共事，遂决计独自经营”^③。陶成章只好自行筹款，然而，孙中山在南洋的影响较大，而光复会对于南洋华侨还比较陌生。陶成章不得不请孙中山介绍同志，分赴各地筹款。孙中山对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在东京掀起第一次“倒孙风潮”还记忆犹新，对陶成章不听劝阻执意要来南洋筹款更是怀有戒心。陶成章“欲游历南

① 郑螺生：《华侨革命之前因后果》，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② 《致王子匡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8页。

③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页。

洋各岛与华侨相商经济问题，请孙文作函介绍，孙文不许”^①。孙中山对于陶成章要求写介绍信的要求，起初并不答应，思忖良久，最后才勉强应允。

第二节 连载浙案

1908年11月，陶成章与陶文波来到缅甸的仰光，与缅甸的革命党人庄银安、傅春帆、徐赞周等人取得联系。先后来到缅甸的革命志士有“刀安仁、秦力山、张石泉、杨秋帆、居觉生、吕天民、胡汉民、黄克强、汪精卫、陶成章、吴应培等，先生（徐赞周——引者）咸倾衾雅接，置腹推心，共图义举。”^② 缅甸华侨以仰光为最多，大都是闽籍的漳州和泉州人。

缅甸同盟会的成立比南洋其他地区都迟，1908年3月，王群才从日本带着东京同盟会本部的委任书来到仰光，起初只有徐赞周、陈仲赫、陈守礼、张源、陈国章、沈继昌、林水都、王永和、林金源等10余人加入同盟会，并在仰光大贺胥园召开了成立大会，会址就设在益商学校。由于缅甸风气未开，保皇党人占优势地位，反对革命者甚众，缅甸同盟会成立3个月，仅发展会员37人。到秋季，才增至400余人。9月，“汪精卫先生为孙中山先生筹川资到仰，寻陶成章先生亦到，

^①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页。

^② 徐市隐：《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乃请汪、陶二先生改订同盟会章程。”^①汪精卫与陶成章改订了《同盟会缅甸分会章程》。11月20日，缅甸同盟会召开了选举干事大会，推举庄银安为正会长，卢喜福为副会长。缅甸同盟会派居正和陈仲赫赴缅甸各埠发展会员，共成立25处分会，指定各埠杰出党员为主盟人。

陶成章旋即出任缅甸《光华日报》记者，陶文波则任《光华日报》校对。1908年8月，缅甸同盟会的机关报《光华日报》正式出版，由庄银安任经理，陈仲赫任副经理，并电新加坡《中兴日报》，聘请滇人杨秋帆和鄂人居正任报馆主笔，报馆设在百尺路62号。自从《光华日报》出版后，“即大倡革命排满，尤抨击康梁不遗余力。”^②缅甸华侨的思想为之一新。陶成章抵缅甸时，“《光华报》股本2万盾，每日销行于本埠者约400份，人数足与出数相抵，无岌岌动摇之虑。”^③《光华日报》的经济状况与难乎为继的《中兴日报》不可同日而语。

陶成章参与了《光华日报》的编辑工作，“陶成章所著《浙案纪事》，即在是报登载。”^④陶成章为了不泄露光复会的机密，“所有革命党人之姓名，皆用甲乙丙丁等字以代之，盖恐清吏之注目也。”1910年，陶成章将《浙案纪略》增补，分

① 钝庵、敬撰：《徐赞周先生传》，《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② 《缅甸华侨与中国革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7页。

③ 《汪精卫函》，《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④ 《缅甸华侨与中国革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7页。

为三卷：“上卷纪事本末，凡四章，曰文字狱，曰党会原始，曰进取纪事，曰破坏纪事，并增补刘光汉内叛诸事；中卷列传，凡七篇；下卷附录，凡二集，曰革命文告，曰清吏案牍；又外纪一篇，曰《教会源流考》。凡关系诸人，为清吏所不知或知，而不甚注意者；又或本人已著名，清吏已注意而尚留寓内地者：本书仅录其姓，而名用□空之，以为隐晦，余则录其真姓名也。”^① 魏兰写了序言，介绍《浙案纪略》。后来，《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刊登了《浙案纪略》的出书广告，介绍“本案为近年间一大党案，然海内外记斯案诸书，强半违离事实，致使同胞莫由悉其始末。兹由斯案关系诸人将前后事实详加审谛，编成三卷。上卷纪事本末。中卷列传，计七篇：一、刘家福、濮振声、王金宝列传；二、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列传；三、秋瑾列传；四、刘耀勋、徐顺达、蒋篆飞列传；五、敖□□（嘉熊）列传；六、余孟庭列传；七、裘文高、大开列传。总计六万余言，言皆有物，洵足供有志者之研究云”^②。陶成章增补完《浙案纪略》，准备印刷时，革命党人“皆谓序述过详，事机毕露，反为进取之害，因将中卷列传及《教会源流考》先刻于日本，余稿悉藏于东京”^③。

陶成章的《浙案纪略》在《光华日报》连载和日本再版后，宣传了光复会在国内艰苦卓绝的革命业绩，介绍了徐锡麟和秋瑾组织皖浙起义和英勇献身的过程，使光复会在南洋华侨

① 魏兰：《浙案纪略序》，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9页。

② 《本社出书广告——〈浙案纪略〉》，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0页。

③ 魏兰：《浙案纪略序》，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9页。

中赢得了更多的支持，陶成章的名字为海外华人，特别是南洋华侨所熟悉，其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也为海外华人所钦佩。“时公在南洋爪哇等埠联络华侨，倡设报馆，鼓吹共和。人但知革命潮流澎湃于南洋群岛，而不知皆公之心血、之脑汁所流注也。”^① 特别是陶成章“因将其所著浙事，即记载浙江各同志革命事迹始末者，编《浙案纪略》一书，以一部分登之当地《光华日报》。自是而南洋各地无人不知陶成章久已声名卓著之人”^②。陶成章在南洋宣传光复会的革命光辉业绩，却遭到孙中山的“忌恨”。

第三节 缅甸筹款

陶成章在缅甸的筹款也不多，同盟会缅甸分会“以先后筹款维持党报之故，对于孙总理所需求不能多量协助。戊申十一月汪兆铭回星洲，庄银安等募款二千八百元以应之，同时陶成章亦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费名义筹饷，银安等亦助以千元。己酉（一九〇九年）孙总理以河口败军将士群集南洋，给养困难，思赴美洲募集巨资再图大举，特派胡汉民赴缅甸筹措旅费，银安等复筹金二千余元济之。此外协助辛亥三月二十九一役，及杨秋帆、居正、吕志伊、陈仲赫、黄克强、李雁南、郑坤诸同志来往滇粤车船各费，亦为数不赀”^③。

^① 章乃毅、鞠僧甫：《民国浙军参谋陶公焕卿传》，《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2页。

^②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1页。

^③ 《缅甸华侨与中国革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6页。

陶成章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及布置决行团名义进行筹款，并向捐款者颁发凭单。凭单正面盖有浙江同盟会分会印，背面印有浙江同盟会分会的章程——《信禾简章》，共有8条。^①

第一条 本光复会，由来已久，乙巳夏，由总会长蔡（元培）、湖南分会长黄（兴），从舆论众望，请孙中山先生为会长，开会日本东京，改名同盟会，而以本会附属之。但该时浙江内地，势力异常扩张，章程发布已久，更改为难，故内地暂从旧名。然重要事务员，均任同盟会职事，故又名浙江同盟会分会。本会前日办事一切费用，均由内地同志担任。近因事务扩张，费用不敷，故商之总会，遣人至海外，以求海外同志人等赞助焉。

第二条 本会办事所在地，虽以浙江为根基，而以江浙、皖、赣、闽诸省，皆有所布置。即于去岁徐（锡麟）烈士事可见一斑，故即以江浙、皖、赣、闽五省，为本会办事区域。

第三条 本会办事方法，分为三门，不便诸列于此，可询之代表人。

第四条 本会既为同盟会分会，故本章程订定后，移知东京总部及南洋支部。

第五条 诸义士所赞助之款，其偿还法，悉照同盟会总章。俟办有成效后四倍偿还。其所得款数，亦移知东京总会及星洲分会。

^① 徐市隐：《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第六条 劝助款项之人，以熟悉内地情形者充之，对于出款之人及总会有责任。

第七条 助款之人，不愿写真姓名者，听其自便。

第八条 听给凭单，盖印三颗，为其符号。

凭 单	今 有 收 到 义士赞助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费并布置决 行团一切费用金 元正 （注意）本会募款简章及一切偿还办法均有专 条详章程册本上伏希查照 为荷 天运 年 月 日 代表陶成章押 浙江同盟 会分会印
--	--

缅甸华侨对革命的资助很大。1908年3月至12月，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的开办费累计达700元。缅甸分会为《光华日报》的三次开办，耗费巨资。1908年7月，筹办《光华日报》时，首次达17000元，《光华日报》维持一年而停刊，开支累计20000余元。《光华日报》第二次复刊，一夜集资13000余元。《光华日报》第三次改版为《进化报》，前后维持8个月，又支会费5000余元。“屈指三次办报，统计开销5万余元。”^①缅甸华侨对革命党人的屡次筹款也竭力支持，1908年11月，汪精卫到仰光筹款，发给优先债票，首次在缅甸筹款2800元，

^① 徐市隐：《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

带往新加坡。缅甸还“开筹陶成章出爪哇款，1000元以上”^①。1909年春，孙中山因经费不足，再次派胡汉民到缅甸筹款2000元，仍发给汪精卫所定的优先债票。10月，同盟会员杨秋帆赴云南永昌府发动武装起义，筹款2000元，也发给优先债票。1910年5月，黄兴到缅甸筹款1000元，拟赴云南发动滇边起义。至于其他临时捐助，更是不计其数。“再查会员，未满2000，平均每人担负义务，不为不多矣。”^② 缅甸同盟会会员大都并不富裕，会员也不多，而捐助革命事业，却不遗余力。

第四节 槟榔受挫

1909年初，陶成章与陈威涛来到英属海峡殖民地，又名七洲府，包括新加坡、槟榔屿、吉隆坡、怡保、吡叻、坝罗等大小各埠，首府设于槟榔屿。

陶成章在槟榔屿因所筹款过少，怀疑孙中山暗中进行破坏。陶成章“由仰光至槟榔屿，偕陈威涛游英荷各属。时王致同在望引学堂，教授生徒，专以革命为宗旨，被清吏王广圻、汪凤翔、白萍洲探悉，迫令学董辞退。张云雷因介绍致同与先生同游各岛。未几，致同赴日本返温州。先生在英荷各属运动，孙文、胡汉民皆作函阻止之。”^③ 陶成章认为孙中山表

① 徐市隐：《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

② 徐市隐：《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

③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页。

面上对其筹款不便反对，却在暗中进行破坏。

马来西亚北部的佐治市，华侨称之为槟榔屿，又称庇能。陶成章在槟榔屿的筹款也受到当地同盟会员的阻挠。

槟榔屿同盟会会员提出：“按照同盟会章程规定，只有孙中山派来的人才能筹款。”

陶成章对此极为愤怒，据理与同盟会槟榔屿分会会长吴世荣力争，吴世荣不为所动，双方形成僵局。

经旅居吧城的老同盟会会员李天麟的调解，吴世荣才不得不同意陶成章在槟榔屿筹款，但吴世荣并不召开槟榔屿同盟会会员会议，只召集三四个会员赞助300元，予以搪塞。

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任职于《中兴日报》的老同盟会会员邓慕韩竟然尾随陶成章来到坝罗。陶成章刚来到坝罗时，受到当地同盟会会员的热烈欢迎，陶成章说明筹款的来意后，坝罗的老同盟会会员非常支持。

1909年1月23日，同盟会坝罗分会专门为陶成章筹款召开了大会，可是，同盟会坝罗分会会长汤伯令到会发表演讲时，竟然说：“《中兴日报》筹款的事重要，请诸位为《中兴日报》踊跃捐献。”对陶成章筹款的事只字不提。

坝罗的其他会员也倡议为《中兴日报》筹款。

汤伯令还声称：“陶成章君此次来坝罗，不过是来游历而已，并不是来筹款。”

坝罗同盟会会员均相信汤伯令的话，对陶成章的来意表示怀疑。

陶成章本来能在坝罗筹集至少千元，但只筹得300多元。

陶成章不得不到各地游说，多花路费，多费口舌。当地有些同盟会会员为陶成章的诚意所感动，同意再次为陶成章筹款

召集会议。

可是，由于陶成章筹款得不到当地同盟会分会的支持，阻力重重，收效甚微。陶成章在致李燮和的信中，认为这是孙中山在设置障碍，对孙中山很有怨言。“弟本不说中山坏事，盖犹为团体起见，不得不稍留余地，至是逼弟至无可奈何，不得不略陈一二而已。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真正苦恼万分。”^①陶成章在南洋的筹款，受到同盟会的阻挠，陶成章对此极为苦恼。

尽管英属海峡殖民地同盟会分会对陶成章筹款设置种种障碍，但他们却全力以赴地从经济上支持孙中山，成为孙中山在南洋从事革命活动的坚强后盾。据冯自由回忆：1910年“冬黄克强、赵声、孙德彰、胡汉民等同聚槟榔屿，谒总理商定广州大举策略，决议分途募款，以利进行。未几总理因在清风阁演说革命，为当地政府限令一星期离境，遂有美洲之行。其眷属仍居柑子园，每日家费由槟榔屿及吡叻、吉隆坡、芙蓉四处党员分任供给之。统计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英属七洲府各埠合筹军饷共47600余元。”^②可陶成章在英属海峡殖民地筹款却举步维艰。陶成章“知难与共事，决计尼之”^③。

第五节 泗水再挫

陶成章在槟榔屿遇到前来相邀陶成章回国发动武装起义的

① 《致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页。

②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③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1页。

王致同，因缺少经费，两人相约一起赴南洋各地筹集款项。“时适清帝载湉卒，王致同由爪哇星夜赴仰光，欲邀公（陶成章）回国发难。时公已离仰光矣，相遇于槟榔屿，密谋起事，以经费无着，遂与王致同遍历英荷各属筹款，到处演说，颇得华侨欢心，惜为同志中反对者所梗，无甚成效。”^①陶成章在荷属群岛的筹款，同样举步维艰。

1909年2月初，陶成章与王致同又辗转来到荷属殖民地群岛。荷兰殖民者为了便于管理，将各地划成不同的区域，任命华侨中的大资本家或地主为“马腰”，管辖一个或若干个区域。下设若干个“甲必丹”，实行分层统治，华侨未经允许，不得越出所居区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华侨备受殖民者的欺压，因此，他们渴望祖国独立富强，对革命大都表示同情和支持。

陶成章曾“遍游荷属群岛，大倡光复会，用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名义募款，不受同盟会本部节制。李柱中、曾连庆、王文庆、许雪秋、陈芸生等助之。泗水富商蒋报和、蒋报礼兄弟也入其会，故势力颇盛，駸駸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戊申河口革命军起事，汪兆铭、邓子瑜奉总理命往荷属筹饷，至文岛时，大受光复会会员反对，无功而返。庚戌冬，黄克强至南洋筹募广州起义军资，力劝李柱中、陈方度等捐除意见，合力筹款。陈、李从之，且愿赴粤参加义举。是役曾派谢良牧、黄甲元、古亮初、伍连忠、梁纽若、刘芷芬、曾伯谔、姚雨平、吴伟康、温庆武等分头募集。结果于辛亥三月广州一

^① 《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7页。

役以前得款3万余元，而同盟会已涣散之势为之一振”^①。陶成章在荷属群岛筹款得到李燮和和魏兰等光复会员的大力支持，但由于孙中山的阻挠，并没有像冯自由所说的那样顺利。

2月5日，陶成章来到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会泗水，即苏腊巴亚。陶成章到泗水筹款，也是阻力重重，到达后一周，“一切事情，均未易着手，奈何！”^②陶成章感到束手无策。

由于缺乏资金，陶成章想做的许多事都无法进行。陶成章在荷属群岛的筹款，与英属各埠一样，很不顺利。陶成章在给李燮和的信中抱怨：“弟自去岁南来，迄今已历九月，所希望之目的，全然未达。”已筹款项“不足三千元，且多未寄出，暗杀暴动，两无可办。内地同志，均坐而待毙，牵连者竟及八府之多，肝脑涂地，徒死无益，曷胜悼哉！现欲往吻里洞，旋即来贵埠，一切仰仗斡旋，或者于文岛得集数千金，则事尚有可为。惟祈吾兄务为预先计划，使弟来时得有所措手足，则幸甚焉”^③。因资金短缺，无论是实行暗杀，还是发动武装起义，都无从谈起。特别是皖浙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肆意逮捕光复会会员，仅浙江受到此案牵连就涉及严州、衢州、处州、温州、台州、金华、宁波、绍兴等浙东八府，营救被捕入狱的光复会会员，也急需大量资金。陶成章计划先到印度尼西亚的吻里洞，再赴李燮和所在的榜甲，寄希望于在榜甲岛上的城市文岛能筹集更多资金。

①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② 《致李燮和信》，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0页。

③ 《致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页。

第六节 商议重组

陶成章到叻里洞后，原拟立即赴榜甲找李燮和。但临时接到魏兰的急函，要陶成章到谏义里去一趟。于是，陶成章又临时改往谏义里。

1906年4月，魏兰应董鸿祯的邀请，与妻子何莲卿、长子魏绍鹤、堂侄魏毓蕃、魏仲麟以及张伟文等人，前往南洋爪哇谏义里，出任中华学堂的总教习。

1907年，皖浙起义失败后，国内革命形势陷入低潮，大批光复会会员受到清政府的通缉，纷纷出走南洋，扩大了光复会在南洋的影响。

陶成章应魏兰“急函相招”，赶到谏义里与魏兰会晤，鉴于光复会在国内的革命活动受到严重挫折，光复会的主要成员来到南洋，有必要重设光复会的领导机构。于是，陶成章与魏兰商议重组光复会的有关事宜。

陶成章在谏义里只呆了一个星期，又急忙返回叻里洞，“因种种事故逗留，竟至两月有奇，诸事之贻误，实非浅鲜。”^①陶成章鉴于孙中山设置种种障碍阻挠筹款工作，又急于到榜甲岛与李燮和相见，共商重组光复会事宜，而将筹款的事放在其次。

李燮和，字柱中，湖南安化人。1906年，李燮和准备在长沙起义，再次失败。李燮和受到湖南巡抚的通缉，被迫离湘。李燮和“在沪遇见浙人陶成章，相与谈天下国事，十分

^① 《致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页。

投契”^①。陶成章与李燮和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两人成了莫逆之交。于是，陶成章“介绍燮和为会员，是为燮和入光复会之始”^②。李燮和原拟与陶成章一道赴浙皖等地联络会党，由于陶成章足疾未愈，行走不便，故未成行。

1907年2月，李燮和来到新加坡，时新加坡已设有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革命党人介绍李燮和赴爪哇三宝瓏任中华学校教员。9月，李燮和又应华侨曾连庆和李天麟的邀请，赴榜甲岛从事华侨教育。12月，李燮和报东京同盟会本部批准，在檳港中华会馆成立了同盟会分会。

陶成章在南洋的筹款，使“忌者益切，散布谣言，诬为保皇党，遣人暗杀，幸得李燮和等力为辩解，得免于难”^③。孙中山先是对陶成章的筹款设置重重阻力，继而“指控”陶成章是“保皇党”，最后发展到像对付革命敌人一样，要“暗杀”陶成章。

陶成章与李燮和“谈到同盟会党务、人事和经济上的许多问题，对孙中山极为不满”^④。陶成章与李燮和、沈钧业、王文庆等光复会会员再三商议，觉得非重组光复会不可。而李燮和“亦屡忿孙文以诈术待人，遂联络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在南洋办事人，罗列孙文罪状十二条，善后办法九条，并将孙文往来信札，交先生手，托其带至日本东京同盟会总会，不欲

① 李兴潇、李兴藻：《追忆先父李燮和》，2004年版，第8页。

② 李燮和：《光复军事略》，《近代史资料》（第5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③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1页。

④ 李兴潇、李兴藻：《追忆先父李燮和》，2004年版，第17页。

戴孙文为会长”^①。陶成章与李燮和决定“整顿会务，上书东京总部论孙文，请易黄兴为会长”^②。酿成了第二次“倒孙风潮”。

①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页。

② 李燮和：《光复军事略》，《近代史资料》（第5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

第九章 兄弟阅墙

陶成章认为南洋筹款受挫，是因为孙中山的阻挠。陶成章联合李燮和、柳聘农、沈钧业、陈方度、胡国梁、易本羲等南洋革命党人，以川、粤、湘、鄂、江、浙、闽等七省同盟会员的名义，向同盟会总部提交了《七省同志致同盟总会书》，揭露孙中山在南洋的部分“罪状”，共三种十二条，包括“残贼同志之罪状”五条，“蒙蔽同志之罪状”三条，“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四条，提出罢免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总理等九条善后办法。陶成章和章太炎的言行，遭到以黄兴为首的同盟会领导的抵制。陶成章和章太炎等人便以传单的形式，向南洋和美洲的华侨和华人报纸散发，公开了革命党人的内部分歧。黄兴和孙中山利用所掌握的同盟会报纸，组织系列文章进行反驳，革命党人内部的分歧愈演愈烈。以章太炎、陶成章为代表的光复会领导人和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是革命党人内部不同的政见分歧，双方属于政友而不是政敌。

第一节 猪仔事件

陶成章离开槟港返回日本时，李燮和担心陶成章“遭暗杀，并托人护送至新加坡”。而孙中山则“命汪精卫尾随先生而至东京，与同盟会书记黄兴联络”^①。汪精卫也奉孙中山之命，尾随陶成章来到日本。

陶成章到东京后，将联合李燮和、柳聘农、沈钧业、陈方度、胡国梁、易本羲等南洋革命党人，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粤、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七省同志致同盟总会书》的公函，上交同盟会东京总部，并声称仅为孙中山在南洋的“罪状”，尚未涉及孙中山在内地和日本的“罪状”，拟另外撰写。即谭人凤所述“爪哇八同志，指数十罪告同盟”^②。

公函首先阐述了上书的原因是因为“弟等南渡以来，虽均各个人对于各国人邮函通问，然实未曾通一公函于公众执事之前，职是之故，遂使南北两地情形隔膜，为奸利者因得肆无忌惮，而为所欲为，致南洋各埠均受莫大之影响，及今若不再行改图，后事将何堪设想，用是不揣冒昧，敬将各种情形布告于公众执事之前，祈我诸执事诸公审择而施行之也”^③。陶成章等赴南洋的革命党人尽管互相之间有信件往来，但从未向东

①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页。

② 谭人凤：《石叻牌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③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0页。

京同盟会总部递交过公函，致使“奸利者”乘虚而入，胡作非为。有鉴于此，南洋革命党人不得不上书总部，公布真相。

公函开明宗义地谴责孙中山，认为“孙文的人品，谅久已为诸执事及众同志所洞悉，此亦无庸赘言。今仅就其于团体上利害关系之处述之而已。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一则以为两广洪门尽属其支配，一则以为南洋各埠多有彼之机关，华侨推崇，巨款可集，天大梦想，如此而已。即弟等各人先后南渡之始，亦何尝不作是梦想。竟不料其南渡之后，情形全非。所谓孙文也者，在两广内地，固无一毫势力，即在于南洋各埠，亦仅得新加坡一隅，设一团体，彼时会员也不过三十余人。弟等既先后南来，于是为之开通风气，组立学堂，添设机关。嘉应之来自内地者，又复尽力经营，逐渐推广，各埠响应，遂以肇成今日之势力。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彼又借我留学生之革命党，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报馆，于是也逐渐有纪其事，称其名者。既得势，彼乃忘其所自始，不审己果有何等力量，而得此高尚之名誉，以负此莫大莫重之责任，遂以为众人尽愚而彼独智，众人尽拙而彼独巧，谎骗营私之念萌，而其毒其祸，遂遍及于南洋之各埠矣。其恶迹罪状，直所谓倾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而流恶无尽者也。”^① 公函仅将孙中山“最确切”，已经为同仁“所悉劣

^①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0页。

迹之最大者”，共三种十二条罪状，包括“残贼同志之罪状”五条，“蒙蔽同志之罪状”三条，“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四条，悉数公之于众。

陶成章等人在公函中提及的孙中山第一条“残贼同志之罪状”：“河口之事，彼在槟榔屿报销三十万，在星架坡则贬少为八万，盖因地制宜而说谎话，其后河口同志为法人所不容，均来新架坡。有何某者，镇南关之粮台也，既到新架坡，新架坡同志责之，谓孙先生既有八万军饷，何故退兵？何某愤甚，（盖并无此款也，其破河口事，彼等在河口本埠，自筹二万，（胡）汉民取去五千。）乃集河口、镇南、钦、廉出来旅居新架坡之同志，相约签名，发表此事（已二百余人签了姓名）。惠州同志（亦为孙文在惠州同事之人）曾直卿，恐碍于团体名誉，为反对党及官府所见笑（曾亦反对孙文之人），劝之而止。孙文闻之，乃嘱私人告之英官，目为在埠抢劫之强徒，凡八人，欲掩执之，幸有告者，乃始得免，而逃避香港（类此者尚多），其残贼同志之大罪一也。”^① 由于陶成章等人仅提及何某，未指出名字，今天已难于考证。至于曾直卿，似应为曾仪卿。曾捷夫与曾仪卿叔侄，是广东归善人。曾捷夫是三点会首领，1900年，曾助郑士良运动会党；曾仪卿也是三点会的骨干分子，在广东平海一带徒众甚多，1900年，兴中会发动三洲田起义，曾仪卿号召当地会党予以策应。1907年9月，许雪秋在惠州汕尾接受日轮幸运丸运送的军械失败，曾仪卿奉冯自由之命赴平海接应军械图谋再举，因幸运丸奉日本领

^①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1页。

事之命仓皇返日而不果。曾仪卿与许雪秋因此与孙中山产生隔阂，参加了陶成章在南洋组建的光复会。

陶成章等人在公函中提及的孙中山第二条“残贼同志之罪状”，关于参加边境武装起义的革命军人被驱逐出越南，押往南洋，孙中山置之不理。“河口、镇南退出之同志军士，法人不容，来至新架坡，身边无船费，落猪仔行，欲卖身作猪仔，新架坡之同志不忍，商之孙文，求其共同设法。孙文曰：‘听之可也，不必管他。’新架坡同志不忍，共公同集款，赎身而出，孙文则借此招呼同志之名目，向各埠筹款，名之曰善后事宜，其残贼同志之大罪二也。”^① 陶成章等人谈到参加华南起义失败的革命军人，流落南洋，卖为“猪仔”，属于误信谣言。

关于孙中山拒绝安置流亡南洋的参加华南武装起义人员，并加以迫害的谣言，除陶成章等人相信以外，在第二次“倒孙风潮”中支持孙中山的谭人凤也认为确有其事。谭人凤曾回忆：“越事败后，昔日赴义诸士逃窜南洋者，不下百余人，其素享田园而不能苦工，要求中山招待者，亦实出于万不得已。闻中山概拒绝之，且有招英捕干涉之一事，故而起抱公愤也。”因此，“在南洋方面者，尤极端反对中山，并指数其罪状，由陶成章、李燮和、柳某、陈某、胡某、易某等8人联名发表，并函请东京本部改选总理。”^② 尽管谭人凤曾与黄兴一起劝说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顾全大局，但也认为陶成章等人谴责孙中山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①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1页。

^② 谭人凤：《石叻牌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陶成章在游历英属和荷属南洋群岛时，正是革命军人刚移居南洋之时，听到许多有关革命军人在南洋的传闻，其中也有谣言，加上与孙中山原本就有隔阂，以致误信谣言，形成对孙中山漠视革命军人的困境而置之不理的不正确的看法。

第二节 残害事件

陶成章等人在公函中提及的孙中山“残害同志大罪”之三为：“广西参将梁秀清，为不忍于故帅苏元春之无辜受遣戍罪，起而为变，投身革（命）党，孙文亦常利用之，设法愚弄，梁大愤怒，亦欲表白其欺骗之罪状，犯孙文所忌。当梁至新架坡之时，孙文密嘱其党某某某欲毒之以灭口，事为某某某兄所知，密以告梁，使为自己留心，乃得不死（类此者尚多），此其一也。其残害同志之大罪三也。”^① 陶成章等人在公函中提及的梁秀春，确有其人，孙中山要“除掉”梁秀春，也确有其事。

孙中山在致张永福和陈楚南的信中，专门提及梁秀春的“劣迹”。梁秀春，原名梁兰泉，从河内遣送新加坡，孙中山指出此人“作恶多端，负义反噬，河内同志人人切齿”。并一一列举其昭彰的“恶迹”。其一为“纵勇殃民”，其二为“贪而多忌”。孙中山认为梁秀春“罪恶累累”，提请新加坡的革命党人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慎防梁秀春的破坏。孙中山指出“如清朝与星加坡政府交涉提解此人，不必助之。如同志之力

^①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1页。

能除此人，则大善；不能，亦须声其罪恶，使彼无立足地。又须密防其在星（加）坡如何作为，报告弟处，至以为望。”^①

陶成章等人在公函中提到的孙中山第四条“残贼同志之罪状”是要“暗害”东军都督许雪秋。“潮州志士许君雪秋，系资本家，倾心革命，以倾其家产，又复躬践力行，以组织内地革命家之团体，其才具如何，且不必论，而其人品实为不可多得。黄冈之事，尝受孙文三千之款，孙文对同志言，妄报七八万。许君以资费不足，自向暹罗筹款。孙文恶之，尽力诋毁，又畏许君之发其复也，当何□□寓许君家之时，乘隙使警官掩之，幸许、何外出，否则何为劫贼，许为窝家，一网打尽矣。其残贼同志之大罪四也。”^② 陶成章等人提及的孙中山要借新加坡殖民当局之手，进行暗害的许雪秋，曾与陶成章相交，关系密切，并加入了光复会。

至于陶成章等人在公函中提及孙中山的第五条“残贼同志之罪状”，特指陶成章赴南洋筹款，先是受到孙中山的百般阻挠，继而指控陶成章为“保皇党”，最后则欲置陶成章以死地。“自去岁八月以来，各埠同志均已悉其内容，大众以顾全名誉之故，不忍表白其罪，然积愤已久，防口等于防川，身受其毒者，不能默尔而息。孙文闻之，大为恚怒，凡反对彼一人者，尽诬之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意欲激怒极热心而不洞悉内情之同志，使之互相倾轧，以快其初愿。（此条即指陶君来南洋言。）又常言必先杀尽嘉应客及外江同志，然

^① 《致张永福陈楚楠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2页。

^②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2页。

后乃可革清政府之命，而各埠机关部同志，凡系有留学生在者，必设法驱逐之（此条即指驱逐□□□□□□言），以便彼之自行直与华侨直接以便其私。盖基业一定，先杀功臣，中国历代开国帝王之公例也，彼亦仿而行之耳。其残贼同志之大罪五也。”总而言之，“凡从河口、镇南、钦、廉、惠、潮败走来南之同志，咸言上他的当，无不欲得而甘心，而钦、廉诸人之对于黄兴，潮州诸人之对于许雪秋君，惠州之人之对于曾捷夫君，皆无有异词，足见公论之在人心也。虽曰众恶必察，然察之既久，夫固等于国人皆曰可杀之条矣。”^①

陶成章等人谈到的孙中山“残贼同志之罪状”，大都是在国内进行革命斗争，特别是在华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流落南洋，因经济问题，对孙中山有意见，而孙中山或“指责”他们为保皇党人，或“指控”为清政府的侦探，欲加以暗杀；或向南洋的殖民当局诬告为刑事犯，以借刀杀人。以上所述的事实，大部分属于“误信谣言所致，叙事中有某些失实之处”^②。

第三节 蒙蔽罪状

陶成章等人提及的孙中山“蒙蔽同志之罪状”，前二条“陈述的事实基本属实，孙中山也应负一定的领导责任”^③。

①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2页。

② 饶怀民：《李燮和与沪宁光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③ 饶怀民：《李燮和与沪宁光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陶成章等人揭露孙中山第一条“蒙蔽同志之罪状”：“《民报》名誉，为南洋各埠所顶礼，孙文之出名，亦即由此而来。今彼名既成立，复有《中兴报》之鼓吹，但《中兴报》不得目为南洋全体之机关，实系彼一人之机关而已，然使东京而有《民报》在也，是则加于《中兴报》及《中国日报》之上，南洋华侨人心势必有所分驰，是不得便其私图矣。故于去岁陶君《民报》收单寄交之后，彼既托言筹款困难，并不发布。至《中兴报》之股，集款至于再而至于三，极言本报大有关系，我同志不可不出力协助维持等之言，此去岁秋、冬二季之时之事也。今岁春间，闻《民报》社又派有同志前来筹款，迄今各埠不见有来使之足迹，此必又为精卫所愚弄，而中途返旆者矣。然而彼之心不仅欲使东京无《民报》也，又欲使南洋各埠，除《中国日报》及《中兴日报》之外，不使再见有中国之报章。何则？中国各报均零星载有内地革命之事，使华侨见之，知我革党非仅彼之一人专有矣。故于去年《中国公报》招股一事，常出全力谋破坏，而《中兴报》定例，凡上海各报不准剪角，盖深恐有他革命之事，误登入之，而为南洋华侨所见也。其蒙蔽同志之大罪一也。”^①孙中山离开日本之后，不再过问《民报》事宜，而支持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创办《中兴日报》，亲自参加了《中兴日报》与改良派的论战，并过问编辑、财务和招股事宜。《中兴日报》也一度取代了东京同盟会本部的机关报《民报》的主导地位。

南洋华侨针对陶成章等人的攻击，专门为《中兴日报》

^①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3页。

进行辩解。南洋华侨指出：“夫《中兴报》为有限公司，全是华侨资本，虽为开通民智起见，仍含营业性质，吾同人也有附股者，何硬指为孙君所办？试问《中兴报》之宗旨，果为何等？自负革命功首，而必踪其迹而破败之？”^① 南洋华侨认为陶成章等人“指责”《中兴日报》成为孙中山一人所控制的报纸，不符合事实。

陶成章等人在公函中揭发孙中山第二条“蒙蔽同志之罪状”为另立同盟会南洋支部：“日本东京为革命党产出之所，而同盟会之总机关设在东京，固南洋同志之所共知，当初彼亦尝假其名以为号召者也。自去岁创设南洋支部，凡各埠之事，咸归节制，而以汉民为支部长，移文各埠，言凡有来自东京或内地来有筹款并游历者，当由支部长之介绍函为凭，否则不准招待。及问他索介绍函，多不肯，或依违其词，又将我等所定直接总会各条件尽行削去，而易以支部等之名词。各函件中并无道及总会等字样，而我等原始倡办机关之人，职员单内尽削去实权。凡是行为，不过欲使其权归一人，以便其营私之念而已。其蒙蔽同志之大罪二也。”^②

1908年，华南边境武装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从河内移居新加坡，设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委任胡汉民为支部长，并另立了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16条。

孙中山在南洋创建同盟会南洋支部，实际了成了与东京同盟会总部平行的一个并立机构。孙中山自己也承认：“从新组

^① 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②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3页。

织团体，弟在南洋已有行之，是以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此陶（成章）所攻击之一端也。”孙中山也未用同盟会的名义组织华南地区的武装起义，“前、去两年，两广、云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部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①孙中山手定的《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也确实未提及与东京同盟会总部的隶属关系，甚至只字不提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孙中山抵美洲后，又创建了中华革命党，当他再次返回南洋时，又要求南洋支部一律改称中华革命党。作为同盟会的总理，未与东京同盟会总部商量，就另立组织，实际上是一种无组织的行为，自然引起陶成章等人的不满。

陶成章等人提及的孙中山“蒙蔽同志”的第三条罪状为：“安南同志，因河口之役，倾家助饷，至质其家产于银行，而河口之军，未见接济，固无论矣。役后又借弥补安南同志之名，向各埠筹款，或称尚缺五万，或称尚缺三万，或称尚缺二万，或称尚缺万余，其所以多寡不一之故，亦是因地制宜之道使然也（实则一万有余，五个店号）。究之筹款者自筹款，而倾家者自倾家，何尝有一毫之补助。缅想我东京同志，于去岁贼后受天诛之时，至质官费折于银行，以谋集款办事，遭穷迫至于莫可言。然闻彼孙文者，其在前岁于香港、上海汇利银行，贮款二十万（现尚存否，则不知矣），去岁其兄在九龙起造屋宇，用款不足，电至乃弟，旋电汇款项以往者，能不令人痛心疾首也哉（此种情形，不一而足）。去岁所筹之款，据弟

^① 《复张继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6页。

等所知者，为数甚巨，然已不知何往矣。其蒙蔽同志之大罪三也。”^①

公函中提到的越南同志和东京同志将官费质子抵押银行，借款支持孙中山发动华南边境武装起义，基本符合事实。

至于说到孙中山的兄长孙眉在“九龙造屋”也确有其事，据孙穗芳回忆：“那时，太祖母杨太夫人、祖母卢太夫人和伯祖父一家人已迁到九龙居住。伯祖父孙眉倾巨资赞助革命，破产之后，带着一家人回到了九龙。而祖父从事革命，得到的捐款都投入革命事业，自己的生活已经极为俭朴，无法给家里任何资助，一家人在九龙处于极端贫困之中。而祖父从来不对外张扬。”^② 至于谈到孙中山将所筹款项供其兄“造屋”，与事实出入较大。

南洋华侨曾就陶成章等人关于孙中山将筹来的款项资助孙眉在九龙建房一事进行了专门的调查，鉴于陶成章所说：“孙某借运动革命之名是捐钱到他家里去的，他家里已经发了大财了！”尽管“他这种无稽之谈，本来没有人会相信他的。不过南洋人很认真，就派人切实调查先生的家庭，先生九龙的家里只有母亲，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几个旧房子，此外别无所有！还有先生的哥哥，是自己修了草房子在那里耕种。假使先生为革命发了财，把钱寄到家里去的，为什么家里的房子家里的人还是这样蹙脚呢？南洋同志切实调查以后，就把实情宣布，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反证。南洋华侨对于先生的信仰更而坚确，毫

^①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4页。

^② 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无摇动之余地。”^① 孙眉破产后，在九龙盖了简单的房屋，与母亲杨夫人，孙中山的妻子卢慕贞及女儿住在一起。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也提及这次调查：“祖父的家人，他的母亲、他夫人和女儿生活极其艰辛，除了几间破旧的房子外，别无所有。而曾为推翻清封建王朝的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伯祖父孙眉仍是自己修缮草房，自己租地耕种。”^② 南洋华侨经过调查，发现不存在孙中山假公济私，汇款资助孙眉在九龙盖豪宅之事，便焚毁了陶成章和章太炎散发的传单。

孙眉与夏威夷政府的诉讼败诉，茂宜农场也因此而破产。孙眉到河内与孙中山商量善后事宜，但孙中山正筹划华南边境地区的军事行动，无力帮助孙眉。孙眉将檀香山的产业全部变卖后，只够支付与夏威夷政府诉讼的费用，孙眉租陈少白的九龙荒地，建房造屋，经营农场。由于孙眉曾到河内请孙中山帮助，后又在九龙建房居住，致使陶成章等人误以为得到孙中山的筹款接济。

孙中山的家境并不好，但孙中山和光复会的章太炎和陶成章缺乏应有的沟通，以至于产生许多误会，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的误会。

第四节 敛财事件

陶成章等人在公函中还提及四条孙中山“败坏全体名誉

^① 《胡汉民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6页。

^② 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之罪状”，有的专家认为“绝大多数内容属诬蔑不实之词”^①。实际上，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有些符合事实。

陶成章等人罗列的第一条孙中山“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为：“我东京同志向固同心一德，均自己不顾声望名誉，推尊崇之为党首者，夫岂有所私图，不过痴心妄想，求其能助成我辈之事而已。然而黔驴之技，又焉能久骗我东京之同志。自前岁以来，因既有人发议，倡言革除之论者矣。又以团体之名誉之攸关，而中止其事。彼乃不顾全体名誉，妄毁我全体同党之名誉，污蔑至于不可言状，彼乃自夸于人曰：‘我去岁谋发起潮惠钦廉之事（彼何尝有一点功劳），先数目固不名一钱，而临行之际，一日本资本家，送程仪一万元，日本政府送费四千元，我只留五百元于《民报》社为经费，而弟行后，东京同志查悉万四千元之事，谓我不均分之，而自饱于私囊，一时大为攻击，无所不至，比他等平时攻康、梁为尤甚。若在公等处之，不知若何气极也。我则处之宴然，以彼等排斥叫嚣，为研究心理学之资料耳。夫各为同志，则各有权利义务，乃不期东京一二同志（二十一行省皆有，何至一二人），分财则讲平等（不知所分何财），而义务则责我一人当之，办事也（所办何事），筹款也，惟我是问（岂敢，不破坏他人就是好了）。而我于自行筹款之外（一己私囊，诚然），又要筹款以顾各地之同志（所顾何人，不借他人所流之血，托名运动，已经好了，岂敢受赐），东京以许多人不能顾一《民报》（《民报》本为

^① 饶怀民：《李燮和与沪宁光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东京同志所组织，你原本无一点功劳，我辈革命党家都破了，何处得钱），我力稍不及顾（岂要你顾，不卖掉就好了），则为众谤之的矣’等言，其可恶有如此者，其破坏全体名誉之大罪一也（有孙文亲笔书信为证）。^① 陶成章等人主要提到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和日本资本家的赠款，损害了革命党人的声誉。而孙中山则抱怨自己责任重大，既要筹款准备华南边境的武装起义，又要汇款维持《民报》正常出版，还要受到东京同志的批评。

至于孙中山第二条“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为：“有新加坡资本家陈□□，自言愿出款二千元，以助革命党。孙文闻之而垂涎。但陈君与彼实无一点之关系，不便直接，乃运动潮州□□□君而告之曰：‘闻君与陈□□有交，彼欲出款二千，子其为我言之，若得款二八均分，我得一千六，你得四百可也。’□□遂为之言，令其以二千之款，自交孙文，□□君以君子待之，不言分利之事，而彼亦不予之也。其后□□君以其所办潮州之事，自往暹罗运动。孙文闻之，即致函暹罗，称其棍骗，事为□□所闻，大怒，乃返新加坡，索取前次之四百元（本不欲索取之），孙文答以无款，□□君欲聚其同党洪门兄弟往殴之，孙文不得已曰：‘余实无款，余妾有金镯一双在，请以予子。’□□君愈怒，孙文乃开一纸条，给与《中兴报》，将烈港同志黄甲元君助《中兴报》款项内，拨二百元以予之。嗣后遂尽诋□□君，二八之例，亦不止一处。夫先以不肯之心待人，而劝之以为不肖之行，事后乃复诬人以不肖之名，以为

^①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5页。

制人不敢反抗之具，其可恶有如此者，遂使人言藉藉，谓我革命党皆为骗钱而来。其败坏全体名誉之大罪二也。”^① 此条是关于孙中山通过潮州同志，向新加坡的华侨资本家劝募，因语焉不详，无法考证，似属“不实之词”。

陶成章等人提到的第三条孙中山“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为：“去年九月，孙文复发布南洋支部，其规条无一而非可恶之事。而其著者莫若会底金一条。其例凡人会者，须收会底金三元，而主盟人分给半元，介绍人分给半元，以分利之举诱人，遂致流食之徒，借此名义，以为各地棍骗之计，引坏人心，可恨莫甚。其破坏全体名誉之大罪三也。”^② 孙中山手批《中国同盟会分会章程》，即南洋支部章程中，规定凡加入同盟会南洋支部者，由主盟人发给盟书，缴书记注册，由书记汇交支部收存，并发给底号，收执为据。会员应缴纳会费，也有缴纳会底金的要求，孙中山在信中，多次提及各地会员缴来会底金一事。孙中山曾在致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会长庄银安的信中，提及“收到会底半额，银400盾及公费银200盾矣。闻贵处团体已达500人之数，循此进步，前途不可量也！”^③ 孙中山曾派胡汉民到缅甸筹款，曾与庄银安谈到会底金的问题。孙中山在回复庄银安的信中，谈到“来信云会底金不能改章，

①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5页。

②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5页。

③ 《复庄银安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1页。

此事可与汉民详商，通融办理就是”^①。孙中山组建南洋支部，要求会员缴纳会底金确有其事，由于南洋支部游离于东京同盟会以外，致使陶成章等人对其收取会底金产生看法。

陶成章等人揭露第四条孙中山“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为：“借内地革命军名目，行军债票，行之内地，流同志之血者，不知若干，犹可言也。而不期又有所谓保护票者，遍放南洋各埠，称其家之有无而高下其价，有多至数百金一张者，亦有少至五六元一张者，发卖之际，有八九折者，或六七折者，有五六折者，代派发行之人，亦有分润，此实三点三合之所不屑为不敢为，干犯他人之国际，欺骗同胞之资财，设一旦为外人所掩执，我革命全体之名誉，其不均为所污辱也几希矣。其败坏全体名誉之大罪四也。”^② 这里提及的孙中山以革命党人名义，发行军债票以及保护票，也确有其事。

第五节 善后九条

陶成章等人统计孙中山的“罪状三种十四项，皆为已现发露者也。若其未发露者，盖不知其又有若干也。至其关系稍轻者均不录入，盖实录不胜录也”^③。公函仅罗列孙中山在南洋已经暴露的主要罪状。

陶成章将公函上呈东京同盟会总部，希望“诸执事先生

^① 《复庄银安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5页。

^②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6页。

^③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6页。

洞明世故，熟悉人情，诚谓革（命）党首领腐败极点，至于如此，尚任其逍遥自在，享受尊名乎？况现今受其荼毒之各埠，虽已悉起反对，而将次开发之土生华侨，固未深知内情，弟辈旧日之所经营者，既尽其能力所及，均双手拱奉而送之于我大统领之前矣。（精卫并未自己经营一埠，实我等经营成功，招之前来，请其演说一二次，即攫资而去，如是而已。）目下不能不再辟新埠，（惟浙人不受其害，因其不通闻问也，然亦因其所在之地，风气最顽。近日新为着手经营之故也。）然恶莠不除，则嘉禾不长，若不先行开除孙文，则我辈机关办就，他即乘势侵入。土生同志不识内地情形，以为中国革命军尽系其一人之所为，孙文之大名已遍宇宙，熟闻固已久矣。比及乃时，拒之不能，不拒又不可，欲再收拾，其能得乎？若一开除了他，发表罪状，事必大有可为，无论将次开办者不至蒙害，即令既破败者，热心之人尚多，犹堪收效在桑隅也。”并“就以后办法，陈之于左，伏祈我东京同志审择而施行之。”^①陶成章提出“善后办法”九条：

（一）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布罪状，遍告海内外，慎毋沾沾于名誉之顾全，行妇人之仁，以小不忍而乱我大谋（且天下各国革命党非尽佳士，皆有败类，其要在能除之而已）。

（二）另订章程，发布南洋各机关所，令其直接东京总会，须用全体名义，或多数人名义行之，囑令南洋支部章程一概作废。

（三）由总会执事出名，令各埠将孙文所筹去之款，令其

^①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6页。

自行报告总部，加给凭单，以为收拾人心之具。

（四）公举办事二人，奉总会之命，往论南洋各埠，已灰心者则导之；将开通者，则鼓励之。来各机关所演说，亦为收拾人心之具。且破孙文之诡谋，使其无立足之地。

（五）再开《民报》机关，通信各埠，以系海外人望。

（六）兼于《民报》社内附设旬报，凡《中兴报》之所至，亦踪寻之而往，以为扩张势力之举，且以限止孙文谎骗之伎俩也。

（七）将内地近年间各内地革命事实编成一史，译作巫来由文，散布英荷各属，使华侨知我中国之革命党，大有人在，以生其鼓舞之心。

（八）创设巫文报馆于英属，此事弟等可担任。

（九）同志之在南洋者，各出全力以经营商业，以固久长之基础，此事亦弟等可以担任。

陶成章等人认为孙中山的所作所为违反了《中国同盟会总章》的原则，依据总章的规定，总理每四年改选一次，1909年8月，恰好是第一届总理任期已满之时。于是，陶成章等人提出开除孙中山总理的职务，将其罪状向海内外公布；南洋支部必须订立新的章程，直属东京同盟会总部领导；调查孙中山在南洋筹款的数目，由东京同盟会总部发给凭单；由总部派二人前往南洋各埠进行宣传，使孙中山的“诡谋”无法得逞；重新刊发《民报》，树立海外华侨革命的信心；在《民报》内附设旬报，发往《中兴日报》的订户；编撰革命党人的斗争简史，向南洋华侨宣传革命党人的辉煌历史；最后两条关于创建巫文报馆以及经营商业，陶成章表示愿意亲自负责。

陶成章等人表示“以上皆弟等之意也”。并特别提到“陶君遍历各属，一切事情，皆已洞达无遗”。并希望“诸执事先生向彼商之，也必能筹无遗策也。”还表示若“有所委劳，则弟等虽摩顶放踵，亦何敢辞劳”^①。陶成章愿意积极配合东京同盟会总部处理好“善后九条”。

但是，陶成章将公函送交黄兴后，黄兴并不赞成陶成章等人的意见，反而为孙中山辩护。而谭人凤、汪精卫等人，也与黄兴持一致意见。陶成章在致李燮和等人的信中，谈到黄兴等人的态度。“公函已交克强兄。惟彼一力袒护孙文，真不可解。精卫来东京已十余日，与克强同住。石屏在安南信孙文大言，亦为所迷。”黄兴“拟先复一公函于兄等。所谓公函，仍出于此四五人之手，不过为缓兵之计耳。弟拟日内往克强处，先行取归公函，而后再议他事”。陶成章还在信中特别提到汪精卫“为人狡猾异常，挟制克公，使其不发表此公函”^②。陶成章认为黄兴之所以“袒护”孙中山，是因为受到汪精卫的迷惑。

黄兴也没有将陶成章等人的公函向中国同盟会南洋各分会公布，而是搁置起来。陶成章在致李燮和的信中，对此表示不满，“公函交与克公而后，并不发布与各分会看，均留克公处。克公欲复一公函，此复函即由克公等数人拟之而发，其中即以克公及精卫二人所知者而为之辩难。克公之说，弟不敢以为非，而亦未敢竟断其为是。精卫之欺诈，弟固亲受之，即兄也何尝不亲受之乎？其言之无价值，已可想见一斑。然彼亦一

^①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7页。

^② 《致胡国梁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0页。

是非，此亦一是非。克公既欲复函，弟亦何能强止不发耶？克公欲弟附一函，弟亦允之。克公以为南洋之事，久远非所宜，意欲速就为是，皆与弟及兄等之意大相反。且以为不开除孙文，无妨于事。不知各埠感情已大坏，势已分崩瓦解，必然至于莫可收拾而后止。弟亦不愿与其裂，已函至相知诸友，早为设法防维之矣。”显然，黄兴不同意陶成章等人对孙中山的看法，也不同意开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认为对南洋的大局不利。黄兴同时表示对于孙中山“指控”陶成章是“保皇党”和清政府的“侦探”，是“莫须有”的，他也不相信。谭人凤也不相信陶成章是孙中山所指控的“保皇党”和清政府的“侦探”。陶成章也不作过多的辩解，只是希望李燮和将与陶成章在南洋开会的情况以及陶成章与南洋同盟会会员温庆武、蓝瑞元、黄甲元的通信，附在致黄兴的信中，就能证明陶成章并无叛变投敌之事。

黄兴、谭人凤和刘揆一一起到陶成章的寓所，讨论陶成章等人提交的公函一事，以调解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的矛盾，恰好陶成章有事外出，没有找到。第二天，陶成章前往黄兴的住处，两人为孙中山的南洋“罪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黄兴明确表示反对公布陶成章等人起草的公函，准备另外向南洋发表为孙中山辩护的公函。

陶成章在致李燮和等人的信中，详细地提及这次会见。“昨日克强、石屏、霖生三君来弟处，适弟外出，今日特走访之，与克公辩论中山之事多时。据克公意，先复一函于南方诸君（此函即由三、四人主之，弟不之阅，听之而已），且俟诸君之复函再议。其复函即辩论公函之事，系克公及精卫所知者申言之。克公之言，弟未敢妄议其是非，唯精卫之欺妄，弟已

亲受之矣。近日克公恐又在术中而不悟耳。前此公信尚留克公处，并未发布与各省人看。”^① 黄兴仍然为孙中山辩护，并重申另外向南洋发表为孙中山辩护的公函。

黄兴再次表示不相信孙中山指控陶成章是“保皇党”和清政府的“密探”，“中山指弟为保皇党及侦探事，克公不信，而石公更不信，以谓天下断无此理。”^② 黄兴和谭人凤等人表示对陶成章的革命气节深信不疑。

陶成章再次提出“兄能将前后两次开会情形，并其与各人之函件寄来为妙”^③。陶成章希望李燮和能提供证据，为自己洗刷孙中山强加的莫须有的“保皇党”和清政府“侦探”的嫌疑。

陶成章再次表示对黄兴“袒护”孙中山的强烈不满。“弟思时局如此，焦唇敝舌，屡与不道德之人苦辩，实在乏味之至，苦恼之极。弟意各处局面，可以收拾者则收拾之，不则弃之可也，何妨另开局面乎？前次之事，终算一场大晦气罢了。兄如以为然，弟当致函魏君，另立方面。”^④ 由于陶成章等人的公函没有得到东京同盟会总部黄兴等人的支持，陶成章心里极为难过。

陶成章不得不考虑单独将公函公开发表。陶成章“思筑室道旁，永不成功，不若由二三人出面发表之，从此分为两岐罢了。文岛亦可不必收拾，再造新者可矣”。陶成章认为“与

① 《致亦逵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5页。

② 《致亦逵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5页。

③ 《致亦逵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5页。

④ 《致亦逵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5页。

中山已不两立，看来非自己发表不行矣”^①。于是，支持陶成章的陈威涛在爪哇谏义里魏兰处将《孙文罪状》印刷百余张，“邮寄出中外各报馆登之”^②。将革命党人内部的分歧公开。

陶成章向黄兴取回公函，被黄兴拒绝。相反，黄兴的来信，却一再为孙中山辩护。陶成章在致胡国梁和李燮和的信中，再次对黄兴的态度表示强烈的不满。“昨日去索回公函，由弟表白。今得克强来信，中多无理取闹之言，可恨已极。彼之如此，不过欲俟《民报》出版，以为其掩饰耳。苟复函中有一项异议，彼即全体翻案矣。克公自以为能，竟不料其自坏长城矣。”尤其是“克公贪于目前之近利，不识适贻日后之祸患，又为一人之便益，而以之反伤其同人，有所不计。英雄作用如此，吾其奈之何哉！”并在信中特别提醒李燮和注意汪精卫在黄兴面前说三道四，调拨离间。并再次表示“弟意事已如此，不若尽弃之，改造新方面耳。”并建议“二兄在文岛，日后恐难立脚，弟意不若往仰光为宜。”^③ 陶成章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准备与李燮和等人转移到缅甸，另外开创新的局面。

黄兴从大局考虑，在多方劝解无效的情况下，拒绝了陶成章等人的要求。“黄兴偏袒孙文，不肯发布，并作书复李燮和等，为孙文辩护，洋洋千余言。”^④ 在公函中署名的从事南洋华侨教育工作的湖南籍李燮和、胡国梁、陈方度、易本羲等人也致信东京同盟会总部的黄兴、谭人凤和刘揆一等湘籍党员，

① 《致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8页。

②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页。

③ 《致李燮和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9页。

④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页。

控诉孙中山在南洋的“罪状”。黄兴联合谭人凤、刘揆一，发表长达千余言的致南洋反对孙中山的李燮和等同盟会会员信，就公函中涉及的孙中山的“罪状”，一一予以解释，以便他们消除成见，反躬自省。

第六节 中山自述

孙中山很快就从美洲的来信中，获悉陶成章等人撰写的公函的主要内容，因为陶成章等人以中国同盟会的名义致函美洲各埠，公布了《七省同志致同盟总会书》。“孙文大怒，命各机关报攻击先生与章太炎、陈威涛不遗余力。”^①孙中山在致布鲁塞尔的同盟会会员王子匡的信中，提到“近接美洲来信，谓有人托同盟会之名致书各埠，大加底毁于弟，不留余地，该处人心颇为所惑云。此事于联络华侨一方面，大有阻碍矣。为此事者乃陶成章”。并分析其原因在于“陶去年到南洋，责弟为他筹款五万元，回浙办事。弟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彼失望而归，故今大肆攻击也。东京留学界之不满于弟者，亦为之推波。故从外人视之，吾党已成内乱之势。人心如此，真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可为浩叹！”^②孙中山为革命党人内部发生严重的分歧而痛心疾首。

孙中山与伦敦的吴稚晖就陶成章等人的公函问题晤谈过多次，吴稚晖建议孙中山将有关经济问题向外界公布，以释众人

^①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页。

^② 《致王子匡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8页。

的疑虑。孙中山思前想后，觉得吴稚晖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决定将南洋筹款及用款问题，作一详细的交代。孙中山在致吴稚晖的信中，罗列了三次革命开支的明细账。“昨日先生之意，以为宜将此事和盘托出，以解第三者之惑，而表世界之公道。弟再思之，先生之言甚是。而世人之所见疑人者，多以用钱一事着眼，故将弟所发起之三次革命所得于外助之财，开列清楚。然此适表出以前助者之寡，殊令吾人气短。然由前三次推之，则一次多一次矣。若明明白白表示于人前，使新得革命思想者无此疑惑，安得下次不更得多助乎？前二次助者无几，无甚可对人报销之事。前年第三次之款多由外助，而出款之人如南洋各埠，则零星合集数万金，当为千数百人之所出也，弟此处未有详细数目。然各款收入与支出，弟在安南时多自经手，弟离安南后则汉民经手。而受款分给各处用者，则河内五家字号经手，以用于钦廉、广西、云南三地；其潮惠之款，则由香港同志经手；日本办械、租船之款，则由日本殷实商人经手：皆有数目列明。除所入各款，尚支长万余元（即河内之欠债）。弟所开各处之入款是大约之数，因不记详细，所报皆过多而无从报少也。收款多由精卫，支款及我与汉民也。此事弄清，则可破疑惑矣。除三人经手外，知各款之来路去路者尚有多数共事之同志，即今巴黎之张骥先亦其一也。”^① 孙中山重点讲述了离日以后在南洋得到华侨资助的款项及开支的情况。

孙中山对于陶成章等批评其借假《民报》而“得名”，作

^① 《致吴稚晖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9页。

了申辩，认为陶成章“所攻者，以我得名”而言，“不知我之经营革命在甲午以前，此时固无留学生为我吹嘘也。而乙未广州之事失败，则中国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当时如有陶成章，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辞也！今日风气渐开，留学之士以革命为大光荣之事业，而陶辈始妒人之得名。然我之初意，只在赴大义、行宗旨，而与共事之同志也无不如此。不期今日乃有以名而始谈革命者，以故固属风气之开，而亦道德之退化也！”^① 早期孙中山从事革命时，风气未开，尤其是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被骂为“乱臣贼子”，被迫流亡海外。只是近年来风气大开，革命才为东京留学生所接受，倡言革命才得到留学生的尊重。

至于所谓的孙中山“攫利”，孙中山也一一进行了反驳。“以我为‘攫利’，而不知我于未革命以前，在社会上所处之经济界中固优胜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则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图之快乐我无不得之，革命‘攫利’云胡哉？且当日图广州之革命以资财赞助者，固无几人。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合共不过万余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所能办者也，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经营接济，所费不下十余万元，所得助者只香港李（纪堂）君出二万余元，及一日本义侠出五千元，其余则我一人之筹获而来也。自此吾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蓄亦家兄任之。是

^① 《致吴稚晖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0页。

从事革命十余年以来，所费资财多我兄弟二人任之，所得同国人及日本人所助者前后统共不过四五万元耳。若谓我以十余年之时间，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万之资，则我前此以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此固港粤人人所共知共见也，而其他之事业投资取利者犹过于此也。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之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已立之恒产耶！（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钱已尽，则以恒产作按，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卖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乃陶（成章）更诬以在九龙建洋楼，夫家兄本为地主实业家者，非我从事革命以耗折之，则建洋楼亦寻常事，陶等何得多言。）此庚子以前，我从事革命事业关于一人得失之结果也。”^① 孙中山备述自己及哥哥孙眉为革命毁家纾难，备尝艰辛，孙眉因此而破产，被迫迁居香港，过着寄人篱下、躬身耕种、自食其力的生活，根本不存在于九龙盖“洋楼”之事。

孙中山接着重点谈到在南洋筹款准备华南地区武装起义的经过。“自庚子以后，中国内外人心思想日开，革命风潮日涨。忽而萍乡之事起，人心大为欢迎。时我在日本，财力甚窘，运调不灵，乃忽有他方一同志许助五万金，始从事派人通达湖湘消息，而萍乡军已以无械而散也（此事不过乘一时矿工之变而起，初未谋定而动，故动，他方同志多不及助，是以不支也）。惟有此刺激，人心已不可止，故定计南行，得日人

^① 《致吴稚晖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1页。

资万四千元及前述所许五万元，以谋起义。初从事潮惠，潮黄冈以未期而动，事遂不成；惠七女潮怿悴应之，亦属无功。吾人遂转向钦廉，与该处军队相约，遂破防城，围灵山。惟此时所有之资以买械而尽，而安南同志虽陆续集款以助军需，精卫又亲往南洋筹资，惟所得不多；钦军统领终因资少不肯如约反正，钦事遂不成。吾人转破镇南关炮台，以促钦军之动，事又不成。我遂出关而入安南，过文渊，为清侦探所悉。广西官吏托龙州法领事到安南查我踪迹，知我寓某街洋楼，密告清政府，与法政府交涉，逼我退出安南。我遂往星加坡。我到星加坡后则河口之事起，占据四炮台，诛彼边防督办，收降清兵陆营。本可进取，据有全滇，惜当时指挥无人，粮食不继遂退。自潮州、惠州、钦廉、镇南、河口五役及办械、运动各费，统共所用将近二十万元。此款则半为南洋各地同志所出，为革命军初次向南洋筹款者。今计开：由汪精卫向荷属所筹者约三万余元，向英属所筹者万余元，共约四万元；向安南、东京及暹罗所筹者约五六万元。我手得于上述之同志五万元，得于日本人万四千元，河内欠债万余元。此各项之开支，皆有数目，皆有经手。除梁秀春自行骗去五千及累去船械费数万，又一人骗去千余及陶成章用去一百，此外之钱皆无甚枉费。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见也。而此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一万四千元，家人私蓄及首饰之拨入公用者亦在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① 孙中山详尽地罗列了南

^① 《致吴稚晖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2页。

洋及安南和日本筹款的数目及开支的情况。后来，越南的革命党人也发表了《河内公函》，详细地叙述了发动云南和广西起义的情况，针对陶成章的“诽谤”，一一加以“驳斥”。

孙中山对于东京同志将官费折抵押银行，贷款资助孙中山发动华南武装起义，无法索回，将责任归为自己一人也感到很委屈。“又以东京同志以官费折作按贷钱，责我不代筹，此诚我罪也。然家兄亦因以家产作按而致今日之破产，亦我罪也。河内五家作保之万余元至今犹未还，亦同为我之罪也。然此时则无如之何之际，闻陶现在南洋托革命之名敛钱亦不少，当有还此等债之责也，何不为之！”^① 孙中山认为陶成章在南洋以光复会的名义筹款，同样有责任索回抵押在东京的官费折以及归还尚欠河内银行的万余元。

孙中山针对在南洋颁发保护票一事，也作了辩解。“又谓在南洋有出保护票之事，此乃荷属一隅同志所发起行之，本属自由行动，至成效如何我全未闻之，亦无从代受责任也。而陶成章亦在南洋印发票布，四处敛钱，且有冒托我名为彼核数，其不为棍骗乎？其无流弊乎？问陶成章当自知之，今乃责人而不自责。”^② 孙中山否认知悉在南洋颁发革命军安民局护照滞碍难行，也指责陶成章在南洋筹款向南洋华侨颁发凭单与颁发保护票异曲同工。

孙中山要求吴稚晖撰“长文一篇，加以公道之评判，则各地新开通之人心自然释疑，而弟从事于运动乃有成效也”。

^① 《致吴稚晖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2页。

^② 《致吴稚晖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2页。

并特别强调“所言事实皆当作第三者之言，则较弟自言者更为有力也”^①。孙中山要求吴稚晖以第三者的身份，根据孙中山提供的事实，撰文驳斥陶成章等人的公函。

孙中山抵纽约后，再次致函吴稚晖，要求以报业同行的方式，致函美国有关报纸，揭露陶成章“争名夺利”，煽动革命党人将孙中山“暗杀”的无理之处。孙中山在信中指出：“闻美西金山等处华人思想颇开，惟被陶（成章）布散传单之后，新得革命思想之人对于弟之感情大不善，非多少时日未易解释此种疑惑。最妙莫如由《新世纪》用同人字样作一函致美西四报馆即《大同》、《美洲少年》、《中西》及云哥华之《华英》，及檀香山三报馆《自由》、《民生》、《大声》，作为同业互通消息之谊，将陶（成章）信内忌功、争名、争利及煽人行杀于弟之口声之无理处指出，并下以公平之评判；当较《新世纪》已言者略详；及劝报中同业不可误听一面之词，如外间有人疑惑当按公理解释、维持人道等语。此函当由巴黎寄发及盖《新世纪》之印据，如此则必为力甚大。倘各报馆能维持公论，则诽谤不能摇惑也。有《新世纪》报论，更有专函，则此事可以销释，弟不用自解也。”^② 孙中山要求吴稚晖为自己辟谣。

吴稚晖按照孙中山提供的材料，在《新世纪》第115号发表《劝劝劝》的文章，吴稚晖指出：“近见有东京同盟会布告孙文君罪状书，所言不惟无足为孙文君之罪状，且适显其为

^① 《致吴稚晖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0页。

^② 《致吴稚晖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5页。

保皇党气息。”^① 吴稚晖撰文一一反驳陶成章等人的《孙文罪状》，为孙中山辩护。孙中山认为“《新世纪》所评陶（成章）言甚当，而公见者当无不明白，可以毋容再发专函于报馆矣。且东京同盟会近已有一公函致各报馆，想此也足以解各人之惑也”^②。孙中山对于吴稚晖的评论极为满意，由于黄兴已以中国同盟会的名义致函美洲及南洋各中文报馆，为孙中山辩护，吴稚晖就不必再致函美国各报馆进行解释了。

第七节 中山反击

章太炎因《民报》复刊问题，与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散发《伪〈民报〉检举状》的传单，对孙中山进行严厉批评，也加入了“倒孙”行列。

黄兴鉴于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曾发函给美洲各华文报馆严厉批评孙中山，特以东京同盟会的名义致函美洲各华文报纸，予以辟谣。“同盟会总理孙君今春由南洋起程赴欧，将由欧来美，想各位同志已有所闻。本处风闻于孙君未抵美以前，有人自东京发函美洲各埠华字日报，对于孙君为种种排挤之词，用心险毒，殊为可愤，故特飞函奉白：（一）按本会章程，如总理他适，所有事务由庶务代理，故凡公函必须有庶务签名及盖用同盟会之印者，方可认为公函。（二）如非公函，而函中有多数委员签名者，则作为会员之函件，请将其姓名及所陈之事

^① 罗平汉：《风尘逸士——吴稚晖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② 《复吴稚晖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9页。

实，抄录一通寄来敝处，俾得调查考核，以明是非曲折之所在。（三）如系匿名之函，则其为清政侦探奸细之所为毫无疑义。近日奸细充斥，极力摇撼本党，造谣离间之事陆续不绝，同人可置之不理。”并特别强调：“南洋近二三同志对于孙君抱恶感情，不审事实，遽出于排击之举动，敝处及南洋分会已解释一切。望我各位同志，乘孙君此次来美，相与同心协力，以谋团体之进步，致大业于成功，是所盼祷。”^①该函以中国同盟会总部的名义发出，由中国同盟会庶务签名，并加盖了中国同盟会公章，以达到否认《七省同志致同盟总会书》和《伪〈民报〉检举状》的效果。

黄兴还致函孙中山，要求孙中山宽宏大量，不与计较。“昨接读由伦敦发来之函，得悉有人冒名致函美洲各埠，妄造黑白，诬谤我公，以冀毁坏我公之名誉，而阻前途之运动。其居心险毒，殊为可恨！再四调查东京团体，无有人昧心为此者。但只陶焕卿一人由南洋来东时，痛加诋毁于公，并携有南洋充当教习诸人之公函（呈公罪状十四条），要求本部开会，弟拒绝之，将公函详加解释，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是函乃由弟与谭人凤、刘霖生三人出名，因当时公函中有湖南数人另致函弟与谭、刘也。本拟俟其回复，再作处理，不料陶焕卿来东时，一面嘱南洋诸人将前公函即在当地发表，（即印刷分布于南洋各埠者），一面在东京运动多人要求开会。在东京与陶表同情者，不过江浙少数人与章太炎而已。及为弟以大义所阻止，又无理欲攻击于弟，在携来之附函中，即有弟与公朋比为

^① 《致美洲各埠中文日报同志书》，《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奸之语，弟一概置之不理。彼现亦如何只专待南洋之消息，想将来必大为一番之吵闹而后已。彼不但此也，且反对将续出之《民报》，谓此《民报》专为公一人虚张声势，非先革除公之总理，不能办《民报》。见弟不理，即运动章太炎在《日华新报》登一《伪〈民报〉之检举状》（切拔，附上一览），其卑劣无耻之手段，令人见之羞愤欲死。现在东京之即非同盟会员者亦痛骂之。此新闻一出，章太炎之名誉扫地矣！前在《民报》所登之与吴稚晖君书，东京同志已啧有烦言，知其人格之卑劣，今又为此，诚可惜也。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且有识者亦已责彼无余地也。总观陶、章前后之所为，势将无可调和。然在我等以大度包之，将亦不失众望，不知公之见意若何也？美洲之函，想亦不出陶、章之所为，今已由弟函达各报解释一切（函稿另纸抄上），桀犬吠尧，不足诬也。我公当亦能海量涵之。至东京事，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毋以为念。”^① 黄兴向孙中山通报了章太炎和陶成章发函美洲各中文报纸“攻击”孙中山的情况，并告知已以同盟会的名义，向美洲各中文报纸“辟谣”，要求孙中山对章太炎和陶成章的所作所为不予理会。

孙中山没有理会黄兴的意见，从纽约致书吴稚晖，要求吴稚晖在《新世纪》再次撰写“公道”的评论，谴责章太炎和陶成章的“卑劣行为”。孙中山在致吴稚晖的信中指出：“近得东京来信，章太炎又发狂攻击，其所言之事较陶更为卑劣，真不足辩。陶之志犹在巨款不得乃行反噬，而章之欲则不过在

^① 《复孙中山书》，《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页。

数千不得乃以罪人。陶乃以同盟会为中国，而章则以民报社为中国，以《民报》之编辑为彼一人万世一系之帝统，故供应不周，则为莫大之罪；《民报》复刊，不以彼为编辑，则为‘伪《民报》’。兹将章太炎《检举状》寄上一观，此真卑劣人种之口声也！闻太炎此状一出，则寓东京之人士，无党内党外皆非之云。此足见公道尚存于人心也。可否再下公评于《新世纪》，一听高见裁之。”^① 吴稚晖遂在《新世纪》上发表《党人》一文，指责章太炎贪图万金之利而出卖革命。陶成章认为“《新世纪》原与太炎有私仇，故袒护老孙宜也”^②。吴稚晖发表攻击章太炎的文章自然也不奇怪。

南洋群岛的同盟会员也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对章太炎和陶成章进行了反击。“是时章炳麟、陶成章（字焕卿）同布一印刷品，攻评总理及胡汉民，大意谓总理到东京，则云南洋资本家尽吾同志，至南洋则云日本留学生尽入吾党，岂南洋资本家如此众多？民报支绌，分文不助云云。且攻击总理排斥外省人。南洋同志以章等所言有误会，除将其印刷品焚之不发表外，并致书章等为总理代辩。”^③ 南洋的同盟会员焚毁了章太炎和陶成章散发的宣传品，并针对有关孙中山的“罪状”，逐条予以辩驳。胡汉民也为此专门致信南洋的同盟会会员：“兹事之颠末，具如来书所云。陶成章心伎刻多疑，实为戎首，竞利而忘义，怀私而败群，亦既情见乎词矣。南洋同志不乏有识

① 《复吴稚晖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9页。

② 《致李燮和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3页。

③ 邹鲁：《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78页。

之人，无稽谰言，未易入听。况中山先生为国民倡义，已十余年，其信用岂一二哓哓者所能伤，惟目前中立之辈，未免阻厥过步耳。河内公函，系彼处同志见陶谤书而发，故于滇桂用兵之事颇详，足备参考，其他于南洋役，施之事，则昭昭然在人耳目，想文岛同志得此书与公等之书，必了然于是非之辩。”据说“黄克强兄已有书致文岛各教员，痛为辩白。而陶（成章）归日本要求开会讨论，黄君则拒绝不允，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盖吾人矢志革命，虽未尝依赖一人，而其人与全党有重大关系，抑且无丝毫之负于党，如此而被诬受谤，则不容不为辩白护持。今在东京有黄克强兄，在南洋有公等，俱持正不阿，以伸公论。悠悠之口，将不久自息也。”^①胡汉民谴责了陶成章的“攻击”，为孙中山进行辩解。

当黄兴写信责备陶成章推波助澜时，陶成章也写了洋洋二千言的反驳信。黄兴“以信责弟，以神圣孙（中山）恶，而隐隐以弟谓受政府之指使。自谓真正公心，而责弟以妄存私意。弟乃为二千言之长函以责之”。李燮和收到黄兴等人写来的信后，复信陶成章，声援陶成章和章太炎，陶成章没有经费进行印刷，只好将李燮和的信抄出二份，一份送云南留日学生办的革命刊物《云南》杂志社，一份送给章太炎，张贴在章太炎讲学的国学讲习会的教室里。“而南洋各埠接到太炎之传单，已有复信，又来责言一纸，以太炎之事为受弟指使，目弟有代为总会长之意。”南洋各埠收到章太炎的传单后，一些同盟会员和华侨来信谴责陶成章，认为是陶成章从中挑拨离间，

^① 《为陶成章、章炳麟等到攻讦总理致南洋同志书》，《胡汉民先生文集》（第1册），1978年版，第613页。

想取孙中山而代之，出任同盟会总理的职务。后来，“彼等又使人诈取太炎之图章，太炎不虑有他，与之（云往警察署取旧《民报》之保证金）。越数日，而《日华新报》又登章炳麟有与端方合谋卖革命党的信矣，又牵涉及弟，谓弟在南洋与李时乾狼狈为奸。”^①陶成章一一予以驳斥。黄兴以前曾与孙中山有过分歧意见，后来，黄兴主动和解，支持孙中山。陶成章认为“克强居心不可测，彼非不知孙（中山）之恶，前固曾竭力反对，今又忽神圣孙文，可怪甚矣”^②。并将黄兴致陶成章的二封信也转寄李燮和。但是，章太炎和陶成章并未掌握任何宣传工具，只能通过传单表达自己的意见，与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发动的舆论攻势相比，显得极为苍白无力。

第八节 孙陶之错

1907年，孙中山离开东京以后，同盟会内部不断出现分歧，而且越演越烈，导致了二次“倒孙风潮”的发生，同盟会内部以章太炎和陶成章为首的一部分会员，对于软弱涣散的同盟会总部极为不满，强烈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选举黄兴出任总理。而同盟会总部领导在同盟会内部的分歧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与不足。“没有总部领导自身存在的缺点，没有他们在内部矛盾乃至分裂过程中的处理不当，不少因细故引起的矛盾或者可以化解，闹独立者的恶感也因之可以减弱乃至消失。不幸的是总部领导事先即没有进行细致的说服教

① 《复李燮和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页。

② 《致李燮和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4页。

育，听之任之；事情发生时又处置失当，领导乏力；事后也不思总结，注意吸取教训。结果，前车之覆，成不了后车之鉴，裂痕越益扩大而不可收拾。作为同盟会的总理，孙中山在处理内部矛盾时所表现的失误尤多。”^① 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孙中山面对内部分歧，处置欠妥，以至于矛盾日益扩大，裂痕越来越深，负有主要责任。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极为欣喜，认为有如此众多的中国精英分子组成革命团体，创建民国的反清大业肯定能够“及身而成”。但孙中山没有想到，即使是中国的先进分子，也要以组织纪律来约束过于张扬的个性。然而，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组织的同盟会，其章程中竟然没有一条关于组织纪律的条文，更没有关于组织活动的规定，只有入会誓词中“任众处罚”的句子，也没有议及处罚的内容，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由于缺乏纪律约束，存在组织不健全的严重缺陷，同盟会成了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只要履行了入会手续，就是同盟会的会员，彼此成了革命同志，会员不相聚集，也互不认识，更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大多数会员既不相往来，又自由散漫，缺乏组织观念，没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党派意识。不少人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与总部不一致，也习以为常。孙中山和黄兴等同盟会的领导人对于创建一个纪律严明，坚强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还缺乏认识和经验。这就不难理解，中部同盟会总会在宣言中指责同盟会本部领导不力，“有共同的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

孙中山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忽视思想建设和组织建

^① 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7页。

设，只重行动，致使中国同盟会本部名存实亡。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因忙于筹划反清武装起义，经常离开同盟会本部，东京本部的事务由黄兴处理。后来，黄兴也因组织武装起义的活动而离开了本部的岗位，本部的事务改由朱炳麟、张继、孙毓筠、刘揆一主持，他们难孚众望，人微言轻，无法承担起革命指导的责任，只能维持本部不至于解散而已，无事时尚可勉为其难，一旦发生突发变故，往往束手无策。1907年，第一次“倒孙风潮”发生时，主持会务的刘揆一惊慌失措，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一面函告黄兴，一面要求孙中山向本部引咎。作为中国同盟会东京本部的两大领袖，孙中山和黄兴长期不在其位，虽说有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的客观原因，黄兴代替总理指挥国内反清起义的重任在身，但面对总部领导乏力的现状竟然长期不思改变，听之任之，这就在客观上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中国同盟会是否一定要孙中山担任总理。虽说孙中山不在本部期间一刻也未停止为资产阶级革命操劳，但其长期脱离本部的领导岗位，较少过问本部的事务，孙中山难辞其咎。两次“倒孙风潮”均提出要孙中山引咎辞职，改选同盟会总理，也就不难理解。

同盟会内部产生意见分歧时，孙中山的所作所为，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因经费问题发生第一次“倒孙风潮”时，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要求孙中山引咎辞职，遭到孙中山的断然拒绝，孙中山坚持以事实说明问题，在两广和云南发动武装起义时，不用中国同盟会的名义，而用革命党本部名义，显然不利于化解矛盾。更有甚者，孙中山甚至想另立总部，改变同盟会的人宣誓词，更改同盟会的名称。1908年秋，孙中山在新加坡组织南洋支部，尽管有统一南洋各埠同盟会分会之意，但

从其发布的《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来看，表面上号称分会，然而，其16条章程中只字未提与同盟会本部的关系，甚至连同盟会本部的字也未出现过，就其实际地位而言，俨然是一个与东京同盟会本部并列的另一个总部。因此，不难理解，陶成章批评孙中山在南洋重新组织团体，并认为南洋支部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1910年，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改李是男等组织的少年学社为中国同盟会旧金山同盟会分会时，又将同盟会的人会誓词改为“驱逐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入会会员也改称“中华革命党党员”。孙中山返回南洋槟榔屿后，又通告南洋各埠，要求仿照美洲党员新例，将盟书内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字样，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最后却不了了之。孙中山另立南洋支部，改变同盟会的人会誓词，将中国同盟会会员改称中华革命党党员，从未与同盟会本部其他领导商量，也未向本部报告或备案，实际上是与第二次“倒孙风潮”对着干。作为革命组织的领袖，“孙中山这样做，说得轻点是‘使性子’，重一点则是自摈于组织之外，自弃于总理职责。”^①不言而喻，孙中山对于两次“倒孙风潮”的组织处置，严重失当。

孙中山在具体处理革命党人的内部分歧，尤其是面对两次“倒孙风潮”时，以感情代替理智，以至于造成内部分歧越演越烈的趋势，东京同盟会本部也群龙无首，无人问津。“当时同盟会东京本部出现的混乱局面，孙中山固然要负一定的领导责任，但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由于孙中山对章

^① 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0页。

太炎、陶成章等人掀起的倒孙风潮不满所致。”^① 1910年，广州起义后，东京的革命党人灰心丧气，同盟会本部也已无人过问。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导人陆续潜入东京，商讨对策。宋教仁和谭人凤也相继与孙中山相见，讨论改良党务问题。孙中山异常激动地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教仁询问原故，孙中山直言不讳地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孙中山表露了对章太炎和陶成章批评的强烈不满。谭人凤对孙中山因东京部分同志的批评而放弃领导责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谭人凤责问：“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孙中山哑口无言，答应日后与各分会长商议。谁知仅数日，孙中山“暗地而来者，又暗地而去，置党务于不议不论”，谭人凤也因此“大不嫌于中山矣”^②。显然，孙中山不能正确地对待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对他的批评，并及时进行解释，化解矛盾和冲突，最后导致与东京同盟会本部会员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尤其是陶成章“游历南洋各地，发动华侨捐款，曾为同道者所忌，散布谣言，谄诬其为保皇党，为此几遭不测”^③。孙中山指控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是“保皇派”、清政府的“侦探”，将他们作为革命的敌人来对待，必欲除之而后快，不能

① 饶怀民：《李燮和与沪宁光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② 谭人凤：《石叻牌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③ 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25页。

不说是极为严重的错误。

孙中山是个毕生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奋斗的志士，但孙中山作为同盟会的总理，无论在用人问题上、起义地点选择上，还是经费筹集和分配问题上，都有领导方法上不够民主的地方，与同盟会本部的其他领导缺少商量，导致同盟会内部出现严重分歧现象，孙中山是难辞其咎的。对此，国民党的元老谭人凤曾有中肯的评价，“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统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糜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①特别是孙中山无视长江中下游日趋高涨的革命形势，而将武装起义局限于华南地区，致使同盟会内部许多有识之士，不得不另立组织，进行领导。对此，谭人凤对孙中山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中山以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同人不得已商议改组。非同盟会负中山，实中山负同盟会也。胡汉民以窃权固宠之心，欲奉中山为终身总理，并敢藐视东京同志，不足言办事。今试问满廷之颠覆，东京人为之耶，抑南部人为之耶？长江光复五

^① 谭人凤：《石叻牌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六省，张鸣岐卷款而逃，李准畏罪邀功，汉民始得入为广督，是东京人且大有造于胡氏，胡氏究竟有何力能？南部前后糜款不资，究竟有何效果？吾当日谓‘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盖轻视其人，而因轻视其地也。”^① 孙中山未能看到长江流域日趋高涨的革命形势，总离不开珠江流域，当珠江流域的革命一再受到挫折时，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作出进入低潮的错误判断，并远赴欧美，留连忘返。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人，未能对迅速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尽应有的领导责任，当南京临时政府在难产中仓促成立时，没有足够思想准备的孙中山被历史的大浪推上了临时大总统的宝座。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形成坚强有力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历史注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无可挽回地走向失败的悲剧性的命运。

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这场内讧，处于弱势地位的光复会领导人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光复会员大都是浙江人，多数领导人还是绍兴人，心胸不够开阔，对人对事易感情用事。陶冶公曾批评：“光复会人，浙籍多数，而浙人局量狭隘，不能容人，固少雄奇伟大的风度，亦缺大公忘我的精神。”^② 章太炎和陶成章等光复会领导人对孙中山有怨言，要求罢免孙中山同盟会总理的职务，当他们的意见得不到黄兴等同盟会本部领导的支持时，擅自将不同意见公布，不但无助于解决双方的分歧，反而扩大了双方的分歧，不利于革命党的团结和统一，容易被人所利用，作为分裂革命队伍的致命武器，他们对此同样

^① 谭人凤：《石叻牌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② 陶冶公：《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歧与合作》，《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6页。

负有重要的责任，犯了严重的错误。

陶成章自始至终都是光复会的领导人，同盟会浙江分部的负责人，是一个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干家。陶成章联络了会党，组建了光复会，积极筹划苏、浙、皖、赣、闽五省起义，其百折不挠、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素为革命党人所敬佩。陶成章为人耿直，严于律己，任事负责，但也有气量狭小，不善容忍的一面，有时固执己见。陶成章自己也承认“心本下急，无容人过失之量，近日心复多疑，非所居而居之，辱与危且交至矣。”^①章太炎也批评陶成章：“焕卿性急，与同盟会人不相能。”^②因此，当陶成章在南洋筹款遇到重重障碍，特别是被孙中山指控为“保皇党”，并派人要将其“暗杀”时，陶成章忍无可忍，联合李燮和等人，起草了《七省同志致同盟总会书》，控诉孙中山的“残贼同志之罪状”五条、“蒙蔽同志之罪状”三条以及“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四条，加起来共三种十二条“罪状”，并提出了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等要求。当陶成章等人的意见没有得到以黄兴为首的中国同盟会领导的支持时，陶成章又与李燮和商量，由陈威涛在爪哇魏兰处将“公函”复印百余份，邮寄南洋及美洲等地，将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公之于众，以至于局外人看来，革命党人已呈内乱之势。1909年11月11日、27日和29日，保皇党控制的《南洋总汇新报》，以《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为题，分三次刊载了这份传单，并加编者按曰：“此传单用石版印成，由爪哇友人寄来，嘱刊报端者，其中词语，本报不敢

① 《致魏兰书》，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0页。

② 章太炎：《龚未生传略》，《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增减只字。”连载完毕后，又加记者按曰：“自革命邪说流毒南洋以来，一般之劳动社会几于尽为所惑，其每况愈下，如尤烈等创立中和堂名号，搜罗万象，但知敛钱，不论流品，甚至如茶居酒楼之堂倌、妓院娼寮之厨夫，亦皆侈言革命，流风所及，诚足为风俗人心之大害。记者怒焉忧之。兹特将此传单录出，在记者之意，不过欲使华侨知革（命）党之内容如是如是，则已入迷途者，宜急早回头，将入而未入者，更宜视之。若浼大之为国家，培无限之正气，小之为华侨，惜有限之资财，如是焉而已。”^① 1912年11月2日，辛亥革命胜利后，《神州日报》又以《孙文罪状》为题，重刊该传单，只是文字略有出入。1910年初，陶成章又将《七省同志致同盟总会书》改写成《布告同志书》，“直言孙文种种之非，并略述自己生平所经历”^②，并寄给李燮和和胡国梁，特别提到“布告同志书，多据事实，特附上数册。他处尚未寄出，因乏邮费故也”^③。而实际上，陶成章“所发表之布告书，仅于仰光寄去三份，《新世纪》寄去三份，欧洲商务研究所寄去三份，余皆不寄了”^④。陶成章对自己的意见得不到东京和南洋大多数革命党人的支持也非常痛苦，“近来东京人心大坏，南洋更不可不注意。”并认为“南洋局面，已败坏到极点，一切均难收拾”^⑤。革命党人的首要问题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推

①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8页。

②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页。

③ 《致李燮和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6页。

④ 《复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8页。

⑤ 《复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6页。

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可陶成章等人却将矛头指向孙中山，不顾大局，不顾影响，其错误的性质和后果极为严重。

以章太炎、陶成章为代表的光复会领导人和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属于革命党人内部不同的政见分歧，双方属于政友而不是政敌。当双方头脑冷静下来，都停止了互相攻讦。陶成章对自己的错误也有所认识，自动停止了对孙中山的批评。陶成章认为“老孙事，实属可厌，以后不理之可耳，想彼当亦无能为役也”^①。并表示“从此以后，不欲与之胡闹矣”^②。陶成章在复沈钧业的信中再次谈到“孙文以后不必攻击，弟意亦然。而弟之意，即意见不同，宗旨不合者，辩正可也，不辩正亦可也，再不可如前者之《中兴报》，日从事于谩骂，不成日报体裁。即个人私德有缺陷者，亦不可多加攻击，盖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多所取怨，于所办之目的宗旨上，毫无所裨益，谅兄当亦以为然也。”^③人无完人，后人更不能苛责前人。章太炎和陶成章在革命党人的内部纷争中，尽管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丝毫也无损于其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称号。

① 《致李燮和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3页。

② 《复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9页。

③ 《同龚宝铨复沈钧业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5页。

第十章 重组光复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作为同盟会的加盟团体之一，并未合并到同盟会，光复会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光复会领导人在同盟会的领导机构中也没有发言权。皖浙起义后，大批光复会会员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流亡日本和南洋地区。陶成章在南洋筹款受阻，回东京提出改组名存实亡的同盟会本部，改由黄兴出任总理，以便领导日趋高涨的长江中下游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陶成章等人的意见遭到拒绝后，重组了光复会，在东京设立了光复会总部，在南洋设立行总部，代行总部权力，并大力发展南洋的光复会组织，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高潮。

第一节 酝酿重组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兴中会和华兴会合并于同盟会，不复存在，但光复会仅仅是同盟会的加盟团体。同盟会成立初期，光复会方面只有蒋尊簋一人加入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仍以自己的名义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活动，光复会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同盟会，如蔡元培、陶成章、龚宝

铨等人；也有的光复会员，始终保持光复会员的身份，不加入同盟会，如徐锡麟等。“光复会同入后多加入同盟会，伯荪独不入。”^①而章太炎是1906年出狱赴日后才加入同盟会，陶成章直到1907年初才加入同盟会，并负责同盟会浙江分会工作。光复会自成立伊始到陶成章被害后解散，从未停止发展自己的组织和单独开展革命活动。

1907年，皖浙起义失利后，光复会元气大伤，许多光复会会员受到清政府的通缉，纷纷出逃国外，大都流亡南洋，从事华侨教育，潜伏下来。

1907年，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离开同盟会本部东京后，以章太炎和陶成章为首的原光复会领导人，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人开始产生意见分歧。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掀起了两次“倒孙风潮”，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特别是第二次“倒孙风潮”时，双方的意见分歧尤为尖锐，以陶成章为首的原光复会领导人准备重组光复会，东山再起，推动长江中下游的资产阶级革命。

陶成章萌发重组光复会，始于1909年5月。由于陶成章以光复会的名义在南洋筹款，受到孙中山的阻挠，举步维艰，而营救因皖浙起义被捕的人员和重新开展长江中下游的革命活动，又急需大笔经费，陶成章不得不另谋出路，改组因皖浙起义受到严重挫折的光复会，承担起领导革命的重任。陶成章应魏兰“急函相招”，赶到爪哇谏义里与魏兰会晤，鉴于“光复会在浙江的革命活动受阻，重要成员暂离浙江，被迫来到南

^① 《与陶冶公》，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89页。

洋，重设领导机构已属必要”。而孙中山又不断给陶成章的筹款制造障碍，无法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于是，陶成章和魏兰“商议再举义旗，重组光复会之事”^①。陶成章从谏义里返回吻里洞以后，又致函李燮和，将重要的筹款事情放在一边，急于赶往榜甲与李燮和相见，商谈重组光复会事宜。陶成章在信中谈到：“此次本拟即来贵埠，因谏义里魏君有急函相招，不能不先往，但往谏义里不过留停一礼拜而已。弟有诸事极紧要者，与吾兄相酌办理，筹款一节，固其次也。然暑期已近，特恐吾兄有事他出，故特因吻里洞同志沈君汉思来文岛之便，先函道候，并陈鄙意。如吾兄因暑假之暇，亦有要事与他同志相约游行别处者，乞开一所往之住址于巴打威陈百鹏兄处，使弟得以踪寻走谒也。吻里洞之事，问之沈兄，便当明白。”^②陶成章已先托前往榜甲的沈汉思面告重组光复会之事，并要求李燮和暑假外出时留下联系地址，以便能够与他面谈“极紧要”的重组事宜。

陶成章在随后致李燮和的信中，将此“极紧要”的事说得更加明白。陶成章询问李燮和：“兄之心意何如也？若再经营，或加一字，或改一名，或以暗杀名义行之。其章程中，不认孙文为会员，谅亦可以做得。弟当另拟章程，请兄与魏君及最热心诸人共同谋之，谅可有济。”李燮和“如以为善，弟当即定章程，且不必举首领。举首领最为坏事，前车可鉴。孔子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前次之举孙文，实授之于刀柄，而使之杀与刀于彼之人也，一误岂堪再误云”。陶成章鉴于成立

① 阙良庆：《魏兰与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50页。

② 《致李燮和书》，《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页。

中国同盟会时，推孙中山为总理，而孙中山以总理名义，阻碍陶成章以光复会的名义开展活动，建议重组光复会，将孙中山排除在外，以便更好地进行革命。至于陶成章所谈及的另拟“章程”，是指在原革命协会章程的基础上，重新拟定重组后的《光复会章程》。至于李燮和要求的委任书，是指准备成立的光复会南洋“行总部”的执行委员的委任书。陶成章决定将重组后的光复会工作重点放在江浙皖赣闽五省，采取的斗争方式主要为暗杀。“暗杀一道，浙人大有可为，可恨者经费无着耳。”陶成章还与黄兴商量一起开展暗杀活动，但不同意孙中山参与其间。陶成章告知李燮和，“克强兄欲与弟同谋暗杀之事，但弟若不声明与孙文无关系，决不愿也。”^①陶成章在信中，已谈到有关重建后的光复会名称、光复会章程以及光复会的工作重点和斗争方式等问题。

陶成章重组光复会肇始于南洋筹款与孙中山意见不一致。章太炎回忆：“时荷兰属地华侨谋建学校，请于同盟会，李柱中、魏石生、张云雷、王文庆、沈复生、陈陶怡，暨未生之弟厚生、希生等先往，而焕卿继之。焕卿日以复汉之说励华侨，得侨人尊信，亦恨同志不能如前日精纯。乃阴部署光复会旧人，与侨胞有志者，集光复会如故。推余主会，而焕卿以副。往来日本南洋间，外事多以属柱中。”^②重组光复会之所以肇始于南洋，是因为革命党内部有不同意见分歧，陶成章南洋筹款受阻，成了重组光复会的导火线。

陶成章回东京后，将《七省同志致同盟总会书》交给黄

^① 《致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8页。

^② 章太炎：《龚未生传略》，《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兴，提出罢免孙中山总理的要求，未能得到黄兴的支持。于是，陶成章又征求章太炎关于重组光复会的意见。

陶成章对章太炎说：“孙中山这个人难与共事，无法相处。我们主张光复汉族，致力于长江流域的革命，也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不如重组光复会，另起炉灶。”

章太炎在自述中回忆：“焕卿自南洋归，余方讲学，焕卿亦言：‘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余诺之，同盟会人也有附者。”^①章太炎对孙中山等人续刊《民报》意见很大，对于陶成章重组光复会的提议表示支持。

陶成章得到章太炎的支持后，又给李燮和和胡国梁写信，提出在东京设立光复会的总部。陶成章告知李燮和和胡国梁：“俟敝友到东（京），另行组织新机关，为内外各地之通信所，俟有成议，当行奉告。”^②

陶成章重组光复会的真正的原因在于自孙中山离开东京后，黄兴也离开日本到前线指挥华南地区的武装起义，同盟会本部的代理人员人微言轻，形同虚设，未能起到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指挥中枢的作用。陶成章从南洋返日后，提出改组同盟会本部，建议由黄兴接替孙中山出任中国同盟会总理，以便继续发挥东京同盟会本部的领导作用，但遭到否决。而全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却日趋高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也暗流涌动，急需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政党来领导。而涣散的东京同盟会本部显然难以胜任，陶成章不得

^① 章太炎：《自定年谱》，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0页。

^② 《致胡国梁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0页。

不考虑重组光复会，来承担历史赋予的重任。“时河口事败，革命志士逃避南洲者不少，因意见之不同，而有别树党帜之心，同党倾轧，外祸日多。星洲一带之会党，与同盟党魁，感情未洽，意见又多。当时南洲群岛，欲以同盟会之名义，号召一般会党中人，殊不能行，寄旅南方经营革命者，为之殷忧，谓同盟会，既未可取信于人，非别组一会，则人心离散，欲筹经费，无从措手，况年来革命之运动屡起屡败，良以经费之不巨，布置之未周，故所益者少而所损者大。因之与网甲岛槟港中华学堂教员李燮和、沈钧业、王文钦等，再三思维，为联络党人起见，庚戌年八月，在网甲岛组织光复总会。于是该岛党人均入光复会，公举章炳麟为正会长，公（陶成章）副会长。”^① 陶成章等人最后决定重组光复会，是在罢免孙中山的提议遭到黄兴等人的否决以后。参与重组光复会事宜的李燮和也承认：“己酉八月，陶成章至南洋，与燮和商议整顿会务，上书东京总部论孙文，请易黄兴为会长，与多数会员冲突，乃复与陶成章等议复兴光复会。”^② 陶成章等人改组同盟会的总理受挫后，才在东京和南洋重组光复会。

陶成章联合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员，加紧了重组光复会的步伐，重新制定了《光复会章程》。陶成章在致李燮和和胡国梁的信中提到：同盟会总部“已一败涂地，无可整顿矣。弟乃邀集旧时同志最可靠者商酌数次，已议定草章，寄奉三张，乞兄等与各同志酌量之，再细加商榷，冀臻于完全，是所至

① 《陶焕卿》，《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7页。

② 李燮和：《光复军事略》，《近代史资料》（总57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

盼。”^① 陶成章将起草的《光复会章程》寄往南洋的李燮和等人，请他们予以斟酌。

陶成章在来信中还提到重组后的光复会的机构设置，建议不设总会长，以免出现“孙中山第二”，只设正副会长。“此次设立会长，均以不置总会长为是。盖总会长一举一动，系于会事前途甚大。当其职者若有才能而无道德，则借权营私，弊将百出，第二孙文将复见于他日。若有道德而才不足以副之，则难免不受人愚弄，倒行逆施，会之破坏亦可预卜。当其时再谋补救，晚矣。”至于章太炎也不是光复会合适的会长人选，“章君太炎，其人并非无才之人，不过仅能划策，不能实行，其立心久远，志愿远大，目前之虚名，彼亦所不愿也。大约日后使彼来南洋讲学，广招学徒，分布四方各埠，其效果当非浅鲜；若以会长处之，用违其才，反碍前进之路也。”^② 陶成章已在考虑光复会会长的人选问题。

陶成章建议光复会总部设在东京，设立评议和执行二部，并建议由李燮和和胡国梁任评议委员和执行委员。“现今会章，但分评议、执行二部，分立权限，各行其是，既无不能统一之虞，又有互相监察之效。”^③ 东京虚设总会，作为通信机关。

陶成章提出在南洋另外设立支部。陶成章征求李燮和等人的意见，“南洋分会之权，使之加重，未识兄意以为何如？”因为最近接到田桐的信，“知新加坡之张永福、陈楚楠亦已反对孙文。夫新加坡为各埠所观望，不可不乘势联络之。弟意仍

① 《复李燮和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1页。

② 《复李燮和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1页。

③ 《复李燮和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2页。

欲于南洋设一支部，举本地有名之人为支部长，而评议、执行二部之人，以东京同志之在南方者充之，兄意以为然否？”^①以光复会南洋支部代行总部权力。

第二节 再组光复

1910年2月，光复会在东京成立总部，由章太炎出任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陶成章原先不想设总会长，后来还是请章太炎任总会长，但认为章太炎并不适合担任总会长，不过也是一个迫不得已的临时方案而已。陶成章之所以请太炎出任总会长，是因为“太炎先生既为总会长，可藉以联络各埠”。然而，陶成章认为“自联络成后，可将太炎公改为教育会会长，方为合宜。盖彼之能力在此不在彼，若久用违其长，又难持久矣”。陶成章也自谦任副会长难以胜任，“至于弟之副会长职，非特不能胜任，抑亦实非心之所愿也。”陶成章认为自己性子过于急躁，唯恐因此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陶成章“意欲于联络后告退，谅诸兄必许弟也。至新推正副会长，恐名望不足以副人心，此节弟可助劳，使行暗杀者，以名归之，斯可矣。”^②一旦推选新的光复会正副会长，陶成章表示一定全力以赴协助做好工作。

另外，由章梓任庶务员，沈家康任书记员。光复会东京总部机关的联络地址设在东京大冢町五十番地的《教育今语》杂志社内，实际是一通信联络机构。“本会总部之通信所，仍

^① 《复李燮和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2页。

^② 《致南洋光复会会员公函》，《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7页。

以杂志社通信所为通信所云。”光复会总部事宜，均由总部工作人员负责。“现今总部已举定职员，分头办事。嗣后若有会中之事，可不必写信于弟，且弟又将一切事件交出，以便南行也。诸兄如遇有会中事务，可写信职员，至叙名可写诸执事先生公鉴云云。信到后自然有人为照办，兼由书记员作复以答也。”^①陶成章将光复会总会的事务移交给庶务员章梓和书记员沈家康办理。

南洋设立光复会行总部，代行东京总部的权力，由李燮和、沈钧业、魏兰任执行员。“行总部办事人员（庶务、会计、书记等），由东京总部给委任状，纸用黄。亦可由行总部执行员代东京总部给委任状。”^②陶成章也表示要到南洋的光复会行总部与李燮和等人一起工作。“此事弟不能不效劳，但才力薄弱，还须赖老哥出力维持，乃始不至失坠耳。”^③还建议南洋“行总部之事，大约可附设在报馆，则可以不费矣”^④。

光复会在南洋各埠设立分会，委任分会长。分会会长由行总部代东京总部发给委任状。至于分会长以下的职员，陶成章建议由行总部执行员或分会长发给委任状，或者由行总部代东京总部发给委任状。凡是光复会的委任状，均要由正副会长署名，光复会发展会员要填写盟书，同样必须有光复会正副会长的署名才有效。光复会的盟书和有关图章，均由东京印制和雕刻，寄往南洋行总部。

① 《致李燮和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9页。

② 《致李燮和沈钧业魏兰等公函》，《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9页。

③ 《复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1页。

④ 《复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1页。

光复会刚创建时，就设有暗号。重组后的光复会同样有规定的口号和暗号，在内地则没有。陶成章在致李燮和的信中，提议光复会的“口号、暗号等，可由兄等拟定之（内地不必有此）”^①。陶成章请李燮和拟定重组后的光复会的口号和暗号。

陶成章拟定了《光复会章程》，并在日本东京印制，再寄送南洋行总部。鉴于日本政府加强了对东京革命党人的压制，东京印制的《光复会章程》空出在“日本东京”设立总部四字，由李燮和发出时补上。

重组后的光复会，将革命进行方略的重点放在从事暗杀活动。陶成章“与女士孙晓云密谋，欲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诱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②。陶成章素来主张中央革命，曾计划在北京开设一个妓院，收罗一批美女，伺机暗杀满清贵族。

陶成章在致南洋光复会会员的公函中，对重组后的光复会的工作重点作了详尽的阐述。“现既已成立光复会，大张门面，其势不得不用逆取顺守之法。若用此法，须速而疾，且断不能持久。夫我辈之目的，在一举覆清，若东放一把火，西散一盘沙，实属有害而无益。然欲为一举覆清之举，非可定以年限。若会成立二三年后，一无音响，会员必定大生疑心，团体可以立刻解散。如欲顾全团体，其势不能不于地方上起，作微幸以一逞之举，目的既乖，方针自乱，无可为矣。且会既扩

^① 《致李燮和沈钧业魏兰等公函》，《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9页。

^②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页。

张，趋炎附势者必来，拒之不可，不拒则将藉我名以招摇，一不便也。又今者革命之党遍于国中，人人有一方针，人人有一目的，各欲向其目的之地以谋进取，于是有欲向云贵以进取者，有欲向两广以进取者，有欲向江浙以进取者，有欲向两湖以进取者，有欲向山东、河南以进取者，有欲向中央革命者。如此纷纷之热心人，各欲乞此总会以求运动款项，其将奈之何哉！当是时也，不与则名不正，言不顺；欲与则无款与给之。即令有稍稍之款，与其一不与其二，不可也，与其先不与其后，又不可也。全力助他人，未见他人之能集事，而本己之方针且先乱矣。秦末之项羽，隋末之李密，其失败皆因此也。既已发表，无庸言矣。且先讲持久策，其策无他，先集数千金，或万金之款，办暗杀事宜，以振动华侨始可。否则会既成立，于一二年内，竟乃影响全无，其可乎哉？如不用暗杀，转用地方起兵，丧民费财，祸莫大焉；一有不慎，必引外国人之干涉，后事益难着手矣。”^① 光复会希望采取简单便捷而有效的暗杀办法，达到动摇封建专制统治、振聋发聩的革命效果。尽管依靠单纯的暗杀手段，不是革命胜利的途径。但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力量准备不充分时，将暗杀作为武装起义的一种辅助手段，也无可厚非。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暗杀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和王公大臣，所起的激励民心、震惊封建专制统治者的作用，不容忽视。

光复会从未与中国同盟会合并，谈不上重组后的光复会与同盟会搞分裂。重组后的光复会，仍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

^① 《致南洋光复会会员公函》，《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6页。

体，并未放弃以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目标。“光复会坚持由‘鼓吹’而趋向‘力行’，就是重视武装革命，自癸卯至辛亥之间，没有一年，没有一月，不在进行武装革命。清朝反动统治集团残酷镇压，同志被杀的，被‘密拿’、‘通缉’的，起义就难的，前后不下5000人。”^① 尽管光复会特别强调民族主义，但并没有背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仍然一如既往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致力于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陶成章等光复会的领导人鉴于皖浙起义后光复会元气大伤，需要有一个积蓄革命力量的时期，将工作重点放在从事暗杀活动上，也不能说就是“出现了某些倒退现象”。

第三节 发展组织

陶成章领导重组后的光复会，在南洋大力发展光复会的组织。光复会的分会在南洋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陶成章“因与中山先生意见不合，乃重组‘光复会’于南洋英、荷两属，推章太炎先生为之首，各省同盟会员之失意者，纷然和之，于是各埠分部陆续成立”^②。据重组后的光复会在南洋的骨干魏兰回忆：“陈威涛作书联络管慎修、杨俊明、锺芝溪等，锺芝溪复联络何剑非等。在新加坡，以何剑非为招待员；

^① 沈颀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② 陶冶公：《陶焕卿先生小传》，《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在爪哇，以谏地里魏兰、也班许绍南为机关所。南洋志士，如陈吉宾、何根性、曾赞卿、梁玉田、邵天彩、何德南、兰亦凡、蔡公哲、胡子春、刘维东、徐柏如、李弼公、陈芸生、陈百鹏等，先生（陶成章）皆联为一气。时李燮和、沈钧业、王文庆等，在网甲组织教育会，举槟港华侨温庆武为会长，沈钧业为视学员，借此为联络入会之机关。网甲岛华侨对于李燮和、沈钧业之信用极深，故其佩服章太炎与先生之心尤切。爪哇岛之华侨开化最迟，故人同盟会者甚少。杨俊明在泗水联络华侨，创办书报社，以管慎修为坐办，鼓吹革命，一日千丈。又得张云雷、魏兰、屠景曾、许绍南、丁荣等之运动，思想日益发达。冬十一月，沈钧业由黄肃方、田桐、张云雷三人之介绍，来泗水《汉文新报》主笔政，人心益动。义侠之士，日夕过从。辛亥三月，先生重来爪哇泗水，闻者益为之喜。时张云雷、沈钧业二人，均在泗水。先生与二人联络志士蒋开远、蒋以芳、蒋报和及书报社社员王少文等。”^① 其中尤以广东的潮州和嘉应两府的人最多，“盖潮洲人许雪秋等于潮汕失败后，群聚南洋，对于中山先生左右，颇多非议。其时成章组织‘光复会’，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雪秋、芸生等深表同情，由是‘光复会’势力为之一振。”^② 光复会的组织，遍及南洋英属和荷属殖民地。一大批著名的光复会会员抛头颅，洒热血，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陶成章亲自指导了南洋各地光复会组织的发展工作。陶成

①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

② 陶冶公：《陶焕卿先生小传》，《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章曾给文岛的秋宾、振芳、益鸿、义云、芝崖、曾传、谷园、和凤、锦昌、子钦、国雄、月洲诸人写信，称赞“文岛诸同志之热心，久为各埠同志所深悉。但先开导者，实嘉应李君天麟、湖南李君柱中之功也。今柱中兄闻及贵埠热心，欲相联络，则诚中国莫大之幸事也。故弟特为介绍。”^① 陶成章介绍李燮和前往文岛各埠发展光复会组织。南洋大吡叻的光复会组织发展最好，“南洋各方面，惟大吡叻进会之人甚多，进步甚速，人情也较他处为厚，他埠亦多通信者。”^② 大吡叻的光复会组建后，陶成章写信给南洋的何震生和王文庆，嘱他们与大吡叻华侨热心同志保持密切的联系。“兹有大吡叻埠同志曾君赞卿、梁君玉田、邹君天彩、何君性厚、陈君吉宾、潘君品初等，皆为极热心之同志，已在该埠立定机关，祈兄等时通音问，为彼此匡益之举。”^③ 光复会的组织大都以书报社的名义作为掩护，曾赞卿等人在大吡叻组织积我营育群书报社时，陶成章专门为此写了序言。“昔王船山先生有言曰：‘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育其群，若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仁义之足云。’由是观之，舍合群主义外，固别无人道主义；舍民族主义外，亦别无合群主义。虽然，欲求合群，非可徒托空言，必有机关以联络之，然后有过足以相规，有失足以相救，有疾病足以相扶持，有灾祸足以相补助。退而守之，可以保一隅，使不受外侮；扩而充之，可以联万方，谋光复神州。如是则合群之道，乃称实践。大吡叻埠志士曾君赞卿等有见于此，爰于各同志倡建阅书报社，作为机关，安置各种书籍，以饷华侨多

① 《致秋宾振芳等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9页。

② 《复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1页。

③ 《致何震王文庆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8页。

士，为振聩发聋之计，伸明群学之意，故定名为育群书报社。社成，嘱余为序述其意。余愿曾君等抱此宗旨，益励不懈，慎始敬终，终以无困，勿恃众盛而凌异党，勿以细故而乱大谋，庶几事可久大，人无间言，则船山先生之志也。”^① 陶成章还将积我营育群书报社发起人及捐赠者的姓名刊在《教育今语》杂志第五六期合刊的附录中。

南洋群岛的光复会组织，以书报社的名义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光复会’是当年革命的主力军，开始成立于日本，后迁至南洋爪哇，光复会之陶成章、李燮和、章太炎等，均为南洋华侨所最信奉者，一言一动，无不从命。爪哇、泗水、吧城、网甲、滨港等岛各书报社，以光复会名义，鼓吹革命。于是人心大动，每岛均成立光复会，于是光复会员遂遍布于南洋群岛矣。”^② 1911年6月，陶成章再次与陶文波、李一民、陈陶遗等人，前往南洋群岛，发展光复会组织。“数月来光复会几遍南洋群岛，此均陶（成章）一人奔走经营之臣功也。”^③ 陶成章作为后期光复会的实际领导人，为发展南洋光复会的组织，做出了很大贡献。“至后期光复会，领导人在名义上是章太炎先生，实际由焕卿主持。”皖浙起义失利后，陶成章“于1908年走避南洋，开始联络南部华侨，1910年在东京重兴光复会，继又设分会于南洋群岛各埠，光复会之声势为之一

① 《积我营育群书报社序》，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0页。

② 杨镇毅：《光复会和光复军》，《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页。

③ 《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8页。

振”^①。章太炎是革命的理论家，而不是革命的实干家，章太炎仅仅是后期光复会名义上的会长，光复会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发展工作都由陶成章负责。

重组后的光复会组织成分变化不大，仍以早期光复会成员为主体，包括部分同盟会会员以及在南洋华侨中新发展的会员，也有少数以前的华兴会会员，人数估计有 1000 人以上。^②除极个别不良分子外，绝大多数都是坚贞不屈的革命党人。光复会会员遍及国内的苏、浙、皖、闽、湘、粤以及海外的南洋等地，有的虽然加入了重组后的光复会，但并未声明脱离原有的同盟会会籍，而是兼有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双重身份。

第四节 拟办报刊

章太炎和陶成章担任过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苦心经营过《民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民报》被日本政府封禁后，章太炎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也曾有过在日本重新恢复《民报》的设想。陶成章从南洋回东京后，在《七省同志致同盟总会书》的“善后九条”中，也有复刊《民报》的意见。但是，当汪精卫等人背着章太炎和陶成章在日本秘密续刊《民报》时，章太炎和陶成章认为这是为孙中山“虚张声势”的伪《民报》，并联合进行了抵制。续刊《民报》只出了 25 期和 26 期后，就夭折了。当章太炎和陶成章发

^① 陶冶公：《光复会的组织与发展》，《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52 页。

^② 饶怀民：《李燮和与沪宁光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0 页。

起第二次“倒孙风潮”时，孙中山和黄兴利用同盟会掌握的新加坡的《中兴日报》、香港的《中国日报》、东京的《日华新报》、美国的《美洲晨报》以及巴黎以吴稚晖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机关报《新世纪》连篇累牍地进行反击，而章太炎和陶成章没有掌握任何报纸，只能利用散发传单的形式进行反驳，其力度自然可想而知，影响也很有限。因此，创办一份属于光复会的机关报，有自己的喉舌，发出自己的声音，宣传光复会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一直是陶成章的愿望。

陶成章在南洋筹款受到孙中山的阻挠后，就有创办光复会机关报的设想。1909年2月初，陶成章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省会泗水遇上由张玉堂介绍过来与胡汉民无法相处的章毅夫。章毅夫原来追随孙中山，陶成章在新加坡进行筹款时，曾设置种种障碍。陶成章知道章毅夫性格刚直，也不计前嫌。章毅夫提议在新加坡创办一份报纸，进行革命宣传，他能自筹若干股金，请陶成章也入股，一起合作。陶成章觉得光复会没有自己的喉舌，应创办自己的机关报，而且陶成章因筹款困难，也想通过经营商业，筹集革命经费。而报纸对于经商也有好处。张玉堂在新加坡也曾向陶成章建议创办报纸，并表示可以请人协助，以便打开新的局面。可陶成章没有资金，于是，就写信与李燮和商量，想听一听李燮和的意见。“彼欲办一报，自言能招股若干，请弟赞成其事，弟亦允之。但言此事非弟一人之力所能赞助，须俟与柱中兄商之。现弟思我辈近日空空无一凭藉，号召非常困难，新加坡之报馆，终不可不办，且报馆于商业大有关系，欲经营商业，此事亦不可缓也。弟在星洲时，景良兄对弟言：这次归香港后，如不举发，即邀张古山君来南方，扩张一切事宜，彼自己亦可向潮人运动，办报之事，

不患不成，局面不患不成。然吾兄之意，未识以为何如？”^①由于缺乏办报经费，陶成章并没有立即着手办理。

1909年9月，陶成章返回日本后，与李燮和商讨重组光复会的事宜时，再次提出：“弟现拟邀旧日同事之人而尚未归国者，另组织一报，以为机关。否则，筑室道旁，议论百年，亦未见其有成效也。”^②陶成章将创办光复会的机关报作为当务之急。

陶成章在东京重组光复会后，再次将创办光复会机关报的事宜提上议事日程，南洋的光复会会员经过多方努力，在新加坡设立了新加坡报馆。陶成章闻讯后，极为高兴，并推荐了总经理人选。陶成章在致沈琨和胡国梁的信中，对报馆的成立表示祝贺。“八月二十六来示已收到矣。知新加坡报馆已成立，喜甚。至司理其事，自料非其所长，至作文或可勉强（因弟不擅长时论故）。有一极妥当之友，名为陈陶公，现别称道一，才具既长，人又和平，并且谨慎老成，且有过人勇敢之气。前弟曾将此君行谊，略对柱中兄述之矣。文庆、彝宗、福生诸兄深知其人，现弟已写信去邀请之矣。据莫良兄说，必可来得。若得彼来，胜弟十倍。然弟决不敢自逸，当亦南来襄理一方面之事也（如作文等事）。”由于陶成章正设法营救被捕入狱的光复会会员，因此暂时还不能南行。“近日因有一同事张君伟文，久禁在狱，困苦非常，弟欲运动出之，正在入手。若能出狱，必再为谋一安全之位置，事妥后，方能来，不能半途止也。故弟南行之期，当在中历十二月及阳历正月之间。有

^① 《致李燮和信》，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1页。

^② 《致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8页。

此原因，想兄等亦不以迁延见责也。”^① 陶成章想一旦营救张伟文出狱，就到新加坡，协助办好报纸。

陶成章对于创办《光复报》极为重视，对其创办的意义也有高度评价。陶成章在复沈钧业的信中，认为“《光复报》之事，弟已向诸同事酌量再三，咸以为不可缺之机关，不可不尽全力以举之。不但宗旨之鼓吹为重要也；举凡商务之开展，实业之经营，无不因此而渐入手。先议论以启导人心，而后乃入手办理实事，则庶乎有路之可寻也”。陶成章除了推荐陈陶遗任总经理外，对于《光复报》的主笔人选也极为重视。“至于主笔，驻在报馆者，至少当有二人。然能文之人，实不多觐，且又不能不大加慎重。而经理之人又不能以作文分其心，作文之人不能顾他事，则精神始可灌注。未识吾兄可任其正席否？其副席已有一人在，但此人非与当面讲定，却不过情，始能前来。俟新加坡局面有定，章君莫良当返国力劝其来。至于义务主笔，太炎之门徒，多半系为将来往内地作教员，不可不稍习国文而来者，非特不肯作文，且亦不能请其作文也。其稍稍有志者多系浙人，现均返国，皆欲独善其身，不能强使之干预外事。至于太炎，未始不可以作文，而奈其不肯作文何！弟不得已，与一二同志商酌，写信内地，必有三五人可得者。弟也不敢自外，当为效劳，但弟不善时论，只可从历史上立论。”^② 陶成章也表示要前来协助，撰写历史论文，宣传民族主义。

陶成章经多方联络，陈陶遗答应报馆成立后，来新加坡出

^① 《复沈琨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2页。

^② 《同龚宝铨复沈钧业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6页。

任《光复报》经理。陶成章获得确切信息后，立即给沈琨复信。“陶公已允于报馆成立后，就来接手。而莫良公亦答应南行协助，且为归国一行，运动人才南行也。弟初次之踌躇者，实因一人之力有限，恐招覆餗之讥。今如此，则弟可以无忧矣，兼请兄亦勿忧也。”^①《光复报》的经理陈陶遗答应南行后，陶成章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陶成章还在东京多方寻找合适的《光复报》记者，并与章莫良约定，由陶成章先赴新加坡筹办《光复报》，俟有眉目后再写信给东京的章莫良，由章莫良回国，邀请国内记者来新加坡，协助办好《光复报》。“报馆之人才，已可招到。而内地各埠及东京，皆可尽义务之访事员。但必须人才满足，办出报来，始可出色，否则恐不能胜人而上之也。”^②陶成章已决定前往新加坡，筹办《光复报》事宜。陶成章又写信给李燮和，在内地记者未来南洋之前，也兼管一下《光复报》的事宜。“《光复报》事，祈吾兄暂为兼理。弟已向内地招办事之人南来，兼弟也当南来协助也。”^③陶成章谦虚地表示“弟因一人，不敢独任，现已与诸友商酌，俟报馆成立，有存脚处，各南行来协理。诚能如是，乃大幸也”^④。陶成章到南洋后不久，辛亥革命旋即爆发。陶成章急忙回国领导东南地区的辛亥革命，筹议中的《光复报》未能如期创刊发行。

① 《复沈琨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3页。

② 《致丁荣王文庆李燮和等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6页。

③ 《复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8页。

④ 《复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2页。

第五节 经商计划

光复会重组后，在筹款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同盟会解决经费问题，主要以向华侨筹款为主。陶成章重建光复会后，主张依靠经商来解决经费问题。

经费问题一直是困扰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问题。两次“倒孙风潮”的起因，均与经费有关。第一次“倒孙风潮”的起因，就是孙中山接受了日本商人和日本政府的赠款所引起，第二次“倒孙风潮”的起因，同样是孙中山不支持陶成章等人在南洋筹款而引发。革命党人背井离乡，流亡国外，身无分文，又要完成推翻清政府，创建民国的重任，需要有巨额的经费作为后盾。然而，革命党人却常为缺少经费而一筹莫展。革命党人谭人凤曾为此发出感叹：“古人谓君子忧道不忧贫，贫似非病也。然而金馨床头，英雄减色；钱空囊内，壮士无颜。古往今来魁杰奇才，其因潦倒穷途，侘傺而不能得志者，盖不知凡几。然则金钱之势力，亦安可忽哉！”^①陶成章出身贫寒，过着艰苦的生活早已习以为常。但是，陶成章要从事革命运动，不能没有经费。陶成章计划组织革命协会，发动江浙皖赣闽五省起义，需要至少五万元资金。皖浙起义失败后，许多光复会会员被捕入狱，需要资金打通关节，营救出狱。重组后的光复会拟创办机关报《光复报》，已筹建了新加坡报馆，由于缺乏资金，最后也胎死腹中。陶成章还想创办《光复》杂志，也因没有资金，而徒唤奈何。陶成章到各

^① 谭人凤：《石叻牌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处联络，也需要路费。

重组后的光复会的日常开支很大。陶成章与章太炎创办了《教育今语》杂志，但是杂志亏损严重，难以为继。陶成章连印刷《秋瑾女士遗稿》、《浙案纪略》以及《教会源流考》、《光复会章程》以及加入光复会的盟书的资金都没有。陶成章在致沈琨等人的信中，抱怨“弟自近月以来，杂志亏折甚巨，又连印《秋稿》、《浙案》、《教会源流考》等书，负债累累。近又代印《光复会章程》、盟书及图章等物，更觉困难”。陶成章准备营救被捕入狱的张伟文，也需要一大笔资金。“张君一事，大约终不免要花钱，用是不得已乞彝宗、文庆诸兄为代筹稍稍之款，以资助其困厄，以便为弟南行之旅费。陈君之费，亦乞代为一筹是幸。叨在知心，故敢直告。”^① 陶成章还准备北上北京，实行中央革命，开展暗杀活动，也需要活动经费。“至于革命一节，弟意非先扰乱北京不可。若有三四万金，亦可将就。”^② 陶成章估计赴京至少需要三至四万元，否则，无从下手。

陶成章曾想方设法筹款，但国内无法筹款，东京也无款可筹。“盖近日内地可筹之处，已久为弟筹之一空，至于东京，实为至穷之地，万无可筹也。”^③ 而南洋华侨大都并不富裕，经营的企业也不景气，革命党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南洋华侨筹款，华侨的承受力也有限度。特别是陶成章在南洋的筹款，又受到孙中山的阻挠，举步维艰。南洋各埠华侨承诺的捐款，事后也很难到位。陶成章从南洋回到日本时，只有马来西亚的

① 《复沈琨胡国梁等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2页。

② 《复李燮和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2页。

③ 《复沈琨胡国梁等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2页。

大吡叻寄来 500 元，而当时急需 2000 元寄往台州办事。后来，陆续从南洋寄来的款项也是微不足道，“弟所筹之款，均不见寄来，前后寄到者不过七百元，合之去岁仰光之款，不足千元，已零星付牢狱费及内地同志川费等用完。弟将用一纸声明，且言不再向南洋各埠筹款，以免贻人口舌，而绝后贤之路。”^① 陶成章辗转南洋各埠，所筹款项微乎其微。

于是，陶成章设想通过经商来筹集开展革命活动的款项。当光复会会员陈方度提议创办实业以解决经费问题时，陶成章大为赞赏。陶成章在致李燮和的信中，明确表示“弟之所赞成者，方度兄之独立营办实业耳”^②。陶成章计划邀集志同道合的同志，研究经济问题，发展商业，从长计议，解决经费困难。陶成章向李燮和等人提出“弟同德同心之旧同事，犹有多人，皆尽力于财政之研究，二三年后必有济也，尚不致束手无策也”^③。陶成章也曾精心物色善于经商的人才，在致李燮和的信中，对沈钧业的经商才能大为推崇。陶成章认为“沈君才具、学问、人品均佳，前在日本大阪商会中，故东方一面之商情，颇行熟悉。且居日本之我国商人及居朝鲜之我国商人，多有与之深交者，将来东南声气可通，亦一佳事也。《中兴报》如能承顶来，沈君才堪当经理之任，与兄等面晤之后，即可知其才能矣”^④。陶成章推荐徐锡麟的得意弟子沈钧业出任报社经理，既经营报纸，又发展商务。陶成章还向李燮和介绍龚宝铨的弟弟到南洋先做教员，将来再从事商业。“龚君系

① 《复李燮和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32 页。

② 《致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13 页。

③ 《复李燮和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32 页。

④ 《复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37 页。

同事宝铨之弟，曾在苏州营学堂毕业，国文精通，算术、体操等各种亦尚好，私德完全，惟年少，人太忠厚，一切尚须兄等指教之。其所以南渡者，因家况所迫而来，将来亦须改营商业。其位置亦乞兄等代为介绍之，最好能有可靠之同志，与之同学堂最佳。”^①

陶成章经过周密的思考，以给南洋光复会会员公函的形式，提出了系统的经商筹款计划。“经商之事，弟亦筹之素，近得一计，有益无损。”^② 陶成章首先说明经商的必要性，“弟历观万事，皆与财政相为因果。然财政之道，非自行筹画无由，此商业之所以不得不速为经营。且诸同志寄食南方，固与燕巢幕上无异，而同志中又有记名党案者，设一有变易，行将进退维谷。故经营商业，专为个人生计计，又非可已者。然斯非易事也，得其法固可获厚利，否则并小小资本亦将消耗，因之因循者久之。”^③

陶成章将拟经营的四种商业，一一向李燮和和胡国梁说明。“一、教科书籍、图画、科学仪器、体操音乐器具等。书籍由弟等自行编辑出版。图画可向图画店办特别交涉，照前日成例，凡五十元以上四折，以下四折半。科学仪器、体操音乐器具等，则有上海科学仪器馆东京坐办张之铭君处可以探问。张君系浙江宁波人，居东京已有八年之久，与弟交情素厚，且又甚重（陶成）章耐苦者，其必能为特别尽力也无疑。二、学校用品，若钢笔、铅笔、洋墨水等，其一切交涉，亦可探之张君，盖科学仪器馆亦兼营此项商品也。三、杂货，若衣衫、

① 《复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8页。

② 《致李燮和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5页。

③ 《致李燮和胡国梁等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2页。

牙粉、洋皂等，须先调查土著嗜好，然后办货。此项交涉，可探之横滨华商。露清银行横滨支店经理宁波郭外峰君，素开通，近颇与弟等交好，横滨华商即可由彼介绍。四、代印书籍，代刻图章、名片等，此项亦可在东京办特别交涉。”^① 光复会会员大都在南洋从事华侨教学工作，陶成章拟经营的商品，也大都是文化用品，以及南洋居民的日用品。

陶成章还计划目前从事商业应办的六件事情。“夫经商之道，不外进货、出货两项。出货主自我，事尚易为。进货主自彼，稍不谨慎，损失随之。今进货一方面，既可与普通商人无异，所可办者一也。凡兴一事业，开创费最无谓，且非小数也。今石生君既将开设店面，即可于石生君店内另设一小店面，俟有成效，再移设泗水、吧城等埠，是出货处之开创费稍节省矣。日本坐办，即以杂志社充之，是进货处之开创费可无有矣。所可办者二也。教育杂志，弟等拟为维持久长，与此公司可相为表里。何者？今世界营商之得益与否，全视其广告行之远近为准。教育杂志四、五期后，势必普及南方各地，即可为此公司之广告机关，而教育杂志亦可因此公司推广其销路，所可办者三也。今南方诸同志行将设教育会以联络感情，苟一埠有一热心教员为之提倡，则此一埠之教育用品，必可尽入我手，所可办者四也。目下所难者，惟资本。弟意先定款六千，分三期交纳（若定款万金，则分五期）。半年一期，苟有十人合股，每人一期仅出资二百盾，所可办者五也。诸君意中必以此数为未足以经商者，其实非也。何者？初次办货，专择行本稍轻，销售较易者购之，若大宗图画、科学仪器等，则须俟他

^① 《致李燮和胡国梁等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3页。

人定购，始向日本进货，而定购者又须先纳半价，如此则即以他人之资，经我之商也。代刻书籍等亦然。所可办者六也。”^①陶成章提出建立专门的公司，从事商业活动，严把入口，慎重进货；逐步在南洋各埠开设店面，而日本的进货处可附设在《教育今语》杂志社内，以节省开办费；利用《教育今语》杂志登载广告，扩大商业公司的影响；依托拟在南洋各埠成立的教育会，推销公司的文化用品；先行筹集经营资本 6000 元，分三期缴纳，若筹集 10000 元，则分五期缴纳；不够的资本，可采购价廉易销的商品出售，若是大宗商品订货，则可要求订户先支付半价定金，以弥补流通资本的不足。

陶成章还分析了成立商业公司的三大有利条件：“诸君每月进款，若无存储之所，势必耗诸无形之中，甚可惜也；苟公司成立，即以之为公司资本，积少成多，其利一也。开通民智，全恃图书，公司成立，一切图书即可由我意输入，南方各地势将日有发达，其利二也。南方印书非易，苟公司为代印，凡教员学生，均得发表其意见，其利三也。”^②

然而，陶成章的经商计划并不顺利，经商也不是陶成章的专长。陶成章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经商一节，弟当出全力以相助，无论若何，必使成立而后已。但此节又非弟之所长，须赖老哥及福生兄为之耳。弟只可以提倡而已。”李燮和也为重组后的光复会的经费短缺而伤透脑筋，但是，对于漂泊异国他乡，一文不名的书生来说，经商营利又谈何容易。为此，陶成章也不得不安慰李燮和，“祈老哥善自珍重，勿以经商目的

① 《致李燮和胡国梁等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44 页。

② 《致李燮和胡国梁等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44 页。

之不能遽遂，多生烦懣，致生理有碍也。”^① 由于武昌起义爆发后，陶成章和李燮和等南洋光复会员回国参加辛亥革命，陶成章的经商计划未来得及付诸实行。

第六节 储备人才

光复会重组后，陶成章认为不必急于求成，应从长计划，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入手。陶成章在致南洋光复会会员的公函中，谈到“弟本意会必设立，必不汲汲扩张，以教育为进取，察学生之有志者联络之，如是而已”。陶成章“本欲专主个人运动，以教育为根本，苟得二三有资本之学生赞成，则已足也。”这样，有三方面的好处，“一、易于秘密；二、可以专决，可缓可急，不成亦无大害；三、不招人忌。”^② 陶成章主张在南洋兴办教育，为革命储备人才，还准备南下南洋，亲自从事教育工作。“弟明年欲再南下一次，提倡教育，劝人多设学堂，为后人开门径。”^③

陶成章等人宣布孙中山的“罪状”后，无论是在东京，还是在南洋，支持的人都不多。南洋许多地方的同盟会会员也进行了抵制，陶成章对此感到异常苦闷，寄希望于发展华侨教育，培养革命人才。陶成章在致李燮和的信中谈到“弟思南洋局面，已败坏到极点，一切均难收拾。惟教育一方面尚可着手，请兄速为注意，否则恐日后更不堪设想也。弟思事已无可

① 《复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2页。

② 《致南洋光复会会员公函》，《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5页。

③ 《复李燮和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2页。

奈何，索性再忍耐一年半，请与魏君商之，请彼前来襄助。如兄有事他往，彼可以代兄之任。弟与魏君同事最久，深知其最富于忍耐性及坚忍性，其他则张烈君及屠仲谷君均可。凡八港门皆须极力整顿，即令目前无效果可以收得，日后学生长大，必有可望者，功固不必及身而成也。”^① 陶成章对于从事革命运动，有着极为长远的计划。

陶成章“已与深于中国学问，及日本物理学校毕业生深于数理、化学者议定，可以南来”^②。陶成章介绍不少革命党和进步青年赴南洋任华人华侨学校教员。

陶成章介绍张云雷赴南洋从事华侨学校的教育工作。张云雷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陶成章和黄溯初就建议张云雷去南洋群岛。

陶成章分析了南洋群岛的有利条件：“两江总督端方很厉害，江浙革命目前已处于低潮，南洋群岛华侨多，离中国近，要开辟起来作为中国革命活动的场所。”

于是，张云雷便准备前往南洋群岛，先抵新加坡，再赴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到华侨办的中华学校当了四年教员。

辛亥革命前夕，张云雷准备回国参加革命斗争，陶成章又介绍陈陶遗继任泗水中华学校教员。陈陶遗原名陈道公，1908年曾与陶成章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被同盟会会员朱少屏无意中泄漏了秘密。陈陶遗刚离开租界，即被端方所派的特务逮捕。陈陶遗在狱中关押了两年，才被端方释放。由于端方号陶斋，陈陶遗认为自己是端陶斋刀下所遗，故改名为陈陶遗，而

① 《致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6页。

② 《复丁荣李燮和沈琨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5页。

不再用陈道公了。陈陶遗出狱后，由陶成章介绍到南洋任教。张云雷回忆：“黄花岗举事前，我已得到消息，那是因为黄兴来约李柱中去，李柱中又来约我。陶成章听说我急于回国，连忙介绍来一个松江人陈陶遗来替我的缺。”^① 陈陶遗直到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才来到泗水，张云雷急忙搭上一艘前往上海运输糖类食物的华侨商轮回国。

皖浙起义失败后，光复会会员王文庆也受到通缉，被迫亡命国外，陶成章也介绍王文庆到南洋任教。陶成章在致李燮和的信中，提到“兹有同志王君文庆尚无位置，乞兄在文岛代为设法处置之”^②。由于王文庆普通话不标准，人又爽直，陶成章要李燮和予以特别关照。“王文庆兄人系极可靠之人，然教育之事非其所长，算学甚佳，体操则兵式者佳，惟语言多操台州土音，甚觉困难，人又太率直，易受吃亏。乞吾兄为之左右之，或另托可靠之人，为人左右其间，则幸莫大焉。”^③ 王文庆来到泗水的中华学校任教员。王文庆在泗水发展华侨教育，宣传光复会的宗旨，许多华侨青年因此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受徐案牵连的沈钧业，也是由陶成章介绍到泗水华侨办的《汉文日报》任主编。沈钧业，字馥生，也作复生、复声，浙江绍兴人。曾入绍兴府学堂求学，后来被聘为大通学堂教员。徐锡麟和陶成章赴日拟进振武学校时，沈钧业也一起同行，并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徐锡麟赴安庆后，因与之有师生之

① 张云雷：《辛亥革命见闻琐谈》，《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② 《致亦達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6页。

③ 《复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7页。

谊，双方往来书信频繁。皖案发生后，清方搜出“沈钧业致徐匪书八件，多有谋皖之语”。清方到绍兴张墅搜捕未获，得知沈钧业在日本东京，又要驻日公使杨枢设法密捕。沈钧业曾在《民报》社工作，后又在大阪商会任事。1910年1月，沈钧业在陶成章的介绍下，来到南洋。沈钧业“是徐锡麟的学生，徐锡麟事发后，也被牵连在里头，幸好逃出来，经陶成章先生介绍在泗水华侨商会办的《汉文日报》当主笔”。《汉文日报》有4个兼职的员工，一位是商会副会长，二位是商会的秘书，张云雷也在报社兼职。沈钧业在《汉文日报》发表《故国不堪回首》等论文，报馆的大部分事情，都由沈钧业一人负责，“沈复生不愧为好主笔，报馆大部分的事都由他一个人担当。这个报纸除了商业的内容之外，主要是介绍国内革命情况，在华侨中间宣传鼓吹革命。”^①当光复会与同盟会发生意见分歧时，沈钧业曾写信给陶成章进行劝解。陶成章表示赞同，并复信说：“兄所言‘与其虚言实事，不如实行虚事’是乃至理名言。所可惜者，光阴易逝，精力虚耗，为可悲耳。”^②陶成章同意沈钧业的意见，表示以后不再与孙中山争辩。

陶成章准备再次重返南洋时，准备与招聘的四名教员一起同行。与陶成章“偕行之人如下：一、陈君仲权，二、张君焕伯，三、徐君澄如，四、李君浩然。内李君为西医，在湖洲设立有医院，近拟南来先作教员，后再设法开医院云。陈君又善作文，张君长于科学，徐君善于体操，皆极热心之士也。”此外，经过陶成章的多方活动，前往南洋从事华侨教育的内地

① 张云雷：《辛亥革命见闻琐谈》，《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② 《同龚宝铨复沈钧业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5页。

教师越来越多，“尚有处州李君志成及周君咏仁，周君系武备出身，在营有年，系熟悉情形者，亦将南来。弟恐人才拥挤，请其缓行一步，后弟等半月而行云。祈兄等速为代谋位置，免至多延搁日子，至令经费困难云。又志士愿来南方相助者，极多极多，弟不敢多招，均约其弟到南方后，再看情形云。”^①光复会在南洋逐渐打开局面，许多革命志士和进步青年纷纷南下，南洋华侨的教育呈现蓬勃发展势头。

陶成章还重视发展南洋的女子教育，并向南洋的光复会会员推荐女教员。陶成章向李燮和推荐张焕伯和徐澄如的夫人到女子学校任教员。“至于女学堂之事，若能成功，则焕伯、澄如二君夫人，皆可作教也。”^②另外还推荐了一名绍兴同乡作女教员，“又有女子大学校本科师范毕业生陈君，为弟同乡，绍兴山阴人氏，学问甚好，人亦能干，可以南来。”再加上“张焕伯之夫人，亦可南来”。这样，“则女学亦可兴办也”。但陶成章表示“此事当俟弟南来与诸兄议定而后运动之，若果成立，不患无效果可也”^③。

陶成章也在东京编撰教科书，以便作为南洋华侨教育的教材。“小学历史教科书已编至九十课，一周前后，决可寄出。又有简易历史教科书一，尚须稍改，或可同时寄出。此简易教科书，乃为半日学堂及书报社讲习所用者。其他小学地理及高等小学地理，并高等小学历史，皆当为陆续编之寄奉也。大约

^① 《致丁荣王文庆李燮和等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7页。

^② 《致李燮和等书》，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8页。

^③ 《复丁荣李燮和沈琨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5页。

不出中历十月，决可寄上。”^① 陶成章准备再次赴南洋时，也表示要谋一自食其力而行动又较为自由的位置，从事教育工作。“如未有，弟将寄居寺院，多著几部历史、地理教科书，以益后进，而助教育精神之发挥。盖弟近立定主意，不为虚耗金钱之事，更不为无益之举而虚耗其精神。实事求是，以图渐进，不为躐等也。”^② 陶成章奋笔疾书，编写教科书，为发展南洋的华侨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七节 捐弃前嫌

光复会领导人与同盟会领导人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在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大目标上，双方没有任何分歧。“革命潮流既澎湃于中国，革命党在内地起义者，如黄花岗等役，轰轰烈烈，声震寰宇，光复会即由章、陶诸先生严密组织志士英才回内地谋职或捐官，渗入国内清政府机关握权，乘机从内地起事。”^③ 1910年，同盟会领导人倡议发动广州起义，光复会领导人积极予以配合。“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黄花岗之役，七十二烈士光荣牺牲，一时轰轰烈烈，声震寰宇。光复会内，章炳麟、陶成章也密谋起事。”^④ 黄兴“力劝柱中及文岛诸同志消除意见，为国合作，柱中等素敬仰

① 《复李燮和沈钧业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0页。

② 《复李燮和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0页。

③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2页。

④ 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24页。

克强，从之”^①。李燮和表示赞成，又“致函陶成章等人，希望大家以革命大局为重，届时在江浙地区采取配合行动”^②。陶成章表示支持，并指示光复会全力以赴予以援助。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广州起义的筹备会议，黄兴、胡汉民、孙眉等同盟会会员参加了会议，南洋群岛以及东南各省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光复会的赵声、李燮和等也应邀参加了会议。李燮和由光复会推举为南洋代表，从荷属榜甲岛起程赴会。孙中山主持了大会，与会同志就如何筹款问题进行了讨论。为了“避免英国和荷兰国居留政府的干涉，便假托用中国教育义捐名义筹款。当下决定了英属捐五万元，荷属五万元，暹罗和安南各捐三万元，总共计有十余万元之多”^③。并决定以新军为主发动起义，然后，由黄兴率一军进攻湖南和湖北，赵声率一军出江西和南京，长江各省也举兵响应，会师北伐。

槟榔屿会议后，光复会竭尽全力在南洋发动华侨为广州起义募捐。李燮和回南洋后，召集榜甲岛各埠光复会员开会，“报告会议内容，大家非常高兴，就照此次会议的方法，向荷属侨胞筹饷。公推黄甲元和温庆武二同志负专责。筹了几个月，仅筹到一万块钱，可见筹饷之事，很不容易。”^④ 荷属榜甲岛各埠均办有中华学校，担任教员的李燮和、陈方度、易本

① 《光复会》，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页。

② 李兴藩、李兴藻：《追忆先父李燮和》，2004年版，第18页。

③ 胡国梁：《广州起义别记》，《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4页。

④ 胡国梁：《广州起义别记》，《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4页。

羲、何震生、王文庆、沈琨、李天麟、胡国梁等都是光复会员，获悉广州起义筹款陷入困境后，再次发动荷属各地华侨捐款。迄1910年冬，泗水报告已筹5万元，八打威筹得1万元，文岛可筹2万元。荷属群岛实际筹款3万余元。“是役荷属同志共募款三万余元，燮和与有力焉。”^① 由于同盟会和光复会精诚合作，筹款数目大大超过原定的计划。黄兴为此特别感谢负责南洋筹款的各位革命党人，“幸南洋各志士担任筹款者极形踊跃，得十余万元。”^② 实际收到捐款为荷属南洋32550元，英属南洋47663元，美洲77000元，合计157213元，另外安南和暹罗筹款具体数目不详，约为30000元左右。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光复会还有三十万元华侨捐款由李燮和存放在香港。

南洋的光复会会员也应邀参加了广州起义。1911年初，王文庆和李燮和就离开榜甲岛，前往香港报到。“辛亥三月，黄兴以书召燮和，会于香港，遂有广州之役，同人殁焉，世所称七十二烈士者也。”^③ 据李燮和之子回忆：“当时兴潇出生不到半岁，先母家务繁忙，身体虚弱，但她没有因身家利害去阻碍义举，而是将自己大部分积蓄捐助为军费，积极支持先父的革命行动，使他能及时去香港会晤黄兴、赵声等人。”^④ 李燮和等人“至广州诈炸巡警道王秉恩，以响应义师，因举事延

① 《光复军司令李燮和》，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7页。

② 黄兴：《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之前因后果》，《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7页。

③ 龚翼星：《光复军志》，《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9页。

④ 李兴潇、李兴藻：《追忆先父李燮和》，2004年版，第18页。

期而止，后由同乡张通典援助出险”^①。后来，黄兴又给尚留在榜甲岛的光复会会员发出“开学在即请兄速来”的暗号，胡国梁将起义的消息告知了榜甲岛的光复会会员，大家都非常高兴。胡国梁和柳聘农立即离开榜甲岛，与先期抵达香港的李燮和取得联系，并到香港广州起义的统筹部报到。

正在南洋的陶成章也应邀来到香港，积极协助同盟会发动广州起义。“当年三月，因黄克强在香港谋起义，电招李燮和、王文钦等返国。燮和文钦诸人，即电请公（陶成章）速归浙谋响应，于是公遄返。抵沪时，广州事败，处处惊心，人人痛苦，当时屠景曾、张云雷二人亦返国，舟经申江，公与燮和诸君均在焉。”^② 广州起义旋即失败，陶成章、王文庆与从广州撤出的李燮和等人相见，“大家对同盟会多次在华南地区起义失败，深表惋惜，认为光复会党人今后应当重视华东、华北地区起义的工作。”^③ 光复会决定将斗争重点转向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随后，陶成章与李燮和等光复会同人又返回上海，进一步商讨了光复会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

光复会会员还动员南洋的华侨青年参加广州起义，据张任天回忆：“陶焕卿重组光复会于南洋英、荷两属。王文庆在泗水任教，宣传光复会宗旨，泗水华侨青年纷然响应。一九一一年春黄花岗之役，死难者七十二烈士，有不少即为泗水华侨青年志士，他们就是受了陶、王的引导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当时王文庆原亦要参加是役的，因在海上阻于雾而迟到，被滞于香

^① 《光复会》，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页。

^② 《陶焕卿》，《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8页。

^③ 李兴潇、李兴藻：《追忆先父李燮和》，2004年版，第20页。

港。等到黄花岗起义事败，黄兴、胡汉民脱逃至港，王文庆即再进入广州，请姚桐豫设法营救失散的荷属华侨青年志士。”^①王文庆也受到清吏的追捕，幸好姚桐豫的掩护，才得以幸免于难。

广州起义以 86 位烈士血洒羊城而告终，广州起义总指挥光复会会员赵声也突然英年早逝。因赵声不明不白的逝世，又给原来弥合的同盟会和光复会之间的关系，投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广州之役，号称总司令者，实曰赵声，其事世多盛称之，其人皆故光复会员也。”^②广州起义失败后，赵声悲痛不已。胡汉民招待赵声饮食，赵声食后腹痛难忍，医生诊断为盲肠炎，因割治无效，于 5 月 18 日逝世。赵声先入光复会，后入同盟会，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对于赵声之死，有不同的看法。赵声家人认为“伯先既惜此役之挫败，复痛战友之牺牲，抑郁悲伤，一时并集。胡汉民邀往痛饮，而同盟会中异己分子嫉之甚，乘隙下毒，归腹痛如绞，入院诊断为盲肠炎，须施手术。伯先性至刚烈，拒施麻药，一任医生奏刀，神态自若。惜手术欠佳，缝后化脓，再度开刀，流血过多，病势危殆。同志哭之甚，伯先张目曰：‘吾负死难诸友也，雪耻唯君等。’嘱夫人善待老父，三呼岳武穆而歿，时辛亥四月二十日，年三十有二。”^③

而光复会也认为是同盟会故意对光复会会员赵声下了毒

① 张任天：《回忆陶成章与王文庆》，《陶成章史料》，1987 年版，第 64 页。

② 龚翼星：《光复军志》，《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99 页。

③ 赵启霖：《赵声革命事迹》，《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4 集），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03 页。

手。章太炎曾公开对报社记者披露赵声被害真相，将罪魁祸首直指胡汉民：“至辛亥三月，黄兴发难于广东，推赵声为主，赵君本亦光复会人也。尝以机密泄漏，侦得其踪，欲杀胡汉民之弟胡衍鸾不果。广州败后，一日，胡汉民邀赵君会食，食后赵君腹遽痛，赴医院剖割两次，俱不能愈，竟以毕命，外间颇有烦言指责。”^①

陶成章也怀疑赵声之死，是胡汉民下的毒手，并进一步加深了对同盟会的猜忌。“伯先治军严肃，为广州人忌，发愤致死，或疑为被毒，焕卿尤恨之。”^② 再加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光复会牺牲的人很多，这一批都是陶成章招集过来的。黄花岗起义的失败，使光复会的一些精华损失殆尽。”^③ 同盟会与光复会原本愈合的裂痕，因黄花岗起义的失败以及赵声的不明不白地死去，又加剧了。

① 章太炎：《光复会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8页。

② 章太炎：《自定年谱》，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8页。

③ 王仲萃：《太炎先生二三事》，陈平原 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第十一章 光复东南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光复会没有因为烈士血洒羊城而气馁，而是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开展革命活动。陶成章和光复会骨干分子返回上海，作出了光复东南的重大决策，派李燮和到上海，王文庆到杭州，许雪秋到汕头，并在上海组建“锐进学社”，由尹氏姐妹负责，作为光复会在内地的联络机关。陶成章部署完毕后，又返回南洋，继续发展光复会的组织，加紧筹集款项，迎接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高潮。武昌起义后，光复会立即以陶成章的名义号令东南，发动武装起义，占领上海，光复杭州。陶成章从南洋赶回国内，当选为浙江军政府参议部参议，倡议进行北伐，攻克南京，直捣黄龙，推翻封建专制统治。

第一节 建立学社

上海是光复会的创建地，一直是光复会活动的中心。1911年，陶成章来到上海，在法租界平济利路良善里166号设立了光复会后期的总机关，即“锐进学社”。由于“光复会的秘密革命活动，不能在清朝统治下的地区进行，只有在租界里才有

活动余地。上海虽有英租界（也叫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但对党人的侦缉，英租界较严，法租界较宽，所以，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陶成章在法租界平济利路租屋设立一个从事革命秘密活动的机关，取名‘锐进学社’，就是用两姊妹名字中的各一字合以为名，由尹锐志姊妹住在里面，负责日常一切光复会中的事务”^①。陶成章之所以以尹氏姐妹的名义，组建“锐进学社”，是因为女同志的身份便于掩护光复会的革命活动。“因为那时候清政府搜捕革命党人甚严，单身男子去租屋，屋主怕惹是非，不敢答应，所以革命党人租设机关，都由女同志出面。”^②除“锐进学社”外，其他革命分支机关也大都以女同志的名义租借房屋，以研究学术或办理书报为借口，开展革命活动。

尹氏姐妹是浙江嵊县人，世居城关镇北门西乡。1906年，秋瑾通知尹氏姐妹来到上海，在虹口祥庆里设立“蠡城学社”，作为光复会的秘密机关。

1908年，陶成章来到上海，联络革命志士，并与尹氏姐妹取得联系。陶成章“专致力革命，深沉多谋，在沪与各同志等相集数月，启迪革命意识，指示革命筹策，此外无他言，同志等敬仰之为光复会继承领袖”^③。陶成章激励光复会同人勿因皖浙起义失败而气馁，继续完成徐锡麟和秋瑾等光复会先烈未竟之志，坚持反清事业不动摇。尹氏姐妹深受鼓舞，决心

① 周进三：《尹锐志和周亚卫》，《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页。

② 杨镇毅：《光复会和光复军》，《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页。

③ 《锐志回忆录》，《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7页。

在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等人的领导下，继承先烈遗志，完成光复会的革命事业。为了更好地开展武装斗争，姐妹俩学会了制造炸弹的技术，开始在上海秘密试制炸弹。

资产阶级革命并未因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而销声匿迹，反而持续高涨。陶成章经常往来于日本、南洋和上海、杭州之间，策划光复会的武装起义。“丁未之役，虽事业未得如本会计划之所定，而全国革命思潮从兹突形高涨普及，本会各方同志之精神亦益坚定。惜乎领袖秋徐二先烈皆已就义，陶公常赴各省及南洋各国，行止无定。”尹氏姐妹返回上海之后，没有经济来源，不得不穿行于舟、车、旅馆之间贩卖书报，一方面藉此联络革命党人，另一方面也可维持生活，救济经济困难的光复会会员。1911年6月，陶成章来到上海，鉴于“在沪同志无集会定所，而对外联络尤感不便”。陶成章等人议定在上海法国租界平济利路良善里166号设立固定联络机关，由尹氏姐妹具体负责，并以尹氏姐妹之名，称为“锐进学社”。“表面仍以一阅览书报之文化组织，而实际则为光复会之总机关。”^①“锐进学社”像小型的阅览书报的民间文化机构，实际上是光复会在国内联络苏、浙、皖、赣、闽五省和南洋及海外光复会员的总机关。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陶成章“偕燮和、文庆赴沪，晤女士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于秘密机关，会商再举”^②。陶成章与李燮和等人在“锐进学社”商讨了光复会发动武装起义的计

^① 《锐志回忆录》，《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8页。

^②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

划，决定“留许雪舟部于潮汕，派李燮和赴吴淞活动，派王文庆赴杭州，恢复光复会，运动新军入会”^①。陶成章在沪上制定光复东南的计划后，再度赴南洋发展光复会的组织。“锐志姊妹以电招先生。”陶成章再次返回上海，与尹氏姐妹在“上海法租界平济利路良善里，组织锐进学社，发刊《锐进学报》，以为内部交通之所”^②。并于1911年8月，印发了“锐进学社简章”，共19条。“学社”是革命机关的暗号，“书报生意”则暗指革命活动，而“印刷机器”特指武器。“锐进学社”以研究学术，经营杂志、书报和文具作为掩护。内部秘密设立了制弹室、印刷所、接待室、阅览室、招待所、办公室，还专门办有《锐进学报》。

“锐进学社”在杨树浦长浜路3号联合山庄及附近高廊庙和法租界赖格纳路两处设有秘密机关，由江苏吴江人甘成志和浙江临海人王文庆的堂妹王素常负责。后来，又在附近的嵩山路维昌洋行和江西路设立秘密机关。嵩山路离赖格纳路很近，建有沈宅（沈克刚宅），一楼是瑞典人开办的贸易商行，进口机械电器，出口中国产品。“锐进学社”通过维昌洋行购买枪支弹药。维昌洋行二楼是“锐进学社”宿舍，设有制造炸弹的秘密工场。

“锐进学社”的具体负责人就是光复会的两个女杰尹锐志和尹维峻姐妹。“由于陶成章本人常在国内各地和南洋奔走，无暇常驻上海；而后期光复会会长章炳麟专心学术，于会务不

^① 张任天：《忆光复会王文庆》，《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

^②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

甚过问，所以光复会的实际工作落在尹锐志和尹维峻身上，她俩始终顽强不屈地坚守岗位直到上海光复为止。”^① 尹氏姐妹在恶劣的环境中，含辛茹苦地经营“锐进学社”。

“锐进学社”作为光复会的内部交通机关，成为光复会发动上海起义，光复杭州，攻打南京，北伐徐州的大本营。据樊光回忆：“武昌起义后，既由陶先生所设立之锐进学社为本营，以李燮和、尹锐志、尹维峻为首，会同陈其美等攻取上海制造局，光复上海。又由尹维峻、王文庆等赴浙发动朱瑞、吕公望等光复杭州，方於笥等在嘉兴反正。我与周华昌、吕东升等在处州起义，而浙江各旧府属均同时起义，各设军政分府，类皆为成章先生平日所布置策动之人。嗣又由朱瑞率领浙军敢死队北伐，以马郡等处进兵，百战攻克天堡城，驱使张勋宵遁，光复南京，得以召集各省代表组织临时参议会，选出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推翻清朝，改定国体为中华民国，宣布五族共和，颁布临时约法，以开民主共和基础，而结束二千数百年封建专制之局。”^② “锐进学社”在光复东南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第二节 上海起义

陶成章在南洋发展光复会的组织，发动华侨踊跃捐款，支援上海起义。“成章先生于辛亥夏曾又赴南洋各地，发动华侨

^① 裘振纲：《光复会又一女杰尹维峻》，《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②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3页。

捐款，资援国内革命，又成立多处光复分会，陆续筹募巨额捐款，汇归国内供革命起义饷款，如第九镇统制徐固卿、上海陈其美、李燮和等，即得其接济以举事。”^① 陶成章将发动上海武装起义的重任委托李燮和具体负责。“武昌起义以前，李燮和即衔陶成章、黄兴之命，到上海策动新军，为东南大起义作准备。”^② 隐居在汉口的李燮和获悉革命党人要发动武昌起义的消息后，认为“民军首举武汉，已扼全国中枢。而上海吴淞为东南门户，得之则长江以南可传檄而定也”^③。1911年10月6日，李燮和到达上海，与王文庆、陆翰文、尹锐志、尹维峻等人在“锐进学社”规划革命方略。清廷原拟10月在直隶的永平举行陆军阅兵式，王文庆和陆翰文等获悉后，鉴于新军中有不少革命党人，若事先与之联系，届时可举兵反正；且永平靠近京城，挟新军以擒贼擒王，能够一举倾覆清廷。王文庆等人正拟电告李燮和，恰好李燮和已抵沪上。李燮和持反对意见，认为“事将不在北，何必舍近图远，此即用武地也”^④。李燮和仍坚持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于是，李燮和一边致函南洋请求接济军饷，一边募集敢死队，购买短枪火药，制造炸弹。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的革命党人跃跃欲试，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予以响应。然而，上海的形势异常严峻，敌我双方

①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4页。

② 张任天：《我所知道的陈其美》，《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页。

③ 李燮和：《光复军事略》，《近代史资料》（总57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④ 钱基博：《辛亥革命江南光复实录》，《辛亥革命》（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

力量相差悬殊，“清兵屯集沪淞，起外海暨江阴，扼塞防守，水陆近万，营制将卒皆累旧，民党鲜通声气，不与列省常备新军比，计商进行，久不决。”^①李燮和等人讨论上海的进行方略时，无成兵宿粮可凭借，众皆有难色。

清政府派遣海军提督萨镇冰和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以及所部兵舰会攻武昌，清军水师主力皆赴武昌，淞沪的防备遽然松懈。李燮和见时机成熟，决定分途进取，王文庆往杭州，章梓去江宁，柳承烈和张通典奔苏州，李燮和则留上海，准备封锁淞沪，扼守江海关口，阻挡萨镇冰所部海军上驶，截断武昌后援。王文庆到杭州后，在嘉兴、湖州等地招募党人，并派遣百余人赴沪，由李燮和派往淞沪附近各府州县，届时响应。李燮和另以中国体操学校和龙门师范学校投效来的学生作为主力，编成敢死队，散居于英法租界。

如何发动上海的军警起义，是上海起义的关键。李燮和将策动军警起义，作为工作的重点。军警大都为湘籍子弟，李燮和通过同乡关系进行联络。李燮和得知湖南湘乡人黄汉湘任吴淞巡官，行侠好义，乡土观念重，早有反正之心。李燮和遂遣体操学校的学生将黄汉湘召来，两人一拍即合，相见恨晚。黄汉湘久闻李燮和的大名，敬重李燮和的为人，表示愿意效命疆场，李燮和将吴淞的军事大权委托黄汉湘负责。黄汉湘向李燮和推荐闸北巡逻队队官陈汉钦，李燮和请陈汉钦面商大计，陈汉钦处事稳重，态度迟疑，不愿前来。李燮和只得亲自赴陈汉钦公馆，定约而归。随后，“沪淞一带兵警，皆隐附燮和，燮

^① 龚翼星：《光复军志》，《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00页。

和卒以此一举而兼举两地，因始得黄汉湘、陈汉钦之力也。”^①最后只剩下张士珩控制的江南制造局卫队及其相关部队，约500余人，仍敌视革命党人。李燮和后来还派人与制造局卫队取得联系，卫队士兵表示愿做内应。经过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共同努力，上海起义前革命力量已大大超过了反革命力量，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群起响应。光复会加紧了发动上海武装起义的步伐。李燮和获悉清军海舰五艘正准备运送江南制造局的枪械弹药上驶武汉，以接济冯国璋军的消息时，震惊异常。11月2日，李燮和与陈其美等人在上海《民立报》社开会，商定11月3日午后四时，各军营皆易汉帜，以示独立。李燮和负责进攻闸北和吴淞，陈其美则负责进攻上海县城，然后双方会师共同攻打江南制造局。光复会连夜准备《安民告示》，赶制光复军白旗，约定届时举火为号，军士均缀白布条为标识，又派遣敢死队员送光复军白旗到吴淞，通知黄汉湘起义日期。上海则由陈汉钦通知各营，共举义旗。

11月3日，闸北巡警提前起义，巡警总局首先挂出光复军旗帜。午后，各军营均按计划易帜反清，沪城内外各商团也起而响应。黄汉湘也在吴淞如期反正，并建立吴淞军政分府。上海道刘燕翼已先避往洋务局，只有江南制造局还控制在张士珩手中。陈其美独自率商团部分民军及刘福标所带敢死队，乘江南制造局五时下班之时发起进攻，因敌众我寡，攻击受挫，陈其美也被捕。李燮和闻讯后，立即召集陈汉钦等人在“锐

^① 龚翼星：《光复军志》，《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02页。

进学社”商议救援对策。11月4日凌晨，各路人马按时会集龙华镇。李燮和身先士卒，冲锋陷阵，部队有20多人阵亡。上海最后一个封建堡垒被攻克，张士珩逃之夭夭，陈其美安然无恙，上海胜利光复。李燮和被推为上海起义军临时总司令，移驻江南制造局。

第三节 光复杭州

广州起义失败后，陶成章等光复会领导人返回国内，商讨光复东南的武装起义计划。陶成章与李燮和、王文庆“至杭州，潜会党人于西湖白云庵，设机关部于杭城”^①。陶成章在杭州设立了光复会的秘密机关，并派王文庆到杭州联络新军作为革命力量。“王文庆到杭，即以光复会名义运动新军，开始是士兵，接着是军官，纷纷入会。”^②陶成章则在南洋筹募款项，从经济上援助光复浙江。“杭州并江浙各重要地方起事者，亦皆得其支援之力为多。”而“在上海、松江、杭州首义之敢死志士，亦类皆成章先生平时推心置腹所联络之志士”^③。而参加光复杭州的敢死队员，很多也是陶成章培养的光复会会员。

浙江原来就是光复会的大本营，也是会党徒众出没之所，经过陶成章等革命党人的联络，会党大都具有革命思想，有较

① 龚翼星：《光复军志》，《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9页。

② 张任天：《回忆陶成章与王文庆》，《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64页。

③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4页。

好的群众基础。自从徐锡麟和秋瑾遇难后，光复会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打击，作为前期领导浙江革命的绍兴光复会中枢已不复存在，而作为前期光复会的主要革命力量会党，也因众多领袖或被捕牺牲，或遭通缉四处流亡而陷于沉寂。然而，以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并未消沉和退缩，而是在曲折中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并呈现新的特点。光复会组织及其成员仍在各地自发而分散地开展活动，并在局部地区与同盟会携手合作；光复会的革命力量的分布，不再集中以绍兴为中心的地区，而是蔓延到全省广大的区域；革命力量的成分，也不再局限于学界和会党，原来扮演次要角色的新军，现在也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武装斗争的主角。

皖浙起义失败后，光复会适时调整了浙江革命发展的战略。1908年以后，光复会在浙江新军中的革命势力发展迅速。1908年3月，光复会借营葬秋瑾的机会，秘密集会，总结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并讨论了今后浙江革命进行的策略，“鉴于徐锡麟无军队响应，致遭失败，议定此后革命运动，宜注全力于军队方面。”^①光复会开始从过去只依靠会党进行武装斗争，转向以新军为主要革命力量。新军不仅有近代军队所具有的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较强的战斗力，还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武昌起义前夕，光复会在驻杭新军、宪兵和巡抚卫队中，发展许多中下级军官加入光复会。光复会的组织很快就从新军向宪兵营和巡抚卫队发展，迄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已在新

^①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辛亥革命》（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

军中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组织系统。驻杭新军的革命党人由管带官朱瑞、韩绍基、顾乃斌以及吕公望等人组成“上级会议”，作为新军中的革命党领导核心，与上海的光复会和同盟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由担任各营队官的革命党人如俞炜、童保暄、王桂林、傅其永、孙昭道等人组成“中级会议”，成为革命党人组织中的中间阶层，直接联系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中的革命党人。每当革命工作作出决定后，就由低一级的会员分头负责执行。各营、队中均有革命党人的代表，经常召集会议，讨论革命进行的方法。此时，“章太炎、蔡元培、蒋观云、张人杰、陈其美、陶成章诸先生，或联系华侨，或结合同志，兴办报社，筹措经费，或联系各府会党，鼓吹革命。至武汉起义前夕，浙江革命势力，实已布满了全省。”^①至1910年，革命党人已基本上控制了驻杭新军。

武昌起义爆发后，杭州的光复会连续召开光复会员会议，讨论光复杭州问题。“王文庆在杭亟谋响应，连日召集光复会会员会议，第一次（10月13日）在白云庵；第二次（14日）在凤林寺；第三次（15日）在城站二我轩照相馆楼上。”10月20日，李燮和从上海来到杭州，与王文庆等人在吴山四景园茶室召开了光复会第四次会议，李燮和提出：“时势已急，杭州必须响应，由光复会主持。否则，上海将另派人来。”^②参加会议的新军将领下定决心，表示听从光复会的命令，作好发动起义的准备。同盟会与光复会经过多次协商，最后共同制定了光复杭州的武装起义计划，由吕公望赴处州、金华等地联

① 傅墨正：《辛亥革命杭州光复的回忆》，《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页。

② 张任天：《回忆陶成章与王文庆》，《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64页。

络会党，攻打富阳，以策应杭州；由王金发回嵊县召集人马组织敢死队；由屈映光到宁波，通知新军42标的革命党人届时响应杭州起义；由吴思豫负责游说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新军82标标统周承葵加入同盟会。迄杭州武装起义前夕，“新军中上至官长，下至士兵，皆期待举行。”^① 驻杭新军基本上成了革命武装。

11月3日晚，传来上海武装起义的消息，杭州的革命党人连夜召开会议，制定了发动杭州起义的具体作战计划。在城站设立总司令部，推举童保暄为临时总司令。11月4日晚10时，城内的新军工程营首先行动，切断了电报线和电话线，占领了电报局和电话局，并在全城贴满了革命军起义告示，占领并打开了艮山门和望江门新城门，等待南北两支主力部队入城。驻笕桥的81标和驻凤山门外馒头山的82标也分别发布命令，紧急集合。全体官兵臂缠白布，手持武器，齐集操场。长官宣布革命宗旨和起义命令后，从驻地向城内进发。至11月5日晨，杭州全城已基本光复，大街小巷均张贴浙江临时都督童保暄的光复通告。唯有旗营还在负隅顽抗。为了减少无谓伤亡，革命军方面主动停战，并邀请杭州驻防协领贵林出营谈判，双方达成停火协议。晚上7时，革命军代表傅孟和楼守光至旗营收缴枪械，至此，杭城全部光复。革命党人方面，除了光复会会员陈国杰受伤之外，别无死伤。陶成章“号召旧部，浙江光复，公之力也”^②。

随后，浙江各地也纷纷以各种方式宣告光复，仅仅半个月

① 黄元秀：《辛亥浙江光复回忆录》，《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7页。

② 《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3页。

的时间，全省 11 府便实现了光复。

第四节 推选浙督

武昌起义后，推翻了清政府所派的总督，革命党人推举黎元洪为湖北都督，随后，湘粤赣等省光复，也沿用都督之名，或由革命军推戴，或由各界推举。杭州光复前，光复会就曾议过浙江都督的人选，顾乃斌邀请朱瑞、黄元秀、吴思豫、褚辅成等 10 余人商讨，考虑到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需要有资望的人来主持工作，而汤寿潜在争回浙路自办运动中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被认为是浙江都督的最佳人选。

1911 年 11 月 2 日，杭州起义前夕，褚辅成请已倾向革命的浙江谘议局副局长陈时夏前往上海，迎接汤寿潜来杭州。下午 3 时，汤寿潜在陈时夏、高尔登、王清夫等人的陪同下，到达杭州。各界立即在谘议局开会表示欢迎，并正式选举汤寿潜为浙江都督。

11 月 6 日，汤寿潜宣布了浙江军政府名单，周承蒞任浙军总司令，原谘议局议长陈黻宸任民政长，沈钧儒任交涉长，褚辅成任交通长，汪曼锋任巡警长。五人中有三人就是原来的谘议局议员，只有褚辅成是光复会会员兼同盟会会员，周承蒞在杭州光复前夕才加入同盟会。革命派对排斥革命党人的安排极为不满，尤其坚决反对起义前夕还反对独立的陈黻宸任民政长。

11 月 7 日，革命军各军官和参加光复杭州的各地领袖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重新组织军政府问题。会上，王金发倡议：

“秋瑾被害，喧传汤寿潜曾赞一词，不应举为都督。”^①王金发要求另外改选都督，得到不少光复会会员的支持。原来，光复会认为秋瑾被害，与汤寿潜有关。而王金发在秋瑾被害后，又受到牵连。王金发刺杀了向贵福告密的绍兴“劣绅”胡道南，也曾计划暗杀汤寿潜。“金发为了替秋瑾报仇，还曾准备杀了汤寿潜。盖秋瑾之死，乃因郡守贵福得胡道南之告密，于五月二十七日到杭州面禀巡抚张曾敷，说秋瑾遭竺绍康、王金发等纠集浙东‘会匪’，将于六月初旬袭取绍兴县城，请速派兵前往拿捕，据传张曾敷曾以此事询之汤寿潜，汤竟加以怂恿，张曾敷乃漏夜派兵前往绍兴，秋瑾因以遇害。后来王金发每提及此事，即义愤填膺，欲杀汤为秋瑾报仇，商之于陈其美，陈其美则力加劝止，说汤是浙江‘人望所归’，杀之于革命不利，力阻金发，汤始得不死。”^②

秋瑾遇难后，光复会准备为秋瑾复仇。尹锐志和尹维峻曾在绍兴以办女学作为掩护，拟铲除杀害秋瑾的刽子手，汤寿潜曾被列入暗杀名单，考虑到汤寿潜在苏杭甬的护路斗争中，深受苏浙人民爱戴，光复会最后放弃了暗杀汤寿潜的行动。但是，由这样一位有参与杀害秋瑾“劣迹”的人出任浙江都督，显然不合适。

陶成章对汤寿潜参与杀害秋瑾，深信不疑。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有过详细的叙述：“秋瑾既自沪旋绍，不知以何因缘，改五月二十六日师期为六月初十日。先是绍兴士绅

①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辛亥革命》（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6页。

② 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既有恨于瑾，又因师期屡改，密谋尽露。于是绅士胡道南等密禀知府贵福，贵福也已早有所闻，因未知其确，不能发难。至是，遂上省请兵。比到杭城，先见巨绅汤□□，□□素恨秋瑾，力怂恿贵福去之。贵福便面禀浙抚张曾敳，曾敳使其幕友张让山询之□□，□□答曰：‘是等人，不杀何待。’让山以复曾敳，已复从中下石，曾敳之意乃决，遂徇贵福之请，使贵福先归，预为措置。”^① 文中提及的“巨绅汤□□”，就是指汤寿潜。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两次提到汤寿潜在杀害秋瑾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先是绍兴知府贵福获悉秋瑾准备“谋反”，但对秋瑾这样一个弱女子居然也敢干“大逆不道”的事心存疑虑，到杭州征求汤寿潜的意见，汤寿潜落井下石，怂恿贵福上告浙江巡抚张曾敳，加害秋瑾。接着，张曾敳得到贵福关于秋瑾“谋反”的密报，又派幕僚张让山征求汤寿潜对秋瑾“谋反”一事的处理意见，汤寿潜又怂恿张曾敳杀害秋瑾。也有人否认汤寿潜参与杀害秋瑾^②。

陶成章作为光复会杰出的领导人，他认为汤寿潜在秋瑾被害一案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难辞其咎，对光复会影响很大。因此，陶成章也反对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

汤寿潜之所以要陷害秋瑾，据说其原因有二，一为“徐锡麟在安徽刺恩铭，汤为徐捐候补道时以同乡京官同具保结之一，皖变事发汤惴惴不安，惧累及之，乃密讦于浙抚，力主封闭大通学堂，搜捕与徐有关系之人。”而其中就有秋瑾。二为“瑾素轻汤，时汤著有《盛世危言》一书，瑾购得，指摘其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

② 郑云山：《汤寿潜与“秋案”关系析》，《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疵，眉批迨遍，汤衔之。皖案发，乘机告讦，报宿怨，图卸保结之职。汤预属党羽、绍兴败类、府学堂监督杜子楦、监学胡钟声播谣中伤，指秋瑾拟起事响应安徽。浙抚中汤先入之言，令下绍兴府严惩。”秋瑾因此被害于轩亭口。因此，许多光复会会员相信“汤在丁未年，系教唆杀害秋瑾之主犯”^①。

由于“有人反对汤为都督，因他与秋案有关。”革命党人就汤寿潜出任都督一事，意见很不一致，“会议几至动武。”^②于是，推举汤寿潜出任都督成僵持之势。

然而，光复会会员褚辅成对王金发等人的提议坚决反对，不同意另选都督，他回避了汤寿潜是否参与杀害秋瑾一事，而是从大局出发，认为：“湖南焦都督就职三日，即被倒，舆论颇多批评，浙省若再演倒督恶剧，国人将视光复义举为争夺权利，有碍革命之进行。”^③

由于褚辅成等人反对改换都督，誓死力争。最后，与会代表达成暂不更换都督的决议。

尽管汤寿潜仍被推为都督，但革命党人对汤寿潜这个立宪派领袖并不放心，推举了已加入同盟会的周承葵任总司令，节制全省军事。褚辅成任政事部长，庄崧甫任财政部长，沈钧业任副部长，陈汉第任民政部长，张副之任副部长，汤尔和任外交部长，方鸿声任副部长，傅修龄任交通部长，黄越川任副部长，陈泉卿任总务部长，谢斐麟任副部长。其中，周承葵、褚

① 章天觉：《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1页。

② 张任天：《回忆陶成章与王文庆》，《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65页。

③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辛亥革命》（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6页。

辅成、庄崧甫、陈泉卿、谢斐麟都是同盟会或光复会会员，革命党人占了三分之二，掌管了军政府中最重要的部门，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了实际的领导权。

11月7日，杭州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宣布军政府正式成立。汤寿潜在省城梅花碑劝业道署正式即位。

12月初，浙江军政府又进行了改革，都督之下由原来并立的6部，改为设立2部：即政事部和军政部，原财政、民政、外交、交通、总务改设5科，受政事部统辖。浙军总司令仍为同盟会会员周承葵，政事部长由同盟会会员褚辅成担任，新设的军政部长由同盟会会员顾乃斌担任，军政府的实权进一步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因此，“汤老固然正式做了都督，但是没有实权。褚辅成做了民政长，而他这个民政长和湖北江苏等省的不同，是和都督平行的。”^① 汤寿潜督浙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了实权。

浙江革命党人设计的军政府体制，与江苏和湖北等省有很大的不同。都督类似虚位的“元首”，名义上为最高长官，但军事由总司令部和军政部负全责，节制全省所有的陆军和巡防营，财政部掌握财政，政事部总揽民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形成“军政、政事、财政三大部鼎峙一城，各自为政，都督几同赘瘤”^②。都督府事权不一，汤寿潜也力不从心，只能采取放任的态度，自喻为“傀儡都督”。

^① 马叙伦：《我在辛亥这一年》，《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② 《都督统一政权之滥觞》，《申报》，1911年12月6日。

第五节 倡议援宁

武昌起义前，李燮和闻讯离开武汉前往上海，就“频电成章，促之归”^①。武昌起义爆发后，陶成章立即电告南洋各地光复会，发动华侨筹集款项，支援革命。“武昌发难，公尚在南洋，逆料饷绌兵单，力筹接济，部署略定，然后归国。”^②镇江章梓和上海李燮和等人起义的费用，许多是爪哇、泗水光复会筹寄的款项。

陶成章拟从南洋起程，回国领导光复会，光复东南，曾化名周守礼，嘱南洋的光复会会员写信到上海的“锐进学社”，保持联系。

震生吾兄大鉴：

敬启者：弟因长江事急，欲速返国，不能来槟港矣。以后若蒙赐函，请寄上海法租界平济利路良善里第一百六十六号锐进学社尹锐志女士收交周守礼可也。

又有启者：泗水欲用药物，祈吾兄托若愚兄代办若干，寄予与福生兄为要。

此请讲安。

弟守礼白

八月二十四日^③

^① 龚翼星：《光复军志》，《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09页。

^② 章乃毅、鞠僧甫：《民国浙军参谋陶公焕卿传》，《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

^③ 《致何震生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8页。

陶成章在另一封至胡国梁的信中，也告知准备回国之事，并询问胡国梁作何安排。

若愚老兄鉴：

启者：弟因事归国矣。吾兄行止奚若？泗埠欲用药物，祈吾兄代购若干，寄至福生兄处为感。

此请近安。

弟陶成章白

八月二十四日^①

南洋的工作安排妥当后，陶成章立即回国。陶成章“及归，而燮和已复上海、吴淞”^②。陶成章来到吴淞时，杭州已经光复，汤寿潜被推为浙江都督。“成章关怀桑梓，别去经营浙江军务。”^③陶成章前往刚光复的杭州，被推举为参议员。

武昌起义爆发后，光复会会长章太炎和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分别从日本和南洋返回上海，共同领导了光复会的革命活动。“炳麟徒以文学有高名，领袖光复会，而书生騃不晓事；成章智而能得众，实左右之。光复会之有陶成章，犹同盟会之有黄兴也。炳麟不足当孙文之恢廓有大略，而成章则胜于黄兴之轻发多败事；黄兴未必推心于孙文，而成章则实竭诚于炳

^① 《致胡国梁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9页。

^② 龚翼星：《光复军志》，《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09页。

^③ 李燮和：《光复军事略》，《近代史资料》（总57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麟。”^① 陶成章从南洋回国，对光复会进行辛亥革命起了核心的领导作用。

革命党人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其最终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在 中国建立近代民主政治。光复会为此进行了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在浙江的专制统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为光复会在浙江实践从西方学来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可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三权分立制度，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项权力，分别由议院、行政机构、法院独立行使。无论是以汤寿潜为首的立宪派，还是以同盟会和光复会为主体的革命派，都曾经热衷于三权分立制度。因此，当武装起义刚刚取得胜利，革命党人和立宪派都迫不及待地 把设立立法机构作为头等大事，认为目前设立民意机构刻不容缓。陶成章“与沈钧业、陈陶遗抵沪时，杭城已复，浙督暂推汤寿潜。及公（陶成章）抵杭，军学各界皆有举公为都督之意。即由革命党人组织参议会，举公为部长，以监督都督。”^②

11 月 6 日，组成浙江省军政府的同时，也组建了临时参议会，作为临时立法机构，各地革命党人推举陶成章（光复会会员）、张恭（光复会会员）、蒋著卿（光复会会员）、庄辛璽（光复会会员）、张浩（光复会会员）、方鸿声（光复会会员）、吴思豫（同盟会会员）、顾乃斌（同盟会会员）、庄崧甫（同盟会会员）、黄元秀（同盟会会员）、李炯寰等 12 人为参议员，其中革命党人占绝大多数。“军政府内复设参议会为临时议事机关，张恭、吴思豫、顾乃斌、庄崧甫、黄元秀、陶成

① 钱基博：《辛亥革命江南光复实录》，《辛亥革命》（第 7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9 页。

② 《陶焕卿》，《陶成章史料》，1987 年版，第 19 页。

章、蒋著卿、李炯裳、庄辛墅、周淡游、张浩、方鸿声等皆被举为参议员，凡施行全省之重要政务及一切规章，参议会均有议决权。”^① 参议会的权力较大，“所有军政大纲，皆由参议会会议决，送都督府执行。”^② 凡是军政府的重要军政事务，均事先由参议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由都督及各部执行，从而确保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新政权的领导。

11月9日，临时参议会召开了第四次会议，由陶成章任主席，讨论并通过援助南京等议案。

陶成章刚由沪抵杭时，就与王文庆商议，“以为浙江虽已独立，而南京未下，恐碍大局，劝朱瑞出劲旅以援。”^③

于是，陶成章鉴于“南京原有新军（第九镇）响应黎元洪起义，为张勋江防营与驻宁之旗营合击失败，镇统（师长）徐绍桢（字固卿）来电乞援，同时上海沪军都督府亦来电催促”^④。陶成章提出援助南京的建议。

原来上海和杭州光复后，11月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在苏州宣布“独立”，自任江苏军政府都督。

驻南京的清军兵力雄厚，武昌起义前，两江总督张人骏为了防备新军起义，将徐绍桢统制的第九镇新军调往南京城外，而将仇视革命的江南提督张勋所部江防军二十营、王有宏所部缉私营十营从城外调入城内。11月8日，第九镇新军官兵发

①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辛亥革命》（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7页。

② 黄元秀：《辛亥浙江光复回忆录》，《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9页。

③ 张任天：《回忆陶成章与王文庆》，《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65页。

④ 黄元秀：《辛亥浙江光复回忆录》，《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1页。

动起义，向南京进攻，由于决策失误，加上弹药缺乏，被清军张勋部击败，被迫撤往镇江，并派人向上海的革命党人求援。

在上海的中部同盟会领导人陈其美和宋教仁等人得知南京新军起义失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策动江浙各军编成联军，并推举南京新军第九镇统制张绍桢为江浙联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各军，共同进攻南京。陈其美以沪军都督名义致电江浙各省都督，要求迅速派兵会攻南京。

浙江临时参议会接到陈其美的电报后，立即召开会议。

陶成章首先提议，组织联军，会攻南京。全体参议员“一致通过赴援，由参谋处计划一混成支队”^①。并责成吕公望起草动员计划，交临时参议会复议通过。

第六节 攻克南京

陶成章号召光复会会员组成“光复义勇军”攻打南京，并电告温州、台州和处州三府，指示会党首领，组建义勇队三营，作为预备部队。“金陵之役，公（陶成章）集团体往助，颇有功。”^②

浙江军政府立即抽调步队 81 标全部和 82 标一个营，巡防队三营，以及炮兵营、工程营、辎重兵营、宪兵队、骑兵队、卫生队，另有由光复会会员尹维峻、林宗雪等约 30 人组成的女子先锋队，共约 4000 多人，组编成“浙军攻宁支队”，由光复会会员朱瑞、吕公望分别担任支队长和参谋长。另由光复

① 黄元秀：《辛亥浙江光复回忆录》，《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21 页。

② 《孙德卿记事》，《陶成章史料》，1987 年版，第 12 页。

会会员屈映光担任兵站司令，在上海设立兵站，负责后勤保障。11月12日，“浙军攻宁支队”从杭州出发，于15日抵镇江。

陶成章“以张勋负固，金陵未下，不敢稍安，又奔走各处，联络同志，助浙军攻取南京”^①。陶成章号召浙江的光复会会员，全力以赴地协助浙军，攻占南京。

以陈其美为首的上海军政府，派出了以洪承点率领的沪军义勇队1000多人，开赴镇江。

江苏军政府也从苏州派出由刘之洁率领的苏军步兵四营、炮、马各一队，约3000人，赶赴镇江。

陶成章于11月9日晚，与王文庆、张任天等人回到上海，转赴吴淞，来到设在中国公学的光复军总司令部，与李燮和、杨镇毅商谈，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制定光复会的援宁计划。据张任天回忆，光复会作出了四项决定：“1. 由李燮和、杨镇毅向江南制造局提取枪械，先成立一个师或一个混成旅；2. 由陶焕卿、王文庆物色官佐，王萼、张鹏、项霈等充之，王萼即文庆之弟再卿；3. 由我以台州军政分府参谋名义回台召集潘门主帮来沪，补充下级官佐及士兵名额；4. 由陶焕卿分电南洋英荷各属光复会汇款接济。”^② 陶成章还与李燮和决定派遣第一协协统黎天才率领600余人的光复军，由吴淞军政分府派遣，又称淞军，于11月14日开赴镇江。随后，“王文庆、姚敏、陆翰文皆自浙江来，有杭州兵300人，以周李光领之；台

^①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

^② 张任天：《回忆陶成章与王文庆》，《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66页。

州兵 600 人，以王任化领之，皆隶属光复军。”^① 另外，吴淞军政分府民政长杨承溥还负责在上海、镇江设立兵站，向援宁军队提供后勤支援。

陶成章在上海设立了“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沪局”，委派朱立冈、赵汉卿、王致同、张蔚裁四人专门负责筹款支援攻宁事宜。陶成章与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商议，在浙江所属各府均设立“筹饷局”，以便筹集更多的款项，支援南京战役。但陶成章在浙江的筹饷进行得很不顺利，陶成章曾为此与浙江都督汤寿潜进行交涉，汤寿潜以种种借口予以搪塞。汤寿潜在致章太炎和陶成章的信中，推托说：“人以为幸福在前，我以为大劫方始，不待汉皋之挂，已预言之。下走生平所病，在不争权利；公乃以争权利药之，如证不对何？下走不争，而不能积诚以化人之争，此则所返躬而引为大戚耳！顿闻大旆将以月之五日来，挚诚扫经以望上。盖姗姗不来，以何留津？焕公以饷章不通行之故，微有所不嫌于下走，参议处不承认，下走安能以专制行之哉！”^② 汤寿潜以无权为理由，对陶成章的筹饷不予支持。

陶成章还致电南洋群岛的光复会筹款援助攻宁部队，南洋的光复会会员想方设法筹集捐款，汇往上海，接济江浙联军。由于陶成章“设筹饷局于上海，竭精尽虑，寝食未安，而旧病加剧”^③。陶成章为筹款之事忧心如焚，奔波忙碌，以致于

① 龚翼星：《光复军志》，《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211 页。

② 汤寿潜：《致太炎、焕卿信》，《萧山文史资料选辑——汤寿潜史料专辑》（第 4 辑），1993 年版，第 700 页。

③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46 页。

病倒了。

江浙沪援军陆续抵达镇江后，与林述庆率领的镇军和徐绍桢率领的第九镇余部会合，组成江浙联军，共10000余人，推徐绍桢为总司令。12月2日，江浙联军胜利占领南京。

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在辛亥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而克服南京，奠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基石。“是役也，牺牲少，成全大。后之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清帝退位议和，都是由武昌独立开花于前，南京光复结实于后的。诚以武昌地扼南北要冲，南京城绾长江锁钥，得此两地为之犄角，便可问鼎中原了。”^① 南京光复，其意义不亚于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发起上海起义，光复杭州，攻克南京，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而抵定东南半壁江山，彻底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这与陶成章及其领导的光复会长期进行革命宣传，播下革命种子，积蓄革命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分不开。“秋八月，武昌起义，尹锐志、尹维峻、李燮和、王文庆，在锐进学社商议响应。以先生为名，派人运动各界，制造局，救陈其美，上海因而光复。王文庆、尹维峻往杭运动，并屈映光、周文介、周佩璜、张伯岐等赴杭，约朱瑞、吕公望、童保暄、庄新如等志士数十人，商谋光复浙省。尹锐志等并派人游说程德全，江苏亦即光复。潘谋先、方于笥、屠景曾等，亦在嘉兴运动军界反正。先生恐经费不足，遍电南洋各埠光复会筹集巨款，接济军需。镇江之章梓、申江之李燮和诸人

^① 吕公望：《浙军攻克南京纪实》，《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91页。

起义之费，多系爪哇、泗水光复会筹寄之款。其取上海、杭州、淞江等处诸死士，上海嵩山路炸弹炸死之杨哲商、炸伤之王常素、平智础，及与试枪毙命之沈克刚，均与先生生平最信任之友。非先生数十年来，奔走东南，苦心经营，安能至此哉！至南洋筹集诸款，汇至申江，接济徐固卿、陈其美、李燮和三君者不鲜。去年，东南各省义旗一举，四方响应，两三月即有半壁河山，此时先生虽非建有赫赫之伟业，推其原因，皆先生前数年运动筹画影响所及也。”^① 江浙联军的主力之一浙军，无论是支队长、参谋长及其他一些重要干部，都是光复会会员。至于攻乌龙山，克幕府山，破孝陵卫，特别是强攻天堡城的敢死队员，多数是光复会过去联络的会党分子，有些是陶成章直接派人从台州招募的会党勇士。尤其是“海外侨胞、国内志士之乐于输将饷项，以资民军者，烈士（陶成章）之力为多。”^②

陶成章从南洋回国后，奔走联络，呕心沥血，为攻克南京做出了重要贡献。“武昌起义时，成章先生方在南洋募带巨款而来，浙中光复各同志公举为北伐总参谋长，乃在沪维昌洋行设办事处，因奔走各处，联络同志，援助浙军北伐，进攻南京，竭力焦劳，几乎寝食俱废，因而旧病复发。”^③ 据张云雷回忆：“当时杭州情况很混乱，主要是党争相当厉害。光复会的人和光复会的人，尤其是和国民党人之间的矛盾很大。陈

①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

② 《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1页。

③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4页。

叔通先生对这种情形很不满意，看不下去就不发言，有的会索性就不参加。陶成章从绍兴调停王金发的事情回到杭州，对我说：‘现在南京都没有打下，杭州这班人就闹得这样厉害了。咱们不要缠在里头了，到上海去安下身来。龚未生等几个朋友已经在那里联络各方面的人谋攻南京，咱们也去，现在攻南京要紧。’”^① 陶成章和张云雷等人在上海英租界租了房子，作为光复会和浙军在上海的招待所，专门负责筹款支援浙军和光复军等军队会攻南京事宜。

陶成章还亲自赶到南京，参加攻坚战役。陶成章冒着迷漫弹雨，激烈金风，亲临前线，奋勇上阵，“金陵之役，厥功尤伟”^②。1911年11月28日，《民立报》为此作了专门的报道：“浙江陶焕卿君，秉性刚毅，不屈他族，立志推倒满清，恢复旧物，行年三十余岁，尽力奔走于南洋及闽、粤、皖、鄂、苏、浙等处，辛苦经营，未尝稍懈。平素为人，以诚实二字自恃，以俭自奉，以厚待人。故一般英俊豪杰，争趋附焉。昔年组织敢死团计五百人，闻其中有尹锐志女士，团员十余人，并有东西洋留学生数人，能自制炸弹及无烟火药者。药笼中物，无式无之。前次攻陷江南制造局，炸毁上海道署、浙江抚署等，俱系敢死团之伟业也。现陶公以南京未下，北虏犹存，苟不合力进剿，生灵行将尽害。故特召集旧部之光复义勇军急速进剿，并电饬浙属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以为后援。一面电告外洋各机关，速汇巨款。又设立沪地机关，名曰‘光

^① 张云雷：《辛亥革命见闻琐谈》，《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

^② 章乃穀、鞠僧甫：《民国浙军参谋陶公焕卿传》，《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

复义勇军练兵筹饷沪局’，札派同志朱立冈、赵汉卿、王致同、张蔚裁四君总司其事。又商同浙都督汤公，于浙属各府，设立筹饷局，以便接济，誓灭此朝食矣。或问陶公云：满贼尽灭，子将何为？彼答曰：托天之福，得如愿以偿，则吾西行矣。”^① 陶成章向《民立报》记者表达了北伐成功，就解甲归田，以实现光复会“功成身退”的宿愿。光复南京，瓦解了清王朝在东南地区的统治，为革命提供了一个大本营，使中华民国得以早日成立。陶成章在筹划攻克南京的战役中，功勋卓著。

^① 《光复义勇队纪闻》，《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26 页。

第十二章 萁豆相煎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精诚团结，携手合作，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随着革命的节节胜利，东南地区的光复，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原来联结革命党的反清纽带不复存在，革命党内部以前潜伏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无论是同盟会内部，还是光复会内部，尤其是同盟会和光复会之间，矛盾急剧发展。同盟会和光复会在临时政府的建都地点、首脑人选以及政府机构的人员构成等问题上，均存在分歧。特别是以沪军都督陈其美为首的同盟会骨干与以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领袖，围绕着经费分配、地区控制权等问题，分歧严重，呈现日趋激化之势。

第一节 同室操戈

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广大成员在国内进行革命，携手共进，固无分彼此。且大敌当前，也不可能有泾

渭之分。如进攻南京之役，上海制造局之役，都是两党并肩作战”^①。然而，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革命派的内部，围绕着政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光复、同盟两会自相水火，嫌隙益深，致蹈洪杨覆辙，不惜萁豆相煎。”^②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两大政治团体——同盟会和光复会，对中央政权的组成，有着各自不同的意见。

在建都地点问题上，同盟会领导人和光复会领导人各持己见。南京被革命军攻克前，同盟会主张建都上海，光复会则力主建都武昌。武昌起义后，湖北义军提出在武昌建都，而上海的陈其美则提出在上海建都。12月1日，章太炎立即发表《章太炎宣言》，表示强烈反对。“近见某报以武昌危急，欲于上海设临时政府，鄙人决不赞成。无论云、贵诸省，去此甚远，不能辐凑；且上海政府之说一成，则援鄂之心自懈。武昌不守，江左其能安乎？托庇荫于外人商场之下，又无一人足以任首领者，正如附赘县疣，安能为国人所瞻仰耶？今日仍宜认武昌为临时政府，虽认金陵且不可，况上海边隅之地。谓贵报宜取消此语，毋令偷安者借以为柄。”^③ 章太炎对同盟会提议以上海作为都城表示坚决反对。

南京被江浙联军攻克后，同盟会力主建都南京，光复会仍坚持建都武昌。12月2日，留沪各省代表在上海讨论建都问题，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程德全和汤寿潜也参加了会议。

① 沈颼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② 陶冶公：《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歧与合作》，《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7页。

③ 《章太炎宣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29页。

黄兴主张定都南京，章太炎主张定都武昌。章太炎“窃念曩日满政府虽孱弱寡谋，然遇有兵祸时，省城虽危急将陷，犹未以外府为省会，必待真正失守，乃移行省于他处。今吾侪之认政府，反不能如满廷之认省会耶？以武昌为都城，以金陵为陪都，此今日正当办法，愿公大宣法语，以觉邦人。不然，仆辈所持，既与克强不合，终无谈了之期。若曲循金陵之议，援鄂之心必懈，冒昧之策必生（谓大举北伐），其祸将不可解也”^①。上海方面不认可武昌作为未来政府的首都，实际上是不信任黎元洪，也是对原革命阵营的湖北文学社和共进社的不信任。而以陈其美为首的同盟会，想把未来中央政府的权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与袁世凯进行了南北和议。同盟会仍主张定都南京，光复会则认为应定都北京。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孙中山按约定向参议院提出辞呈，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还提出附加条件，要求临时政府的首都设在南京，袁世凯到南京继任新总统后再辞职。2月14日，参议院进行临时大总统选举，袁世凯当选。但光复会领导人对袁世凯赞成共和抱有幻想，与同盟会领导人不同，力主定都北京。章太炎认为北京最适宜作为都城，“中国幅员既广，以本部计，燕京虽偏在北方，以全邦计，燕京则适居中点，东控辽、沈，北制蒙、回，其力足以相及。若徙处金陵，威力必不能及于长城以外，其害一也。北方文化已衰，幸有首都，为衣冠所辐凑，足令蒸蒸日上。若徙处金陵，安于燠地，苦寒之域，必无南土足音，是将北民化为蒙古，其害二

^①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6页。

也。逊位以后，组织新政府者，当为袁氏，若迫令南来，则北方失所观望。日、露已侵及东三省，而中原又失重镇，必有土崩瓦解之忧，其害三也。清帝尚处颐和园，不逞之徒，思拥旧君以倡乱者，非止一宗社党也。政府在彼，则威灵不远，足以镇制；若徙处南方，是纵虎兕于无人之地，非独乱人利用其名，蒙古诸王，亦或阴相拥戴，是使南北分离，神州幅裂，其害四也。交民巷诸使馆，物力精研，所费巨万，若迫令迁徙，必以重资备偿，民穷财尽之时，而复靡此巨帑，其害五也。今北方诸议者，咸思改宅天津，其实犹不如仍旧，而况金陵南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其可以为首善之居哉！谋国是者，当规度利病，顾瞻全势，慎以言之，而不可以意气争也。”无论是从地理位置，文化发展，反清斗争，还是从外交上看，都宜建都北京。相反，若建都南京，则有五害。章太炎渴望国家统一，民族富强。“愿审思鄙言，速与解决。南北混一，九州攸同，然后生聚教训，期以十年，使中国雄视亚洲，未敢望也。国维四固，安如泰山，出于水火而登之衽席，则其幸耳。”^①章太炎还拟定了《驳黄兴主张南都电》，力主建都北京。

至于临时政府的首脑人选以及政府人员构成问题，同盟会和光复会也有自己的考虑。光复会对孙中山出任临时政府的总统，有很大的意见。同盟会获悉孙中山即将回国的消息后，决定等孙中山回国后由孙中山来组建临时政府，章太炎却不以为然。“今日各省代表，认武昌为中央政府，已无异论。而下江浮议，有欲待孙君归国始正名号者，此无异儿童之见。方今惟

^① 《致南京参议会论建都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63页。

望早建政府，速推首领，则内部减一日之焚乱，外人少一日之覬觐。初起倡议者黎公，力拒北军者黄公，今之人望，舍此焉适？元帅、副元帅之号，惟二公得居之。至虏廷倾覆以还，由国会选大总统，或应别求明德耳。处今日而待孙君归国，始定名号，何异待豹胎麟脯而后食耶？前观孙君电报，属意黎公，明其自知分量，不争权位，亹亹乎有克让之风，而昧者反欲推孙，抑何不晓事机也。域中搢绅之士，多未与孙君识面，心仪其人，以为希世之杰，度孙君亦未必愿受此名也。如仆所观：孙君长于论议，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① 章太炎认为大总统应在清政府倾覆之后，由国会选举，等待孙中山回国任职很不恰当，孙中山属于元老之才，又有自知之明，不争权力，同盟会欲推举孙中山出任总统，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愿，而主张推举黎元洪出任临时政府总统。

孙中山回国后，即被同盟会举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并运动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黄兴和陈其美在上海哈同花园宴请回国的孙中山，并邀请在沪的各省代表作陪。“席次，黄、陈密商举孙逸仙为大总统，分头向各代表示意。”^② 于是，孙中山遂被各省代表选举为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由于孙中山回国前，曾向英法政府寻求财政援助，但遭到拒绝。因此，沪上盛传孙中山带有巨款回国，还有兵舰数艘，中外报馆也作过询问。孙中山回答：“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

① 《章太炎宣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27页。

② 章天觉：《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6页。

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①但光复会认为，孙中山以携有巨款和兵舰回国，骗取了临时大总统的位子。章太炎回忆：“未几，逸仙返。甫抵岸，自言携兵舰四艘至，至挟多金。又言战则非吾所任，和则吾能任之。军民惑焉，遂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云。”^②魏兰也认为孙中山“勾通”《民立报》，“谎称”携有美金巨款以及兵舰若干艘回国，并“伪造”兵舰的相片，在南洋群岛散发，从而“骗取”临时大总统的位子，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陶成章回国后，与陈其美见面时，也“以英士等先选总统为非。及总统府聘为高等顾问，陶（成章）又拒不接受”^③。显然，光复会对于孙中山被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持反对态度。

由于光复会对同盟会的态度，由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出任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自然不会有光复会员的位子。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后，提出了各部部长名单，交各省代表讨论。原拟章太炎任教育部长，遭到代表中的同盟会会员的强烈反对，经过黄兴调解，改任蔡元培任教育部长。重组后的光复会会长章太炎被摒斥于临时政府之外。对此，章太炎愤愤不平，他自认为是革命的功勋，其才能也远远超过孙中山。“吾虽庸懦，鼓吹之功，必贤于中山远矣。当庚辛扰攘以来，言革命者有二途。软弱者与君主立宪相混，激烈者流入自由平等之谬谈，弟《驳康有为书》一出，始归纯粹。因是人狱，出后至东京，欢

① 《与上海〈大陆报〉主笔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3页。

② 章太炎：《自定年谱》，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0页。

③ 黄元秀：《陈其美事略》，《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迎者六千人。后作《民报》，天下闻风，而良吏宿儒，亦赧赧趋向矣。此岂少年浮躁者所能冀，亦岂依违法政者所敢为耶？又中山本无人提挈，介绍中山，与学人相合者，实自弟始。”^①至于陶成章和李燮和等光复会的其他领袖及骨干，在临时政府中，就更没有一席之地了。早期光复会会长蔡元培任教育部长，但他对光复会的事务早就不再过问了，与其说蔡元培是一个光复会会员，还不如说是同盟会会员了。同盟会甚至对光复会领袖章太炎公开进行谴责，孙中山刚回到上海，就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通过了《同盟会本部改定暂行章程并意见书》。孙中山指责“偏怯者流，乃唱为‘革命事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至可怪也。此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势，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瞽之，是儒生阉茸之言，无一粲之值”^②。章太炎所说竟成了“儒生”的蠢话。

第二节 其美其行

光复会岂止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没有地位，光复会会员已沦落到死无葬身之地的地步了。“时同盟、光复二会嫌隙滋甚，而趋势者多归同盟会，一日或二三千人，同盟旧人亦为其所陵轹。”而“新著同盟党籍者，未识前日艰难之事，势利所在，旦暮反复。”^③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同盟会有些人自以

① 《与王揖唐》，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页。

② 《同盟会本部改定暂行章程并意见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8页。

③ 龚宝铨：《自叙革命历史》，《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为掌握了国家政权，立即磨刀霍霍，同室操戈，干起了其豆相煎之事，竟然向革命的同盟军、创建民国的功勋、昔日与同盟会个别领导人有过不同意见的光复会领袖及其骨干分子举起了屠刀。而明目张胆、无所顾忌、持刀相向对付光复会的就是沪军都督陈其美。

武昌起义后，革命军一举占了武汉三镇。11月2日，光复会的李燮和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陈其美相约11月3日发动上海起义，联合攻打江南制造局。李燮和在武昌起义前从湖北赶回上海，了解武昌起义的一些内情。李燮和到上海后，又利用同乡的身份，策反了吴淞巡警官黄汉湘、闸北巡警营管带陈汉钦，联络了驻沪巡防营管带章豹文、巡防水师营管带王楚梅、海巡盐捕营统领朱廷燎、吴淞警务区区长杨承溥、济军督队官徐占魁等人。还争取沪军营和江南制造局附近的炮兵一营的士兵。吴淞和闸北等地军警，基本上被光复会掌握。李燮和将有关的情况，全部告知了陈其美。

陈其美却另有打算，为了抢占攻克上海的头功，将光复会的势力排挤出去，煞费苦心。

陈其美密约亲信在住处商议对策：“据李燮和陈述各情，武昌首义多旧隶光复会人，或光复会化身，极少数的兴中会（同盟会前身）人。孙逸仙以兴中会号召海外，不图至南洋，周游群岛，知华侨多先入光复会。而光复会中坚之陶成章，久居南洋群岛，为一般华侨所爱戴，陶刚毅木讷，勤俭刻苦，往来南洋，从未一坐头二等舱，喜与苦力为伍，此最合南洋老华侨之心理，故兴中会难收发展之效。及返日本后，晤陶成章，劝其与兴中会合并，陶不允。经温生才劝说（时温生才尚未殉义），孙逸仙委曲求全，牺牲兴中会旧名，更名为同盟光复

会，而光复会、同盟会亦自简称如故。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满清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一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所以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若能从光复上海入手，次第光复江、浙、南京、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政治优势之政党，始可无恨。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

众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陈其美起而言之：“李到沪后，据其报告，不数日间，将沪军营、炮台营、巡防营之士兵，均已联络就绪。即商团巡警中，亦有默契。虽因武昌起义风声所播，士兵浮动，易于利导，然亦足见李之能耐与权术。”

陈其美环视亲信中，不得不承认没有一人能胜过李燮和。

良久，沈缦云才站起来发言：“当于死中求生。同盟会不少俊杰，虽黄花岗之役牺牲过多，然明大义隐忍待时者，亦所在多有。计不如先发制人，集吾党同志一鼓而光复上海。其日期必须在李氏约定之前，能先占一二日最好。因各军营同志经李游说，必多动摇。苟先期而往，必多误应，惟不可使李知之。吾人现能利用者，为闸北南市及城内商团。南北市商团教练官张沛如、高一梅又素与我辈暱，此外，周德厚、潘永强、姚毓江、邵汝钦、刘福彪、周永广、蒋百攻、邵智渊辈敢死之士，足以应付而有余。宜亟与商团连络，待命而动，功可成也。惟敢死队必须先行组织就绪，由王季高、刘福彪两人中择

一管带，不使漫无行列。”^①

沈漫云说完，陈其美连连点头。

11月3日下午5时，为了抢占光复上海的头功，陈其美率部分人马，冒险攻打江南制造局，被清军俘虏。原来光复会“以为陈其美是自己人，就将联系新军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他，谁知他别有心肠，满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制造局可以不攻自下，所以他事先不和我们联系，就在八月三十的深夜，即九月初一的一二点钟时候，冒冒失失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是同盟会员之外，大多数是上海流氓，还有几个是‘小连生’（潘月樵）戏班的演员，闯进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可是他不懂我们和新军联系好的口号，一闯进去，就被打垮，陈其美被擒。”总办张士珩准备处决陈其美，制造局一位已赞成革命的士兵张杏村予以劝阻。张士珩下令将陈其美绑上，用冷水灌进嘴里，进行折磨。“李燮和闻讯之下，觉得不能坐视不救，就急速动员全体同志和一部分起义的新军，组成光复军全力赴援。”李燮和亲自率领光复会已掌握的部队，攻打江南制造局，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攻下了清军在上海的最后一个阵地。光复会“进攻制造局，是为了光复上海，同时也是为了救出陈其美。可是攻下制造局之后，到处都找不到他。后来据起义人员报告，才在厕所旁边的一个储藏钢铁的小房间里发现，只见他手足带着镣铐，坐在一张条凳上，头紧紧靠着板壁，默然不动。一看，原来他的发辫从新凿的壁孔拉出房外，房外梁上挂着一个铁钩，发辫就紧紧缚在上面，所以他一动也

^① 章天觉：《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6页。

不能动。同志们给他打开镣铐，放下发辫，他已经手足麻木，不能走路。李燮和传令扶着他走几步舒舒筋骨，然后叫他回去休息。”^① 江南制造局的攻克，标志着上海全境光复。

陈其美被救后，立即以武力实行选举，抢占了“沪军都督”的位子。11月6日下午2时，上海自治公所、商务总会、商团等头面人物，以及部分同盟会员和会党首领50余人，集聚小东门内原清海防厅署，商讨组成新的地方政府。会议在选举沪军都督时，分歧较大。沪军都督人选有三人，一为已推为临时总司令的李燮和，二为中部同盟会领导人陈其美，三为曾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与陈其美同时被俘的高尔登，而李燮和在上海起义中功勋卓著，呼声最高。

会议主持人李平书首先提议由李燮和出任沪军都督。但是与会者大都是陈其美的亲信，李平书的提议，立即遭到否决。

王钟声发言表示反对，认为“上海光复，非李燮和一人之功，诸同志已先李而奔走。陈英士先生因李来沪多日，未得端倪，愤而以身许国。昨日偕高子白，二人单独往说张士珩归附。原冀动以大义，不烦一兵一矢。不图张士珩不知顺逆，将陈高两君拘囚，致激起同志愤怒，纠集发难。赖孙逸仙先生声威，一鼓而克上海。此皆居沪诸同志之力，李君何功之有？若非陈英士先生为国，以身陷阵，恐今日在座诸君，尚呻吟于满人官吏淫威之下，惊心动魄，准备为俎上之肉。况此次攻打制造局、道台衙门各役，李燮和均不在场。事前也不能免其所在，岂可贪天之功。鄙人之意，如上海不须都督则已，若需要

^① 杨镇毅：《光复军攻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陈其美篡取沪军都督之真相》，《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都督，非陈君莫属。苟举非其人，余决以身家性命掷之”。王钟声抬高陈其美的功劳，贬低李燮和光复上海的功绩，并在发言结束时，以武力相威胁。

接着，刘福标也掏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拍，声色俱厉地扬言：“陈英士攻打制造局吃过大苦头，非当都督不可。”

蒋介石、王金发和刘福彪高呼：“请陈其美同志担任都督！”^① 王金发频频以手探藏在西服裤袋中的枪。

与会人员见状面面相觑，无人敢再提异议，陈其美遂被“推选”为沪军都督。

没有人通知光复会派代表参加“选举”会议，李燮和仅仅被任命为沪军都督府参谋。光复会联络的军警，只有章豹文一人闻讯赶到海防厅，但他见到会场上那种“都督非陈君莫属，倘有异议，请饷吾弹”的紧张局面时，觉得很不是滋味，提前退场了。

陈其美虽然被“推选”为沪军都督，但他掌握的军队有限，上海军警大都由李燮和联系，他们只知道李燮和，不知道陈其美。上海各防军原拟由李燮和出任都督，陈汉钦任上海总司令。陈其美出任都督后，“有人主张由李燮和出面，变更布告。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一时引起轩然大波。”李平书原来提议李燮和任都督，但未被接受。李平书唯恐李燮和及其部属因持异议而举事，劝说李燮和以大局为重，不予计较。李燮和原本不同意在上海设立都督府，准备招募军队继续北伐，彻底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

^① 章天觉：《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8页。

治。李燮和“考虑再三，以为武昌起义不久，上海刚刚光复，全国形势还没有稳定，如果兄弟阋墙，不但引人耻笑，而且要贻误革命全局，因而坚决主张退让。”^①

沪军都督府在旧海防厅办公后，江南制造局的办公机关无形中已取消，李燮和被推任的总司令一职，也无形中化为乌有。由于光复会所领导的军队不愿隶属于陈其美，吴淞炮台的官兵反对尤为强烈，遂推举李燮和任吴淞都督。光复会将领认为“同志们出生入死，光复上海，而‘沪军都督’名义被人篡窃，大家心里总觉得快快不平。光复会所以不与之较者，不忍因小愤而乱大谋故也”^②。李燮和为了避免光复会和同盟会之间的内讧，主动将制造局所有的仓储和军牒移交陈其美，率领敢死队开往吴淞。11月9日，李燮和到达吴淞，只见到处张贴“吴淞都督李（燮和）”的布告。李燮和劝阻黄汉湘取消吴淞都督府，认为吴淞与上海相距仅十里，两位都督并立，容易产生磨擦。但吴淞军政分府不愿隶属陈其美，李燮和征得江苏都督程德全同意，改隶江苏都督名下。李燮和取消了吴淞都督名号，改任吴淞军政分府水陆军总司令，黄汉湘任副总司令。李燮和又在原敢死队的基础上，另外组建了一支光复军，假中国公学设立光复军总司令部，李燮和自任总司令，黄汉湘任副总司令，有4000余人。

即使这样，陈其美仍不放过李燮和，还要派人刺杀李燮和。据余焕东回忆：“当李燮和初至吴淞设立军政分府时，陈

^① 杨镇毅：《光复军攻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陈其美篡取沪军都督之真相》，《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② 杨镇毅：《光复军攻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陈其美篡取沪军都督之真相》，《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其美及其党羽甚为嫉忌。某日，予与李在吴淞车站乘车往上海，忽有人从车窗外放枪，射李未中，其随身卫兵中弹死。随后，陈其美又派会党头目某，携带手枪至军政分府与李燮和谈判，勒令李取消军政分府。李只得服从，改为光复军司令部，但要求陈分拨原占领制造局之枪械子弹，另练新军，以便进攻南京。”^① 陈其美勉强同意。

第三节 陈陶之争

陶成章从南洋回国领导东南地区的光复会进行辛亥革命后，与陈其美和同盟会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同盟会和陈其美同室操戈，干下了亲痛仇快，给辛亥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刺陶事件”。

辛亥革命前后，陈其美和陶成章之间，因南洋华侨的捐款分配问题，产生了分歧，双方闹得不欢而散，陈其美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朝陶成章开枪。“焕卿辛亥夏回沪，六月在嵩山路沈宅开会，陈英士出手枪欲击之。可知焕卿辛亥之被刺，杀机早已萌兆于那时。”^② 广州起义失败后，陶成章回沪布置光复会光复东南事宜，在沪上与陈其美相遇，“在嵩山路沈宅开会，陈其美出手枪欲击先生。”^③ 而陈其美之所以对陶成章举枪相向，原因在于如何分配南洋华侨的革命捐款。当时，“革

① 余焕东：《李燮和沪宁革命之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② 陶冶公：《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歧与合作》，《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7页。

③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

命党人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沈宅开会，讨论上海起义事宜，当讨论到经费问题时，陈其美突然提出今后南洋华侨汇来的捐款，需全部交给他来支配。陶成章立即回答：‘这是华侨的血汗钱，是华侨支援革命的经费，不能作嫖赌之用。’陈其美听后，勃然大怒，从衣袋里摸出手枪，欲击陶成章，后经在场同志劝解，陈遂罢手。”^①

陶成章经常往来于上海、日本和南洋之间，动员爱国华侨，捐助中国革命。陶成章源源不断地将华侨捐款汇往上海，由陶成章的秘书赵汉卿经手。陈其美需款时，经常派蒋介石前来领取。陶成章以革命大局为重，同意蒋介石从赵汉卿处取钱。

后来，陶成章获悉陈其美有挪用公款、假公济私、寻花问柳的恶习，曾责骂陈其美：“这些钱，都是花侨的血汗钱，你们在上海这样花天酒地乱用，对得起华侨吗？”并告诫赵汉卿以后不准陈其美再随便支用华侨的捐款。

因此，当陶成章再次拒绝陈其美支用华侨的捐款时，陈其美恼羞成怒，拔出手枪，要朝陶成章射击。

经在场同志多方劝阻，陈其美才收起枪。

陈其美因此向孙中山提起陶成章搞“小团体主义”，将南洋捐来的钱，只供光复会使用，不肯给同盟会。

会议到晚上一点多钟才散，陶成章对陈其美的所作所为极为气愤。“此等人，如何与之共事？”陶成章回到家后，仍余怒未息。

^① 陶永铭：《陶成章之死》，《绍兴文史资料》（第14辑），2000年版，第99页。

光复会建立吴淞军政分府后，面临的严峻问题倒不是军事问题，而是财政拮据，入不敷出。其中，最大的开支就是光复军的军费了。“隶属于吴淞光复旗下各军队，散布各地面，纵横数百里，以营计，二十有奇，皆视所主地以领饷，素不统摄。又新归附，非赏不能得其心。若从而编制，则服械有增。矧添练兵队，如北伐，如防守，如护卫侦探，一炉一竈，井然秩然，均须根本上筹备。不宁唯是，时而接待客军，时而出发兵队，时而犒捷，时而抚降。此外邮电有费，输运有费，建兵房棚栅有费，门类百出，不可殫数。凡此应付，竭力支撑，种种困难，殆非笔舌所能道其状况。嗣认苏省为主体，额饷始有着，而前后溢支之数，不可胜计。”光复会的同人也想方设法筹款，“自有商船筹饷处之设，如得稍事补苴，然酌行潦以实陂池，终恐无济。故说者谓诸人当谋光复时，有无限隔膜不相知之劲旅，环伺逼立于其旁，欲猝然镇服之，颇非易易。及观光复后筹措经济问题之难，又转觉前事之事尚易为力，洵深知个中甘苦之言哉。”^① 上海光复后，光复会筹款遇到的困难竟然超过了发动武装起义的艰难。光复会领导吴淞军政分府采取了一系列筹款募捐措施，将吴淞辖区原清政府应收之款，分轻重缓急，由光复军次第征收。自1911年12月起，“发行第一次奖励券额，设二万张，每张收助饷洋六元，择定第一期12月19日开会，计得奖者，头等一张奖洋二万元，二等一张奖洋一万元，所有奖洋均十足给发。”^② 李燮和也多次在各大报

① 汉史氏：《吴淞光复军纪略》，《辛亥革命》（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

② 《中华民国光复军总司令兼吴淞军政分府筹办助饷处广告》，《申报》，1912年1月10日。

刊上刊登通告，反复声明发行助饷奖励的道理，劝说民众踊跃捐献。李燮和还与热心同志商量，请演艺界著名艺人登台演出拿手好戏，吴淞军政分府水陆副总司令黄汉湘登台鸣谢，义演所得收入，全部用作吴淞军政分府军饷。尽管光复会想方设法筹款，但仍难解燃眉之急。光复会将领不得不各显神通，解决款项问题。李燮和等人以私人名义，向海外华侨、社会各界人士，以及邻近革命政权借款，以助吴淞军政分府渡过经济难关。尽管光复会通过各种途径，筹集了大批军饷，但仍难满足浩大的军政开支。

陶成章在上海设立了“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局”，并商得浙江都督汤寿潜的同意，在浙江各府也设立了筹饷局。“焕卿恐经费不足，遍电南洋各埠光复会，筹集巨款，接济军需。”江浙沪地区的革命党人，均得到陶成章从南洋募来的款项。陶成章也将南洋捐款资助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以及沪军都督陈其美，“至南洋集诸款，汇至申江，接济徐固卿、陈其美二君者亦不少。”^①

据说，浙江都督汤寿潜还利用陈其美与陶成章在分配款项问题上的分歧，扩大双方矛盾。陈其美筹建中华银行，缺少资金，“即电汤索协饷二十万两，移充中华银行发行纸币之准备金。汤得电后，即商之陶成章参谋长，陶答容缓商。汤遂告高（尔登），令发电婉拒。高虽长厚，然有时亦机警，借备案名，索汤书手令。汤不虑其他，竟书予之。高遂电复拒之。陈大怒，由蒋介石领衔，列全体参谋人员名姓电责高，且诟其不顾

^① 陶冶公：《光复会的组织与发展》，《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1页。

大局，妨碍攻克南京，贻误戎机。函电往来不下十余通，悬而未决。不数日，陈、汤会面，又严诘之。汤以陶成章不允对，只呼负负耳。陈、陶遂成隙。迨南京攻克，清帝逊位，南北和议成，沪军都督府裁撤，陈、高复会晤于北京路浙江地方银行。陈旧事重提，面责高之不当。高检出汤之亲笔手令付阅，陈始悉颠末，知陶之不允协饷，系汤遁辞，诿罪于陶而已。惜陶已被人刺杀于广慈医院，将届断七，尸骨早寒矣。陶之被杀，虽远因在光复会与同盟会之不融洽，近因南京选举临时总统，浙江代表汤尔和、黄群仰承陶意，不予同意投孙（中山），而电索饷又不允，汤诿过于陶，要亦为下井之石也！”^①汤寿潜利用了陶成章与陈其美的分歧，制造纠纷。

南京攻克后，陈其美再次向陶成章提出用款要求，陶成章正准备北伐，款项紧张，又拒绝了陈其美。陶成章“本在卧病，以南京光复，国体初定，而北方未靖，朱瑞等督率浙军，仍在策划进军北伐，强起视事，与朱瑞等计议进兵方略。时陈其美在沪督任上，声名恶劣，当然是大不满意，间有讥评，而陈其美又欲向陶分用其带回饷款，陶正面拒绝，以此为北伐饷需，当不敷支援甚巨，决不能移作别用，陈既衔之次骨。”^②陈其美对陶成章屡次拒绝助款，自然恨之入骨。

陶成章并不是不资助陈其美，而是反对陈其美将华侨的血汗钱，用作嫖资。原来陈其美在革命党人中，有“杨梅都督”之称。“陈其美好嫖妓，每在福州路所暱爱的妓女家中发号施

① 章天觉：《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3页。

②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4页。

令，大家颇不满意他，叫他杨梅都督，但为革命大局计，没有将他撤换。”^① 很多革命党人与陈其美在“堂子里”相见。张奚若回忆“陈英士也是这时认得的。那时陈英士当然是官方注意的人物，我和他初次是在堂子里见面的。浙江路清和坊的怡情别墅是他最喜欢的姑娘。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开了，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以后还在那儿吃过几次花酒，也是陈英士请的”^②。陈其美曾将同盟会的秘密机关设在租界的妓院里，“赁居租界马霍路德福里。阳为纵情声色，以掩饰侦者耳目，外间仅知德福里为游宴之场，而不知为发纵革命决定大计之所在也。”^③ 武昌起义后，陈其美“日夜筹议，每借三百女间，为连络传达机构，为掩中外侦探之耳目”。从外表上看，“系一班纨绔儇薄、花天酒地之少年，其实尽党人也。”如果仅仅以妓院掩护革命活动，在革命党人处于非法状态，也许可以谅解。但是，陈其美“迨清帝逊位，共和告成，积习难改，致遭反对者之借口”。陈其美起初借妓院作为同盟会的秘密机关，来掩护革命活动，后来，上海光复后，好嫖成癖，积重难返，以至于有“所谓杨梅都督、花花太岁，实自轻之咎，于人何尤”^④。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也谴责陈其美是“阉茸

① 袁希洛：《我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85页。

② 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③ 《陈英士年谱初稿》，《湖州文史——陈英士先生史料专辑》（第1辑），1984年版，第30页。

④ 章天觉：《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5页。

小人，抑无足道。上海光复，攘李燮和之功以为已有，偷儿成群，拥为都督。自言饷糈匮竭，日有征求，而珍翠细饰，逋负数万，斯岂军中所用”^①。

革命成功之后，身任沪军都督要职的陈其美，已经不必要在“堂子里”掩护革命活动了，却仍然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在上海的“堂子里”留连忘返。有人专门致书沪军都督，规劝陈其美以革命大业为重，不要在“堂子里”浪费商人侨胞节衣缩食捐献的金钱。

英士都督阁下：

启者，日来街谈巷议，咸谓阁下无日不在清和坊等处，非酒即和，甚至谓自中秋节以来，已连取小星四人；进出必坐极华美极昂贵之汽车；府中上下人等，凡是稍优之缺，悉数以湖州人充之，一若都督府变成湖州同乡会也。当此筹饷孔急之时，我民国之成与否，全在此须臾之机，真所谓一刻千金，不容稍缓者也。阁下身居都督，应如何奋发自雄，以图上取，而仍与朱少屏一流人成群结党，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无怪有种因公务奉访者，十数日不得一遇面也。姑勿论所花费之银钱乃是公众捐助之银，即是阁下自己之银钱，亦不应出此。吾辈商人节食节衣，勉助饷银已不在少数，何阁下竟不稍节花酒费以助饷银乎？果尔，则以后助饷一事，从此互相灰心矣。阁下一人固不足惜，其如大局何？鄙人之望共和如大旱之望云霓，自闻阁下之举动，几次叹哭不已。愿阁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总以化除积弊，力图进取为上策，不然反不如清政府之

^① 《却与黄、陈同宴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22页。

腐败也。以上所陈，请逐条详复于各大日报，以解群疑，不胜厚望之至。^①

陈其美不得不在报上公开为自己辩护。陈其美承认“鄙人昔日为秘密结社之故，偶借花间为私议之场，边幅不修，无须自讳”。可自从出任沪军都督后，“则军书旁午，日昃不遑，风月情怀，销磨殆尽。乃赐书竟有狎邪之劝，恐外间或有假冒之徒，曾参杀人，大局疑阻。”^②显然，“杨梅都督”陈其美的花名，已传遍上海滩。

武昌起义后，陶成章和陈陶遗均从南洋返回上海，并带回一笔华侨捐赠的款项。光复会经营吴淞军政分府也需款孔急，入不敷出，而陈其美生活又不检点，在革命党人中名声欠佳，加上同盟会和光复会之间原本就存在一些矛盾。因此，陈其美要求陶成章将华侨捐献的款项全部交由他支配，自然遭到陶成章的拒绝。“这时，在爪哇向华侨募捐的陈陶遗和陶成章，都已回到上海，募了一笔银款带了回来。陈为同盟会江苏支部长，而陶则为浙江支部长，陈其美知陶带回巨款，即向陶要此款作为军用。陶对陈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你够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③陈其美听见这样的话，自然恼羞成怒。

陶成章曾向吕公望、李燮和、王文庆等人抱怨：“陈英士

① 《龙浩池等致陈其美书》，《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61页。

② 《沪军都督复徐震书》，《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61页。

③ 袁希洛：《我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页。

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我五年来在新加坡等处筹来的款约一百十万元，给他作组织革命之用，现在我回来一查，都被他大嫖大赌用掉了，现在我再不与他合作了。”^①

陶成章出身贫寒，为革命常常往返于南洋、东京和沪杭地区，为了节省费用，只坐四等舱，与苦力为伴，甘之若饴。“近年，规模粗具，海外侨商，国内志士所输饷项，为数甚巨。公为之运送存储，靡不妥协，或以购器械，或以给运动联络之用。靡有毫发之侵蚀。十余年以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未尝稍求华丽。今冬，有友见其始服敝羊裘一袭，询所自来，则某友所贻赠。以视藉公帑以便私利者，优劣奚啻千百倍耶！”^② 皖浙起义失败后，光复会元气大伤，东南革命陷于低潮，陶成章曾到南洋筹款，重组光复会，以便恢复东南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受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阻挠，举步维艰。武昌起义爆发后，陶成章和光复会既往不咎，与同盟会携手合作，共同发动光复东南的武装起义。光复会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费分配上，均与同盟会采取一致行动。但陶成章对“杨梅都督”陈其美确实不放心，不愿意让华侨省吃俭用、满怀爱国热情的捐款，给了上海“堂子里”的姑娘。为此，双方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痕。

第四节 卧榻之师

最让陈其美和同盟会不放心的是，光复会在东南地区势力

^① 《吕公望先生自传》，《杭州文史资料》（第4辑），1984年版，第16页。

^② 《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3页。

日渐壮大。武昌起义爆发后，李燮和奉陶成章之命，组织上海起义。上海光复前，李燮和招募中国体操学校和龙门师范学校的学生组织敢死队，成为光复军的雏形。上海光复后，李燮和率部开赴吴淞，在中国公学内设立“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光复军总司令。此后，吴淞军政分府的军队一律以“光复军”的旗号出征作战。起初，吴淞原有军队只有一个协，李燮和计划再募一个协，两协合为一镇。

吴淞另有一支客军，即黎天才的济军。黎天才是一位以识时务而著称的军官，目睹吴淞革命军即将起事，避居上海租界。11月4日，黄汉湘遣人带银币犒赏济军，各勇一律遵从，督队官徐占魁和队官田汉福也表示暗中内应，济军完全倒戈。李燮和开赴吴淞后，派人到租界邀请济军统领黎天才回吴淞，授予“光复军第一协统”，依旧统帅济军，并增加济军薪饷，以示特别倚重。济军遂由清军营垒分出，成为光复军的一支重要力量。黎天才部在攻打南京时，以少胜多，勇往直前，首先攻克乌龙山和幕府山，旗开得胜，首战告捷。黎天才部在克复金陵战役中，与各友军相配合，锐不可当，勇冠诸军，获得“黎老虎”之称。黄兴指名要调黎天才部赴鄂，光复军一时名声大噪。陶成章与李燮和商议，决定派遣光复军一部援助湖北。李燮和到南京与联军诸将帅商议援鄂事宜，各将帅皆指调黎天才部赴鄂，并推李燮和为“援鄂联军总司令”。但黎天才部只有五营，攻克南京后，张联陞一营编入黎部，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又指令增拨江防二营，镇江都督林述庆拨来窦国治、赵荣华二营，并抽调各军中有枪械者，合编为援鄂第一镇，共计有步兵四标、炮兵一营、机关炮兵一队。黎天才也升为统制，张联陞、犹应龙为协统，拟分期分批援鄂。2月24日，张联陞的先头部队如期出

发，黎天才率领第二批部队原拟12月31日出发，后延期到1912年1月2日才出发赴鄂。张联陞的先遣部队和黎天才军赴鄂后，改隶湖北革命党人指挥，不再受光复会统率。

吴淞还有两支娘子军，也颇为引人注目。一支是1911年11月奉李燮和之命，由女管带陈婉衍招集组成的“女子北伐光复军”，分为临阵、补阵、侦探、卫生四队，均遴选强干能任军事者数十人组成。另一支是由五十人组成的敢死队，以攻取金陵为目的，故又称“女子荡宁队”，也是“勇猛异常，一洗柔弱之习”^①。

吴淞军政分府军队的编组情况，《民立报》作了较详细的报道：吴淞军政分府“自开办以来，合计原有老兵及续练新兵，约三千人，名曰光复军。川乱初起，张鸣歧派龙济光所带之兵一千人来沪，溯江上驶，赴川防剿。及武昌事起，沪市光复，济军进退失据，遂向吴淞军政府投降，仍其旧名曰济军。江浙风气早开，女界发达尤捷。吴淞军政府女子投效者，有七八十人之多，或出家财以助军饷，或竭才力以赞军事。尤可异者，内有某某女士，能自造炸弹，使放手枪以毙敌。因张贼横暴，宁事紧急，内有五十名，请于李司令组成一队，往宁杀敌。此队名为女子荡宁队。吴淞炮台及狮子林炮台，原有把守炮台兵二千名之谱，现在照旧驻扎二处炮台，以固长江门户，名曰水军。此吴淞军政府组织军队之大略也”。光复军参加了攻打南京之役，光复会“派赴攻取宁垣者，共光复军三千人、济军一千人，统名吴淞军，归黎天才督率，光复军夺取幕府山、乌龙山、孝陵卫、尧化门诸要隘。昨日全城光复，吴淞军

^① 《女子敢死队出发》，《申报》，1911年11月26日。

之力居多。捷电至吴淞，需犒赏银约十万两。又张贼之兵纷纷来投有五六千人之多，合之原有兵四千，总共约一万兵之谱”^①。人数约一万人的光复军，成了光复会掌握的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浙江是光复会的大本营，光复会的势力超过了同盟会的势力。浙江省都督府军队的军官，也以光复会会员为主。以浙军攻宁支队为例，支队长朱瑞和参谋长吕公望都是光复会会员。其他的中下级军官，也大都是光复会会员。

另有一支让同盟会和陈其美感到不安的势力就是光复会掌握的会党力量了。皖浙起义后，会党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摧残，但并没有被消灭。辛亥革命高潮到来后，会党的势力又风起云涌，异常活跃，再次成为浙江辛亥革命的一支生力军。原来会党势力强大的金华和处州，就是依靠浙江最大的会党——龙华会的力量，才得于光复。以金华为中心的龙华会，有会众数万，龙华会的领袖沈荣卿、张恭、周华昌是光复会的重要领导人。皖浙起义后，龙华会的力量遭到沉重打击，龙华会的主要领导人或流亡外地，或遭清政府杀害或关押，龙华的副会主张恭即被关押在江苏上元监狱。但龙华会的基本力量还在，并且从未停止秘密的反清活动。武昌起义后，金华的龙华会等反清革命势力乘势而起，纷纷在金华及金华府属各县揭竿而起，驻金华的清巡防营也被龙华会控制。

与龙华会有联系的金华府中学堂监督金兆棧等革命知识分子，极力劝说金华府县官员自动解散撤出。11月6日，金华

^① 《吴淞军组织详情》，《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7页。

光复，同盟会会员朱郁荃出任金华军政分府都督，但是金华局势并不稳定。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后，张恭被释放出狱。张恭立即返回金华，金华人民万人空巷，在婺江滨小码头迎接张恭。朱郁荃表示愿意奉印让贤，由张恭主持金华军政分府，但张恭认为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婉言谢绝，而是接受民团长职务，训练旧部，准备北伐。张恭每天骑马到武胜营训练士兵，随时待命，准备北上直捣黄龙。张恭虽未任金华军政分府都督，但出任民团长，实际控制了金华，掌握了会党力量。

处州也是会党势力异常强大的地区，有一支会党队伍。1904年以后，由于陶成章等人的联络和宣传，处州的双龙会和龙华会等会党势力归附革命。龙华会在处州的首领，也是光复会在处州的负责人吕逢樵通过创建半日学堂等方式，组建了一支拥有数百人的光复军。双龙会在处州的首领阙麟书也联络会党，建立了两队光复军。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吕逢樵潜居缙云横塘岸附近缙云和仙居交界的百步岫从事农桑，以筹集革命经费。同时，与沪杭绍地区的革命党人保持密切的联系，还与处州府的“丽水实业公司”的同志分析形势，准备起义。杭州光复后，吕公望即赴永康与吕逢樵相约举义。吕逢樵首先率部光复了缙云，接着准备光复处州。吕逢樵以百步岫的武装力量和半日学堂的学生为骨干，组建了一支300人的武装队伍，号称“光复军”。“利用实业公司”的志士也加紧准备迎接“光复军”，革命党人陈逸、叶庆崇、金志振与地方绅士孙寿芝、项际虞等20余人，劝说驻丽水的浙江后路陆师巡防队管带李茂青顾全大局，切勿顽抗。处州知府肖文昭获悉缙云光复后，早已躲进基督教堂，不敢露面。知县范传衣则闻讯丧胆，逃之夭夭。李茂青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交出军装局，约束部

下，等候光复。11月23日，吕逢樵在壶镇祭旗誓师，光复军日夜兼程，进军丽水。11月25日，光复军在丽水群众的热烈欢迎下，兵不血刃，光复处州。“全军分三队，约三百多人，队长吕振中、吕焕光等骑着马各自在队前领队。他们的枪械不全，头一队士兵十有七八肩背步枪，二、三两队只有半数持枪，其余拿的都是鸟枪、尖刀枪乃至柴刀、棍棒之类了。吕东升坐着一乘藤轿，藤轿前后有四人骑马荷枪保卫。”^①处州军政分府建立后，吕逢樵出任军政分府都督，孙寿芝任民政部长，项华黻任军政部长，毛养先任财政部长，叶庆崇任教育部长，陈逸任司法部长，朱光奎任民事部长。双龙会首领阙麟书也在碧湖天后宫广招义军，分发武器，任命阙德淦、阙德谦为正副连长，也组织了“光复军”。处州光复后，吕逢樵又令阙麟书在丽水、云和、青田招募一支四五百人的新军，编为北伐队一营，准备参加北伐战争。

台州也是依靠会党的力量，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台州的会党有着长期的革命斗争历史，太平天国时期就进行反清斗争，20世纪初台州仍然活跃着龙华会和伏虎会等会党势力，进行反洋教的斗争。1904年以后，经过陶成章等人联络，台州会党也接受了光复会的领导，参加了革命。1907年，光复会会员杨镇毅等在临海创办“耀梓学堂”，培训会党人员，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一批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杭州光复后，驻台州清军管带弃军出逃，清朝官吏惶惶不可终日，而民众则已预备旗帜，准备迎接革命军的到来。台州的“巨绅”周继索、

^① 毛虎侯：《辛亥革命在丽水》，《丽水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版，第40页。

何奏簧准备集结党羽，抢夺政权。11月5日，驻海门原清军统领雷廷瑞乘乱率军入郡城，宣布就任军政分府都督，局势更加混乱。浙江军政府任命光复会会员姚桐豫为台州军政分府都督，率会党马俊山部300余人乘船抵达府城临海，受到群众夹道欢迎。姚桐豫率部直奔清朝知府衙门，知府嵩连乖乖地交出了印信簿籍，表示归顺。姚桐豫组建了台州军政分府，就任都督，台州和平光复。

嘉兴也是以光复会会员为主，得以光复。“嘉兴光复工作，以方於笥为中心，受省光复会领导。”^①革命党人“潘谋先、方于笥、屠景曾等，亦在嘉属运动军界反正”^②。嘉兴地区革命党人的力量比较强大，同盟会会员有30多人，光复会会员有10多人。但嘉兴的清军兵力也较强大，有清巡防营10营，其中约1营驻扎县城，主力驻王店，清统领沈沂山有恃无恐，顽固不化。杭州光复前夕，诸辅成到嘉兴召集革命党人开会，部署武装起义事宜。方於笥以精严寺藏经阁作为总机关，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筹划活动。嘉兴的革命力量除学生军外，还有一批客民，以及会党余孟庭的旧部，共同组成民团，集中于台州会馆待命。方於笥派人劝告知府杨兆麟和知县沈恩齐合作。杨兆麟觅地隐藏，沈恩齐则回松江参加光复。方於笥劝告沈沂山支持光复，沈沂山予以拒绝。方於笥致电已光复的杭州，请求支援。浙江军政府派顾乃斌率新军82标第2营驰援。沈沂

① 董巽观：《辛亥嘉兴光复记》，《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页。

②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

山及清官吏闻讯仓皇出逃。11月7日，革命军抵达嘉兴，组成了以光复会会员为主的嘉兴军政分府，方於笥被推举为嘉兴军政分府都督。光复会会员占绝对优势。

绍兴是光复会势力较大的地区，但皖浙起义后，所受摧残也最为严重。11月5日，杭城光复后，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光复会会员鲁迅与弟弟周建人等进步师生上街游行，散发传单，演说革命。光复会会员陈燮枢、徐锡麒等人密谋响应。原知府程赞清于11月7日宣布绍兴“光复”，组建军政分府，自称“都督”。11月10日，王金发率部抵达绍兴，受到周树人、陈燮侯、范爱农等光复会会员及群众的热烈欢迎。王金发组建了绍兴军政分府，就任都督，由光复会会员谢飞麟任总参议兼秘书长，主持军政分府日常工作。

杭州府也在省城光复后，推举光复会会员汪疑出任杭州军政分府都督。

宁波和湖州是陈其美派同盟会会员光复，衢州、温州、严州则由当地士绅宣布光复。

浙江省11府都实现了光复，光复会的力量占压倒的优势。

光复会控制了吴淞地区，领导着一支近万人的“光复军”。而浙江的光复会势力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远远超过同盟会的势力。尤其是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徐锡麟和秋瑾联络的会党力量，在徐锡麟和秋瑾遇难后，大都集结在陶成章的麾下，唯陶成章之命是从。光复会在东南地区控制着这样一支英勇善战的光复军，让陈其美和同盟会忐忑不安，卧榻之内，岂容他人酣睡。当汤寿潜离任推荐陶成章为浙江都督时，陈其美和同盟会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陈其美铤而走险，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刺陶事件”。

第十三章 血色疑案

1912年2月14日凌晨2时左右，2个黑影翻过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低矮的围墙，径直来到二楼西面的6号病房，朝熟睡的陶成章开枪，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辛亥革命的元勋，光复会的巨擘陶成章遇刺殉难，年仅35岁。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也敲响了辛亥革命失败的丧钟。中华民国成立不到1个月，就在离民国首都南京近在咫尺的上海发生暗杀创立民国元勋的惊天大案。凶手就是后来出任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和光复会的叛徒王竹卿，而操纵者就是沪军都督陈其美。民国初年发生过许多暗杀革命党人的惊天大案，如1913年暗杀宋教仁的“宋案”，1916年暗杀陈其美的“陈案”，但均已破获。唯有民国建立伊始的“陶案”，不了了之。

第一节 增韞事件

陶成章被害前，并非没有蛛丝马迹。陶成章刚从南洋回到东南地区，有些人就制造了所谓的“增韞事件”。陶成章被攻击收受前浙江巡抚增韞二十万元的巨款，私自将其释放。

陶成章担任主席的浙江参议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释放被

俘的前浙江巡抚增韞案。

汤寿潜提议，吕公望附议，向临时参议会提出《浙江巡抚增韞及其眷属如何措置案》。汤寿潜提出：“将增韞押解出浙境，给资遣送北返。”

吕公望予以支持：“浙抚增韞以及总参议袁思永未杀过革命党，做人也很不错，我们可以给予宽大处理，建议每人给5000元路费，送他们到上海，释放回家。”

褚辅成也认为“抚台增韞、督练公所总参议袁思永为人忠厚，应予护送上海，每人发给遣散费5000元。”^①

“既然不杀增韞，不如资送增韞出境，以绝后患。”陶成章表示赞同。

于是，全体参议一致通过“释放”增韞出境，“由陶焕卿带往上海，还他们自由。”^② 并且“由总司令部派副官周承稷（字悦民），带兵专车解申全眷船票，监视上船北返。”^③

陶成章具体负责将增韞遣送出境。

原来增韞被俘后，有些革命党人提议将其枪毙，陶成章提出异议。陶成章担心“杀了他得罪满人太多，会引起满人反对。”

许多人想不通，为此责骂陶成章。陶成章解释说：“你们

① 吕公望：《浙江光复丛谈》，《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1页。

② 吕公望：《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

③ 黄元秀：《辛亥浙江光复回忆录》，《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1页。

杀他一个人有什么用呢？咱们才拿下一个杭州，打南京要紧。”^①

参议会最后作出决议，“革命军以不杀人为宗旨，给资派陶成章护送至上海，恢复他的自由。”^②

参议会通过释放增韞的决议后，褚辅成声称：“听说增韞在浙江银行有28万元存款，应该予以查实，并勒令增韞交出。”

褚辅成与陶成章相约：“明天前往浙江银行核查，如确有存款，将发电告之。如一日内没有电告，即可将增韞遣送出境。”

众参议亦一致表示赞成。

总司令部派专车，送增韞前往上海。临行前，褚辅成为了慎重起见，又派吴思豫与陶成章谈及释放增韞一事。

吴思豫又与陶成章约定：“以半天为限，到时没有来电，即可放行。”

当天晚上，陶成章、王文庆、张蔚裁以及汤寿潜派来的代表黄某等人，在二排标兵的护送下，坐专车陪同增韞前往上海。专车抵上海后，陶成章等人陪增韞到常州八邑会馆休息，由余丹屏专门负责招待增韞一家。

陶成章将有关核查增韞是否有银行存款之后，才能释放增韞的约定告之余丹屏。余丹屏唯恐夜长梦多，士兵情绪激动，要求处决增韞，无法予以制止，提议立即送增韞离开上海。

^① 张云雷：《辛亥革命见闻琐谈》，《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

^② 傅孟：《杭州光复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8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陶成章觉得不妥，没有同意。

11月10日，陶成章与张蔚裁一起到上海浙江银行查问：“增韞是否在浙江银行有巨额存款？”

上海浙江银行答复：“即使增韞在银行有存款，也应到杭州的浙江银行查询，上海的浙江银行无法查找。”

陶成章在上海浙江银行无法查证增韞是否有存款，而与杭州方面约定的时间已过，也未收到禁止送增韞出境的电报，陶成章遂按计划送增韞上船。

增韞的行李极为简单，连必需的衣服铺盖也没有。

增韞无奈地对陶成章说：“在下没有旅费，能否暂借若干？”

陶成章也身无分文，只好向余丹屏借了100元。陶成章在张蔚裁的陪同下，赴开平轮船公司购买船票，花去44元，剩下的56元，全部给增韞作为盘缠。

陶成章等人送增韞一家上了一艘开往秦皇岛的轮船。

然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些人竟借陶成章释放增韞一事，大做文章，攻击陶成章徇私舞弊。11月13日，上海的《民立报》竟然刊登所谓的杭州来电，《增韞允赠二十万》的报道，声称：“增韞允浙军政府，筹赠经费二十万，闻措缴。增与其母女确于二十日辰初押送沪交纳。其镖客四人，枪毙者二，禁锢者二。”^①影射陶成章将增韞的赃款放入私人腰包。

陶成章对此捕风捉影之事，置之不理。

^① 《增韞允赠二十万》，《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54页。

不久，杭州又谣言四起，盛传陶成章独吞增韞赃款 20 余万，拟到绍兴练兵，准备搞“独立”。光复会会员樊光也听到了谣言，“杭州光复后，增韞被捕，关在陆小，后来听说以 30 万元巨款赎出性命。”^①

陶成章不得不在 11 月 27 日的《民立报》上发表启事，以正视听。

陶成章坦然地说：“我抱民族主义宗旨已 10 多年，备尝艰辛，从未动摇，这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匈奴未灭，战事正酣。我怎会贪图这点蝇头小利呢？说我得增韞 20 万元，到绍兴另立独立王国，纯属造谣诬蔑。”

《陶成章广告》^②

清浙抚增韞被光复军擒获后，以礼待之。九月十九日，由浙江军政府参议部开会公议，仆谓：既不杀，不若送之出境，以全终始，并绝后患。当众参议赞成，遂于是晚开专车，派标兵护送至上海。随行者有都督汤派员黄某（浙测绘学堂教员），偕仆同至常州八邑会馆休憩，有余君丹平招待。增韞旅中行李萧条，衣服铺盖不完备，自言旅费缺乏，仆即向余君丹平借银百元，以四十四元托泰安栈购船票，其余悉交增韞作杂费，遂于二十日乘开平公司轮赴秦皇岛。当议决时，有褚君慧僧声明，增韞在浙江银行有存款二十八万，当俟查确，勒令增韞交出。约期一日，如有是款，则以电告；如一日内无电，即可放行。此褚与仆预约之言也。临行时，复由吴君思豫对仆言

① 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 年版，第 25 页。

② 陶成章：《陶成章广告》，《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955 页。

及此事，以半日为限，届期无电，方可放行。仆到申，告余君营中，而余君深恐军士激烈鼓噪，不能抑制，又主议速送出境。然仆犹恐不妥，复亲至上海浙江银行，查问究竟增韞有无存款。该行谓：即有存款，亦应存在杭州浙江银行，上海无从查究。仆叮咛再三方回。此当日之情形也。况护送有标兵二排，同车者有王君文庆、姚君吾刚、张君蔚裁及其他多人。增韞同仆至会馆时，有王、张二君偕，且为余君及众军士所共睹。至往浙江银行查问存款及购船票，则张君蔚裁同去。是皆众目昭彰之事。诂于九月二十三日，《民立报》上载有杭州专电谓：增韞助浙江军政府款念万。语中有影射仆意，仆亦置之不理。继则杭城谣言叠出，对于仆咸有猜疑，甚谓仆挟有南洋巨资二十五万，往绍兴与练兵谋独立之举。可笑孰甚！悠悠之口，本何足介意。然仆有不得不声明者：仆抱民族主义十余年于兹，困苦流离，始终不渝，此人之所共见者也。今南北未下，战争方兴，仆何敢自昧生平，而争区区之权利？谓仆得增韞款二十万及绍兴谋独立，其视仆不亦左乎？第谣言不息，行事多碍，故特声明。会稽陶成章白。

据说，让陶成章护送增韞赴沪释放，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焕卿至浙江后，锋芒太露。其时适为处理增韞事，遂推焕卿护送至沪，不知此即圈套也。乃造谣谓焕卿得贿若干，焕卿性急躁，大登广告于《民立报》，而迫焕卿不能立足于浙江。”^①只是陶成章不知是计。

革命党人从事反清革命，就是为了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

^① 许仲和：《章太炎撰龚未生传略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8页。

统治，而不是要对满族人斩尽杀绝。因此，各地的辛亥革命对清政府的官吏都很优待，对汉人如此，对满族人也一样。“浙江抚台增韞被俘仍受优待，并于1911年11月9日由浙江军政府参议会开会公议，派陶成章、黄教员（浙江测绘学校教员）及派兵士护送到沪，11月19日，上海《民立报》载有杭州专电，谓增韞助饷20万元。陶成章遂在《民立报》登载广告，详细申述护送增韞经过情形，可见其中投机活动，互相倾挤的尖锐。按当时情况错综复杂，不可究诘，而实质上说明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而已。”^①从“增韞事件”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取得彻底胜利，隐藏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就暴露无余。

第二节 反黄事件

“增韞事件”刚刚平息，又有所谓的陶成章煽动浙军反对同盟会的黄兴出任大元帅的“反黄事件”。

原来南京被江浙联军攻下后，汉阳已失守，武昌在清军炮火的威胁下，独立各省到达武汉的代表只能在汉口的英租界开会。12月4日，陈其美和宋教仁等人以急需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为理由，鼓动独立各省留沪代表召开共和联合会大会，与会者除了各独立省的代表外，还有苏浙沪三省的都督。会议除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外，还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陈其美等人认为黎元洪是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

^① 董巽观：《辛亥嘉兴光复记》，《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8页。

所拥戴出来的首领，但并不是革命党的领袖，而孙中山还在海外未归，因此，只有黄兴是同盟会在国内的唯一领袖。

关于这次上海方面选举黄兴为大元帅，当事人均有详尽的回忆。蔡元培在柏林接到陈其美催其速回的电报，就途经西伯利亚匆匆回国。蔡元培到达上海时，恰好黄兴也刚从汉口来上海。蔡元培回忆：“有一日，说是有一个省代表会，将于第二日举大元帅，大约举黎宋卿先生的多一点。我因为听说黎先生本来不是赞成起义的，又那时候很有与北军妥协的消息，觉得举黎不妥，特地到汤蛰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详细讨论，彼等亦赞成我举黄的提议。但汤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举黄，而要求我亦到会，于会中推我为代表而投票举黄。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时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开选举会，依汤先生所定之手续，我投票举黄，章先生及其他有选举权者，皆举黄，盖事前受章、汤两先生疏通了。大元帅举定后，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说：‘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既选定，请设一副元帅，并举黎先生任之。’全体赞成。”^① 蔡元培刚从外国回沪，对许多情况并不了解。蔡元培提到章太炎和汤寿潜起初同意举黄兴为大元帅，但汤寿潜不愿公开表示赞成，而章太炎最初也表示同意推举黄兴，可是会上黄兴被选举为大元帅后，章太炎却表示反对，认为对黎元洪不公平，蔡元培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或许章太炎本人的回忆，有助于解开这个谜。章太炎的说

^① 《辛亥那一年》，《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7页。

法，与蔡元培有所不同。“江宁既下，浙府嘱余为浙江代表。各省代表半已上武昌矣，其半尚留上海。克强欲自为大元帅，代表多屈从之。议于江苏教育会，苏、浙两都督亦至。余言克强功虽高，已受黎督委任为汉阳总司令，不得以部将先主帅；且前已推武昌为中央，焉得背之。诸代表未有言，蛰仙称浙江有事，遽引去。苏军偏将顾忠琛横刀直入曰：‘诸君议何故不决，吾军人，不能容诸君犹豫。’诸代表皆起，决推黄兴为大元帅。余曰：‘武昌先起，今处黎督何地。’乃推黎元洪为副元帅。”^①章太炎提到之所以举黄兴为大元帅，是因为黄兴要自任大元帅，且会上有军人不允许代表犹豫不决。故汤寿潜表面上赞成，但在选举会上不直接提出来；而章太炎实际上反对黄兴任大元帅，故表面上允诺，却不投票。但黄兴被推举为大元帅后，章太炎又以黄兴是黎元洪的部将，且黎元洪有首义之功，力持异议，但无力回天，黎元洪仅被选举为副元帅。章太炎的回忆，将蔡元培感到“曲折”的问题讲清楚了。

然而，12月5日，想自任为大元帅的黄兴，却发表声明，坚持不就，让人困惑不已。据说是因为黄兴素志就是“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在举行欢迎黄兴推举为大元帅的大会上，黄兴竟然当场辞谢。黄兴解释说：“愿领兵北伐，誓捣黄龙，以还我大汉河山。至于组织政府，则并非自己的能力所能信任。”

与会代表询问：“黄先生如果觉得各省代表盛情邀请仍不够，若是全国人民都请黄先生任大元帅呢？”

^① 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0页。

黄兴回答：“孙中山即将回国，由孙先生组建临时政府较为合适。”

代表们以接力赛的方式，反反复复劝说黄兴，黄兴才勉为其难，以作为一时权宜之计，暂时担任大元帅。一旦孙中山回国，立即卸任。

但章太炎对黄兴辞任大元帅，却有另外的说法。章太炎回忆：“议罢，江苏督部总务厅湖南章驾时闻之，怒曰：‘南方倡义，可录者两大功耳：发难自武昌，下江宁者程公之力，黄兴何故得先之？若然，吾将举兵攻兴。’克强大惧，让大元帅于雪楼。雪楼初反正，尚不能制顾忠琛，亦不敢受。英士闻，遽以商团40人护克强，其徽识曰警卫军焉。”^①因章驾时表示欲以武力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故黄兴辞职。而顾忠琛坚决反对黎元洪，黎元洪亦不敢任大元帅职。

黄兴被举为大元帅，也遭到浙江攻宁支队军官的反对，据说朱瑞反对最为强烈。章太炎回忆：“后十余日，代表先上武昌者皆返，以前所推举非代表全体意，复上江宁，议于江苏谘议局。主黄者犹未屈，诸军洶洶，浙司令朱瑞尤愤。克强微知之，急请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三督同赴江宁。浙军责蜚仙规避，语未终，英士狼狈走还上海。蜚仙许通情代表，终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以汉阳新破，北军方逼夏口，武昌不可置政府，推副元帅就江宁组织内阁，克强欲入江宁，无应者。”^②原来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者，还

^① 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0页。

^② 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0页。

有浙军的军官。

据葛敬恩回忆：“革命军既下南京，革命党人内部问题不断暴露，争执磨擦，日益剧烈。如推举大元帅一事，一部分人主张推黄兴担任，一部分人则主推黎元洪，我们浙军中的将领主推黎的居多。其时人们党派分野并未划得十分清楚，我们起初对这件事情的想法，以为黎毕竟是武昌首义的人物，黄虽属同盟会领袖之一，但为汉阳作战败将，浙军司令朱瑞主张就很明朗。我们的司令部因设在省谘议局，来访的人更是络绎不绝，都想说服浙军表示坚强主张，借以增加自己势力。袒黄（亦即袒孙）袒黎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光复会分子反对同盟会日益露骨，陶焕卿、李燮和一派鼓吹与同盟会分家，我们就成了此等人的对象。沪军参谋长黄郛也曾来过南京，他也多少有些活动。他先向我说服，我本来是最恨派系分裂的，黄对我讲明当时必须推举黄兴的理由，他还希望我劝告朱瑞，要求朱勿在军中续唱高调。朱本富理智，经过这番疏通，浙军方面才没很坚持下去。”^① 黄兴是仅次于孙中山的同盟会领袖，而黎元洪在武昌起义时还持反对意见。但由于黎元洪属于“武昌首义的人物”，自然比背负“汉阳败将”名声的黄兴更适合做大元帅，自然也有浙军援宁支队的许多军官都是光复会会员，支持光复会“袒黎”而不“袒黄”的主张。

浙军的“反黄”举动，被同盟会认为是陶成章的“嗾使”，陈其美为此恨得咬牙切齿。

陈其美杀气腾腾地对浙军攻宁支队参谋吕公望说：“请你

^① 葛敬恩：《辛亥革命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24页。

转告陶焕卿，叫他以后不要多管闲事，否则，就是陶骏保第二。”

辛亥革命时期，陈其美制造的刺杀“二陶”事件，是民国初年两件轰动全国的事件。陈其美的传记作家认为这是陈其美在民国建立之初，做的一些“错事”^①。刺杀“二陶”就属于这些“错事”之一。陈其美在暗害陶成章之前，已枪杀了陶骏保。陶骏保是光复会会员，曾任镇江都督府总参谋兼江浙联军司令部参谋长，南京光复后出任江苏省都督府参谋次长。1911年12月13日，陈其美以商讨进军北京问题作为借口，邀请陶骏保到上海面谈。下午，陶骏保穿着新狐皮坎皮袍，乘坐马车来到沪军都督府拜会陈其美，陈其美在都督府的大堂见了陶骏保，并宣布了其罪状。陈其美指控陶骏保在第九镇进攻南京时，中途截留了由上海运往南京的械弹，致使江浙联军遭受重大伤亡。陈其美立即下令关闭都督府的大门，将陶骏保绑了起来。陶骏保大呼冤枉，但无济于事。下午五时，即在沪军都督府大堂执行枪决，朝陶骏保连开了13枪。陶骏保被枪杀后，陈其美和程德全为了稳定军心，告示民众，宣布陶骏保破坏联军会攻南京；南京攻克后，又冒功揽权，差点酿成事变；到上海后，又散布谣言，煽惑人心。但并未公布具体证据。

陈其美以陶骏保的例子来威胁陶成章，遭到吕公望的嘲笑。

吕公望规劝道：“南京的事，不是沪军都督府所能干涉，请你不要滥用职权。”

显然，陈其美要暗杀陶成章，早就放出了风声。

^① 莫永明：《陈其美传》，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上海盛传陈其美欲谋害陶成章，可陶成章并未放在心上。

光复会会员王文庆在南京听到陈其美欲刺陶成章的风声，立即赶到上海，劝告陶成章暂时避避风头。陶成章正忙于筹划北伐事宜，无暇顾及。由于光复会会员一再劝说，加上劳累过度，旧病复发，才不得不住进医院。

第三节 力辞浙督

浙江是光复会势力强大的地区，自从皖浙起义后，以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一直认为在贵福和张曾敫对秋瑾怎样处理举棋不定时，就是汤寿潜的怂恿，才下定杀害秋瑾的决心。汤寿潜被推选出任浙江军政府都督，是在革命党人获得政权初期，需要有一个有名望的人来维持局面。但汤寿潜作为立宪党人，原本不受革命党人的重视，浙江军政府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革命党人控制的参议会，浙江都督权力被架空了，成了“傀儡都督”。汤寿潜在致陶成章的电文中，也抱怨：“下走在此，从无个人自发之命令。”^① 据说浙江都督府的权力，实际集中在陶成章的手中。“陶成章任参谋长，都督对外命令，非参谋长副署不生效力，使互相牵制。”^② 更让汤寿潜无法容忍的是，杭州的旗营之所以归顺，除了革命党人的武力威胁外，也与汤寿潜的劝说分不开，从上海匆匆赶来的汤寿潜作出保证所有旗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承诺后，参将贵林才逼迫杭州将军德济缴械

① 汤寿潜：《致陶焕卿函》，《萧山文史资料选辑——汤寿潜史料专辑》（第4辑），1993年版，第701页。

② 章天觉：《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0页。

投降。可旗营投降后，革命党人听说贵林父子要谋反，立即将贵林父子予以处决。

陶成章主持召开了参议会第四次会议，诸辅成提议：“满营德济方面密告，贵翰香及其儿子有抗顺密谋，如若叛变，他难负责，应请适时处置案。”

参议会议决：“贵翰香父子予以枪毙。”^①

陶成章和诸辅成遂以汤寿潜的名义，将贵林诱出，并加以处决。

据说“汤任都督，本挟旗人将军德济、协领贵林等以自重。时旗兵驻防杭州，尚有数千人，未安置妥贴，有枪4000余支，子弹五六十万粒，势难轻视，民党知之。汤莅浙后，虽缴械一部分，而隐匿甚多，佐领贵林等实主之，汤亦深悉。其事为杭辛斋侦得，密陈于陶（成章）、褚（辅成）。陶令褚诱贵林等会商安置旗兵办法。贵等至，褚面责匿留枪械事，示以档册，核与所缴不符。贵等词穷而不屈，出言尤不逊（盖亦挟汤以自重，且知民政司无杀人权也）。褚怒，即下令缚贵林于阶下枪决之，未征汤之同意也。汤闻之，不自安，乘隙挟衣被至车站，欲潜赴上海。陶成章悉其情，派兵追踪挟回，责以大义。汤虑为贵林之续，噤不敢言，视事如故。”^② 革命党人借汤寿潜之名，将贵林处决。

作为浙江都督的汤寿潜认为革命党人作出如此重大的决策，事先不打一声招呼，就以都督的名义采取行动，显然，没

① 吕公望：《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

② 章天觉：《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0页。

有将他这个都督放在眼中。尤其是作为在旗营投降书上签字作保的汤寿潜，墨迹未干，便处决订约之人，使其背负欺骗旗营，失信天下的恶名，更是愤愤不平。

1912年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通过了各部总次长名单，由浙江都督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汤寿潜早萌辞职之意，获悉已调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长，便坚辞不就了。汤寿潜辞去浙江都督后，不愿再担任官职，并未立即前往南京任职。

汤寿潜卸任前，推荐章太炎、陶成章和陈其美三人，继任浙江都督。陶成章“意志坚决，生活朴素，办事能力很强，不嫌劳苦，不怕困难，一切认真负责，从不自炫其功”^①。因此，陶成章在仁人中，出任浙督的呼声最高。

1912年1月7日，章太炎发出皓电，以自甘于“民党地位”为理由，主动辞谢不就浙江都督职。“章还征得陈（其美）的同意，乃代陈同荐陶成章为浙江都督。而实际益遭陈英士之疑忌。”^②章太炎以陈其美志在北伐为理由，代陈其美推辞不就，让陈其美恼羞成怒。章太炎诚心诚意地推荐陶成章继任浙江都督。

杭州军统蒋、参谋长周、军政长顾、政治长褚、财政长高暨临时议会诸君钧鉴：

蜚公举炳麟及陶焕卿、陈英士代理浙事。英士志在北伐，炳麟愿作民党，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此次

^① 李净通：《辛亥革命以后十六年的浙江政局》，《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8页。

^② 房宇园、温永之：《陈英士与辛亥革命及讨袁之役》，《湖州文史——陈英士先生史料专辑》（第1辑），1984年版，第23页。

下江光复，微李燮和，上海不举；微朱价人，南京不下；而我浙之得力于敢死队者甚多，是皆焕卿平日经营联合之力。且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卿不能拊慰。鄙意若令代理浙事，得诸公全力以助，必为吾浙之福。敢布区区，仍候公同议决为幸！

章炳麟。皓。^①

章太炎认为陶成章组织敢死队，光复东南，尤其是攻克南京，功勋卓著。陶成章曾联络会党，作为革命力量，在会党中影响很大，深得浙江会党的爱戴和敬重，由陶成章出任浙江都督，自然再合适也不过了。

1月8日，章太炎又致电汤寿潜，坚辞不就。

南京交通部长汤公鉴：

见电举仆与焕卿、英士代理都督，仆天性耿介，惟愿处于民党地位。下江光复，实惟焕卿数年经营之力。其功非独在浙江一省。代理浙事，微斯人谁与归？^②

章太炎再次表达了自己甘处“民党”地位，高度评价陶成章在光复东南所作的贡献，再次强调除陶成章之外，没有其他人更适合继任浙江军政府都督。

陶成章念念不忘的是清政府尚未推翻，不愿出任浙江军政府都督。

南京攻克后，陶成章又继续设“北伐筹饷局”，以及“光

① 《与蒋尊簋等》，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页。

② 《与汤寿潜》，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6页。

复军总司令部于上海募兵”，积极准备“经营北伐”。^①

陶成章的北伐号召，得到各地的热烈响应。绍兴“开元寺主僧巍峰君急公好义，胸存将略，此次北虏未灭，贼害同胞，椎心泣血，日夕痛心，前组织卅字军召集各僧群赴大义，弃佛从戎，刻已编练两队，呈请各军政府立案，并禀请光复义勇军总理、浙江参谋部长陶焕卿公调赴北伐，闻陶公业已允准，已派代表赵汉卿君来绍犒赏，军心鼓舞极为欢迎云”^②。故乡绍兴的僧人也踊跃参军，待命北上。

绍兴光复后，陶成章曾回到绍兴，组织筹饷局，号召各界士人支持北伐。“明道女校的许多师生勿忘秋女侠之遗风，组织了女子协赞会，大力开展筹饷活动，她们把筹募所得的款子，陆续汇寄上海陶成章处。”^③

陶成章为攻克南京，竭精尽虑，以致于积劳成疾。光复会会员王致同、龚宝铨、张云雷和王文庆等力劝陶成章暂时住院休息，但“公之志未尝稍衰。及江南恢复，革命党人皆有争功夸能，帝制自为之心。公恐北虏未破，何以自安，强病而起，与朱瑞、吕公望、屈文六诸友谋北伐之举，欲尽吾浙人之兵力，为中华民国争特色之光荣，而建轰轰烈烈之伟业”^④。陶成章虽然因病住院，身不由己，但仍念念不忘北伐事业。

陶成章告诫光复会同人以及昔日故旧与地方军政府继续联络北伐事宜。“当南京未破前，旧同事招仆者，多以练兵筹饷问题就商于仆，仆未尝敢有所推诿。逮南京破后，仆以东南大

① 尚秉和：《辛壬春秋》（第14册），1924年版，第8页。

② 《绍兴士民之义勇》，《民立报》，1911年12月30日。

③ 裘士雄：《陶成章与鲁迅》，《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61页。

④ 《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9页。

局初定，爰函知各同事，请将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及杭州军政府，以便事权统一，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是所至禱。恐函告未周，用再登报声明，伏希公鉴。”^① 陶成章因病住院，无暇接待各地来沪联系北伐事宜的旧部。

陶成章曾对机要秘书徐仰山推心置腹地说：“北伐成功，虽死无憾。”

陶成章发出通电，对浙江都督一职坚辞不受。1月12日，陶成章在《民立报》发表《致各报馆转各界》：“公电以浙督见推，仆自维轻才，恐负重任。如汤公难留，则继之者非蒋军统莫属，请合力劝驾，以维大局。”^② 陶成章转而推荐光复会会员蒋尊簋继任浙江都督。陶成章“以光复军司令驻沪上，力辞浙督，转推蒋”^③。

但是，光复会会员认为陶成章长期从事反清革命，为这次杭州和浙江光复做出了重大贡献，均要求陶成章继任浙江都督。“适值汤寿潜辞浙江都督，浙人咸以成章于浙江革命运动，其功甚伟，拟举之以代。”^④ 龙华会首领沈荣卿等人发出致陶成章电，强烈要求陶成章出任浙江都督。“顷阅先生通告各界电，骇甚。先生十余年苦心，才得今日之收果。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况和议决裂，战事方殷，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先生为大局计，万祈早日

① 陶成章：《致浙省旧同事》，《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56页。

② 陶成章：《致各报馆转浙江各界》，《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56页。

③ 傅以潜：《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0页。

④ 陶冶公：《陶焕卿先生小传》，《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回浙筹备一切，若不谅荣等之苦衷，一再退让，将来糜烂之惨不可逆料。敢布区区，敬达聪听。”^① 沈荣卿联合毛修洁、蒋演、滕奇、童珏等光复会员，请求陶成章不要辜负浙江人民的期望。

浙江各界均欢迎陶成章继任浙江都督。“两浙人民公举公（陶成章）继任浙督，函电交驰，一日至百数起，公力辞不就。”陶成章“独以民国初成，北虏未覆，功亏一篑，号呼警众”^②。由于陶成章坚辞浙督不受，正在广东的蒋尊簋被电告回浙继任浙江都督。

蒋尊簋继任浙江都督后，对陶成章功成不就，钦佩不已，“浙江大局已定，蒋都督经全省各属代表一致欢迎受任，益见陶先生之功成不伐。不独全国钦敬陶先生，即浙人亦当共体陶先生之谦德也。”^③

但光复会会长章太炎对于陶成章在南京克服后，仍大张旗鼓地筹募款项，招兵买马，以至于引起陈其美的忌恨，不以为然。章太炎回忆：“初，赵伯先之死，未有疑克强者也，焕卿不能分别，并恶之，日与黄（兴）、陈（其美）不合，自设光复军总司令部于上海，募兵。余告之曰：‘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武昌方亟，君当就蜚仙乞千余人上援，大义所在，蜚仙不能却也。如此既以避偏，且可有功。恋此不去，必危其身。’焕卿不听，

① 《沈荣卿等致陶成章电》，《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56页。

② 章乃穀、鞠僧甫：《民国浙军参谋陶公焕卿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6页。

③ 沈荣卿等：《致陶成章电》，《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56页。

果被刺死。”^① 章太炎鉴于沪军都督陈其美咄咄逼人的态势，建议陶成章退让三舍，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一支千余人的军队，西上援鄂，避开与陈其美的公开冲突，但陶成章不听劝告，仍坚持北伐直捣黄龙。

第四节 血溅黄浦

陈其美想继任浙江都督，派蒋介石等人到杭州活动，却遭到浙江革命党人的冷落。“那时恰逢浙江都督汤寿潜辞职去临时政府任职，原已不安于位的陈其美，意欲调继浙督，曾派遣蒋介石等到浙活动，不料受到浙人冷遇。浙人瞩目的是陶成章，派出代表络绎不绝于沪杭道上，欢迎陶成章继任浙督，这一情况更引起陈的嫉恨，遂以陶为主要对手，必欲置于死地。”^② 浙江各界欢迎陶成章继任浙江都督，对陈其美则无人问津。

陈其美恼怒异常，光复会已控制吴淞，浙江本是光复会的大本营，浙江会党一向听从陶成章的指挥，新加入光复会的新军官兵，也都拥护光复会的领导，现在陶成章要出任浙江都督，无异于龙归大海，猛虎归山。沪军都督府在光复会李燮和所控制的吴淞军政分府以及即将由陶成章所掌握的浙江军政府的两面夹击下，不就是死路一条了。

由于陈其美“对浙江都督的职务早就垂涎三尺了，这时恰有汤蛰仙（寿潜）要辞职，时机大好。”然而，陈其美又

^① 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0页。

^② 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26页。

“想到陶成章对浙江革命劳苦功高，有威信，都督之职一定会被他接去，不去掉陶成章，自己想当都督是不会成功的。蒋志清在陈其美部下，就是后来改了名字的蒋介石，想讨好他的主子，按照陈其美的意图，趁陶成章在法租界医院不备，把陶成章枪杀了”^①。陶成章的威望远远超过陈其美，陈其美想与陶成章竞争浙江都督，注定要失败。陈其美因此铤而走险，指使蒋介石暗杀陶成章。

东南光复后，浙江、江苏和上海早就建立了都督府，但江浙沪地区的光复会势力很大，陶成章作为光复会的实际领导人，东南地区的光复会员都唯陶成章之命是从。尽管陶成章曾致电各地的光复会会员，攻克南京后要与各地的军政分府商量北伐事宜，但并无效果。陶成章在东南地区潜在的实力和崇高的威望，让将东南视为同盟会禁脔的陈其美忍无可忍，必欲除之而后快。浙江都督一职的竞争，不过是陈其美刺杀陶成章的一个导火线而已。

陶成章被害前，有关陈其美要暗杀陶成章的传言早已传遍江浙沪地区。陶成章在光复会同人的劝说下，“始避之于客利旅馆。因应接甚繁，不能不出，乃又移之国民联合会。同人以人来太杂，乃又移之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所。次日，又移之汇中旅馆，适同盟会会员在该处宴请孙文，先生在饭厅遇王金发、褚辅成。先生病本未愈，次日因移入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② 陶成章为了躲避行凶者，屡次转移住处。

^① 张云雷：《辛亥革命见闻琐谈》，《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页。

^②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6页。

陶成章曾将秘密住处，写在便条上，告知妻子孙晓云。

弟现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汇路相近）广慈医院，头等房间第六号。此地僻静，晚间来看不便。如来看视弟，可在上午八、九点钟后，下午四点钟前，此上

小云吾姊鉴。

从弟 东生白

十一月十一日^①

东生是陶成章的化名。陶成章未想到，给孙晓云的短笺，竟成了绝笔。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凶手追踪而至。

1912年1月12日，同盟会会员沪军标统蒋志清与光复会会员张伟文和曹锡爵会晤，蒋志清假惺惺地表白说：“我与陶焕卿先生从来没有产生过个人成见，特地前来当面说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蒋介石声称：“有关北伐机要密件，须与焕卿先生面商。”^②

张伟文考虑蒋介石本来也是革命党人，前来与陶成章接洽北伐事宜，应属实情。张伟文未荐芥蒂，便约蒋介石下午四时到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所与陶成章面谈。

蒋介石依约来到江西路，与陶成章相谈甚欢。

“鄙人想随时登门拜访，聆听先生教诲。”临别时，蒋介石

^① 《与孙晓云便条》，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6页。

^②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4页。

石假装恭敬地探问：“不知陶先生现居何处？”

陶成章“素笃实，遽以住处号数示之”^①。陶成章并未在意，随手将金神父路广慈医院住处的房间号，写在便条上，递给蒋介石。

蒋介石是个多疑的人，唯恐陶成章所书地址不实。晚上十时，蒋介石又派人到广慈医院，声称有信递交陶成章。

陶成章接见了送信人，询问：“谁送来的信？”

来人声称：“是从杭州来的快信，托蒋志清转交陶先生。”

陶成章拆开信一看，是“浙江临时协会”署名的信，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

1月13日下午，张伟文前来广慈医院探望，陶成章将蒋志清转来的信递给张伟文。

“此信非常蹊跷？”张伟文读后，对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浙江只有临时议会，根本就没有临时协会？”

陶成章也觉得有些反常，但没有深究。

晚上，樊光与弟弟樊松甫到广慈医院探望住院疗养的陶成章。陶成章身穿中装，体态从容，只是为北伐的事过于操心，容貌显得异常憔悴。

陶成章慷慨激昂地说：“清廷苟延残喘，原不足道，但北洋军阀势盛，袁世凯炙手可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可不严重警惕。”

陶成章虽在病中，但仍对目前的政治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其他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抱有太多的幻想不同，陶成章指出袁世凯有帝制自为的野心。陶成章告诫：“国人宜团结一

^① 《孙德卿》，《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2页。

致，铲除这一祸胎，否则任其勾结帝国主义，胡作非为，国人受害不知伊于胡底。”^①

陶成章与樊氏兄弟恳谈到深夜，并约兄弟二人翌日到维昌洋行办事处会晤，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樊氏兄弟没想到，这竟成了与陶成章的诀别。

果然不出所料，1月14日凌晨2时，陶成章在医院病房已入睡，突然有2人撬门而入，被侍者发现。

侍者惊问：“深夜来访，有何贵干？”

来人声称：“有要事求见陶先生。”

侍者没有警惕，将来人带上二楼头等病房，引入陶成章卧室。

陶成章面向里面，已熟睡。

来人呼叫：“陶先生！陶先生！”

陶成章惊醒过来，转身向外。

来人立即拔出手枪，朝陶成章开枪。子弹从陶成章左颈喉管射入，斜穿脑部。

侍者正要喊叫，来人用枪威胁：“不得出声！否则，就要你的命！”

侍者吓得双腿发抖，不敢声张。

2人收起枪，扬长而去。夜色微明，“刺客跳出去，医院里有人亲眼见两个黑影，逃得很快，转眼就不知去向了。”^②

医院急忙对陶成章进行抢救，“为延西医，施治无效，遂

① 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26页。

② 杨镇毅：《光复会和光复军》，《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页。

卒。”^① 光复会巨擘陶成章英年早逝，年仅35岁。

1月14日，上海《字林西报》发行特大号外，抢先报道了“革命巨子”陶成章被刺身亡的消息。

1月15日，上海各大报纸争相刊登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遇刺的消息。同盟会报纸《民立报》以《陶先生死不瞑目》为题，对陶成章遇刺作了简单报道：“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人颇有举公者，而公推让不遑，其谦德尤可钦佩。詎料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言有要事相访。侍者引入室，公面向内卧。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复以手枪威胁侍者，禁勿声张，从容而去，而公竟自此千古也。凶手未获，故案情颇不明了，惟近日盛传满洲暗杀党南下，谋刺民国要人，公或其一也。闻军政府刻已严密查究，法捕房亦严饬探捕缉获云。”^②《民立报》以清政府派“暗杀党”南下作为烟幕，转移对凶手真实身份的注意。

1月16日，《申报》也以《陶焕卿被刺警耗》为题，作了大同小异的报道：“会稽陶焕卿先生尽瘁革命事业，十年以来无或稍懈。此次浙省光复，先生又组织光复会，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都督蛰仙先生改任交通总长，浙人颇有举先生继任者，而先生推让不遑，其谦德尤可钦佩。先生近因撙疾，在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养病。詎于元月十三日夜间二点半钟时，忽有二人身穿洋服，口操粤音，言有要事相访，侍者引导

① 傅以潜：《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1页。

② 《陶先生死不瞑目（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57页。

入室，二人见先生已卧，面向内，遂呼陶先生，先生转身视之，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先生之太阳部及腹部，复以手枪威胁侍者，禁勿声张，从容而去。而先生竟因此殒命。又闻二人逃出时，邻人闻惊往逐，二人以手枪视之，声言若来追随，当以子弹奉赠，逐者遂散。现在军政府已严密查究，法捕房亦飭捕探缉拿，尚未得其踪迹。”^①

广慈医院所在的法租界巡捕房闻讯后，立即请示会审副领事顾宝，由顾宝派聶讞员到医院查验，首先检查刺客撬门入室情况，并将凶手留在房门的指印拍摄，还到二楼陶成章的住处检视被害状况，因子弹射入头颅，并未穿出，无法取出。1912年1月17日，《民立报》刊登了法租界巡捕房检视陶成章被害情况。“陶焕卿先生在法新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医疾，被不知姓名之人用手枪击伤脑部身死。法捕房得信后，立飭各探捕严行查拿外，稟请会审副领事顾宝君，由顾君谕照聶讞员，会同至该医院，先察看该匪等入门形迹，复至二层楼头等病房检视陶君之尸，系用手枪轰击，枪珠从左颈喉管旁边深入脑部，惟枪珠并未穿出头顶，故不能取出。检毕，由陶君亲友备棺成殓，须严缉凶手到案究办。并闻凶手留有手印在房门上，已由捕房摄影，以便侦缉云。”^② 租界巡捕房已责令巡捕查缉凶手。

1月15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获悉陶成章遇刺消息，立即急电沪军都督陈其美：“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14日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

^① 《陶焕卿被刺警耗》，《申报》，1912年1月16日。

^② 《陶先生死不瞑目（二）——被刺情形》，《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58页。

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凶手逃去，陶君遂于是日身死，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都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① 孙中山在急电中肯定了陶成章长期从事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尤其是光复东南所立下的丰功伟绩，对陶成章遇难表示深切哀悼，指示沪军都督陈其美缉拿凶犯，严惩不贷。

陈其美不得不声称：“此案发生，已由沪军都督派遣全部暗探严密查拿外，并饬交涉司转饬会审公廨委员及函请租界捕房一体协缉矣。”^② 并装模作样地悬赏捉拿“凶犯”。尽管“上海都督悬赏 1000 元，但没有查出结果。”^③ 贼喊捉贼，自然不会有结果。

1 月 16 日，孙中山又致电浙江都督，通报了陶成章遇难情况，肯定了陶成章为辛亥革命做出的贡献，指示做好安抚烈士家属的善后工作。“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 14 日上午两点，在上海法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部腹部，凶手逃去。陶君遂于是日身殁，不胜骇悼。陶君抱革命之宗旨十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尤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痛惜。已电令沪都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至陶君原籍会稽，应由浙督查明

① 《致陈其美电》，《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3 页。

②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958 页。

③ 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 2 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 页。

其家属，优予抚恤，并将其生平之行谊及光复之芳勋，详细具报，备付将来民国国史。”^① 孙中山要求继任的浙江都督蒋尊簋抚恤陶成章的家属，并详细查明陶成章的革命事迹，上报南京临时政府，以备将来国史馆为陶成章树碑立传。

浙江都督府于1月20日批准给陶成章家属优抚费10000元，子女抚养费每年500元。1916年8月，孙中山到绍兴祭奠陶成章，又责成浙江都督府追加陶成章子女抚养费200元。每年正月十五日，陶成章的家人到杭州浙江都督府（后来改为浙江省政府）领取抚恤金。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陶成章子女的抚养费也就取消了。

1月29日，浙江都督府也发出了《悬赏缉凶广告》：“陶公焕卿为民国效力积十余年之久，坚苦卓绝，人所共仰。今在沪无端被人刺死，殊堪骇异。除通飭所属一体严缉凶手外，本都督府特悬赏洋三千元，无论何人在何地方如有获得真凶者，一经解来府，赏洋即行照给。特此广告。”^②

光复会也发出了《上海光复会同人公启》：“去月陶公成章自金陵归，养病于法界金神父路之广慈医院。不料廿五夜之二时许，突有两人身西服，逾垣而入，至楼下，见门高不得入，力将玻璃窗撼下，侍者觉，欲呼贼，二人急出手枪威胁之，于是侍者不敢发一声，任其上楼入公寝室。时公已安睡，二人呼陶先生。公寤，一个遂出手枪，击中公脑部。呜呼！公竟自此与世界长别矣。二人行刺后，虚扬手枪以吓侍者，扬长

^① 《致浙江都督府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页。

^② 《浙江都督府悬赏缉凶广告》，《全浙公报》（第1071号）。

而去。去后，医院电告捕房，同人等至次日始由捕房来报，藉得颠末。嗣由领事咨请臬员往该院勘验一切情形，察得枪弹从左颈项深入脑部，因弹未穿出，以致不能施救。即由同人筹备棺盛殓，灵柩始则暂厝于绍兴会馆，于初三日，绍兴同乡会举开追悼会后，即于次日浙都督派专车运杭。惟缉凶一事，刻下虽蒙浙都督、沪都督已悬重赏，严饬缉拿，尚未弋获。公之被刺情况如此，而致刺原因，尚难拟议。溯自公奔走革命，十余年如一日，此次光复江、浙，功绩卓著，浙人电举督浙，犹力辞不遑。公本以无名英雄自居，谦让如此，其不欲与功名相争逐者可知。蠢尔奸奴，何嫉之深，悠悠苍天，曷其有极。”^①光复会向各界通报了陶成章遇难情况以及善后处理事宜，表彰了陶成章为革命几十年如一日奔波忙碌，光复东南的丰功伟绩，谴责凶手刺杀陶成章的卑劣行径。

陶成章作为光复会的巨魁，名扬中外。陶成章遇刺，自然寰宇震动，而凶杀案又发生在租界，租界当局异常重视，“明知此举系陈、蒋所为，然皆敢怒而不敢言。”^②后来，迫于沪上巨大的舆论压力，租界当局不得不叠成案卷，并发出通缉令，也是不了了之。

第五节 真凶志清

持枪行凶的刽子手之一蒋志清，即蒋介石。“这件凶杀案，当时广慈医院曾有详细记录，事后总司令部侦知凶手，一

^① 《上海光复会同人公启》，《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29页。

^② 陶冶公：《陶焕卿先生小传》，《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个是蒋介石，另一个是湖州人（姓名记不起来），凶杀谋主是篡窃‘沪军都督’的陈其美。”^① 蒋介石后来侥幸逃脱，竟然飞黄腾达，成了国民党的“总裁”。周恩来对蒋介石刺杀革命元勋的卑劣行径，进行了严厉谴责，痛斥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杀了浙江革命党魁陶成章，而窃取了浙江光复的革命果实”^②。

原来蒋介石与陶成章面谈获得陶成章的秘密地址后，仍不放心，又以“浙江省临时协会”的名义，给陶成章所在的广慈医院送来一封信，以确认陶成章所说的住处是否可靠。送信人查证陶成章确实住在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蒋介石仍不放心，又于1912年1月14日晚上，以看望在广慈医院住院的朋友曹慕管为名，前来探听虚实。蒋介石临走时还神秘兮兮地对曹慕管说今晚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曹慕管当时并未在意，果然夜半别室的陶成章被害。八十年后，黄炎培忆起蒋介石制造的惊天大案，仍然记忆犹新。“辛亥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革命大领袖之一陶成章（号焕卿）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死。刺客为谁？怎样刺杀？很多人说是陈其美命蒋介石刺死的。各件记载，大都推给他人，脱卸自己。无论如何，从整个革命说来，总是一件很大不幸的事。”黄炎培有记日记的习惯，据1927年6月3日，上海澄衷中学浙籍校长曹慕管告知：“我民元病卧广慈医院，一日傍晚，蒋介石来谈，临行说：我们今晚将做一件大事。夜半，忽闻枪声，别室陶焕卿中枪死了。”曹

^① 杨镇毅：《光复会和光复军》，《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页。

^② 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页。

慕管事后得知，“陈其美嘱蒋介石行刺陶焕卿，蒋雇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焕卿以为竹卿是自己的人，请他入室，就被刺死。光复会终于又刺杀了王竹卿。”^① 蒋介石行刺前到广慈医院假装看望住院的朋友曹慕管，实际是勘察广慈医院出入的地势，以便深夜伺机作案。

蒋介石在刺杀陶成章的前夜，就已在福州路的四海昇平楼披露刺陶的阴谋。据马叙伦回忆：陶成章遇刺后，叔祖陶七彪“自沪取其柩归杭州，适与余同寓清泰第二旅馆，余以成章被刺事为问。先生涕曰：‘焕卿薄都督而不为也。’盖是时，有陈英士与成章争浙督之说也。成章之被刺于上海法租界之广慈医院，余时为大共和报主笔，由屈映光知之，映光初亦隶光复会也。即赴院视之，乃为捕房之侦者认为嫌疑人，虽示以名帖，犹被留五六小时，至午后四时，偕至捕房一询而后得还。成章之死，章太炎谓蒋介石实刺之；然余闻诸介石乡人曾与介石共作北里游之某，谓成章死之前夕，歇于福州路之四海昇平楼，介石来，持银饼二百元，怀手枪一具，某即以手指蘸茶书三点水旁于桌示介石，介石摇首；某又蘸水书耳旁，介石颌之。盖水旁谓汤寿潜，时寿潜任浙督也；耳旁则成章也。次晨而成章以被暗杀告矣，然下手者王某也。”^② 蒋介石与王竹卿狼狈为奸，潜入广慈医院，王竹卿朝陶成章开了枪。

魏兰在陶成章遇刺后，就撰写了《陶焕卿先生行述》，揭露蒋介石用卑劣的手段，刺杀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当其

^① 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

^② 马叙伦：《陶成章之死》，《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0页。

时，汤寿潜调交通总长，浙人将举先生督浙，先生力辞未就。十一月廿四日，沪军标统蒋介石，晤张伟文、曹锡爵，言与先生本无意见，欲来与其言明，庶免误会。伟文约以下午四时来光复会机关所一谈。及晤，介石与先生言论融洽异常。谈毕，介石询先生住址，先生随书一条实告之。是夜，八时许，蔡先谌与张不华谈，不华辞去，先谌欲偕往，不华不可。十时许，有人持书至广慈医院与先生，询以信之所由来，则言杭州快信，由蒋介石转交。信内系临时协会具名。次日下午，张伟文至，先生示以信，伟文疑之。盖浙江仅有临时议会，并无临时协会之故也。二十五日夜间二时许，有刺客二人，撬门而入，守门者觉，询以何为？则云来看陶先生。旋登楼，入先生卧室，呼曰：‘陶先生！’出手枪击之，子弹从左颊入，斜穿脑部，而先生遂不明不白而死矣。先生生于丁丑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酉时（伪光绪三年）；卒于辛亥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丑时（即中华民国元年正月十四号），年仅三十有五。”^① 魏兰在陶成章遇难的当年就揭露“陶案”的真凶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的御用传记作家，也是蒋介石的启蒙老师，早年追随蒋介石任过秘书和文书科长的毛思诚，早在1936年就在南京出版的《民国十五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毫不隐晦地披露蒋介石刺陶原因：“是时，陶成章踵回国，蓄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煞孙（中山）、黄（兴）历史，并谋刺陈其美，而以光复（会）代之正统。诣公（即蒋介石）游说，公大骇。默付其计果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复入混乱状

^①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7页。

态，而当时东南人心未亡，军官皆清室遗孽，江浙仍将为满清与袁贼所陷，熟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全局，事后自承其罪。盖其心出于至诚，绝非对人有所好恶于其间。此为辛亥革命成败最大关键，亦即公最重要历史之一也。”^① 在蒋介石的御用作家的书中，蒋介石是鉴于陶成章拥戴光复会会长章太炎，反对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和黄兴，要以光复会来取代同盟会的正统地位，还煽动蒋介石“谋杀”其把兄弟沪军都督陈其美，如果陶成章的“阴谋”得逞，岂不“坏了”东南的革命大局。蒋介石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了革命大局，将陶成章刺死。陶成章遇难后，革命党人反应强烈，为了免除光复会攻击陈其美的口实，蒋介石不得不避往日本。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竟然成了值得称赞的“革命行动”，真是匪夷所思。既然杀不杀陶，关系到辛亥革命的成败，而蒋介石又刺陶成功，何以后来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呢？蒋介石杀陶何以没有挽回辛亥革命失败的悲惨命运？

而蒋介石本人，也在自述中，直言不讳地叙述刺杀陶成章的原因。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蒋介石谈到1908年至交竺绍康，“彼（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不然，以□□（徐之）学行，其成就必不止此。又谈，陶之为，人，不易共事。余闻此乃知陶、龚日常诋毁徐伯□□（生有）帝王思想者，实有其他意图。余当时闻陶、龚毁徐，仅以为伯生已死，即有过误，我同志不应再加猜测，诋毁先烈而已，而熟知伯生之死，为陶所逼□（乎）！”

^① 毛思诚：《光复时期》，《民国十五前的蒋介石先生（第1册）》（第4编），1936年版，第3页。

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蒋介石谈到刺杀陶成章的原因之一为陶成章逼死徐锡麟，并诋毁徐锡麟的名声，因此，“鄙视”陶成章的为人，必欲除之。陶成章虽然与徐锡麟在大通学堂以及革命途径的有关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徐锡麟出任巡警学堂会办，没有明显的革命举动，陶成章确有怀疑，但由此认为陶成章逼死徐锡麟则言过其实。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原因之二为因经费问题，诋毁孙中山。蒋介石声称“及陶由南洋归日，又对孙先生诋毁□□（不遗）余情。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嘱余置之不理，不为其所动，免致纠纷。余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济其经费者即停止，不与其往来也。”陶成章确因经费问题严厉批评过孙中山，但不能因此指责陶成章为“自私自利的小人”。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原因之三为陶成章要谋刺陈其美，破坏同盟会的组织，以光复会取而代之，推戴章太炎，妄图取代孙中山的地位。辛亥革命爆发后，陶成章从南洋回国，与沪军都督陈其美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当革命之初，陶成章亦□（踵）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之为革命之正统，必欲将同盟会领袖□□（孙、黄）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戴章炳麟以代孙先□（生），□（鸣）呼革命未成，自起纷争。而陶之忌刻成性，竺绍康未死前，尝谓余曰：‘陶之私心自用，逼陷徐伯生者，实此人也。尔当留意之！’惜竺于此时已逝世，而其言则余初未□（忘）。及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

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盖陶已派定刺客，以谋英士，如其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而当时军官又皆为满清所遗，反复无常，其象甚危，长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为满清与袁贼所收复，如此则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权，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蒋介石诬蔑陶成章想谋杀陈其美，这是莫须有的。至于说与陈其美有尖锐的意见分歧，确是刺杀陶成章的真正原因之一。事后，蒋介石“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①。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革命成功后，陈其美这些特级流氓忘恩负义，为了稳坐江山，不惜诬陶成章‘谋刺陈其美’，而出之以暗杀革命元勋之举，真是太无公道了！”^② 蒋介石给陶成章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自然要出于“革命义愤”，将陶成章“清理门户”了。蒋介石为刺杀陶成章找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将自己打扮成舍生取义的“革命志士”。

如果蒋介石在自述中谈到“除陶”还有些吞吞吐吐的话，而蒋介石的学生，做了蒋介石八年侍从秘书，也是蒋介石“政工头子”和“特工头子”的邓文仪则直言不讳了。邓文仪在其著作《蒋主席》中，将第八章的标题，定为“枪杀陶成章”。邓文仪写道：“这时候，有个假冒革命，阴谋夺取浙江都督的陶成章，因为阴谋不能成功，准备暗杀陈英士先生，主

① 蒋介石：《中正自述事略》，杨天石：《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自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② 《蒋介石的怒与杀——从“公怒之”追到“公杀之”》，李敖：《扒蒋介石的皮》，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93页。

席知道了这件事后，心想：假使陶成章的阴谋成功，那么江、浙再入混乱状态，势将影响到革命基础的动摇。经过公私利害的慎重考虑以后，便决心先除陶成章。那时候陶成章匿居上海租界某医院里面，主席便到医院去找他，先用严辞责问他，哪晓得陶成章不但是恬不知耻，反而还侃侃而谈。主席怒不可遏，便掏出手枪，一枪把他打死。”^① 陶成章并不愿就任浙江都督，坚辞不受。陈其美想出任浙江都督，受到浙江革命党人冷落。现在竟然成了陶成章想“篡夺”浙江都督之位，而“阴谋失败”后，又要“暗杀”陈其美呢？真是颠倒黑白。或许邓文仪披露了陈其美因为想做浙江都督不成，迁怒于陶成章，故而指使蒋介石行凶。而蒋介石为了报答陈其美的“知遇之恩”，铤而走险。

由国民党方面秘密提供国防外交档案及私人资料，由日本《产经新闻》发表的《蒋介石秘录》，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大量印发。《蒋介石秘录》第2卷，以《制裁陶成章》作为标题，详细地表述了蒋介石在上海滩与“同志们”密谋“制裁”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经过。“在首途前往日本之前，即1912年元月14日，蒋介石参与了和同志们策商在上海法租界制裁光复会司令陶成章的计划。”之所以要“制裁”陶成章，是因为“陶成章虽然列名同盟会，但却有公然妨碍建立革命组织，以及污蔑孙中山等行动，及至武昌首义，复推戴章炳麟，要以光复会取代革命正统，以及策划谋杀陈其美，从内部破坏革命组织，将陶成章这样的人制裁，是为了铲除祸根，导革命全局于

^① 邓文仪：《枪杀陶成章》，《蒋主席》，胜利出版社1945年版，第16页。

成功。”^①《蒋介石秘录》提到“制裁”陶成章的原因，与蒋介石的自述，基本上大同小异，一为陶成章“污蔑孙中山”；二为“拥戴”章太炎，“妄图”以光复会取代同盟会的“正统地位”；再就是陶成章要“刺杀”蒋介石的把兄弟沪军都督陈其美。而陶成章的“所作所为”，“破坏”了革命组织，非除之而不能挽回“革命大局”。

杀害陶成章的另一个凶手，也就是杨镇毅在回忆录中提到的“湖州人”，即光复会的叛徒王竹卿。而“那个湖州人后来被总部捕获，判处死刑”^②。王竹卿并非湖州人而是嘉兴人，也并非由光复会总部捕获后判处死刑，而是被光复会派遣的暗探所刺杀。光复会会员对陶成章遇难，“均皆愤不欲生，誓必侦查凶犯，执法雪仇。”^③ 1912年3月28日，《时报》以《白日刺杀队长之骇闻》的醒目标题，详细地报道了枪击刺陶凶手王竹卿的消息。“嘉兴军政分府尚武团队长王君竹卿，本月廿五日夜，由府署外出被匪在暗中放枪行刺未中。不料，本日（即廿七日）上午十一时，王在品芳茶楼饮茗回家，该匪复伺其后，迨进门时，该匪即轰放手枪，击中王之背部，弹从前胸穿出，王痛极，奔至室内，倒地而死。军政分府得报，协同统领赴王寓验视尸身，一面分派军队，赶速缉凶，现已获嫌疑犯萧姓一名，未识是否正凶云。”^④ 王竹卿杀害陶成章后，自

① [日] 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② 杨镇毅：《光复会和光复军》，《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页。

③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6页。

④ 《白日行刺队长之骇闻》，《时报》，1912年3月28日。

知罪大恶极，迅速潜回嘉兴隐藏。“王竹卿既杀焕卿，逃至嘉兴新篁镇依徐忍茹，徐非光复会中人，事为嘉兴光复会中人所悉，乃嘱潘梅仙杀王为陶报仇。潘即雇住王店之帮会头目杀王于嘉兴东门大街。”王竹卿的行踪被嘉兴光复会会员获悉，光复会指示潘梅仙负责处决王竹卿，为陶成章报仇。具体执行处决叛徒王竹卿的是帮会头目王店剃头三宝等仨人。三宝等人曾住在嘉兴东门外吊桥堍的李广元的老李大饼店。“李广元是山东人，在嘉兴建铁路时的小工。路成之后被裁下，开一馒头店，有以前同做小工的二个，到他那里吃面欠帐，在杀王前夕，这二个小工又到李广元店中吃面还欠帐，当夜就宿在李店中。第二天一早，他们（剃头三宝和这二个帮手）去杀王，王在东门里，李店在东门外吊桥堍，三个人杀王逃出城，计划上火车，结果被捉回一个，当时就有人说：这个凶手昨夜住在老李大饼店中。”抓获的“凶手之一，解省讯办，事隔三月，凶手押还嘉兴，不了了之。”^① 尽管报纸及回忆录中有关处决王竹卿的细节有些出入，但光复会在嘉兴处决杀陶凶手王竹卿这个事实毋庸置疑。光复会处决凶手王竹卿，大快人心。

王竹卿被处决后，蒋介石闻讯惊恐万状。“陶成章先生为中国革命伟大领袖，大名传海内外，而凶案又发生租界热闹之区广慈医院内，此事一出，轰传世界，沪英法租界当局亦十分郑重其事，严急缉凶。侦知凶犯在沪军都督府内，为蒋介石，原为府内中校，刺陶后，即已升为上校，众始详悉其行刺之因由，主从之要犯，只以碍于沪督特殊势力，工部局未便径行拿

^① 许仲和：《章炳麟撰龚未生传略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8页。

办。然因迫于多方舆论，并以被害者为如此著名大人物，外国有力权要名流，均力督促，故已出手措施，待机发动，并已叠成案卷，拟即出票拿犯，陈（其美）、蒋（介石）闻风，乃急令蒋匿名躲入日本，避过多时，使缉凶期远，案已冷去，乃被潜回。”^① 尽管有沪军都督陈其美为蒋介石撑腰，还有法租界探目头子黄金荣的默许，但蒋介石仍感到众怒难犯，唯恐被光复会追杀，在陈其美的安排下，潜逃日本，在东京府下代代木山谷一四三番地创办了《军声杂志》。蒋介石擦干净手上残杀革命元勋的血迹，竟研究起军事问题来了。

“刺陶凶手虽然惩处了那个湖州人，却漏走了蒋介石。”^② 凶手蒋介石逍遥法外，让光复会会员愤愤不平。

第六节 陶案迷雾

蒋介石和王竹卿不过是两个帮凶而已，蒋介石当时只有26岁，还是一个政治上很不成熟的青年，不可能独自作出刺杀陶成章这样“顾全”革命大局的决定。必定有幕后操纵者，此人就是陈其美。蒋介石与陈其美相识于日本，1906年，陈其美先在日本警监学校学习，后来转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1907年，蒋介石赴日进入振武学校学习，蒋介石与陈其美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并引见了孙中山。陈其美成了蒋介石的“革命引路人”。1908

①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6页。

② 杨镇毅：《光复会和光复军》，《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页。

年，陈其美回国，在浙沪京津地区从事革命运动，1911年夏，四川掀起了保路风潮，正在日本新潟县高田市炮兵十三师团十九联队实习的蒋介石，恰好有较长的假期。蒋介石立即回国，在沪会见陈其美，参加了营救入狱的张恭以及计划处决叛徒刘师培的行动。因暑假期限已近，蒋介石不得不中止暗杀行动，返回日本。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发电催其回国。蒋介石立即离开联队，回到上海。蒋介石积极参加东南地区的革命运动，曾负责炸弹队，配合步兵攻打浙江抚署衙门。沪军都督府成立后，蒋介石出任陈其美手下的沪军第五团团团长。由于陶成章不愿将南洋的巨额捐款全部交给陈其美支配，还以北伐的名义在沪军都督府的后院“招兵买马”，又与陈其美“争夺”浙江都督，据说陶成章还“游说”蒋介石“除掉”陈其美。陈其美对陶成章的所作所为，忍无可忍，便指使蒋介石，收买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暗杀陶成章。蒋介石果然没有辜负陈其美的“期望”，除掉了沪军都督的心腹大患。“陶焕卿与章太炎本是光复会的人，加入同盟会中，与孙中山手下有些人是不太融合得来的。辛亥革命成功，国民党分子设法取得了沪杭政权，可是觉得陶（成章）在上海总是障碍，于是，他就在法租界医院里被人暗杀了。据一个老国民党说，当时陈其美偶说陶（成章）不死吾侪不得安，有人听了便径去办了，陈（其美）知道了大悦，即推荐于中山，加以信任。此人为谁，即蒋二秃子是也。”^① 因此，陈其美作为“陶案”的直接指使人，已毫无疑问。

^① 《焕强盗与蒋二秃子》，《周作人文类编·八十心情》（第10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

光复会还有人将“陶案”的“幕后策划人”指向同盟会的总理孙中山。陈其美之所以指使蒋介石暗杀陶成章，理由之一就是陶成章曾在南洋反对孙中山。“迨辛亥武昌起义，成章自爪哇归国，适值汤寿潜辞浙江都督；浙人咸以成章于浙江革命运动，其功甚伟，拟举之以代。是时成章养疗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沪军都督陈其美为争此席，乃以成章在南洋反对孙中山为词以事攻击，其部下卫队团长蒋介石受陈指使，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三日间，故往视疾，畅谈许久，夜刺杀之。”^①陶成章之所以遇难，与陶成章在南洋发布《孙文罪状》有很大的关系。

章太炎获悉陶成章遇难的噩耗后，痛不欲生，怒不可遏。1912年1月15日，即陶成章遇难的第二天，章太炎就向《神州日报》记者寂照发表讲话，详细地介绍了陶成章的革命业绩，以及与同盟会的恩恩怨怨，特别提到陶成章前往南洋时，对孙中山将河口起义退入新加坡的义士置之不理，并向华民事务司告密，致使河口起义的义士被捕入狱一事，极为不满，公布了孙中山残害革命党人的“罪行”。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黄兴被同盟会推为大元帅遭到浙江援宁支队的强烈反对，黄兴怀疑是陶成章从中“嗾使”。而沪督陈其美闻讯后，警告陶成章不要多事，否则，就是第二个陶骏保。孙中山出任大总统后，又致书陶成章，责问陶成章当年何以要散布《孙文罪状》，并声明非以大总统身份，而是以个人身份与陶成章交涉。而陶成章收到孙中山的“问罪书”不到三天，就被人暗

^① 陶冶公：《陶焕卿先生小传》，《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杀于广慈医院。显然，章太炎认为谋害陶成章的凶手，就是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以及黄兴和沪军都督陈其美。《神州日报》全文刊登了章太炎的讲话记录。

光复会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

会稽陶焕卿，讳成章，光复会中最重要之一会员。光复会之起，在癸卯年，先于同盟会，以蔡元培为会长。其后同盟兴，光复会渐散，陶君亦兼入同盟会，而徐锡麟、熊成基亦皆光复会员，始终未入他会者。丁未以后，同盟会渐有涣散之象。戊申冬，陶君前往新加坡，与孙文相见，观其行事，多不能中历物之意，陶君郁不快，尝赴缅甸、爪哇等处演说革命方法，亦颇以是招孙文之忌，甚有人谋暗杀陶君者，赖李燮和保持之。其后同盟会河口之败，党人多退入新加坡，或向孙文索资斧，孙不与，竟向英国华民政务司告密，捕囚党人，陶君尤不平，遂于次年发书宣布孙文罪状（按：此宣布书，本社现已访得），自此孙党之势渐散，孙终不安于南洋。嗣是胡汉民等亦惟能往来香港、新加坡间，不敢再越一步，益无所获，而爪哇一带华侨，倾服陶君，附者甚众，陶君因再兴光复会，以李燮和为会中重要之员。至辛亥三月，黄兴发难于广东，推赵声为主，赵君本亦光复会人也。尝以机密泄漏，侦得其踪，欲杀胡汉民之弟胡衍鸾不果。广州败后，一日，胡汉民邀赵君会食，食后赵君腹遽痛，赴医院剖割两次，俱不能愈，竟以毙命，外间颇有烦言指责。李燮和亦去南洋而来上海，潜进而冥冥中，上海光复与制造局之克，皆李燮和为之也。燮和既拔上海，陶君亦自南洋归，时苏、杭皆已次第反正，而李燮和所抚黎天才军，与浙军合攻南京最为出力。浙军中之主将参谋，亦

多光复会员。南京既破，黄兴遽被举为大元帅，浙军不平，反对甚烈，卒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外人颇有疑陶君煽动军队为此者。沪军都督陈其美尝与浙军参谋吕公望言，谓致意焕卿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公望闻之笑曰：南京之事，岂沪军所能干涉，敬劝君幸勿滥用威权也。未几，孙文归，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就任后，即与陶君书，诘问从前宣布罪状之理由，谓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书到之日，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其后三日，陶即于广慈医院被人刺死。

1912年10月10日，《神州日报》刊登陶成章的简介时，特别注明：“太炎口授，寂照笔述。时为陶君被匪徒戕害之次日。”^①章太炎在对《神州日报》记者寂照讲述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生平时，最后特别提到孙中山致书陶成章，何以在南洋要发布《孙文罪状》，此事没完？而陶成章接到孙中山信的三天后，就遇刺身亡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还是其中有必然的联系？

光复会会长章太炎将孙中山列为有重大嫌疑的策划刺杀陶成章的“幕后指使人”。“革命胜利后，正当革命党人应该携手建立新国家时，发生了光复会重要干部许雪秋、陈芸生被陈炯明杀害事件；继之又发生了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被陈其美杀害的事件。陈其美和陈炯明当时都是中山先生的追随者，这激起了太炎先生的愤慨。中山先生虽然也很震惊，电令缉凶，并嘱陈其美‘要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但太炎先生对中山先

^① 章太炎：《光复会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9页。

生终于产生了新的芥蒂。”^①

也有人认为，孙中山并不知道陈其美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的阴谋，更不会“指使”陈其美派人暗杀陶成章了。“陈其美乘陶成章在医院养病时，派人暗杀了他。中山先生不知道这个内幕，陶成章绝不是中山先生叫人刺杀的，但是，章太炎不了解，有时言论比较激烈，攻击了陈其美，也谴责了中山先生。”^②章太炎认为孙中山是“陶案”的“幕后策划人”，冤枉了孙中山。

光复会另一骨干魏兰也将孙中山列为策划刺杀陶成章的“幕后元凶”。陶成章被害后，魏兰悲痛万分，愤愤不平。“盖因先生奔走国事十有二年，自壬寅迄辛亥，十年之中，弃父母妻子于不顾，仅于乙巳岁，在绍兴办大通学堂时，回家省亲一次，居不终日，即返校中。而且生平无丝毫嗜好，往来运动，均系步行。待人则信义交孚，处己则破衣敝屣。道德如是之高，爱国如是之诚，当此民国成立，竟被二三小人，主谋暗害，夫岂中华民国之福哉？”魏兰四处奔走，调查事件的真相，并奋笔疾书，写下了《陶焕卿先生行述》，控诉同盟会残杀光复会的“罪行”，并将“陶案”的来龙去脉作了详实的披露，重点谈到孙中山与陶成章在南洋的分歧。

先生欲游历南洋各岛与华侨相商经济问题，请孙文作函介绍，孙文不许。时《中兴报》执事员陈威涛不以为然，尽将

^① 章念驰：《中华两英杰——孙中山和章太炎》，《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

^② 王仲萃：《太炎先生二三事》，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孙文内容告之先生。先生知孙文难与共事，遂决计独自经营，并将浙江各同志革命始末，作为一编，名曰《浙案纪略》。十月赴缅甸之仰光，为《光华日报》主笔，与庄银安、傅春帆等相联络，并将《浙案纪略》陆续登之《光华日报》。以故南洋群岛，无人不知先生，而孙文妒忌先生之心，亦由是益切。冬十二月，先生由仰光至槟榔屿，偕陈威涛游历英荷各属。时王致同在望引学堂，教授生徒，专以革命为宗旨，被清吏王广圻、汪凤翔、白萍洲探悉，迫令学董辞退。张云雷因介绍致同与先生同游各岛。未几，致同赴日本返温州。先生在英、荷各属运动，孙文、胡汉民皆作函阻止之。先生至网甲岛之檳港，孙文诬指先生为保皇党，运动人暗杀先生，幸赖李燮和（改名柱中）力为剖白，始免于难。时李燮和等在网甲，为学堂教员，亦屡忿孙文以诈术待人，遂联络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在南洋办事人，罗列孙文罪状十二条，善后办法九条，并将孙文往来信札，交先生手，托其带至日本东京同盟会总会，不欲戴孙文为会长。燮和恐先生遭暗杀，并托人护送至新加坡。孙文随命汪精卫尾随先生而至东京，与同盟会书记黄兴联络，黄兴偏袒孙文，不肯发布，并作书复李燮和等，为孙文辩护，洋洋千余言。善后办法中，有言兴复《民报》之举，精卫遂作《民报》续刊之。由是，章太炎作《伪民报检举状》，痛斥孙文藉革命为新骗术。当其时，陈威涛客爪哇魏兰处，将孙文罪状，用药水印刷百余纸，邮寄中外各报馆登之。孙文大怒，命各机关报攻击先生与章太炎、陈威涛不遗余力。先生因作《布告同志书》一册，直言孙文种种之非，并略述

自己生平所经历，此己酉年事也。^①

显然，陶成章与孙中山在南洋的重大分歧，早就埋下了双方难以愈合的鸿沟。

魏兰在详细地讲述陶成章重组光复会的事宜后，又谈到辛亥革命时光复东南的丰功伟绩，以及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歧，特别是孙中山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后，新仇加上旧恨，要与陶成章“算账”。

迨先生等抵沪时，杭城已经光复，督浙者暂推汤寿潜。及先生抵杭，即由革命党人举先生为总参谋。先生以张勋负固，金陵未下，不敢稍安，又奔走各处，联络同志，助浙军攻取南京，设筹餉局于上海，竭精尽虑，寝食未安，而旧病加剧。及江南恢复，革命党中之败类，皆有争功夸能、帝制自为之心，先生恐北虏未破，不能自安，强病而起，与朱瑞、吕公望、屈映光诸友人，谋北伐之举，以尽吾浙人之义务。时孙文沟通《民立报》，谓孙文携有美金巨款，及兵舰若干艘回华。孙党并有兵舰之照相，在南洋群岛发卖，骗取总统，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先生因南洋筹款事，致书孙文，旋得其复书，略谓先生与彼反对，当筹如何对待。^②

果然，孙中山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后，陶成章因南洋筹款事致信孙中山。孙中山复信说陶成章与之作对，要“秋

①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页。

②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6页。

后算帐”。不久，陶成章就在广慈医院被刺。

魏兰在陶成章简历的最后写道，“只述陶先生大略，遗漏尚多，然据事直书，无一字不真，无一事不实，文学之优劣不计，一切忌讳，均无所避。”而且魏兰也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明知此言一出，小人之攻我，手枪之击我，炸弹之掷我，在所不免。然我既为陶公之友，知之最详，知而不言，恐天下后世，无人知革命党之真相，是非淆乱矣。故信笔而书，宁为董狐之直，牺牲性命，亦所不辞。知我罪我，听诸当世。”^① 魏兰不畏强暴，视死如归。魏兰晚年回到故乡，将主要精力用于整理革命历史资料，以及为弄清“陶案”而奔波。

1928年魏兰卧病不起，直到临终，仍念念不忘“陶案”，要求惩办凶手，并在云和大罗山住宅门上贴有联语“陶案不清，不出此门”。“陶案”未破，魏兰死不瞑目。

也有人认为魏兰所说孙中山参与策划暗杀陶成章属于莫须有的事。陶冶公指出：“焕卿与中山先生虽政见稍殊，但并不如魏石生作《焕卿行述》所言之甚，迹近污蔑，不足采信。焕卿于石生言听计从，因此结怨同志，乃至杀身。为大事者，而无知人之明，以致败事，可为殷鉴。”陶冶公认为魏兰所言，没有依据。陶冶公最后还表白说：“事关信史，不得不述所知以明是非，非有好恶存于其间也。”^②

辛亥革命后，各地不断发生同盟会屠杀光复会和保皇党人事件。武昌起义前，光复会曾派许雪秋到广东的潮汕地区开展

^①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7页。

^② 陶冶公：《龚未生自叙革命历史书后》，《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革命活动，然而，同盟会会员广东都督陈炯明任命刚刚反正的清总兵吴祥达为潮汕绥靖主任，将在潮汕光复中功勋卓著的光复会会员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等部民军包围缴械，并将许雪秋、陈芸生和陈涌波三人就地枪决。许雪秋等人在重组光复会时，曾与陶成章等人站在一起，对孙中山意见很大。现在，资产阶级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就不断发生同室操戈、兄弟相残事件，怎不让光复会的会长章太炎焦虑不安？章太炎立即给孙中山写信，要求孙中山不能因为同盟会和光复会上层领导人之间有些意见分歧，同盟会就大开杀戒严，剪除异己，必须迅速予以制止。

孙中山对章太炎的提醒非常重视，立即发出《致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电》。孙中山肯定了光复会为革命所做的贡献，也不隐晦光复会和同盟会领导人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要求同盟会员以大局为重，停止残杀光复会员。

然而，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指示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否认有与光复会发生“轧轹之事情”，也否认有残杀保皇党人的事件发生。

光复会领导人认为，作为同盟会总理的孙中山，对各地发生的残杀光复会员的事件，负有重大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光复会鉴于以往陶成章等人曾发布《孙文罪状》，东南光复后，陶成章在上海“练兵筹饷”又与同盟会产生分歧，因此认为孙中山就是刺杀陶成章的“幕后策划人”。

一些学者也据此认为孙中山和黄兴才是“陶案”幕后的真正策划者。“在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枪杀革命元勋之罪，已不可能湮灭，然而其罪并不能放得太大，当时二十六岁的他，还没有资格‘怒而杀之’。他只不过是奉命行事的枪手和

杀手。他因杀陶而摧毁光复会之功，亦不能高估，因为他不过是孙黄一派的大阴谋，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为大哥陈其美尽的把小兄弟的职责而已。”^①并断言孙中山致沪军都督陈其美的缉凶电，只是“烟幕”而已。“陈其美与蒋介石原是凶手，孙竟要犯人陈其美去查案，哪会有结果呢？蒋介石逃到日本，孙中山总该知道谁是凶手了吧，但凶徒根本没有缉获归案，明正其罪，反而成为帮手。后来蒋介石还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宣誓效忠孙中山，陈其美至死也一直是孙的死党。”^②孙中山所发的“缉凶”电报，陈其美装模作样的“缉杀”举动，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那厢里孙总统通电大骂‘凶手’、‘凶徒’，要求‘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并肯定‘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尤有巨功’，但是，令我们奇怪的是：孙中山当时正是总统，陶成章多年批孙的事，当然为孙中山的死党陈其美所深知，陈其美此时此刻，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而要‘教训’陶成章，岂不正是意料中事？”^③陶成章被刺的近因是即将出任浙督，而其远因则是陶成章在南洋发布《孙文罪状》，因此，“陶成章之死既然是为了孙黄一系同盟会的利益，同盟会的‘最高当局’不是枪手蒋介石，也不是派

① 《枪杀陶同志》，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32页。

② 《枪杀陶同志》，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31页。

③ 《蒋介石的怒与杀——从“公怒之”追到“公杀之”》，李敖：《扒蒋介石的皮》，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96页。

遣枪手的沪军都督陈其美，而是临时大总统孙文和陆军总长黄兴。”^① 因此，陶成章被害，孙中山和黄兴“难辞其咎”。

也有学者认为，即使孙中山事先没有参与“谋杀”陶成章，事后也应该知道“陶案”真相。蒋介石“打死陶成章以后，主席并不掩饰这件事，反向党中表明心迹，自承其罪。党中自然没有加以深究，只有感觉到他的识见的宏远。”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后，并没有隐瞒，反而向同盟会表明了其心迹，同盟会不但没有追究蒋介石刺杀革命元勋的罪过，反而称赞其见识“宏远”，真是匪夷所思。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之前，陈其美曾撰一付对联，由孙中山亲笔书写送给蒋介石：“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共尝。”据说，“这副对联深含着倚畀的意思。”^② 孙中山“当年要‘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的‘凶手’、‘凶徒’，最后成了他‘安危他日终须仗’的接班人”^③。2006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的日记。从日记开放首日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教授就在胡佛研究所开始研究，他是第一位去看蒋介石日记的历史学家。杨天石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研究后回国，并在他的办公室里，首次接受了媒体的专访。杨天石提到蒋介石曾做过一件非常符合孙中山的心意的事，那就是在辛亥革命后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杨天石说：“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和陶成章就有很大的矛盾；革命

① 《枪杀陶同志》，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8页。

② 《枪杀陶成章》，邓文仪：《蒋主席》，胜利出版社1945年版，第16页。

③ 《蒋介石的怒与杀——从“公怒之”追到“公杀之”》，李敖：《扒蒋介石的皮》，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98页。

后，矛盾更厉害。孙光明磊落，不会主张派人去暗杀陶，但除掉陶，符合孙的愿望。”并谈到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我把陶成章杀掉，这件事我没有向孙先生汇报过，孙先生也没有和我谈起过，但是，我想这件事符合孙先生的愿望。这是他后来信任我的重要原因。”很显然，孙中山对蒋介石“刺陶”置若罔闻，放纵凶犯，甚至倚为股肱，“这是值得注意的”。^①

陶成章“既被刺，众不能明其故，海内无远近识与不识，痛悼如失手足”。有人提出质疑，“种族问题，论者谓示人以不广，顾村氓野老以至于妇人小子，莫不知非种之当锄。汉满划分，较若别白黑。光复大功之克成，其不以此耶？君著书注重在此，不仅政治问题也。然而君之死未尝涉及于种族，且发生于光复以后，将终悬为疑案。呜呼！君为同胞尽义务，绝无权利思想，乃所遇若此，吾不知人间之何世矣！”^②

也有人发出悲愤的责问：“彼何人？斯为公欤？为私欤？令人不可得而知之。若陶公者，功成不居，利重不取，乃不保首领以歿。识与不识，能不为公冤之？”^③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尽管中国政治舞台风云变幻莫测，“二次革命”及护国战争接踵而至，但上海滩上曾发生过的重大的刺杀革命党人的大案要案，如“刺杀宋教仁案”和“刺杀陈其美案”等等，均已告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何以民国成立不到1月就发生的刺杀光复会巨擘陶成章的特大案件，至今仍是一个谜？无人将其揭开呢？

① 赵矢元：《孙中山与陈其美》，《浙江文史资料选辑——陈英士》（第36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② 傅以潜：《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1页。

③ 《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4页。

第十四章 气壮河山

光复会创立初期的会长蔡元培德高望重，作为一介书生，勤奋好学，自赴德国留学后，就不再过问光复会的活动了。重组以后的光复会会长章太炎，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着重于革命思想的宣传以及中国学术的研究，也较少关心光复会的会务。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实际领导人，也是光复会的核心。陶成章遇刺牺牲后，光复会失去了擎天一柱，作为一个革命团体不复存在，光复会会员也风流云散。陶成章是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称赞陶成章“光复之际，实有巨功”，周恩来称之为“浙江革命党魁”，胡耀邦将陶成章与孙中山、章太炎、徐锡麟和秋瑾等称为“为辛亥革命建树了功勋的人们”。陶成章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立下的不朽功勋，必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流芳。

第一节 魂归西湖

陶成章刚住院时，杨镇毅曾去医院探望，“寒暄过后，他一言不发，背着两手，在房内踱来踱去，似乎心里有重大忧郁

的样子。”杨镇毅以为陶成章身体欠佳，不敢过多打扰，略坐片刻，便起身告辞了。然而，当杨镇毅再去医院探望时，陶成章已惨遭暗杀。光复军司令部设在吴淞，陶成章遇害时，光复会许多人并不知情。杨镇毅回忆：“这一天上午，我和王文庆坐马车从吴淞到广慈医院，陶住的房间在楼上，我是熟悉的，所以一到就一直进去，刚走到楼梯边，正想上楼，只见一个穿白衣的外国女护士在楼上乱摇手，阻止我们上去。”^①尹维峻已在楼上，听见杨镇毅和王文庆的声音，捧着从陶成章身上脱下的血淋淋的皮袍，失声痛哭，泣不成声。杨镇毅和王文庆也悲愤难忍，痛不欲生，连忙电告光复军总部，筹备陶成章的善后事宜。

1912年1月14日，樊光想到昨夜与陶成章未谈完的北伐话题，约定今日在维昌洋行继续商谈，因此，很早就起床了。突然，听见门外报童在高喊：“号外！号外！革命党首领陶成章昨晚遇刺身亡。”

樊光立即上街买了一份《字林西报》，“广慈医院发生暗杀大案，陶成章被刺身亡”的大字标题，赫然入目。“革命巨子陶成章养病于本市法租界广慈医院，今晨二时许，突有穿西服两人，推门入房，趁陶卧床，以短枪轰击之，破脑裂腹，惨不忍见，凶手迄未弋获，惜一代英豪，天不予寿，太可哀矣！”^②樊光一看，犹如晴天霹雳，差点晕了过去。

樊光不相信这是事实，立即赶到维昌洋行，只见张伟文、

^① 杨镇毅：《光复会和光复军》，《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页。

^② 陶永铭：《陶成章遇刺后社会上的强烈反映》，李永鑫主编：《光复会与民族觉醒》，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页。

龚宝铨等光复会员早已在场，个个泣不成声。“闻龚（宝铨）且晕去过，现正哭得瘫痪，几不能起坐。”^① 樊光这才相信陶成章确已遇难。

1月15日晚上9时左右，寒气逼人，陶堰的乡民延续世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大都上床就寝了，陶品三也已上床睡觉。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谁呀？”陶品三披衣起床。

“品三公，快开门，上海急电。”原来是陶堰茶店的阿龙。

陶品三打开门，阿龙连忙递上一份电报。陶品三拆开一看，神色骤变。

电报内容只有赫然五个字：“焕被刺身亡！”署名为“龚”。“焕”即陶成章的别名陶焕卿的简称，“龚”即龚宝铨。

陶品三悲痛欲绝，泪如雨下。

陶品三匆匆地上楼，将陶成章遇难的消息告诉陶成章的结发夫人王氏。王夫人闻此噩耗，失声痛哭，痛不欲生，几次晕厥过去。王夫人经过抢救，精神受到严重刺激，忧郁寡欢，经常晚上自言自语：“阿炳回来了！阿炳回来了！”王夫人到寺庙塑了一尊菩萨，每月初一、十五必定前去祭拜。

陶成章的叔伯弟妹等闻讯也痛哭失声，全家沉浸在一片悲愤凄凉的气氛中。

陶品三带着陶成章的长子陶守和前往上海奔丧。陶成章的遗体已由广慈医院移往绍兴同乡会馆。陶品三和陶守和到达绍兴同乡会馆时，尹锐志、尹维峻、张伟文、龚宝铨、张任天已

^①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6页。

在会馆，个个泣不成声。

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遇刺身亡，消息传开，群情激愤。尤其是故乡人民，更是痛悼不已。沈钧业缅怀陶成章在浙东联络会党的艰难历程，以及在南洋一起从事革命斗争的艰难岁月，悲愤难忍，赋诗悼念：

会稽先生一世雄，芒鞋踏破万山丛。

中原王气久寂寞，海外忽逢虬髯公。^①

1月21日，陈其美迫于外界压力，不得不以沪军都督府和绍兴旅沪同乡会的名义，在上海绍兴同乡会馆永锡堂召开了陶成章、徐锡麟、陈伯平和马宗汉四烈士追悼会。会馆门前扎有一座花牌楼，大门内外以五色布篷装饰，剧台后面安放陶成章、徐锡麟、陈伯平和马宗汉四位烈士灵柩，二门外有沪军都督府送的一座写有陶成章、徐锡麟、陈伯平和马宗汉四位烈士姓名的纪念花塔，剧台上悬挂着陶成章和徐锡麟的遗像以及徐锡麟、陈伯平和马宗汉三烈士就义时的摄影，还有安庆光复后从仓库中找出的一支徐锡麟手击安徽巡抚恩铭的勃朗宁手枪。另有应邀前来义务奏乐的沪军军乐队、振华乐队、贫儿院乐队。绍兴旅沪同乡及上海军学商界赠送的挽联、花圈不计其数。

下午3时，陶成章等四位烈士的追悼会正式开始，到会的光复会会员、烈士家属和来宾约4000多人，主持追悼会的临时主席许默斋简单说明了绍兴旅沪同乡会和沪军都督府联合举行四位烈士追悼会的缘由。

^① 沈钧业：《挽陶诗一首》，《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33页。

孙德卿报告了陶成章等四位烈士的生平事迹，重点讲述陶成章和徐锡麟组织光复会的光荣历史。

陈伯平的妹妹陈挽澜女士报告了陈伯平的革命简历。

卢钟岳报告了赴安徽迁移徐锡麟、陈伯平和马宗汉三位烈士灵柩的经过，并特别提到马宗汉烈士的遗骨由烈士家属藏在果品筐中运出安庆的细节。

学生军齐声唱起了悲壮的追悼歌。

全体来宾向陶成章等四位烈士三鞠躬，以示哀悼。

沪军都督陈其美的祭文由民政总长李平书代读，商团代表盛绍昌、女界协赞会代表边女士分别宣读了祭文。

陈其美发表了演说，声称：“此时北廷未覆，光复未奏全功，同胞当努力继绍诸烈士之志，以慰烈士之心。”^①

陈其美避重就轻，“四烈士并提，对四烈士之成仁表示哀悼，对陶成章死于其鞑鞞之下，则避而不谈。”^②

绍兴旅沪同乡会代表陈汉翘和沈玄庐相继发表演说，“词意激烈悲壮，闻者鼓掌。”^③

沈玄庐的演说慷慨激昂：“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吾同胞当必代为雪仇。”^④尽管沈玄庐未提挟私者的名字，但其人已呼之欲出。

① 《永锡堂追悼大会》，《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59 页。

② 张任天：《我所知道的陈其美》，《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 27 辑），1984 年版，第 56 页。

③ 《永锡堂追悼大会》，《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59 页。

④ 《永锡堂追悼大会》，《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59 页。

来宾金雪滕、沙宝琛、殷人阉、刘养如、龚菊人、徐东甫、黄膺白、梅竹庐以及女子协赞会的杨季威女士等也相继发表演说。

孙铁舟最后演说，词旨沉痛，激愤难忍。“陶君之死，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私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孙铁舟说完，将手枪掷于祭案前。

四位烈士的家属也作了发言。

下午5时半，追悼大会结束。

1月22日上午10时，浙江都督将陶成章等四位烈士的灵柩运出永锡堂，经过英法租界，至苏路车站，由专门准备的花车运往杭州。

嘉兴也举行了悼念陶成章的活动。“当四烈士灵柩专车过嘉兴车站时，当地也举行了追悼仪式。由光复会会员，嘉兴民事长（即县长）方清湘主祭。”^① 追悼仪式极为隆重肃穆。

南京也举行了陶成章烈士追悼会，由前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在会上致悼词。蔡元培对陶成章遇难，悲痛不已。但南京的气氛大不一样，《越铎日报》评论：“陶之死，各方反应甚微，唯有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在南京为陶举行之追悼会上致悼词，痛惜备至，甚至泣下沾襟。但蔡先生是一书生，不是一个有斗争性的革命党魁，所以追悼也只是托之空言。”^②

鲁迅也在1月22日绍兴的《越铎日报》发表《望华国篇》，悼念陶成章。“而今陶君复陨于私剑矣，车过腹痛之感，如何可言！使君辈存，令此人死，华土之人，其永劫不悟者

① 马巽伯：《追怀陶成章先生》，《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82页。

② 林文静：《蔡子民先生二三事》，《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矣。呜呼！陶君经营伟业，福被吾族，今不死于异族，而死于同种之手，岂命也夫！君之死，本于敌谋，或出自私利，虽不可知，要之汉人亲将其事则一。”^① 鲁迅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对陶成章惨遭暗害的无比痛惜和怀念之情，愤怒谴责置陶成章于死地的无耻小人的卑劣行径。

陶成章遇刺的噩耗传到南洋，居留南洋的光复会会员悲痛不已。光复会爪哇分会发来唁电：“悼闻光复会领袖陶公焕卿为奸人所害，中外同悲，誓死杀贼，早慰英魂。”光复会新加坡分会也发来唁电：“陶公被害，恶耗传来，不胜悼痛，大星中陨，四海招膺，重究主谋，代唁陶府。”^②

随同陶成章赴南洋参加革命运动的侄子陶文波，得知叔叔陶成章在沪殉难，痛不欲生，三日滴水粒米未进。武昌起义后，陶成章在泗水立即召开了光复会会员会议，组织光复会会员回国参加革命。留在南洋的光复会会员，则动员华侨踊跃捐款支援国内革命。陶文波奉命留守南洋，负责联络工作，并陆续将陶成章募集的捐款，汇往上海，供革命党人使用。南洋的光复会会员集结泗水举行了陶成章烈士追悼会，陶文波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因悲伤过度，竟当场晕倒在地。陶文波与南洋其他的光复会会员与陶成章长期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陶成章等人的灵柩运抵杭州后，浙江军政府于1月30日下午1时，在昭庆寺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悼念光复会先烈陶成章等人的追悼会，浙江都督蒋尊簋及浙江军政府各部部长均参加

① 裘士雄：《陶成章与鲁迅》，《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62页。

② 陶永铭：《陶成章遇刺后社会上的强烈反映》，李永鑫主编：《光复会与民族觉醒》，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3页。

了追悼会，到会的各界人士达 10000 余人。

蒋尊簋首先叙述了发起追悼先烈大会的原因：“诸烈士之历史，诸公知者甚多，死者已矣，而现前之生者，皆赖诸烈士所造成，而同享共和幸福，尊簋一心一德以尽厥职，否则无以对诸父老，并无以对各同胞，幸祈互相激励以策群力，而本日开会之宗旨，亦于是乎在矣！”

姚永臣报告了陶成章事迹：“陶公曾充大通学校历史教员，此次因赴光复会而遇害于旅邸。陶系光复会副会长，生平游历南洋群岛，富于经验，无端被杀，骇人闻听，诸公既来与会，宜为陶公复仇。”姚永臣说完，与会人员鼓掌支持。

最后，杨雪门报告：“光复时，浙军阵亡诸义士共 104 人，亦同日追悼。”^①

杨雪门说完，奏军乐，致谏词。

浙江共和促进会及其他团体依次致词申奠。接着，来宾代表发表演说。再奏军乐。礼毕散会。

陶成章的遗体安葬在西湖西泠桥西凤林寺前，岳坟街的南面。墓的两侧安葬着光复会会员杨哲商和沈由智两位烈士。

光复会会员张伟文惊闻陶成章遇难，悲痛万分，到处奔走控告，要求严惩凶手，并自筹资金，在陶成章墓附近建造房屋，独自守墓达三年之久。

1964 年，陶成章墓迁葬西湖鸡笼山。1981 年 10 月，又迁往南天竺辛亥革命烈士陵园，人民政府按原样重建了陶成章墓。

陶成章遇难后，海外华侨和光复会会员给烈士家属赠送了

^① 《追悼先烈大事记》，《民立报》，1912 年 1 月 31 日。

一些抚恤金，陶成章生前友好蔡元培、章太炎和龚宝铨等亦纷纷汇来“奠仪”，资助陶家。

光复会同仁：3000 元；

光复会爪哇分会：3000 元；

龚宝铨：2000 元；

魏兰：1000 元；

蔡元培：500 元；

章太炎：500 元；

其他人士：500 元。

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赠送“奠仪”10000 元，加上浙江都督府的抚恤金 10000 元，合计 20000 元。陶成章父亲陶品三用该款在杭州西湖陶成章墓后（岳坟街十号）购地建房。为了纪念陶成章，在屋门首镌刻了“陶社”二字，墓后就是烈士遗属的房屋。“陶社”由社长光复会会员盖仁志女士管理，1943 年盖仁志女士病逝。抗战胜利后，烈士家属迁居岳坟街十号。后来，陶成章墓迁往南天竺，“陶社”原住房现已拆除，遗址建立了杭州饭店（今香格里拉饭店）。

光复会还在西湖专门建了陶成章专祠，以示纪念。“民政司褚辅成，以先生功不可没，取先生事略呈都督，交省议会，议决设立专祠，抚恤家属。”^①5 月 28 日，民政司褚辅成鉴于“陶公丰功伟烈，炳耀万世，凡我浙人，礼宜崇奉”，将其事迹上呈浙江都督，并提交浙江省议会，通过在杭州西湖为陶成

^①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47 页。

章设立专祠的决议。^①“吾浙陶公焕卿，抱革命主义，奔走运动，十余年如一日。此次武汉义起，各省响应，而下江之光复，陶公亦有丰功。乃英雄之业，未竟其志，凶竖之刃已割其胸。虽邱首成仁，忠骸已归故土，而馨香待报，英魂未慰重泉，论者惜之。拟照徐烈士建设专祠之例，择西湖上应废止祠宇一所，奉祀陶公，以慰先烈而隆瞻仰。”^②依建设徐锡麟专祠之例，建立了西湖陶成章专祠，并编撰了陶成章革命事迹简史。

陶成章遇难时，儿子陶守和13岁，陶守咸11岁，均未成年。龚宝铨除送来“奠仪”外，还将陶守和和陶守咸兄弟俩领到嘉兴抚养。

第二节 会稽同悲

越地人民没有忘记陶成章烈士，“越中人士，崇敬先烈，公立东湖专祠及成章小学以纪念之。”^③陶成章的叔祖陶在宽等人，在陶成章遇难后不久，就向浙江都督及民政司和绍兴县知事提出申请，要求在东湖建立陶成章烈士专祠。

陶在宽等人指出：“窃族侄孙焕卿，于民国成立，积有微劳，不幸猝遭祸害，中道云殂，在国家褒功赐款已极哀荣，乃犹复埋忠骨于西湖，并拟建专祠于故里。凡此隆施，合族均

① 蒋尊簋：《都督蒋令民政司为陶公焕卿建设专祠案已由议会议决文》，《浙江公报》（第132册），1912年6月23日。

② 《陶成章》，《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5页。

③ 陶冶公：《陶焕卿先生小传》，《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感。惟建祠之举，于杭于越尚未定议，而际此时代，诸先烈之祠，纷纷建造，既卜地之为难，亦筹款之不易。查堂弟心云所筑东湖学堂，既已停办，如改为焕卿专祠，则湖山之美，栋宇之崇，实足以光祠典而妥忠魂。”陶浚宣逝世后，东湖学堂已停办，校舍闲置，陶在宽等人有鉴于此，拟改建成纪念陶成章烈士专祠。“将通艺学堂内置立神龛，以为祠堂。其堂之西室史学斋及堂之南室算学斋、译学斋等处皆为祠堂公屋，岁时祭祀，为主祭与祭讌享憩息之所。”^①并随函附上一张东湖地图。

浙江都督蒋尊簋接到陶在宽等人的函件及东湖地图后，认为东湖通艺学堂已经停办，改成陶成章专祠，“既系合族公议允洽，自应准如所请办理，仰民政司核明，飭遵办理。”^②浙江都督批准了将东湖学堂改建陶成章专祠的申请。

1914年，东湖通艺学堂经过改造，已建成陶成章烈士专祠。为了恭送陶成章栗主人祠，孙德卿等人组织了筹备陶烈士入祠事务所，由孙德卿任主任。

陶成章的绍兴故旧亲朋，为了缅怀烈士革命业绩，专门组织了“陶社”，恭送栗主人祠。“满奴揽权，朝政不修，热血男儿耻为人下，因而有辛亥八月十九之义举。陶烈士焕卿为革命先觉之一，经营二十年，大功成而身殉，国人哀之。甲寅仲冬五日，陶社同人乃为先生立专祠于东湖。”如今“先生已矣！值此惊耗频传，千钧一发之际，黄帝华胄，将何以巩金瓯于不缺，藉慰先生于九原乎！”^③由孙德卿任陶社社长，并制

① 《陶七彪等稟浙江都督暨民政司及县知事请将东湖改建陶烈士专祠文》，《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40页。

② 蒋尊簋：《浙江都督批文》，《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40页。

③ 杨无我：《陶社缘起》，《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35页。

定了《陶社简章》。

绍兴陶社社长孙德卿致函浙江都督朱瑞：“陶烈士焕卿，奔走革命有年，当东南光复，大局初基，不料褊狭细人，遽施暗计，大星中陨，四海招膺。绍兴为烈士桑梓乡，而惋惜尤切，故有陶社之组织，以志烈士以不忘。迺维风雨三楹，尚虚俎豆春秋之所，报功未逮，殊觉愧心。爰辟东湖以祀烈士，建立栗主。于本月廿一号，恭送入祠，伏希阁下，赐以楹联，惠以祠额，非特幽英藉阐，而勉励生者，功亦伟也。特此奉闻，顺请钧安。”^① 孙德卿报告绍兴已建立陶社，准备恭请陶成章烈士栗主入祠，请朱瑞惠赠楹联。

朱瑞收到孙德卿的信后，立即写了回信。“陶烈士奔走革命，厥功甚伟，惨遭暗计，悼惜同深。诸君组织陶社，表彰先烈，以东湖名胜之区为奉祀栗主之所，从此俎豆千秋，陶公不朽矣！兹奉楹并额，希查收转送为感！”^② 朱瑞高度评价了陶成章为辛亥革命所做的贡献，对陶成章的遇难表示哀悼，称赞陶社表彰先烈，恭送栗主入祠的义举。朱瑞赠送一副“陶社”匾额，署名“海盐朱瑞”；赠送的挽联为：“革命十余年，亡命十余年，草草劳人，半段绿沉，长饮恨；西湖一勺水，东湖一勺水，家家春社，数声铜鼓，唱迎神。”并题有附跋：“焕卿崎岖海外，奔走革命有功，忌者杀之，人皆悲焉。曾辟社西湖，以永其祀，绍兴为君故里，里人并祀东湖，撰句寄题。”并署名“督理浙江军务兴武将军朱瑞”。

孙德卿还致函浙江巡按使屈映光：“陶烈士焕卿，奔走于

^① 《孙德卿致朱将军函》，《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46页。

^② 朱瑞：《朱将军覆函》，《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46页。

革命有年，乃为忌者所伤，大星中陨，薄海人士莫不招膺相吊。顾绍兴为烈士桑梓乡，风雨一楹，尚虚俎豆春秋之所，仆恒惻然于衷，现辟东湖为祠，建造栗主，择于本月二十一号，恭送入祠。”孙德卿报告了陶社同人拟恭送陶成章的栗主人祠，请屈映光惠赠联幢。

屈映光立即复信孙德卿：“陶烈士经营国事，历久不渝，壮志方酬，殒生凶竖，幽光久闕，遐迩惜之。诸君子追悼忠魂，志隆崇报，稟建祠宇，永荐馨香，高义深情，良堪钦佩。兹敬拟楹联一副，匾额一方，希即查收。”^① 屈映光也高度评价了陶成章立志革命，历久弥坚，惨遭暗害，殊堪哀悼，并送来祭礼 100 元，以及一副“湖山生色”的匾额，挽联一副：“冒千难万险以图成，功转乾坤，壮志已酬，身可死；与越水稽山而媲美，典隆俎豆，英灵不朽，国无疆。”署名“浙江巡按使屈映光”。

绍兴陶社准备于 12 月 21 日恭奉栗主人祠，并致函各机关团体：“陶烈士焕卿，奔走于革命者有年，光复东南，多所擘画，不料为忌者所杀，大局未定，一柱遽折，海内人士，莫不招膺哭之，同人等追念烈士，不胜悼痛，遂有陶社之组织，以志烈士以不忘。兹者民国大定，对于功人，莫不生封死锡，顾绍兴为烈士桑梓乡，风雨一楹，尚虚明禋之祀。同人等实疚在心。爰辟东湖，为烈士俎豆千秋之所，恭建栗主。定于十二月二十一号，谨送入祠。如蒙惠赐巨额、楹联或赐以鸿编巨制者，请寄筹备陶烈士入祠事务所，是所盼祷！”^② 陶社在徐公

① 屈映光：《屈使覆函》，《陶成章史料》，1987 年版，第 147 页。

② 《绍兴陶社通告各机关团体函》，《陶成章史料》，1987 年版，第 145 页。

祠内专门设立了筹备陶烈士入祠事务所，负责办理陶成章烈士的人祠事宜。

筹备陶烈士入祠事务所还专门致函陶成章的父亲陶品三：“哲嗣焕卿先生光复东南，多所擘画，不幸为忌者所杀，薄海人士，无不痛心。同人等景仰先烈，遂有陶社之组织，而故乡尚乏明裡之祠，抱疚实深。现在东湖辟作三楹，为烈士春秋俎豆之所，定于本月二十一号，恭送栗主人祠，以彰盛典。届时务请先生观礼，是为至盼。”^① 陶品三接受邀请，参加了恭送栗主人祠。

12月21日，筹备陶烈士入祠事务所组织了恭送栗主人祠仪式，绍兴各界缅怀烈士事迹，惠赠了100多幅联幛和挽词。

会稽道尹梁建章恭送挽联：

回天志业有时尽；
爱国精神与日长。

梁建章也题有附跋：“陶烈士焕卿奔走东南，热心民国，乃志业未竟，中道而殒，兹值入祠，敬缀联语，以志景仰。”

陶社同人的挽联为：

大陆将沉，问谁可谈天下事；
东湖何幸，得公来作主人翁。

鉴湖秋社同人赠送挽联：

建民国新猷，侠骨侠肠反见忌；

^① 《陶社致陶品三函》，《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48页。

忆故乡旧事，秋风秋雨不成吟。

徐社同人赠送挽联：

为同胞流血，蹈火赴汤，不是争那名利；
恨异种称王，报仇雪耻，定教还我河山。

佛教分会的挽联为：

赤血淋漓，三世火消壮严相；
金光赤奕，八百珠纪般若功。

陶成章专祠位于绍兴著名的风景区东湖，背连千奇百怪的峭壁巉岩，满山松竹，桃李夹径，渊深水碧，景色优美。

清晨7时，恭送次序为：“首为宣导旗，次为国旗，次为军旗，次为军乐队，次为花圈、花球，次为卫戍军队，次为匾额，次为清音，次为提炉，次为像亭，次为警察队，次为挽联，次为县小队，次为挽幛，次为清音，次为提炉，次为主亭，次为男女十校学生，次为普通团体，次为地方官厅，次为陶社同人。”^① 队伍由徐社出发，向西经过广香桥折而往东，穿过北海桥途经大路大街，再过清道桥出五云门，到达散花亭，在朱尉乡初小学校设祭，由卫戍司令部汪京伯主祭。“是日也，吾浙政学各界送者万人，可谓盛矣！”^② 绍兴各界恭送栗主人祠，盛况空前。

各机关团体在散花亭祭奠完毕，改走水路。队伍乘船到达

① 陈骚：《陶烈士入祠记》，《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36页。

② 杨无我：《陶社缘起》，《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35页。

东湖后，依次行人祠礼，军乐队奏起了哀怨的乐曲。绍兴县长金彭年负责陶公祠的主祭。金彭年先恭请神像入祠，接着又恭请栗主人祠。随后，升礼炮 21 响。金彭年率各机关团体依次伫立，军乐队奏军乐。金彭年在神像前恭立，初上香，再上香，三上香。酹酒，献爵，再献爵，三献爵。金彭年宣读了祭文：

民国三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一日，同人等送烈士栗主于东湖入祠，谨以清酌庶羞，昭祭于故陆军中将烈士陶公焕卿先生之灵曰：呜呼！维公少时，岳岳不以温饱累其身，读书明理，而志岂在夫纡紫垂青，鉴天心之转福靡定，大好江山，安忍夫久占于清。于是驰驱海岛，濯足东瀛，奔走于革命垂十余年，而事业渐见有成。洎乎武汉发难，薄海响应，东南半壁，义施飞腾，而公之志遂一朝申。然其时东南虽已底定，扬鞭北指，未颠覆其二百数十纪之帝廷，公乃运筹大局，驻节沪滨，方瘁心于军书羽檄，囤富仓盈，庶几纵横锋镝，肃号令而张威明。公之奔走革命，无非为国为民，掬此心肠，可质天日，容有夫纤毫权利之争，顾宵小奸党不能见谅而猝起其仇害之心。鉏麂夜遣，鬼域昼侵，贼刺来歛，盗杀元衡。山海东堕，勃碣北倾，中原折柱，三灵震惊。痛哉！而公竟成仁，罪人未得，戎首未惩，公之血既三年而碧，则奇冤至今未伸，然忠勇义侠之气，固浑沦磅礴充塞乎九垓太清。风声所播，足以起孱懦而警顽冥，身死而名不死，复何待乎忘人是谬，籍慰公灵，唯是人道不可问。同人等惻惻其情，追仰英烈，泪涕沾襟，安可虚俎豆春秋之所，不逮一楹，而况吾越为公桑梓乡，尤不应缺乏其神灵之式凭。今也，新祠鸿启，大典恭行，岚水色绵千禩，而供

献明湮，海可枯而石可烂，丰功伟绩，则与天地长名，陈辞緘痛，神其来歆！尚飨！^①

最后，金彭年带领祭者行鞠躬礼。军乐队奏军乐。主祭者与祭者又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陶公祠祭奠完毕，主祭者率祭者依次退出。

陶社同人赞叹陶成章烈士的丰功伟绩：“夫烈士为国而丧其生，其功则在于国；为民而丧其生，其功则在于民。所赐于国于民者甚大，非唯国家报功，不敢旷厥典，即人民歌颂，亦将永永不忘，顾于一乡而斤斤焉，为烈士俎豆明裡谋，不亦大烈士者而转小烈士欤？虽然，吾越为烈士桑梓乡，当日邑人士之私淑烈士者实众。痛烈士之为国为民而丧其生，援乡党尸祝之义而祀之，要无不可也。况其地，水竹明瑟，湖山清丽，游赏者终岁不绝，祀烈士于其间，不特重为胜景生色，其所以兴瞻拜者之感叹，而点化社会风俗于无形，其功宁有纪极哉！”^②陶公祠临东湖面，风景幽绝，几席湖山，支霄万古，威仪肃穆，灵爽式凭。陶成章的英灵与湖水青山为伴，与天地齐名。

《越铎日报》也发表了悲壮的《陶焕卿先生入祠纪念词》：

中华民国纪元一月之十有三日，盗杀陶公焕卿于沪。阅二年，十有一月之八日，公之邑人士悯公以奔走革命而死，其功不可泯焉。国家纪功虽曰有典，而煌煌青史又足以垂其不朽。然吾越为公桑梓，乡邑人士之景仰徽烈，感泣英灵者，所在皆是。设无俎豆春秋之所，不唯无以凭其英魂毅魄，即后生小子

① 陶社同人：《祭章一》，《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49页。

② 陈骚：《陶烈士入祠记》，《陶成章史料》，1987年版，第137页。

欲一竭其抠謁瞻拜之誠，亦悵悵而莫得。是則故乡崇祠之設，其再可一日虛哉！遂辟东湖為公祠，建立粟主。謹于是日，恭送而實之。其地去公生長處，不二三十里。邑人有熟諗公家世者，謂公之先人當朱明時一簪纓累奕大族也，自入清後，公之系，例不仕清，終清世二百六十餘祀，皆讀書耕牧以為業，無有以華袞榮其身者，迄乎公之兄，始青一衿，然非公志，故去而扶桑，承先人志，引覆清為畢生大事，茧足枵腹，驅馳于東瀛南洋者垂十數年，其時詭厥心術，視革命為養生起家之事業，同儕輩方罔僑民財帛，以為生涯，公聞而憤然不可遏，檄數其罪，遂為若而人所不容，欲得公而甘之心者，初不待光復事起矣。洎乎武昌發難，公乃应于東南半壁河山，不數十日，而慶底定，皆公之擘劃為多，浙人舉公督浙，免凶庸庸者攫此一席而去，貽禍浙人。公不可，以為戎索未定，危疆待鎮，遂節駐海上，運籌北伐事宜，當是時，先覺之士知世之欲不利于公者實多，語公有所戒備，公坦然不介懷，以為身殉大局固無所惜也，況同舟共命，濟此時艱。使天良未泯者，稍一思維，當不出此，而不知鬼域心腸，但謀權利得爭，雖滅絕人道之舉動，要亦無所顧忌，白虹貫天，五步流血，而公遂為盜所殺矣。嗚呼！痛哉！夫革命者至神聖之事業也，非血性男子，不足以當此而，乃雜猥鄙貪瑣于其間，緣而自利，冰炭不相容，薰蕕不并器，正人君子之不免，亦固其所，一丸見贈，此豈正人君子之所惧者乎！公之不免，蓋公所目審也。雖然，可死者身，不可死者名，死公者，今已身同齊侯之鼠，不敢出一頭于光天化日之下，公則大名垂宇宙，與湖山而并古矣！況乎風雨三楹俎豆得所，從此春秋佳日，邑人士之過烈士祠堂，崇拜英雄，瞻肅廟貌，行將歷千萬祀而不替。懿欤，盛哉！

维天纵之英毅兮！志在灭胡；挺侠骨而奔驰兮！不辞马瘡；蕴奇烈而卒发兮！狄氛乃除；庆举义而光复兮！薄海欢愉；惊楮柱而中折兮！痛极黄墟；鉴神灵其赫奕兮！前导参旗，而后殿雷车；招魂以奠俎豆兮！寿与青山碧水而俱。

镜水呜咽，稽山同悲。

第三节 光复瓦解

陶成章遇刺后，光复会的擎天巨柱顿时折断，光复会作为一个革命团体随即土崩瓦解。“焕卿一生为革命事业奋斗乃至被刺，光复会遂丧失其主脑，势渐瓦解，诚有人亡政熄之慨！”^① 武昌起义爆发后，“辛亥革命军起，光复会员在各省统领军队者，浙江有浙军总司令朱瑞，江苏有吴淞光复军司令李柱中，广东有汕头民军司令许雪秋、陈芸生。自陶成章在上海医院被刺，遂丧失其主脑，势渐瓦解，朱瑞旋任浙江都督，以疾去世，李柱中解职闲居，后为洪宪请愿六君子之一，许雪秋、陈芸生在汕头，与同盟会员之领军者不合，势成水火，时孙大总统尝一度致电粤督陈炯明为之排解，其后雪秋、芸生卒不免为清总兵吴祥达所杀。”^② 光复会群龙无首，光复会会员也风流云散。

光复会会长章太炎长于理论，陶成章勤于实行，两人珠联

^① 陶冶公：《光复会的组织和发展》，《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页。

^② 《光复会》，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6页。

璧合。陶成章“果敢英断，遇事勇为，切实力行，不辞艰险。每遇有大事，由章先生论决，成章先生即为推行尽利，因而相得益彰，而当时革命成效乃大著。”^① 尽管陶成章是光复会副会长，却“负责实际会务，正会长章太炎，不过挂个空名而已。陶处事精明干练，深得华侨信任，光复会革命经费的筹集和会务擘划，几乎是他一人的力量”^②。光复会重组后，势力壮大，遍及南洋群岛，在光复东南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章太炎和陶成章的密切配合分不开。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面目暴露后，章太炎依然进行不屈不挠地反对专制统治的斗争，但一介书生，孤军奋战，备尝艰辛。章太炎原本就不负责光复会的具体会务，陶成章遇难后，章太炎失去倚重力量，光复会也在无形中解体。因此，章太炎称赞陶成章为“国宝”^③。

光复会内有同盟会的追杀，外有袁世凯的假共和欺骗，光复会的巨擘陶成章又遇刺身亡，光复会顷刻间就分崩离析。“陶成章死后，光复会中有号召力的实力派没有了。”^④ 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也发出哀叹：“成章死，光复会也暗不章。”^⑤ 光复会始于上海，也终于上海，犹如一颗璀璨的慧星，划过天空，消逝在茫茫的夜空中，一去不复返。“光复会事前之功，则伯

①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0页。

② 杨镇毅：《光复会和光复军》，《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页。

③ 章导：《章太炎与王金发》，《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④ 陈觉民：《蔡子民先生二三事》，《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⑤ 章太炎：《光复军志序》，《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4页。

荪与吴樾、熊成基皆其人也。而上海、浙江之独立，功与武昌伯仲，及拔南京，亦光复会人赞师为多，可谓无负于中国者。”^① 光复会和同盟会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均做出了重大贡献。“两会共同努力完成了辛亥革命之大业，颠覆了奴役汉人将近三百年的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放着异彩照耀千古，丰功伟绩，两会与有共荣。所惜者焕卿、许雪秋、陈芸生，皆有功于革命的，不死于革命时敌人之手，而死于革命成功后同党陈其美、陈炯明的暗杀。死者抱憾终天，生者亦为之太息痛恨！而今两会皆成为历史的陈迹，两会人物亦多半死亡，昔日为名位之争，自相残杀真可为历史鉴戒了。”^② 1912 年底，原部分光复会会员聚集沪上，回顾已经逝去的光复会的辉煌历史，唏嘘不已，并发起征集光复会的史料，撰写《光复会史》。上海《神州日报》连续几天登载了有关征集光复会史料的广告，陶成章被刺后不到 1 年时间，光复会就成了历史名词。

征集光复会史料^③

敬启者：光复会之组织，始于上海，而推暨于南洋。庚子中国议会以后，同盟会未兴以前，薄海革命之唯一机关，实为此光复会，此吾同志所共认也。若徐锡麟、熊成基、赵声、温生才诸烈士，以及毁家起义于黄冈之许雪秋君等，亦莫非光复

① 龚宝铨：《自叙革命历史》，《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5 页。

② 陶冶公：《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歧与合作》，《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57 页。

③ 《征集光复会史料》，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463 页。

会中人。去岁江、浙规定，光复会之伟功，尤冠于时。惟于南北会员皆尚实践，而不事标榜，耻于希图权利，而又未设言论机关，以故会中行动，常尚隐秘，而不为世所知。今幸共和告成，前此光复会员率皆投入共和党中。昨在沪上集议，拟即搜集事实，编为光复会史，用留纪念。光复会史，约分五门，依类搜集资料：（甲）光复会之创立时期；（乙）光复会之停顿时期；（丙）光复会之继兴时期；（丁）光复会历年之事业；（戊）光复会之会员。凡此五者之史材，如有稔知之人，无论光复会员与非光复会员，敬希依类详叙，寄交上海《神州日报》馆编辑部转交光复会史编辑员为荷。

征集光复会的史料，撰写《光复会史》，自然不能缺少光复会巨擘陶成章的史料。于是，《神州日报》在刊登征集光复会史料的同时，也刊登了征集陶成章史料的广告。

本社征集陶焕卿君事迹^①

敬启者：会稽陶焕卿烈士成章，为光复会继起之伟人，功绩彪炳，勋业未终，而为仇党戕害，识者引为心疚。本社前登广告，征求陶君事迹，颇蒙同志远道惠示，无任感铭。惟以陶君功业尤彰著于南洋诸岛，征求详尽无遗，须求南洋光复会员详析开示，以便著为专传。特再广告，敬希天南诸君从速开示，不胜翘跂之至。本社谨启。

《神州日报》是否征集到光复会史料，已不得而知，但并未编辑出版《光复会史》，唯一能见到的有关记载光复会历史

^① 《本社征集陶成章君事迹》，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3页。

的一本小册子，就是1913年12月龚翼星撰写的《光复军志》，共分《党会》、《上海》（上下）、《吴淞》、《攻宁》、《北伐》、《解兵》、《军用》等8篇，章太炎写了序，主要以李燮和作为主线，着重谈光复军的兴起与解散，谈不上是光复会的全史，也与共和党在《神州日报》征集光复会史料撰写《光复会史》似乎没有关系。《神州日报》曾征集部分有关陶成章的史料，惜已散失。

光复会作为与兴中会、华兴会并存的三大革命团体，兴中会与华兴会组成同盟会之后不复存在，光复会仍作为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长江中下游的苏浙皖赣闽地区以及南洋和日本开展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光复会与其他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一样，有与生俱来的致命的缺点，“光复会是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只着重联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事联络会党的工作，又不深入，更没有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因此力量渺小。”^①光复会的解散与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个人的悲惨结局，与资产阶级革命必然失败的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

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开国之日，成了民国创建者光复会及其领袖陶成章的寿终正寝之时，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

第四节 中山祭陶

革命党人取得辛亥革命的初步胜利，同盟会就针对光复会

^① 沈颢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

制造兄弟相残的恶性案件。在上海，陈其美排挤打击并企图谋害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诱杀了镇江军政府参谋光复会会员陶骏保，暗杀了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在广东潮汕地区，光复会会员许雪秋和陈芸生部，为同盟会会员广东都督陈炯明部缴械，许雪秋和陈芸生也惨遭杀害。曾为推翻封建专制王朝而奋斗的光复会会员，没有被清政府所镇压，反而被昔日的同志同盟会倾轧而消亡，大批光复会会员为此抱终天之恨。而同盟会并未因屠杀光复会会员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永占优势之政党”，相反，由于革命力量遭到严重削弱，革命队伍迅速腐化，加上革命意志的日趋衰退，同盟会无法与袁世凯抗争，被迫将革命政权拱手交给袁世凯。袁世凯窃取民国的大权后，很快就露出了真面目，昔日放下武器的同盟会会员立即遭到追杀，宋教仁被刺，陈其美被杀，孙中山和黄兴也被通缉，被迫流亡海外。辛亥革命昙花一现，无可奈何地失败了。许多光复会会员“所太息痛恨者，独以光复、同盟自相水火，同致覆止，亲见其成，而又及见其败耳”^①。辛亥革命旋起旋落，遽成明日黄花。

1916年6月6日，窃国大盗袁世凯气绝身亡，寓居上海莫利哀路7号的孙中山应浙江省革命党人和督军吕公望的邀请，以中华革命党总理的身份，于8月16日乘沪杭快车抵达杭州。以光复会会员兼同盟会会员、《越铎日报》社长孙德卿为首的绍兴革命党人，通过绍兴县知事宋承家，向省公署提出，邀请孙中山莅临绍兴一游。

^① 龚宝铨：《自叙革命历史》，《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孙中山欣然接受了绍兴各界的盛情邀请。

8月19日7时半，孙中山离开下榻的杭州清泰第二旅馆，在浙江督军吕公望等省各界首脑的恭送下，乘轿到江干，搭轮渡过江到西兴，换乘越安轮船公司专轮，前来绍兴。

孙中山一行下榻于花巷布业会馆，由陶成章的族侄绍兴县商会会长兼布业总董陶荫轩负责接待。孙中山稍事休息后，约陶荫轩畅谈。陶荫轩鉴于会馆有些喧闹，邀请孙中山到咸欢河寓所一叙。孙中山欣然允诺。

孙中山在陶宅大厅前下轿，向迎候的陶氏子侄一一致意。随后，迎入客厅，上茶敬点，稍事寒暄。

“西厅人静，请孙先生到西厅小坐。”陶荫轩请孙中山到西厅喝酒。

孙中山来到西厅，移金樽而对皓月。

陶荫轩在《天放楼戊辰年日记中》中，记录了与孙中山夜访咸欢河寓所的对话，经陶氏后人陶维墀整理，详述如下。^①

先生曰：“仆此番不去嘉兴而来贵县者，正为焕卿之死，深为痛心耳！仆与焕卿邂逅于海外，一见同心，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共磅礴于海内外者已十余年，其志则何尝一日不相同，不意革命甫成，焕卿猝然遇刺，举国为之酸心。仆此次来绍之目的，正为吊元勋，祭陶社，慰烈属，抚老幼，以表仆之哀思。君为陶氏族中巨绅，请君善为仆安排之。”

先大父曰：“荫轩藉焕卿叔之介绍，得识先生于革命之

^① 陶维墀：《孙中山先生访绍第一夜》，《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92年版，第15页。

中，深以为荣，敢不直言以告者，荫轩一介粗人，言有不当处，乞勿见罪。焕卿叔之死，人皆知为陈其美使人暗杀，未知先生知其情否？”

先生曰：“仆于辛亥年末匆匆返国，方就总统之任，国事倥偬，猝闻噩耗，惊惶万分。时盛传满清派间谍南下，谋刺杀民国要人，不意竟加之于焕卿，后虽有英士所为之传闻，仆亦未讯得其实。”

先大父曰：“先生谅已见魏兰之行述，辛亥后，陈其美出手枪于上海会场，声言欲击焕卿叔，秋间焕卿叔刚回国至沪，沪上即盛传陈欲刺陶之说，其后刺客潜入广济医院枪杀焕卿叔，各节谅先生亦有所知。”

先生默然。

先大父继曰：“传此一切皆为清室宗社党所为，岂陈等受清室之派遣乎！无怪乎焕卿叔遇刺后，旋即停止北伐之师，倡南北和议之说，不一月即迫先生让位于袁氏，共和几危，使焕卿叔在，必不出此着。”

此时，先生不慎失箸，先大父忙唤仆人换箸，举杯致敬。

先生徐曰：“仆亦尝闻其美云焕卿欲杀他，曾于仆前振臂欲扑杀焕卿之意。焕卿死后，仆遭袁氏之忌避诸海外，其后二次革命，护国战争相继兴起。陈、陶间之齟齬，仆不及细察，此诚仆之过失。今仆初返国，其美已遇刺，袁氏在举国声讨中下世，共和重建，思焕卿之勋绩与旧情，特来祭吊其灵，以表仆之哀思。”

先大父曰：“光复上海之役，陈其美轻敌遭擒，使光复会人真欲杀其美，何必从溷厕中救其命。光复会人决不出此。李燮和舍身陷阵，陶冶公敢冒矢石，正因与同盟会休戚相关，同

舟共济，从民国之大局着眼耳！上海军政府一建立，其美即撇开光复会于不顾，争都督之位，不惜以枪弹威胁，继则阴谋杀害焕卿叔，何负恩一至于此耶！”

先生默然。

先大父又曰：“焕卿叔莅沪后，其美向其索取自南洋募得之巨款。其美挟妓使酒，自以为革命成功，大局已定，抢地盘，树势力，图一己之利，北伐之志淡薄，内江之局已成，自以为即使进不能一统天下，退亦可以备安于江左。后果如此，先生亦有此同感观乎？”

先大父继曰：“焕卿叔一怒之下，另在吴淞建根据地，练兵屯粮，旨在扬戈河朔，直捣燕京。岂欲与先生分庭抗礼耶？”

先生颌之。

又曰：“汤寿潜离浙，浙人欲推戴焕卿叔为都督，又为其美所妒，然焕卿叔以身许国，早怀功成身退之志。其举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耳”

先生曰：“不意焕卿防范未严致遭暗算，遂成千古之恨，使仆亦难以自明。”

先大父曰：“焕卿叔为人性偏急，谗人间之，致先生疑焕卿为保皇派，而焕卿叔亦媒孽先生之短，此皆为亲痛仇快之事，而在总统人选上，先生或有所不悻，而革命成功之日，清廷遗老改弦更张仍居要位，国人何尝悦服，岂独焕卿叔一人耶！以先生之勋德位望，推为国之元首，为全国人民所共戴，自不待言。”

先生曰：“仆与焕卿，早年同心革命，共经患难，虽间有齟齬，然其志则一，皆为恢复中华也。昔文文山自北归江南，

几为宋之地方宋臣所杀，历尽艰险，然此皆宋室忠良之臣，总之谗人弄舌，以致焕卿疑我，我歉焕卿，焕卿一死，光复会星散，北伐受挫，遂成袁氏攫权，国步艰难之局面，仆至今思之，亦追悔无及。”

先大父曰：“焕卿叔死，光复会群龙无首，名存实亡，实其美一人之过耳。光复会同志于黄花岗，于武昌，于上海，于江宁诸役，躬冒矢镞，舍生取义，此皆焕卿叔十年经营之死士也。革命方成，严令解散，甚至下令缉捕，使天下志士寒心，为清室快意。昔洪杨内讧，天国云亡，焕卿遇刺，民国几殆，真千古令人痛心疾首者也。”

先生曰：“解散光复会之事，时仆已辞职，亦无能为力，且仆亦曾遭缉捕，夫复何言。”

先大父徐曰：“使光复会不散，焕卿叔不死，以夹辅先生，共成大业，国步何至艰险如此。先生既能让位于袁氏，奈何不能容焕卿叔一席之地，同仇敌忾，齐心北伐，驱逐鞑虏耶？今袁氏虽死，遗部尚在，后事尚未可知，其美为一己之利，造成今日之局势，其于民国之罪亦大矣！”

先生颌之。

先生曰：“焕卿十年跋涉，一生革命，固民国之元勋，其功永垂史册。仆闻噩耗后，即电令江浙、上海督属严缉，务令凶徒就缚，明正其罪，以慰焕卿之灵，泄天下之忿。克强亦电令严缉，以慰死友，并设法保护太炎君安全。凶犯王竹卿今已伏诛，亦可稍慰焕卿于九泉矣。”

先大父曰：“先生之电，人疑先生知情，甚至默认；克强之电，人指黄、陈朋比为奸。人谓如此大事，英士不先请示先生，亦可谓跋扈将军矣！今王竹卿虽诛，何足以塞天下之口

舌，荫轩尝闻陈泰有言：‘惟有斩贾充可广谢天下，’今凶徒亦为陈所纵逃，众口如何能掩，焕卿叔一生革命，竟为革命者所害，陶案迄今未清，千古成疑，此诚越之人与陶氏之族所共痛心疾首者也。”

先生默然。移时，孙公微醉，先大父亦有醉意，遂并肩缓步庭园。

先生谓：“陶案未得水落石出，仆亦长恨，今其美亦遭暗杀，无法审察。果尔，亦已冥冥相报，可解恨乎？英士虽为仆股肱，意见亦时有相左。仆不能救焕卿之死，诚有负良友。此行正为祭陶社，隆礼仪，重恤典，吊元勋，抚遗属，以表仆之心，务请代向越中父老、陶氏族人，致仆之诚意。尚期同心协力，同建共和，以成焕卿之遗愿。”

又叮嘱曰：“烈士遗属务必邀请，彼或有所遗憾，亦世之常情，事在君之善为安排耳！”

先大父心知其然，徐又言曰：“公为民国之元勋，首倡革命，建立共和，光复华夏，国人皆翘首望公，荫轩敢不效犬马之劳。焕卿叔死后，老父子幼，孤儿寡妇，生计维艰。宋知事虽已邀请品三公，恐其不来，已嘱荫轩再请，今晨已专人备函赴陶堰邀请，送信人已返，云品三公明晨来城。”

旋商谈抚恤金额，商定每年给恤金七百元。

酒后，复进瓜果，献香茗，先生盥洗更衣，略坐片时，便告辞归。

临别，先大父向孙公进言曰：“荫轩幼年少读书，长为公民之末，不谙礼义，今言语唐突，请先生海涵包容。今日见先生撤岗警，撤轿帘，疏于戒备，一旦有不肖之徒，豫让之行，荫轩将何以对国人，窃为先生危之，然亦以此益知先生之胸襟

坦然。”

先生笑曰：“此何足道哉！”

先生谢先大父曰：“承盛情接待，殊深感荷，尊府真是地如五柳先生逸，贫有千金范子多，异日河清海宴，仆当借君家一席之地，作稽山鉴水终日之游。”

先大父笑曰：“寒舍尚宽裕，足容尊驾，今日怠慢，明晚薄具小宴，略尽地主之谊。”

先生欣然笑诺。

8月20日上午十时，孙中山游龙山回到布业会馆，会见清晨步行从陶堰赶来的陶成章的父亲陶品三。原来绍兴县县知事宋承家昨天已派人到陶堰通知陶品三进城见孙中山，陶品三还不敢相信。后来，陶荫轩也派人来通知，陶品三才信以为真。陶品三非常激动，一夜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就从陶堰步行进城，来到布业会馆。

孙中山一见到陶品三，立即起立，上前握手。孙中山首先肯定了陶成章为辛亥革命所做的重要贡献，对陶成章不幸遇难表示哀悼，并向陶品三一家问好。

孙中山询问：“陶成章烈士遇难后，家庭情况如何？生活是否过得去？”

陶品三如实回答：“浙江军政府发的抚恤金，大部分还了债，一小部分造了几间住房。谢谢孙先生的关心。”

孙中山了解陶成章遇难后烈士家境清寒，立即对陪同的浙江省民政厅主任秘书陈去病说：“焕卿先生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大功劳，请代写条子给浙江省都督府，建议从民国五年开始，追加故陆军上

将陶成章烈士年抚恤金七百元。”^① 此项抚恤金直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南京政府，才下令取消。

应商会的邀请，孙中山出席了在布业会馆北首的觉民舞台举行的绍兴各界欢迎大会。

商会总董高云卿主持了欢迎会，孙中山在热烈的掌声中，起立脱帽致谢，并发表演讲。

仆此次来绍，无非凭吊辛亥革命先烈遗迹，观览绍兴风光，欣赏稽山镜水。蒙诸公不弃，备极欢迎，愧无所长。但仆为民国国民，宗旨既定，山可移而志不可改。若吾国既为民主国，仆亦当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若吾国为君主国而不脱专制气象，仆惟有亡诸海外，以俟机会之可乘，再与诸君共造民主。所以仆前因袁氏破坏民主，而复专制，观诸父老兄弟姐妹，虽抱不平，无如绝无起而与争者，故仆亦只得避诸海外。此次幸袁氏已死，黎公继任总统，故敢归国与诸公谋面也。

专制国为一人之国，共和国为人民之国。尽人皆知，毋待赘述。惟国家强盛与否，非一人之力可以成功，必须合群力，而后可成世界最强盛之国。何也？比如数椽破屋，人苦其不能遮风雨，欲改建华厦，人皆赞成之。既赞成，当力向前拆其破屋，改筑新屋，庶几可享安乐。若徒赞成，而仍袖手，岂但安乐之不得，直将受砖瓦之打击也。

浙民知识，较他省为优。西湖岸上之烈士墓，纪念尚存（引者注——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烈士墓，均在杭州西冷

^① 甘禾、张菊林：《“愧我今招侠女魂”——记孙中山先生三吊秋瑾》，《孙中山研究》（第1辑），1993年版，第135页。

桥一带)绍兴河畔之牌坊不少,此非有知识之作为而何?

绍兴乃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地,报仇雪耻之邦。继承越王勾践奋发图强之精神,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绍兴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三烈士,功莫大焉!

孙中山最后说:“乃知当今之国家,非一人之国家,乃我人民之国家。既知国家为人民之国家,国家之强弱,人人有莫大之责任矣!”^①

孙中山说完,来宾演讲,最后由高云卿致词。会后,孙中山留影纪念。

半个世纪以后,朱仲华回忆孙中山声情并茂的演讲仍历历如绘。“孙先生演讲大意是绍兴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地,报仇雪耻之邦。继承越王勾践奋发图强精神,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绍兴出现了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三烈士,对革命运动起了重要作用。”^②

下午,孙中山坐轿去南街参观成章女校,在陶成章烈士遗像前默哀致敬,摄影留念,并询问了学校情况。临别时,成章学校师生十分感动,校门内外排列欢送的人群,目送孙中山的背影,久久不愿散去。

8月21日下午,孙中山在孙德卿的陪同下,与陶品三一起,坐烟波画舫去五云门外五里的东湖,到陶社致祭陶成章烈士。

① 陈德禾:《孙中山先生越游纪实》,《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4年版,第6页。

② 朱仲华:《回忆孙中山先生莅绍经过》,《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孙中山一行浩浩荡荡，景象肃穆。

孙中山径直来到陶社，旋即举行祭陶仪式。

哀乐奏起，如怨如诉，如泣如思，清酒三杯，薤露一曲。孙中山思旧泪潜，陶品三痛子心酸，陶荫轩同根悲极，祭社众宾，陶社儿郎，同洒伤心泪。

祭陶由孙德卿司仪，奏哀礼，默哀，由陈去病致祭文，孙中山致悼词。

祭祀完毕，孙中山、胡汉民、邓家彦、朱执信、周佩箴、陈去病、宋承家、孙德卿、薛瑞骥、齐豹、孙寅初、张天汉、张琴荪、陈瘦崖、王铎中、陶品三、陶荫轩、陶辑民等 18 人于陶社前合影留念。

孙中山痛心地对陶荫轩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①

东湖主人陶辑民在稷山藏书楼大厅举行欢迎会，介绍了东湖的历史和天然景观。孙中山也作了重要讲话，并即书“焕卿同志千古：气壮河山。孙文”横匾，赠送给陶品三，高度评价了陶成章的革命功绩。

陶辑民设晚宴招待，孙中山称赞东湖之美和鱼虾之鲜，并询问陶辑民与陶成章的关系。

陶辑民回答：“同族不同房，陶堰共西、东、南三房，又各分长次二房，共六房，成章出于东长房，辑民与荫轩皆出于南长房。”

陶辑民补充说：“光绪年间同在心云公所办的东湖通艺学堂见过面。”

^① 陶维堉：《陶氏史记》（下册），1996 年版，第 310 页。

孙中山赞叹：“陶烈士在此读书，东湖内设立陶社，更富纪念意义，这里还有陶公祠，桃源祠，小小亭台楼阁，处处引人入胜，真似桃源之仙境。”^①

自1912年陶成章遇刺后，“中山先生在越人、陶氏家族、光复会间，关系很紧张复杂。”^②陶成章的妻子孙晓云“于中山亦间有微词”。^③1916年孙中山的绍兴之行，陶氏族人对于孙中山给予了更多的谅解。

第五节 万古流芳

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杀害陶成章的凶手蒋介石掌握了国家政权，有关陶成章的革命功勋长期遭到封锁，陶成章的许多史料也遭受湮没的命运。蒋介石为了掩盖其杀害陶成章的罪证，还企图派人暗杀陶成章的夫人孙晓云。尹锐志获悉后，秘密通知孙晓云。孙晓云不得不隐姓埋名，避往上海南市煤炭巷，才幸免于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陶成章在辛亥革命中立下的功勋得于重见天日，陶成章的后辈也得到党和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1950年底，绍兴县人民政府授予陶成章“革命烈士”称号，其家属也享受烈士待遇。1981年10月9日，首都各界人士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

^① 陶维堦：《孙中山访问绍兴记》，《绍兴文史资料》（第15辑），2001年，第165页。

^② 陶维堦：《孙中山访问绍兴记》，《绍兴文史资料》（第15辑），2001年，第159页。

^③ 陶亚成：《光复会成立前之来龙去脉》，李永鑫主编：《光复会与民族觉醒》，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会，叶剑英主持了纪念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耀邦作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和陶成章等具有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的爱国志士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进步。胡耀邦指出：“在辛亥革命时期，许多爱国志士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行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著名的风云人物有陆皓东、郑士良、黄兴、章太炎、邹容、陈天华、宋教仁、朱执信、廖仲恺、蔡元培、胡汉民、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熊成基、刘静庵、詹大悲、张培爵、吴玉章、陈去病、柳亚子、居正、于右任、李烈均、蔡锷、朱德、焦达峰、董必武、林伯渠、冯玉祥、续范亭、张奚若、司徒美堂以及其他许多人。在他们中，除了当时牺牲的先烈以外，有些人继续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有些人进一步成了共产主义者，也有些人后来离开了革命。所有为辛亥革命建树了功勋的人们，永远受到人民的称颂，他们为革命牺牲奋斗的高尚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学习。”^① 1983年7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鉴于陶成章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将陶成章批准为国家级革命烈士，并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以资褒扬。

绍兴人民永远铭记陶成章烈士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所立下的丰功伟绩。1912年4月21日，陶成章烈士刚遇难不久，为了实现烈士生前热心教育和普及女子教育的意愿，胡似杰、陈琳珊等四位女士鉴于绍兴只有明道

^① 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汇报》，1981年10月10日。

女学一所女校，为发展女学起见，发起创办“成章女学校”，并举行了开学典礼。陶成章的生前好友蔡元培、鲁迅、孙德卿、魏兰、龚宝铨、沈钧业、赵汉卿、徐叔荪、胡妘杰、陶清尘等13人，在上海和南洋等地筹集资金3000元，在绍兴南街舍子桥下原清朝绍兴府同知衙门废址建筑校舍一幢，得到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的批准，并拨付没收的东关镇地主景五四的沙地600亩作为校产。章太炎获悉成章女校建立的消息后，异常欣慰，即书《成章学校赞》，以寄情志：“中原向明，海隅未晓。陶公孟晋，与徐分道。诚动宾萌，义夫云扰。杀身之由，志大地小。薰莸判矣，终为国宝。”^①章太炎高度评价了陶成章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贡献，誉为“国之瑰宝”。成章女校的小礼堂上悬有蔡元培亲笔题写的白底黑字校训匾额，上书“义恕仁”三个大字，并有自上而下的中楷跋文：“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是谓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谓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谓仁。”^②并题写了校歌：“纪念烈士建一个成章小学校，我与你小弟妹读书好地方，要仁义要恕信校训记在心，备将来振个新改造旧环境。”^③解放后，校址迁往禅法弄，1962年，纪念陶成章烈士牺牲50周年之际，改名为成章小学。每年1月14日陶成章烈士罹难日，学校都要召开悼念烈士逝世大会，绍兴各界均派代表参加。成章小学是民国成立后绍兴建立的第一所纪念烈士的名人学校，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目前已成为绍兴的名校之

① 《成章学校赞》，《章太炎全集》（第5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页。

② 王保良：《忆母校 怀先烈》，《成章校庆纪念册》，2002年版，第72页。

③ 《成章小学校歌》，《成章校庆纪念册》，2002年版，第14页。

一。陶成章烈士对革命事业彪炳史册的业绩及其伟大的人格和精神，成为成章学子奋发向上的无穷力量。

为了继承陶成章烈士的革命遗志，绍兴县人民政府又于1996年5月16日将烈士故乡的陶堰镇中学改名为成章中学。2006年5月16日，成章中学举行了命名十周年的纪念活动，陶成章的长孙陶永铭为成章中学的陶成章像揭幕。成章中学承传陶成章爱国、报国、兴国的精神，以“扬成章精神之魂，承成章报国之志；修中华传统之德，求中华复兴之学”为德育总纲，努力培养具有中华民族优秀品德，以复兴中华为己任的一代新人。

1981年10月，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绍兴市人民政府在东湖原址拨款重建了被日军拆毁的陶社，充实了革命文物和史料的陈列。绍兴县人民政府还重修了陶成章烈士故居，于1998年4月5日，纪念陶成章烈士诞辰120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并列为绍兴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2004年11月6日，为了纪念光复会成立100周年，缅怀陶成章等光复会先烈的光辉业绩，绍兴市政协文史委在绍兴联谊会馆举行了纪念座谈会。绍兴市委宣传部、市政协、市社联、绍兴县政协、县文广局以及陶堰镇党委有关领导和文史委委员以及光复会会员的后裔陶成章烈士长孙陶永铭、曾孙陶侃以及光复会历史研究专家近30人，赴陶堰陶成章故居和东湖陶社参加了陶成章铜像的揭幕仪式。绍兴市政协副主席陈伯怀在陶堰陶成章故居陶成章铜像揭幕仪式上作了重要讲话。光复会烈士家属代表陶成章的长孙陶永铭在东湖陶成章铜像的揭幕仪式上致谢词。

2005年9月23日，为纪念大通学堂创办100周年，绍兴市政协文史委、市社科联（社科院）和绍兴市文旅公司（文

物局)等单位联合举行了纪念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大通学堂创建者的后代陶成章烈士长孙陶永铭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有关人士共计30余人,他们相聚一堂,共同缅怀辛亥革命先驱的光荣业绩,庆祝大通学堂百岁生日。在纪念座谈会上,革命先贤的后裔、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回顾了大通学堂的辉煌历史,讲述了陶成章等革命先辈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

陶成章的后人感谢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照顾,民进绍兴市筹委会和第一届市委主委陶永铭先生无限深情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我的家。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也才有我的家。因此,我们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继承先烈遗志,无愧于先辈。”^①党和人民政府充分肯定了陶成章为辛亥革命所做的重要贡献,陶成章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

陶成章烈士永垂不朽。

^① 陶永铭:《党和人民政府对陶成章家属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2006年3月3日),(未刊稿)。

参考文献

一、文献资料

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1—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57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6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4. 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5. 张湘炳、蒋元卿、张子仪编：《辛亥革命安徽资料汇编》，黄山书社1990年版。
6.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7. 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岳麓书社1986年版。
8. 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9.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注：《陶成章信札》（修订本），

岳麓书社 1986 年版。

10.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11. 周蒂棠、秋仲英、陈德禾编：《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12. 郭长海、郭君兮编注：《秋瑾全集笺注》，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 年版。

13. 郭延礼选注：《秋瑾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4. 徐乃常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15.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16. 《孙中山全集》（第 1—2 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17.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下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18.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 1—8 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9.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下册），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20. 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21. 魏兰：《浮云集》，1991 年版。

22.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 1—18 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23. 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24.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1—10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5.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鲁迅全集》（第1—16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6.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胡汉民先生文集》（第1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

27.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1—6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28.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28年版。

29.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年版。

30.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

31.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32. 杨天石、王学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33. 《东浦镇志》，1998年版。

二、文史资料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8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 浙江省辛亥革命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 民革浙江省委孙中山研究学会、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文集》，浙江省新闻出版局1991年版。

11.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粹》（政治军事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2.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粹》（经

济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13.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粹》(教育科技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14.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粹》(文化艺术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15.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粹》(社会民情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16. 浙江省政协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联谊委员会、民革浙江省委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研究》(第 1 辑), 1993 年版。

1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暨南京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 6 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18.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杭州文史资料》(第 4 辑), 1984 年版。

19.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杭州文史资料》(第 17 辑), 1992 年版。

20.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杭州文史资料》(第 18 辑), 1993 年版。

21. 绍兴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陶成章史料》, 1987 年版。

22. 绍兴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徐锡麟史料》, 1986 年版。

2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绍兴市委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绍兴文史资料》(第 1—20 辑), 1983 年至 2006 年。

2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绍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1—19辑），1985年至2005年版。

25. 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组：《辛亥革命绍兴史料》，1981年版。

2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嵊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嵊县文史资料——王金发学术讨论会暨殉难七十周年纪念会资料专辑》（第2辑），1985年版。

2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嵊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嵊县文史资料——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5辑），1987年版。

2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嵊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嵊县文史资料——辛亥革命史料续辑》（第8辑），1992年版。

2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金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金华文史资料》（第2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金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金华文史资料——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专辑》（第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金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金华县文史资料》（第4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云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和文史资料——云和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1期），1985年版。

3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陈英士》，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3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湖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州文史——陈英士先生史料专辑》（第 1 辑），1984 年版。

3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温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资料》（第 7 辑），1991 年版。

3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温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资料》（第 15 辑），2001 年版。

3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乐清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乐清文史资料》（第 1 辑），1984 年版。

3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乐清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乐清文史资料》（第 9 辑），1991 年版。

3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武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武义文史资料》（第 1 辑），1986 年版。

4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仙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仙居文史资料》（第 1 辑），1986 年版。

4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仙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仙居文史资料》（第 2 辑），1987 年版。

4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平湖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平湖文史资料》（第 3 辑），1988 年版。

4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衢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衢州文史资料》（第 5 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4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缙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缙云文史资料》（第 1 辑），1985 年版。

4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丽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丽水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版。

4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丽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丽水文史资料》（第18辑），2001年版。

47. 政协浙江省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萧山文史资料选辑——汤寿潜专辑》（第4辑），1993年版。

48. 浙江省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浙江体育史料》，1982年第1期。

49.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0. 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51. 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52. 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秋瑾史集》，华文出版社1989年版。

53. 金希聪编：《秋史遗响》，京社出版2006年版。

54. 金希聪编：《鉴湖女侠别录》，京社出版2004年版。

55. 金希聪编：《秋侠诗魂》，京社出版2004年版。

56. 金希聪编：《秋瑾史录》，京社出版2005年版。

57. 金希聪编：《秋瑾纪念集》，京社出版2001年版。

58.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59.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60. 《革命史资料》，1986年第4期。

61. 绍兴市越城区成章小学九十周年校庆筹委会编：《成章小学校庆纪念册》（1912——2002年），2002年。

62. 绍兴市文化局、绍兴市文物管理处编：《绍兴名人名胜录》，1985年。

63. 陶永铭：《光复会党人录》（初稿），（未刊稿），2001年12月26日。

64. 陶永铭：《陶成章世系简历》，（未刊稿）。

65. 陶永铭：《陶成章生平事迹》，（未刊稿）。

66. 陶永铭：《陶成章与陈英士》，（未刊稿），1994年。

67. 秋经武编著：《精卫石之殒——秋氏亲人记秋瑾》，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

68. 李兴潇、李兴藻：《追忆先父李燮和》，自费出版物2004年版。

69. 《苏杭甬路事研究会演说录》（1907年11月10日），原件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三、论著

1. 朱育和、欧阳军喜、舒文：《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3. 徐和雍、赵世培、郑云山：《浙江近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 金普森、陈剩勇主编：《浙江通史》（清代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 金普森、陈剩勇主编：《浙江通史》（民国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 钱茂竹：《辛亥革命研究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

7. 胡国枢：《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杭州出版社 2002 年版。
8. 汪林茂：《浙江辛亥革命史》，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9. 朱顺佐、李永鑫：《光复会》，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10. 魏建猷主编：《中国会党史论著综录》，上海历史学会 1984 年版。
11. 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第 1—2 卷），学苑出版社 2005 年版。
12. 郑云山：《光复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13. 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编：《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 1987 年版。
14. 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15. 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16. 沈晓敏：《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17. 张宪文、方庆秋主编：《蒋介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18. 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上下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年版。
19. 李敖：《扒蒋介石的皮》，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1 年版。
2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

版社 1992 年版。

21. 日本《产经新闻》社撰、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 2 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22. 莫永明：《陈其美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

23. 绍兴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绍兴市教育志》，1993 年版。

24.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研究集——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 13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5. 张晓唯：《蔡元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26. 陶侃：《蔡元培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 2004 年版。

27. 尚明轩主编：《孙中山的历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

28. 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29.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30. 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

31. 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32. 徐立亭：《章太炎》，哈尔滨出版社 1996 年版。

33. 石彦陶、石胜文：《黄兴传》，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34. 郑云山、陈德禾：《秋瑾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35. 郭长海、李亚彬编著：《秋瑾事迹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6. 郭延礼：《秋瑾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

37. 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秋瑾年表》（细编），华文出版社1990年版。

38. 王去病、朱馥生主编：《秋瑾诗词研究》，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39. 王去病、江涓、朱馥生主编：《秋瑾革命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

40. 王去病、朱馥生主编：《秋瑾评集》，中国妇女出版社2000年版。

41.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2. 孔菁慧：《风雨自由魂·秋瑾》，出东画报社2001年版。

43. [日]永田圭介：《竞雄女侠传》，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

44. 徐和雍：《徐锡麟》，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45. 陆菊仙、陈云德：《徐锡麟家世》，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46. 罗平汉：《风尘逸士——吴稚晖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47. 方光华：《刘师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8. 万仕国编著：《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 2003 年版。
49. 张继舜：《东南豪杰王金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50. 陈志放：《布衣都督汤寿潜》，1991 年版。
51. 饶怀民：《刘揆一与辛亥革命》，岳麓书社 1992 年版。
52. 饶怀民：《李燮和与沪宁光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53.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
54. 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浙江人物简志》（上中下），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5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百年大事记》，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56.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 年版。
57.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下），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58. 朱关甫编著：《绍兴宗教——地方宗教文化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
59. 陶维堉编著：《陶氏史记》（上下册），1995 年版。
60. 陈鼓应：《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案件——民国元年革命功勋陶成章遇刺案》，香港《申报月刊》，1984 年 7 月。
61. [日] 大里浩秋：《关于光复会成立前后的情况——论光复会》，《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 112 册，平成 2 年 3 月。
62. 朱顺佐：《光复会群体思想研究》，1993 年版。
63. 孙元超编：《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1 年版。

64. 朱顺佐、张能耿：《江南人才名镇——陶堰》，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65. 朱顺佐：《江南人物春秋——绍兴东浦》，广州出版社 1993 年版。

66. 朱顺佐：《绍兴贤人志》，1984 年版。

67. 绍兴市妇女联合会编：《绍兴百年妇女运动史》，2001 年版。

68. 裘士雄：《文史掇拾》，中华书局 2001 年版。

69. 陈国治编：《绍兴名人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4 年版。

70. 李永鑫主编：《绍兴名士评传》，远方出版社 2002 年版。

71. 《绍兴名校名师》编委会编：《绍兴名校名师》，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年版。

72. 李永鑫主编：《光复会与民族觉醒——纪念光复会成立 100 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73. [日] 实滕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年版。

74. [日]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75. 陈民：《民国华侨名人传略》，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76. 章玉安：《绍兴文化杂识》，中华书局 2001 年版。

后 记

浙江近现代史以研究民国史为主，而绍兴的近现代史又以研究光复会为主。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和秋瑾都是绍兴籍的光复会著名的领导人，学术界对蔡元培的研究较多，无论是传记，还是学术专著，都是汗牛充栋。秋瑾作为一个为革命献身的女革命家，更是让人钦佩和景仰，许多作家，特别是女作家，撰写了大量的秋瑾文学传记。有关秋瑾研究的论文和评传，特别是小传，更是数不胜数。徐锡麟也有几种传记出版。而作为光复会自始至终的实际领导人陶成章，因为曾与孙中山有过不同意见的分歧，其研究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冷落，光复会及其领导人陶成章的历史地位，也未得到学术界客观公正的评价。因此，我们确定光复会和陶成章作为研究的重点。

然而，当我们真正着手整理陶成章的史料时，才发现难度很大。除了汤志钧主编的《陶成章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注的《陶成章信札》，绍兴县政协文史委编的《陶成章史料》外，其他可供依据的材料很少。陶成章遇刺后，光复会很快就烟消云散，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同盟会以及国民党掌握了政权，光复会的历史被漠视。蒋介石曾是刺杀陶成章的凶手，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曾以给陶成章家属抚恤为名，从陶

成章家人手中要去了大量的陶成章信稿，后来下落不明。可供参考的陶成章史料奇缺，特别是陶成章早期的史料更是稀少。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际，陶成章的长孙陶永铭先生及时提供了许多陶氏家族的史料，陶成章信札手稿，大量的报刊资料以及陶成章的历史照片。陶永铭先生毕生致力于陶成章的研究，撰写了大量陶成章的文史资料，熟悉陶成章所有的历史，对祖父陶成章的感情至深且厚。我们在写作过程中，每当碰上不清楚的问题，陶永铭先生均能给予解答，指点迷津，并提供资料的来源和出处。有时，我们每个星期都要见一二次面，连续几个小时讨论有关陶成章的问题。《陶成章传》能够顺利完成，与陶永铭先生和陶侃教授的大力协助分不开。

我们还要感谢陶成章研究专家钱茂竹先生。钱先生既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又是光复会和陶成章研究专家，撰写过《陶成章传》和《陶成章年谱》，出版了《辛亥革命史研究文集》，写了大量研究绍兴地方史和光复会以及陶成章的论文。钱先生提供了许多陶成章研究的资料，并且不厌其烦地解答我们的疑难问题。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特藏部的钱斌老师，专门研究绍兴地方历史和文化，对光复会首任会长蔡元培的研究情有独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光复会和陶成章的史料，特别是她教我们在网上书店购买资料，解决了陶成章史料奇缺的问题。我们以前收藏的大都是苏区史资料，辛亥革命的史料很少，光复会的史料更少。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大都是80年代出版，通过网上书店邮购，史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陶氏家族史研究专家陶家峻先生，提供了陶氏家族早期从江西迁往陶堰的史料，明清时期陶堰的举人、进士及职官的资料。秋瑾的侄孙秋经武先生和侄曾孙秋晓鸥先生提供了有关秋瑾的资料，秋

经武先生屡次与我们深入讨论秋瑾和皖浙起义的有关问题。汤彦文先生提供了汤寿潜的有关资料。毕生致力于搜集整理秋瑾史料年近百岁的金希聪先生，寄来了编辑的《秋史遗响》、《鉴湖女侠别录》、《秋侠诗魂》、《秋瑾史录》和《秋瑾纪念集》等五书，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秋瑾研究资料。蔡元培纪念馆馆长章大国先生提供了前光复会会长蔡元培的有关资料，我们就蔡元培与陶成章的关系多次进行深入的交谈。陶成章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我们一度为此极为忧虑，章大国先生激励我们知难而上，使我们没有半途而废，并最终完成了《陶成章传》的写作。绍兴市政协文史委主任何信恩先生提供了绍兴文史资料，我们就光复会与陶成章的研究问题作了多次长时间的探讨。绍兴市政协的陈国富先生提供了纪念大通学堂创建100周年、纪念光复会成立100周年以及陶成章铜像揭幕仪式的有关资料。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赵玲华副主任、新昌县史志办的金式中副主任、新昌县政协办公室的吴刘江副主任、诸暨市史志办的谢卫星先生，为我们查阅有关资料提供了方便。湖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饶怀民教授，提供了自撰的有关辛亥革命的专著。绍兴文理学院法学院的徐家恩副教授提供了徐锡麟的有关资料。长期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林文彪副教授，提供了其撰写的有关光复会和陶成章的论文。欧阳云梓博士帮助收集整理了大量光复会和陶成章的有关资料，并提供了有关光复会的论文。越绝书店的老板章镛先生提供了大量的绍兴地方文献资料。成章中学和成章小学提供了校史资料。上海图书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浙江省图书馆、浙江省档案馆、浙江省博物馆、绍兴市图书馆、绍兴县图书馆、绍兴县档案馆、绍兴市政协文史委、绍兴市党史研究室、嵊州市政协文史委、嵊州市

党史研究室、金华市政协文史委、金华市婺城区政协文史委、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绍兴文理学院法学院资料室等均为查阅有关资料提供了方便。

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裘士雄先生曾参与《陶成章史料》的编辑工作，对陶成章的史实如数家珍，提供了部分陶成章及光复会图片，并在百忙当中，仔细审阅了《陶成章传》的初稿，提出了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

绍兴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俞云根先生、副院长周幼涛先生、副院长张仲清先生，勉励我们从事越文化研究，为《陶成章传》的撰写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兼越文化研究院院长王建华教授、副院长王建力教授、党委副书记宋培基教授、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高利华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寿永明教授、绍兴文理学院宣传部部长梁涌教授、教务处长朱志勇教授、法学院党总支书记陈均土副教授、党总支副书记陈林刚副教授、甘宗郊教授、黄华均教授、章越松教授、俞婉君副教授、李建华老师、史正东老师、李新荣老师、吴艳萍老师、周琰老师、诸霞明老师、宁荷花老师，以及越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周一农教授和潘承玉教授、钱汝平博士、王海雷教师和蔡新法老师，给了我们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在此，特致衷心的谢意。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IyMTYwNjguemlw",
  "filename_decoded": "12216068.zip",
  "filesize": 30805728,
  "md5": "02897de831d31f7af2ad9ce2aff059c3",
  "header_md5": "f288bc1920f8ecd96505985561213e28",
  "sha1": "73e370f92f631fc5190f0bc6c7447ac2f4086a13",
  "sha256": "2ef2f627dfe2acf232ad4229b0a940abeb2688f883a3cf8376fc1afa5edd80d3",
  "crc32": 2130521673,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31315537,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474,
  "pdg_main_pages_max": 474,
  "total_pages": 492,
  "total_pixels": 196321382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